

新世纪河南文学论

——《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导言^①

李 勇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新世纪以来,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给河南这块厚重而沉滞的土地带来巨大的冲击。河南作家身处这一时代现实,以善感的心灵和敏锐的笔触,回应历史询唤,勾画出新时代的中原历史变迁画卷。田中禾、李佩甫、李洱、墨白、邵丽、乔叶、南飞雁、李清源等作家的创作,瞩目中原历史和现实,以传统或先锋的姿态,书写出历史中人的卑微与高尚、沉沦与挣扎。他们所组成的本土河南作家的队伍,与省外和海外的豫籍作家一起,展现了这块土地对于文化、心灵的磨砺和滋养。

关键词:中原文化;河南文学;“中原作家群”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01-09

一、什么样的土地,什么样的文学

2010年一个秋日午后,我乘车去开封。车走的是郑开大道,一条宽阔无比的省道。未有高速之前,这应该是郑州到开封的主干道。它还另有一个名字,叫郑汴路。一个“汴”字,道出了时间的深度。那个下午,秋高气爽,天高地远,四野的庄稼散发着秋天的气息,一眼望去,一片秋日特有的斑斓。那开阔、平坦、辽远、丰厚,让人心醉神迷。这开阔平坦的土地,当然也是丰茂的。郑开大道向我背后伸展,便是郑州市区。与这条大道相连的一条大道,也是郑州的主干道之一,叫农业路。郑州还有农科路、丰产路、丰庆路……这些道路的名称,标志着这个城市、这块土地的特征。在这样一个一切都飞速变迁、升级换代的时代,还有这样一个城市如此执着地保存着它和一个旧文明形态的联系,不免让人诧异。然而,也没有什么好诧异的,就像这块土地上所生长的作物一样,那些小麦、玉米——北方最常见的、也最

重要的粮食作物,它们年年被种植在郑州市北黄河两岸辽阔的土地上,每到丰产在望的六月,我所居住的郑州西郊便弥漫在一股浓郁的麦熟气息中。风从早吹到晚,灌进鼻腔的,是儿时无比熟悉的味道。那空气中的气息,甚至偶尔还有随风远扬而来的麦糠,或者高楼大厦间偶或走过的面目黧黑的乡民,都无比生动地标志着这块土地的文明印记。

一个城市的特征,是否也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特征?这里的人们,平凡、朴实。中原多土而缺水,不管今天的郑州还是开封,所拥有的有规模、有气势的“水”,只是一条黄河。纵天降甘霖,河有分支,对广袤的中原大地来说,也都是杯水车薪。缺水的生命,就像缺水的土地一样,总是少了那么一丝灵气,不过却也成就了另一种憨实。这里的人们喜欢说一个词:中。这个词的词源意义和其文化基因,是否和古人对“中原”方位的指称有关不得而知,但今天河南人话语中的它的意涵,代表的是一种肯定的应答,一种应许和承诺,一种让人感到熨帖和亲切的质朴、

收稿日期:2019-08-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ZW15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1批特别资助项目(2018T110733);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2016GGJS-009);郑州大学2019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9ZZUJGLX051)

作者简介:李勇(1980—),男,山东滨州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直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爽快。不过，当它又常常失信于生活的无常和无奈，以及人的功利和有限时，你又会更深切地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的一种虚荣和狡黠。

关于“河南人”的话题，不说也罢。这个对河南人来说比较尴尬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很庸俗，甚至有些无耻。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无法摆脱尴尬。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在我们羞于启齿的背后，也隐藏着某种真实——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在李準的《黄河东流去》中，河南人衣衫褴褛避水西行；在田中禾的《五月》中，贫穷与不公扼杀着青年女大学生的人生憧憬；在李佩甫的《羊的门》中，前现代王国的子民仍在顶礼膜拜他们的君王；还有刘庆邦的《神木》、邵丽的《刘万福案件》、乔叶的《拆楼记》、南飞雁的《红酒》、李清源的《胡不归》，等等，生命的流离、湮灭，人性的挣扎、扭曲，一切都曾在这里或正在这里上演。

这一切并非河南所特有，但似乎只有在河南这块土地上，这一切的苦难和残忍，才表现得如此酷烈，如此撼人心魄、触目惊心。当然，你也可以说，文学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总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但这可能只是我们为自己强找的一种“不至于如此”的理由。文学里的“河南”反而可能更为有力地揭露了这块土地的一种深在的真实。

那么，这种“真实”究竟是什么？——贫穷、苦难，或者愚昧？

那些生长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作家，对于这块土地的了解也许是最深切的——

宋代以前，中原是最好的一块土地……好在哪呢？中原地区一马平川，四季分明，四条大河，三条流经平原，黄河、淮河，还有济水，就是发源于济南那个，济南就是济水之南嘛，不过济水后来被黄河淮河吃掉了，几乎是插根棍子就可以发芽的土地，气候环境条件非常好，这是最有利于人生存的地方。但是宋代之后，逐渐走向衰落了，这是被彻底征服过的一片土地，后来我称它为“绵羊地”。杀气太重了，历年战乱不停，不是有句话说，得中原者得天下，后来被征服后，人民像草一样，命很贱，独立意识很差，群体意识极强，密度很大，但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生生不息。

另外，还有自然条件的原因，就是黄河。黄河连年泛滥，民不聊生，而且黄河滚来滚去，从来没有被征服过，但是新中国成

立之后彻底锁住了。新中国成立前，黄河对河南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是一条“害河”。河南人“走西口”，为啥“走西口”呢？背水而逃，西边高，东边低，逃水啊，河南天灾人祸，连年逃荒，逃亡的路线就是一直向西，第一站就是西安，西安现在有一半人是河南人，最远乌鲁木齐……对黄河的记忆是河南人最坏的记忆，我去豫北黄河看过，（那边的人）都没有建设意识，淹一季，收一季，锅都在树上挂着呢，都没有建设家园的意识，随时准备逃跑。淹一年人跑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第二年必然大丰收，因为那淤地是很肥沃的。吃一年，但是第三年又淹了，所以他不建设，生活质量偏低。^②

李佩甫的描述，也许并不全面，但确也道出了这块土地的历史的真实——这历史又决定了现实。而河南作家以及他们的文学，又是这样一块土地上开出的别样的生命之花。关于文学的“河南”，并不止于河南作家的描绘，在湖北作家方方 20 世纪 80 年代著名的小说《风景》里，河南人出现在武汉郊区，他们聚居于一个据说真实存在过的、被称之为“河南棚子”的地方；在陕西作家高建群新世纪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大平原》里，逃水西行的河南人，足迹远至陕西、新疆，他们在人烟稀少的西部土地上，以河南人特有的坚毅、顽强生根发芽、繁衍生息……

所以，“生存”应该是河南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第一生命要义。而相应地，与生存有关的话语，则是河南文学最显要的话语。于是我们在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甚至《一句顶一万句》）、田中禾的《十七岁》、李佩甫的《李氏家族》中看到了那无尽的战乱、贫穷、苦难，颠簸其中的人们避难、逃荒……既然有生存的悲苦，便有争夺和算计，便有勾心斗角、狗苟蝇营，不管李佩甫、南飞雁、乔叶笔下的官场，还是阎连科、刘震云、李洱、墨白、李清源笔下的乡村，围绕权力的算计和争夺，无异于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既然有这人与人的战争，也便有了有形和无形的伤害，便积蓄了疮疤和病疾，于是便有了这块土地上文学的另一个显豁的主题——愚昧。遍览河南文坛的那些优秀作家的作品，它们几乎无一不与“愚昧”这个主题有关。

然而，这块土地上这些最优秀的作家作品所共同述说着的这个主题（“愚昧”），难道不正是由另一个主题（“贫困”）所决定的吗？无以复加的苦难和

贫困,令人错愕的人性变异,共同造就了河南文学特有的生存叙事和启蒙叙事。有时候,在李佩甫的《羊的门》、乔叶的《拆楼记》、阎连科的《黑猪毛 白猪毛》那样的作品中,贫困和愚昧的纠缠,甚至让我们无法辨清——它们到底谁才真正具有根本性?

已经去世的陕西作家红柯曾经批评陕西人精于算计,“每个毛发都在算计中”^{[1]340},其实他说的并不只是陕西人,而是更广义的内地人、中原人。中原人多,地广却人稠。“人稠”虽然是大多数中国内地省份的共性,但如果想要见识真正的人稠景观,还是应该到中原,到河南(比如可以去郑州火车站或上下班时段的花园路、中州大道)。人稠自然就意味着资源短缺,意味着活命的严峻,意味着竞争,意味着铤而走险。我第一次读刘庆邦的《神木》,惊讶于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竟还有这样的罪恶与黑暗,但那嗜血的獠牙难道不是因为生存的逼迫?后来又看他的《到城里去》,那里面已经没有了獠牙和血光,但是那生存的疼痛已经弥漫、蔓延成了一个乡村女人从青春少女到蓬头垢妇的一生……还是那句话,这一切在其他地域也在发生,但似乎只有在河南这块土地上,在这块土地上的作家的笔下,这一切才如此惊心动魄。

更让人忧心的是,今天的河南和今天的整个中国一样,一切都在飞快加速,一切都在飞快改变。大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日趋加剧,时代转型改变着整个社会的面貌。相较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变化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仅以我所在的郑州市高新区为例,二十年前它还是一片农地,新世纪前后大学西迁刺激了它的发展,但直到十年前的2010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这里仍属于不发达的城乡接合部,当时租处所在的小区,四周有大大小小近十个城中村,大概五六年前,当地政府下达改造令,所有的城中村不到一年时间全部拆除,又一眨眼,高楼林立起来,街道绿化起来……道路拥堵起来,房价火箭般蹿升起来。就在那几年,李佩甫的《生命册》正好发表,我读这个小说时,看到吴志鹏喜欢的那个女孩子梅村租住在一个城中村,便想到自己当年常去的那个城中村,那个村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杂货摊、生鲜市场、修车店、台球室、棋牌室、出租屋、夜市应有尽有,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家烧饼店的烧饼特别好吃,而且特别便宜。还有村头的一对个子小小的卖柴鸡、柴鸡蛋的夫妇,他们来自河南周口,租了村子里的林地,散养柴鸡和柴鸡蛋,因为林地就在村边的大桐树下,抬

头即见,所以柴鸡和柴鸡蛋应该货真价实,也常有人开车穿越大半个市区来买。对于这个村子的记忆和印象,后来成了我读小说时对“城中村”“出租屋”这样的情节的全部想象来源——我想象着《生命册》的梅村被人欺骗后在那个城中村中凄惶度日;也会想到李清源的《苏让的救赎》里苏让和他的女朋友也是在那个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吵架、分手;还会想到乔叶《认罪书》里的金金也曾在那样一个出租屋里栖身并预谋着她的复仇大计……

而这一切,随着城中村一朝消失,现在都已是过眼云烟。当告别发生后,我们总觉得一切恍如昨日,但时间一往无前、从不回头,直到那曾经的一切突然发现已变得如此遥远。这时,也便会有一种恍惚感。而恍惚,可能只是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的一种轻飘飘的观感,那些置身其中的人们呢?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完全置身事外,我们也身在这种迅疾的变化之中,受它冲击,对它希冀或慨叹。然而,和新世纪文学里的那些人物及其命运相比,我们的体验确实是更为外部化的。在河南作家笔下,那些酷烈的生存现实,那些曾经的历史,至少是我不曾经历过的。

而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又赋予了这群作家怎样的精神品格和文学样貌呢?

以新世纪河南作家和河南文学的表现来看,我们首先要提到的,仍然是忧患。这种忧患,既有现实的,又有历史的、文化的。忧患的面向,也决定着忧患的深度。所以在老作家身上,那种现实与历史交织的文化纵深感更让人印象深刻,比如田中禾与李佩甫。田中禾在新世纪之后的写作,比如《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更多地取材于历史;李佩甫的《城的灯》《生命册》《等等灵魂》《平原客》等则更瞩目现实。但不管是书写历史还是现实,作家笔端所渗透的,是对于时代、对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忧患。^{③479-482}

而谈到忧患,尤其是从历史或现实这种取材面向来看待这种忧患的话,那么新世纪当代文学的精神关怀似乎莫不如此展开。具体到河南作家而言,这种忧患的特殊性又在哪里?我认为应该还是在它的批判指向——文化。而这种文化批判又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对于前现代的精神状态、文化形态的一种批判。当然,说到文化批判,或者说那种启蒙主义式的对于前现代精神状态、文化形态的批判,又非河南作家所独有。但这种批判的激情在河南作家身上似乎又表现得最为普遍、最为集中。以新时期而言,我们便能够数出乔典运、刘震云、阎连科、李佩甫等一

个个作家的名字,这也使得河南文学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悲抑、滞重之风。在这种情况下,李洱、墨白(其实也包括刘震云)那种更注重文学形式和语言探索的写作,便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了。他们的这种写作路向和风格,不管是否以“先锋”为名,至少相对于河南文学整体性的悲抑、滞重文风而言,是有着显著的差异的。这种差异的根源,还是在于他们内在的语言和形式创造的激情。不过,这种激情既生发于这块特殊的土地,又借助于这块土地的人事和历史以外化和表达,那么它也便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这块土地特有的滞重。这也便形成了这些作家身上共同的一种既前卫又传统、既叛逆又回归的特征。

李洱、墨白身上的这种矛盾性,也许更能说明这块土地的沉重。而另一个关于这块土地沉重的证明,来自更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尤为突出的是那些女性作家。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河南文坛,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在启蒙叙事的文学传统里,男作家一直占有压倒性优势,在此背景下,邵丽和乔叶的启蒙叙事表达便显得尤为醒目和突出了。这两位女作家的创作,其实如果仅以“启蒙叙事”来概括和归纳的话,显然是有些不够的,她们的女性经验使得她们的写作与那些男作家相比,显然要更具特殊性。然而,若过于突出和强调她们写作的性别特征,又会使我们陷入另外的误区,因为无论乔叶还是邵丽,她们更为成熟的作品,比如《刘万福案件》《认罪书》等,其实都超越了一般的性别叙事,而具有一种更普遍、更开阔的精神追求和气质。这种精神追求和气质,一定程度上又让她们和她们的男性前辈殊途同归。也许,正是这种介于启蒙叙事和性别叙事的两间性,恰是她们写作的个性所在。

在证明传统的强大方面,莫过于不同代际作家的精神呼应。邵丽、乔叶属于“60后”和“70后”,她们超越其女性性征的表达,显示出对传统的依承,而更年轻的李清源、南飞雁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超越代际对传统的依承。关于这种依承,当我们想到更年轻的一代仍然有墨白、李洱这样的反传统者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更年轻的一代对传统反而更为亲近。他们对“现实”的信仰、对时代的焦虑,以及对现实主义写作路径的选择,都是他们依承传统的证明。而当我们对于河南文学整体性的风貌有所把握,并对它的创生和突破寄予希望的时候,新生代的这种表现却让我们有所犹疑——这是年轻一代的保守,还是这块土地的强大与雄厚?

谈到对于这块土地的审视,我们似乎还需要寻

找一种更超脱的、更外部化的视角,就像于万米高空俯视大地一样,这样也许才能将这块土地看得更清楚。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择了周瑄璞和方丽娜两位与这块土地有着血脉关联,但却游离、出走的作家作为我们观察和研究对象。她们都是生长于河南这块土地(临颖、商丘),后来去往了外省和海外(陕西、奥地利),但是故土的文化基因会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改变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种文化基因又以怎样的形态存在于她们出走的生命之中?

二、新世纪河南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以及其他

对于文学发展而言,任何时间性的分期都难免蹩脚、生硬。但是语言的力量也在这里,当我们使用一个时间概念——比如“新世纪”——来界定某种客观世界变化时,即便这种客观世界变化并不一定完全局限于这个时间范围,但这个时间概念其实已经暗暗渗透到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时间概念也便开始建立起超出它自身的内涵,从而具有了一种更丰富的历史意涵。换句话说,所谓“新世纪”,并不一定非要从“2000年之后”来理解,恰恰相反,我们可以从其背后的历史内涵入手,对它做更丰富、立体的理解——它不仅是一个时间性表述,也是一个包含了一定历史内容的事件性表述。这个“事件”便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正是这种发展,赋予了“新世纪”以特殊而丰厚的历史内涵和历史意义。新世纪的河南文学,便是植根于这一历史之中的,再加上河南新文学叙事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共同形成了此间河南文学的突出特征。这个特征,大约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对于时代现实的强烈关注。其实近三十年来,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起,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向便已开始。作家对于转型加速期时代现实的书写,汇成了此间除现实主义冲击波之外,还包括底层文学、“非虚构”等在内的诸多文学浪潮。而这其中,河南作家的表现应该是最突出的。以新世纪为例,我们看到身在河南本土的李佩甫、乔叶、邵丽、南飞雁、李清源,以及离开河南的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梁鸿等作家的创作,都莫不直面时代现实。他们的《生命册》《拆楼记》《刘万福案件》《红酒》《丁庄梦》《湖光山色》《到城里去》《中国在梁庄》等,都是直击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之作。这些身在河南省内和省外的河南作家,关注时代现实的热情是不约而同的。这一点,在其他省市的作家身上并不多见。作家的写作

取材因个性、趣味、学识、经历等有所不同应是常态，但在河南作家身上，却共同表现着对时代热点话题的巨大热情。这些话题又尤为突出地集中于两点：城乡问题、官场问题。乡村叙事、官场叙事历来为河南作家所擅长，而新世纪以来，这两种叙事在分别发展的基础上，日渐呈现出合流之势。比较早的如李佩甫1999年发表的《羊的门》（及其后来的《生命册》《平原客》等），后来如乔叶的《拆楼记》、邵丽的“挂职系列”等，都不再单纯地描写“乡村”或“官场”，而是以一种更开阔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视野，整体性和宏观性地呈现转型时代的新型社会问题——它们与现代和前现代文化冲突下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形态密切相关。河南这块传统而古老的土地，面临的是时代和历史性的裂变与转折，其中的撕裂、阵痛可以说是其他土地所不具有的。这也成全了河南作家笔下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人生和命运故事。

第二点，是河南作家的情感猛烈程度。这种情感猛烈程度，首先表现于其作品中的人事惨烈程度，这一点如果读过了刘庆邦的《神木》、邵丽的《刘万福案件》、阎连科的《丁庄梦》、李清源的《胡不归》等，相信不会陌生。当然，若论人事之惨烈，并不一定是直接性的血淋淋的悲剧，还可能是一种“无形的杀戮”，比如李佩甫笔下那块阉人的“平原”、南飞雁的“七厅八处”。说实话，我常常想，他们写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故事，如果放置于其他地域，很可能会让人觉得不真实，但让它们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由这些作家痛彻心扉地讲出，却每每都让人无法不动容。其次，这种情感猛烈程度还表现于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作家态度。新世纪河南文学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前面提到过的那种作家的文化忧患态度。这种文化忧患在其他地域作家身上也有，但河南作家却尤为直接和强烈。以其官场叙事来看，李佩甫、乔叶、邵丽等对官场的批判，有一个火力集中点：“权力—关系”文化。其实，这种带有强烈启蒙意味的“权力—关系”文化批判，是可以进一步延伸、扩展为一种更深层的文化反思的。但在大部分河南作家身上，这种“延伸、扩展”却往往被激烈的批判情绪所阻断，从而使其多滞留于一种浅表性的社会和历史批判，而无法上升为更深层、更悠远的文化反思。这一点和陕西作家便形成鲜明对比——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典型的文化反思之作；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虽然写的是社会转型，但却透露出更高远的文化道德重建的雄心和理想主义的情怀。河

南作家整体而言，缺少这种宏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

以上两点也决定了河南文学的第三个特征，即比较典型但又比较特殊的批判现实主义风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朴素的写实手法再现客观现实，河南文学显然是这样的一种风格。但河南文学却又因前述诸种原因而有自己的个性。首先，河南文学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的倾向。阎连科笔下那有着森森白骨的“耙耧山脉”，邵丽《第四十圈》中惨烈的仇杀，刘庆邦笔下吞噬人性和生命的暗黑矿井等，都是这一特征的体现。其次，是这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覆盖性。在河南当代文坛，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不仅是主调，而且是绝对的主调。本书所论及的河南作家（不包括周瑄璞和方丽娜），除了田中禾（他的部分创作带有浪漫主义风格）、带有先锋意识的李洱和墨白外，其他作家的创作全是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不论中青年作家、老作家，男作家还是女作家。若范围扩大，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河南文学看，这一结论同样成立。^④这种大规模的前后相继、无论男女的文学追求在其他省份亦属罕见，比如气候地理和河南相似的山东，莫言、张炜、尤凤伟、王方晨的文学气质和河南作家便有明显差异，尤其是其个体间差异看起来也要比河南作家更大。而在陕西，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文学气质显然有异，^④高建群、红柯的浪漫主义风格也各有千秋。这些北方省份的文学风格总体要比河南文学的风格要更多样一些。

这样一种创作特性，共同形成了新世纪河南文学的个性。这种个性，或许不具有“质”的独特，却有“量”和“度”的惊人。如果说这种文学特征可以用现实主义来概括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富有中原特色的现实主义——它形成于中原特有的“现实”，并以某种群体性和共性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样貌形成了一种“主义”。传统的形成，必定是多种因素的集成。这个过程是无形的、无意识的，但却有着强大的同化力。乔叶说她早年并不希望自己被贴上“河南作家”的标签，但“现在就比较认命，真的就觉得自己是个河南作家”，因为在她眼里，河南作家“就是很像”^[2]。九岁便离开河南迁居陕西的周瑄璞，近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多湾》《日近长安远》都笔落河南，追寻一种已逝去的、理想化的中原文化和中原精神，其内在的激切、忧愤，与贾平凹、陈忠实等陕西作家有异，而与河南作家如出一辙，她说：“我作品的魂魄，好像只有落脚在故乡那片土地

上,才有所寄托,才有着深扎大地的强大生命力。”^[3]而另一个关于河南文学同化力的证明来自于李洱和墨白,他们的写作虽然都有着“先锋”的面目,甚至作家本人也自命为“现实主义的叛徒”^[4],但其实他们作品的血肉,乃至他们生命的根基,都与中原大地紧紧相连。

在论述新世纪河南文学特性方面,我们选择了十位作家(田中禾、李佩甫、墨白、李洱、邵丽、乔叶、李清源、南飞雁、周瑄璞、方丽娜)。而“新世纪”即便作为一个单纯的时间范畴,对他们的创作而言,也是意味着某种根本性的发展变化的。田中禾生于1941年,新世纪之后发表的《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相较于他之前的创作,在艺术风格、主题表达上都有较为明显的变化;李佩甫生于1953年,除了《羊的门》(1999)之外,其他代表性作品《城的灯》《生命册》《平原客》等,都发表于新世纪;李洱新世纪后发表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明显摆脱了他早期的先锋写作风格;而同样的变化,也程度不同地发生在墨白身上;至于更年轻的邵丽、乔叶、周瑄璞、方丽娜,她们更是于新世纪前后才在文坛崭露头角;而李清源、南飞雁则是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才跃立文坛。所以,“新世纪”对我们所论述的这些作家而言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可以独立讨论的时间范畴。

最富争议的是“河南文学”这个概念。“河南文学”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指称。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属于文学地理学范畴。文学的地理属性确实也能从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中找到相应例证,世界范围内民族、地域之间的差异与文学差异的对应,中国古往今来文学地理性的区隔,也像一个区域的人种、语言差异一样,并不是那么难于想象的。也正是因此,丹纳才将种族、时代、环境作为文艺研究的三要素加以强调。事实也是如此:“五四”以来,20年代“乡土小说派”笔下的“鲁镇”“浙东”“贵州”,沈从文的“湘西”,老舍的“北京”,海派作家的“上海”,都是现代文学时期著名的文学地理坐标;新中国成立后,柳青的“陕北”、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山西”、孙犁的“河北”,也都是著名的文学地理存在。

“河南文学”这个地域性的文学指称,显然也承袭了这样一种文学地理学传统。关于河南文学,还有“文学豫军”(“豫籍作家”)、“中原作家群”等称谓。按照孙荪、何弘等研究者的论述,这个文学流派的存在是有着客观史实支撑的。作为一个地域文学群体的河南文学,大致于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才

开始形成(现代文学时期力量比较薄弱),孙荪认为,“文学豫军”是一个源于新文学初创时期,成型于50年代,爆发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群体。它主要由“省内作家”和“豫籍作家”两部分共同组成。^[5]“文学豫军”的提法是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新时期之后最早的指称是“河南作家”。“从‘河南作家’到‘文学豫军’再到‘中原作家群’的阶段性变化”,其中隐含着时代环境变化、命名者精神诉求、文学体制规约等多种力量的制衡。以“文学豫军”为例,它在90年代的提出(以1999年河南省文学院组织的“文学豫军长篇小说研讨会”为标志性事件)呼应了当时“陕军东征”“文学湘军”等中国文坛的动向,同时也与90年代文学发展低迷从而亟需振作的文艺界心态有关。至于新世纪之后(大约2010年)出现的“中原作家群”称谓,因立足于新时代、新语境,也引入了新队伍成员(如70后的李清源,80后的南飞雁等),所以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充分使命感的论述”^[6]。

90年代以来关于河南文学的这种称谓衍变,背后虽然有时代变化和相应的文学群体变更(尤其是代际更迭)、创作特征嬗变等因素,但实际上体制的力量可能更具有决定性——在“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命名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孙荪、何弘,他们本身便是河南省文学界的领导。那么,既然是一种人为的官方主导的命名,那么便不可避免有生硬之处。不过,文学地域性命名之生硬,并不只是因为体制力量的介入,而是与这种命名方式本身所暗含的矛盾有根本性关联。这种矛盾,至少有两点:第一,地域和人(作家)的矛盾;第二,人(作家)和文学的矛盾。

先看地域和人(作家)的矛盾。首先要说的是“地域”,地域划分方式一般至少有两种,一是行政性划分,二是自然划分。前者是人为性的,后者更尊重了某些超人为性的客观因素,尤其是更尊重了地域自身的某些自然属性(民族、文化、风俗、信仰等)。行政划分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会尊重地域的自然属性(地域本身是无法改变的),但囿于现实考虑必然不会完全迁就,所以自然划分往往是超行政化的。比如我们这里所说的河南文学,“河南”是一种行政划分,而中原作家群的“中原”则是一种文化划分。于是将文学和作家进行地域划分,便必然会出现行政/文化冲突的尴尬。比如我们提“中原作家群”,这个“中原”至少从字面来看,其文化范畴所包含的地域肯定不仅仅囿于行政区域的河南一地,那么受中原文化影响和辐射的其他非河南作家是否也

属于这个群体？同时，行政区域又是随着历史发展有所变化的，今天的河南辖域肯定不同于民国时期的河南辖域，如今天商丘的某些辖区当年便属于山东，假如当年有个作家恰生于此辖区，那么他是否在河南作家之列？而至于“人（作家）”的方面，最突出的矛盾在于人是可以移动和变化的，而地域则相对固定。一个作家离开这个地域，那么他是否还属于这一地域的文学群体？如果说他的文学风格保持地域特色不变，那我们还可以把他纳入这个地域文学群体（将离开河南的刘震云、阎连科、刘庆邦等称为“豫籍作家”便是这种考虑），但是他的地域风格到底能保持多久（甚至多大程度的保持才算“保持”）？其实，根据现有的地域归属来划分作家，是我们今天惯常的做法——湖北作家姚鄂梅去了上海便成为“海派”，山西作家孙频去了南京便位列“苏军”，江苏的戴来远嫁河南便被归为“豫军”……其实全国上下除了北京有些特殊外（北京的特殊地位导致北京首先没有像其他地方作协那样迫切地打出“北京文学”或“北京作家”的旗号，其次即便也有“京派”的说法，但因其历史理解相对定型化所以也导致这个概念在今天失去了扩延的弹性），其他地方文学群所表现出来的“包容性”，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当然，如果不按行政区域划分而按文化属性划分，可能也有问题，甚至是更根本的问题——这种我们往往标举出的文化属性是否真的是地域特色？比如湘楚之地都受楚文化影响，这是勉强说得过去的，但如果单独提“文学湘军”“文学鄂军”，这两者的区别又在哪里？

这里，更根本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文学创作的个性和共性问题。共性肯定是存在的，同一个国家、地域，因为生活习惯、文化风俗、信仰、语言等相似，必定会使文学存在共性。但也并不尽然。这里暂且不提对于文学而言更具有根本性的价值立场、文学观念等，单就习俗描写、语言风格等艺术层面的问题而言，同一个地域、国家的作家其差异性可能也并不比不同地域、国家的作家要小，而不同地域、国家作家间的相似性，也可能要比同一地域、国家的作家要大。鲁迅的传人不止于浙江和绍兴，沈从文的文学后裔不会只流布于湖南和湘西——这显然是更符合事实的例证。

这里所牵扯的问题，就是人（作家）和文学的关系问题。文学地理学显然首先考虑的是主体——“作家”，而不是“文学”。这也能解释我们目前所讨论的关于河南文学的问题——“河南文学”后来被

替换为“豫籍作家”“中原作家群”，都是更突出了“人（作家）”，而不是文学的属性。其实，关于文学，一直有一种超越性的或者说理想化的理解与期待，即好的文学不应该只属于某一地域；或者从创作论的角度来说，一个作家的写作应该有面向世界和全人类的抱负。虽然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鲁迅），这样的说法也广受认可，但这个说法的重点显然在后半部分——“世界的”。“世界的”是归宿，是目标；而“民族的”则是方法，是途径。这里有体用之别。或者更明确地说，“世界”是一种价值追求，而“民族”则更多是一种风格追求。这样说可能并不完全准确，但也基本符合事实。无论从创作还是接受而言，对文学的这种超越性（超地域、阶级、种族）理解和期待，相信我们都不陌生。而在文学理论领域，现代阐释学、结构主义等学派，也都是在消解文学的主体性，其背后也是一种追求普遍性的冲动。如果说20世纪这些反人本主义思潮过于极端的话，那么我们能举出的更切实、更具体的例子是——有些作家的创作确实是比较缺乏地域特征和地域属性的，我们读《红楼梦》会觉得曹雪芹是北方作家还是南方作家？莎士比亚、卡夫卡的写作和他的故乡有多少关系？^⑤甚至，柳青的写作和赵树理、周立波相比，某种程度上也是回避地域性的；80年代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对地域性更是不屑一顾。也就是说，至少从理论上和某些事实来看，人、文学与地域之间的对应是不同的——一个人的长相、说话口音、生活习惯等可以很南方化或北方化，但他的写作却可能是朝向世界的。所以莫言文学的“嫡亲”是马尔克斯，而非蒲松龄，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三、余论

关于文学的地域属性和地域性划分，确实有着很多难以厘清的难题和困境。这些难题和困境，既有逻辑上的、理论上的，又有现实性的。然而，理论和现实上的这种困境，却又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即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作家的地域属性又是客观存在甚至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尤其是当我们将目光对准一些个体，而不是进行宏观的、群体性概括和定义的时候，地域属性确实又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它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个精神个体。正如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新世纪河南文学，至少就田中禾、李佩甫、墨白、邵丽、乔叶、南飞雁、李清源等人而言，河南这块他们生长和扎根的土地，对于他

们的创作而言是决定性的。而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确实也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共性——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因此，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文学地域属性的提出，只有在适用和需要的时候才应该提出？而作为一种效果检验，我们应该要观察和追问的是：地域性的提出是否为我们理解特定的——而不是所有的——文学和作家提供了帮助？

我认为，至少就河南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河南文学）而言，地域性的提出是有效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突出了这种地域性，所以我们这里选择的比较多的是河南本土的作家（有七位）——这也是我们在具体论述和行文中使用“河南作家”（而非“豫籍作家”或“中原作家群”）这个称谓的部分原因所在。因为“河南作家”通常指的就是在河南本土工作的作家群体。^⑥在我们讨论的十位作家中，情况特殊的首先是李洱，李洱是2011年离开河南，除了《应物兄》外，他新世纪的代表作《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都写于离开河南之前，加上他新世纪创作所展现的精神倾向和艺术特征，把他纳入讨论范畴应无异议。除了李洱之外，还有周瑄璞和方丽娜，周瑄璞早年便去了陕西，方丽娜则是通过读书出国并入籍奥地利，她们写作所涉及的空间场域，看起来和河南的关系更疏淡（尤其是方丽娜），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河南这块土地仍然内在性地影响了她们的写作。选择这十位作家，其实不仅仅因为他们和河南的关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价值和意义。本书的主体共分为五个部分，所讨论的“历史与现实”“写实与先锋”“女性与启蒙”“青年与生存”“外省与世界”五个话题，其实也牵扯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一些话题，比如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启蒙等。而所选择的这些作家，有的植守本土，有的出走；有男作家，有女作家；有青年，有中老年；有的前卫，有的保守——他们恰好与这些话题构成了完美的对应。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河南文学本身丰厚和活力的体现。

选择这十位作家，除了研究话题的需要，也有某种机缘。他们很多就在我身边，这些年来也曾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进入过我的视野。正是因为有这种地缘优势，所以本书也特意发挥了这一优势，而采用了一种“访谈录”的形式，力图更生动、更有力地展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并不能说这些访谈解决了我预先想要解决的所有问题，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对话和访谈带来了很多意外的

收获，它们激发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考——很多都是我之前未曾预料到的，同时又极富启发性的。和作家们对话，打破了自己惯常的凝固而封闭的纯书斋式研究，带给我极大的交流的乐趣，让我感受到一个个鲜活的、富有个性的生命，以及生命背后的土地和历史，从而获得知识和人生启迪。当然，条件有限，像老一辈作家里的张一弓、张宇、郑彦英等，更年轻的90后、00后们，乃至散文和诗歌领域的写作者，一时尚都无法顾及。这些遗憾，也是未来继续追踪观察的动力。

本书题为“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可能会带来错觉，认为所关注重点乃是新世纪文学中的河南书写或河南形象，其实并不是。我们首先指涉的还是河南作家和他们的文学，而非“河南书写”。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文学世界，当然与“河南”有关，但也不尽然，然而从更高远、更抽象的层面看，因这些作家都身属河南或与河南密切关联，故而他们的所有表达——不管是否写的是河南故事——广义而言也便都与河南相关。也因此，标题中的“河南”，所凸显的也便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性坐标，它也囊括了人、人的精神，以及这精神的外化——文学。这样的“河南”，在新世纪文学中也便形成了关于这块土地自身的一种“映像”。而通过此“映像”，我们也许能对新世纪中国文学，对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精神脉象，甚至我们自己，有更深切的把握。

注释：

- ①李勇. 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待出版。
- ②这是李佩甫和笔者对谈时所讲的一段话。对谈时间: 2018年10月10日下午15点—19点, 地点: 郑州东区瓦库。
- ③这种时代性、整体性的忧患, 可参见田中禾. 《父亲和她们》创作手记二则[M]//在自己心中迷失.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李佩甫: 文学的标尺[N]. 文艺报, 2011-04-22.
- ④贾平凹曾以如下一段话形容他们三人的不同: “陕北是高原, 高, 寒; 关中是平原, 宽, 厚; 陕南是山地, 深, 幽。”李遇春, 贾平凹. 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 贾平凹访谈录[J]. 小说评论, 2003(6).
- ⑤田中禾便不同意文学的地方划分: “我不赞成作家群的提法。文学艺术的灵魂是个性, 什么军, 什么群, 有意无意抹杀了个性, 给作家画地为牢。博尔赫斯曾经批判一些阿根廷作家的意识只属于地方, 不属于人类, 自甘于一个地方作家, 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作家和理论界尤为严重。我们不

会把歌德看作魏玛军,把鲁迅称为浙军吧?……同一个地域的人千差万别,同一个地域的作家更是千差万别。以比较文学的眼光,我们可以从地域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传统找出一些作家背景研究的课题,在艺术上,我更重视各自的不同。正如上面所说,各人的优长、欠缺有各自形成的原因,不存在可比性。”李勇,田中禾.在人性的困境中发现价值与美[J].小说评论,2012(2).

⑥何弘曾对此做过区分和界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界提到中原作家群,通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文学豫军’。之所以使用‘文学豫军’这个概念而不直接说河南作家,除了与当时流行的‘陕军’‘湘军’等概念相对应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河南作家’这个概念通常是指在河南本土工作写作的这么一个作家群体,而‘文学豫军’则涵盖了在河南本土写作的‘河南作家’及离开河南在外地发展的‘豫籍作家’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中原作家群’这个概念的提出,除了在外延上涵盖了‘文学豫军’的外延并可有所扩展外,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在这个庞大的写作群体共同的中原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从而更富文化内涵、更具学术意义。”何弘.中国新文学中的中原作家群

[J].小说评论,2012(2).

参考文献:

- [1]红柯.神性之大美:与李敬泽的对话[M]//敬畏苍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2]李勇.小说写作是我精神成长最有效的途径:乔叶访谈录.未刊稿.
- [3]李勇.只有落脚在故乡那片土地上,我的作品才有魂魄:周瑄璞访谈录.未刊稿.
- [4]李勇.我是现实主义的叛徒:墨白访谈录.未刊稿.
- [5]孙荪.关于文学豫军的话题[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文学豫军论[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文学豫军论(续)[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 [6]张翼.地方文学创作群体经典化的路径与语境:以新时期以来河南文学创作群体的命名为例[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Discussions on Henan Literature in New Century

——Introduction to *Reflections of Henan Province in New Century Literature*

LI Y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s brought great impact to Henan, a deep and stagnant land. Henan writers of this era respond to historical call with sensitive mind and keen brush strokes and draw a picture of central China's historical changes. The works of Tian Zhonghe, Li Peifu, Li Er, Mo Bai, Shao Li, Qiao Ye, Nan Feiyan, Li Qingyuan, and etc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describe the humility and nobility, sinking and struggling of human beings in history with the attitude of tradition or pioneer. The team of native Henan writers formed by them, together with the native Henan writers outside the province and overseas, shows the honing and nourishing for the culture and soul from this land.

Key words: central plains culture; Henan literature; writers of central plains

从女神崇拜到男尊女卑

——中日古代女神的比较研究

林 祁, 薛 晨

(厦门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4)

摘 要:中日两国对女神和女性的观念经历了由最初的“女神崇拜”到“男女有别”、到“男尊女卑”及至“重男轻女”的变化,其原因与儒家观念的影响有关。中日两国对于女性问题和女权主义的看法也截然不同。对中日原始时期古书记载中的女神形象和神话故事进行分析,宏观把握中日女神形象在古代的演变,着重分析女神地位反映出的女神文化,以及儒家等级观念对于中日女神文化和女性文化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中日古代女神;女神崇拜;男尊女卑;女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02

中图分类号:I106;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10-07

一、女娲形象的演变

女娲作为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女神,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象征,对她的信仰延续千年,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地方沿袭祭祀的传统,奉女娲为神。作为中国的创世母神,她的事迹深入人心,传说她不仅化生万物,抔土造人,还庇护四方,炼石补天,治理洪水,更与伏羲成婚,创造了婚配的习俗等。

女娲在古代社会经历了独身神和偶身神两个时期,从上古时期成了三皇之一伏羲的配偶,在汉代陵墓中与伏羲共同出现在壁画上,被用于祭祀。这与汉代儒家思想的阴阳伦理观有很大的关系,阳尊阴卑的等级观,也使得女娲不得不与伏羲粘连,失去了独立女皇的身份和地位。

(一)独身神时期

在原始社会,女娲的性别尚不明确,古书对它的记载显得十分简单。据文字记载,它较早出现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1]。在《楚辞·天问》中,也有“女娲之体,孰制匠之”^[2]的说

法。

此时对于女娲,神话不仅没有任何功绩和故事加持,也没有明确地告知世人它的性别,女娲的性别直到东晋郭璞对《山海经》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才被确定并且接受。《说文解字》中也称:“媧,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3]

在早期的神话里,女娲的创世神身份极为明显。王逸注“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可以看到神话对于女娲形象的塑造,她以化生万物的方式作为创世手段。在中国许多地区都流传有“女娲正月初一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猪,初四造羊,初五造牛,初六造马,初七造人”的说法,由此可见女娲具有创造万物的伟大功绩,女娲的神格显得简单却又丰富。

在世界神话中,不同种族对于“创世”和“造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这也体现出不同民族认识世界和文明发展的速度不同。中国是较为典型的“尸体化生”型,典例有世人熟知的女媧、盘古、夸父。但与创世神盘古、夸父的“尸体化生”不同,女媧的

收稿日期:2019-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13BZW13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学术外译”(18WZW009)

作者简介:林祁(1957—),女,福建厦门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厦门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厦门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化生”不以自身的死亡为前提,并且每日重复创造新的生物,极大地强化了它创世神的地位和神力,与女性顽强又温柔的生命力结合在一起,成就了饱满的创世女神形象。

除了化生万物的方式外,女媧仍有特别的方式创造生命。在汉末的《风俗通义》中,出现关于女媧抟土造人的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媧抟黄土造人,务剧,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4]创造人类是女媧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早期氏族里死亡是经常发生的,种族的强大离不开女性的生育,通过生育增加人丁以繁衍种族。原始社会里,种族有对女性的生殖崇拜,女媧作为母神传说的开端就是从抟土造人来的,这体现了女性独有的创造生命、哺育生命的使命和能力。当然,抟土造人的说法充满了文明的痕迹,被认为是早期制陶技术的影射;而抟土产生人类的贵贱之分,可以看作进入等级社会的标志。

作为大地之母,女媧不仅慈祥地造出万物和人类,更肩负起民族英雄的身份和使命。《列子·汤问》中,首次出现女媧炼石补天说:“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体现出她作为民族英雄的壮举。而这里“断鳌足”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水怪,平息水灾,也可见在母系农耕社会时期人们对治理水灾的早期意识。对农耕时期的华夏民族来说,水患极大地威胁着种族的生存和安全,女媧补天治水的神话,折射出古代社会氏族在女首领带领下大规模治理水患的历史背景。^①

可见,早期母系氏族的神话中,女媧的神格饱满又丰富。作为创世母神,她慈祥温柔地创造万物,带给世间蓬勃的生命力和希望;而作为女皇,她也肩负着重任,保护她创造的土地和子民不受侵害,并且拯救苍生,规范世界。这也折射出早期人类对女人领导性的预见,女性的职权不仅仅是生育,壮大种族,更能领导自己的族群抵御危险,创造繁荣。

追溯女媧神话,往往会发现不少文明进步的痕迹。进入物质文明后,女媧的造物更进一步,已经不单单局限于创造生命,更能够创造艺术,诞生文化。

在先秦典籍中,如《礼记》《帝王世纪》等,都记载着“女媧作笙簧”^[5]一说,因此女媧也被称为音乐女神,可以提供给人类艺术文明,对其造物神的神格予以进一步升华。

(二)偶身神时期

随着文明的开化,生产资料为主导的父系社会,取代了血缘关系为主导的母系社会,女性地位下降,

女性生殖崇拜也过渡到男性生殖崇拜。女媧“独立神”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神话开始把女媧和伏羲粘连,称二人为夫妻,创立了婚配制度。

对女媧与伏羲对偶神关系的出现时间看法不一,虽然先秦以来就有将二者并列的说法,但并没有明确指出二者的关系。东汉《风俗通》让二人成为兄妹,而唐代卢仝在《与马异结交诗》中提到,“女媧本是伏羲妇”,这才把女媧和伏羲的婚配关系真正粘连起来。然而,女媧拥有抟土造人的神力,何须通过婚配创造生命呢?^[6]

显然,女媧成为对偶神,是父权氏族对其女皇地位和女性独立神格的削弱。女媧从“独立神”成为“配偶神”,展现出古代三皇之一的女皇地位发生了变化,甚至在东汉后,世人往往把伏羲、黄帝、神农并列为三皇,女媧的地位逐渐被贬到三皇之下。进入父系氏族的中国,妇女地位逐渐下降,女神也迫于天神命令,不得不与自己的兄长伏羲结合,暗示出古代婚配女从男的处境,女神终究沦为“男人的附庸”。

随着“男尊女卑”思想的发酵,女神的神性崩坏,女媧丧失了女皇地位并被神格丑化。如果说东汉伏羲婚配已是女神神格削弱的开始,那么清代的遭遇就不得不令人感叹。

(三)清代对女媧形象的丑化

学者潘世东通过考察清代文学及文献中对于女媧的记述,指出女媧的形象在清代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推断女媧的性别非女性,因为“《山海经》中没有办法论证女媧的性别”,“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支持,是无效的推断”。事实上,女媧的性别虽然在《山海经》中没有明确表示,却在先秦时期的典籍里就已经出现女媧为古代帝女和伏羲之妹的说法了。所谓“女媧不一定是女性”,只是对女媧的恶意揣测罢了。^[7]

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有男人而女名者。如帝有女媧氏”。潘世东分析道,因为古代文字的偏旁说女媧是女这种说法并不突兀,根据古代女媧的职能来看,他更倾向于认为女媧是古代女帝的看法,而不是“男人有女名”。赵翼认为,古代女媧是安排婚配的人,那么它应该是“媒人”,这就导致了它显然不会是女性。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女子不能是媒人,反而暴露了在清代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女性地位的低下,以及男权主义者的片面揣测和盲目自大。

潘世东指出,女媧由于根深蒂固的信仰和地位,即使和伏羲并列,但二人始终是平等的,“男权主义者无论怎么费尽心机曲解女媧,也无法改变她的地位,

女娲自始至终不曾沦为伏羲的附庸,其神格甚至有超过伏羲之势”^[7]。

二、西王母形象的演变

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中掌管不死药,具有惩罚和预警灾害职能的长生女神,是道教的最高女仙之首,主宰阴气修仙,乃全真教的祖神。

西王母同上述女娲一样,有独身神和偶身神两个时期,独身神时期的西王母形象经历过多次变化,学界对此看法较为统一,偶身神时期则又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与配偶东王公合掌修仙界,晚期在民间小说里谣传成玉皇大帝的妻子“王母娘娘”,其中儒家思想对其变化产生颇大的影响。

(一)先秦时期西王母的形象

戴梦君《西王母演变过程原因新论》一文提到,学界认为西王母的形象经历过以下三个时期:先秦时期的半人半兽“蓬发戴胜,豹尾虎齿”;两汉时期人格化并与帝王有了联系,成为“掌握不死药的神女”;以及随着道教发展成为女仙之首。^[8]

西王母的形象最早出现在神话记载中,《山海经》有三个地方提到西王母,按照《山海经》各经成书的先后顺序可分为:《大荒西经》“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这里的“戴胜”指的是西王母头上佩戴着饰物,一副部落首领的形象,然而“虎齿,豹尾”的描述又使其凶残。《西次山经》则说西王母“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司天之厉及五残”。至此西王母形象已经发生变化,“状如人”淡化了她的人类身份而开始有神化的痕迹,又加入“善啸”“司天之厉及五残”的描述,西王母形象更加威严和凶残。这一神职上的变化,使西王母完成了初步神化。

“五残”是古代凶星的名字,《史记·天官书》曰:“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野。其星状类辰星,去地可六丈。”可以看到西王母具有掌管凶星的能力,即“罚恶”的职能。而成书最晚的《海内北经》加入了“南有三青鸟,为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的记述。写西王母的管辖范围为“昆仑山”,神鸟三青鸟为其使者,只出现在蓬莱山上等,为的是突显西王母地位的尊贵。在《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形象经历了从部落首领到半人半兽的变化,初步有了自己的神格。

西王母山神的形象维持得并不久,在同为战国时期先秦的作品《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韩维志在《论西王母的文学形象在东汉的初步定型》一文中提到,《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是一个有文化素养,能用诗歌表达自己不愿生活在旷野上与虎豹相伴,而且舍不得穆王离去的多情

女神。^[9]她可以赐穆王不死,可以与穆王相会于瑶池,狰狞的山神形象不再,多情又温和的女神形象替换了西王母形象,她的神职也从掌管惩罚杀戮,变成了赐人长生不死。这一重要职能的出现,奠定了西王母被道教神话吸收而成为先秦信仰广泛的女神的基础。《淮南子·览冥训》明确记载道:“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确定了她这一独特的神力,西王母在《穆天子传》中已人格化,成为手握长生不死药的重要女神。

汉代道教开始兴起,大力推崇西王母,以她的长生不死作为道教“修仙”的核心基础,将西王母捧上了女仙之首的至高地位。她“蓬发戴胜,虎齿豹尾”的形象不易被人接受,于是道教将其进行美化。在道书《逍遥虚经》中说“蓬发戴胜,虎齿善啸者,乃西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真形也”。在道教神话中西王母是创世神之一,由天下所有至阴之气所生,掌管阴气,能够化灵,是“以西华至妙之气理于西方”之人,她掌管所有的女仙,所居昆仑山也被尊为“仙山”。西王母的形象也丰富了许多,在《云笈七签》中,九天玄女是西王母坐下的一名女仙,被西王母派遣下凡帮助黄帝战胜蚩尤。另外,还有《山堂肆考》中说,八仙之一的铁拐李,是由于得到西王母的帮助点化才得以成仙的。

如此一来,经过道教神话的大力加持,西王母的光辉形象被定型,民间奉她为生子、祈福、消灾、惩恶,以及求长生不死和修仙的女神,信仰极为广泛,皇室也极力推崇,东汉和西汉对于西王母都掀起过多次信仰热潮。

(二)偶身神时期西王母的形象

西王母在道教神话中地位大幅增强,同时也拥有了自己的配偶,与之完全相对应的东王公。道教中,东王公和西王母是世间阳和阴的化身,东王公为阳神,西王母为阴神,东王公掌管男仙,西王母掌管女仙,东王公居住于蓬莱仙岛,西王母居住于昆仑仙山。在东汉中叶已经有将二人奉为阴阳二神祭祀的记载,赵晔在《吴越春秋》中说,越王勾践靠“七术复国的第一术就是尊天祀鬼神以求福”,即“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王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

对于东王公的出现,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用世俗改造神话”的结果。韩维志认为,东汉世人“一厢情愿造神”的做法,是为了让神话符合自己的审美需求,因此用世俗化的概念加以改造。戴梦君也说,“夫妻纲常和阴阳伦理观的出现导致了东王公的出现”,他认为这是一种“用人类社会的关系来揣摩神话”^[8]的行为。

汉代后宫干政的情况较为严重,当时最大的两股势力是宦官和外戚。从西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开始,汉代就开启了外戚专权的先河,吕雉和窦皇后都是汉代有名的太后,她们对朝政的把持力度都十分强大。窦太后在汉景帝时期长期干预政事,甚至让皇帝立梁王刘武为储君。在汉武帝即位后,窦太后被封为太皇太后,其权势甚至可以大到废除皇帝。在汉武帝亲政后,窦太后的势力被逐渐压了下去,然而汉武帝也喜欢使用外戚,不论是卫子夫的弟弟卫青,还是霍去病,都是外戚的身份,可见汉武帝时期对于外戚并没有打压。这些外戚成了皇后母家后宫干政的隐患,汉武帝在晚年时期甚至实行杀死储君生母,以保皇权在自己手里的方式,即“子贵母死制”。这种偏激的极端做法,是汉武帝对后宫干政和女人掌权的完全否定。

由于汉武帝极力推崇董仲舒的“阳尊阴卑”“三纲五常”思想,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东汉时期对女神的“强行配对”才会盛行。即使是远古时期神话里的重要女神,也不得不委身于丈夫,这是对阴阳平衡的妥协,也是对阳尊阴卑的服从。

曲宁宁说,汉代对待妇女的观念由男女有别转向了男尊女卑,“汉初,对婆媳和夫妻间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彼此之间的礼,自汉武帝时风气大变,董仲舒论证男尊女卑为万事不易之道,由此确立了后代妇女理论的基调”^[10]。皇室推崇男尊女卑的观念,对民间产生很大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民间百姓家的妇女地位。

东王公的出现似乎给西王母一个归宿,作为男仙之首,道教称其为“扶桑大帝”“元阳父”,东王公作为男神,地位很快便超过了西王母。其中原因与西汉时期汉武帝推崇儒术,以及董仲舒的“阳尊阴卑”观念有很大的关系。西王母的身份被扭曲,地位开始下降。

(三)成为玉皇大帝的“皇后”

世俗往往以世俗的眼光审读神话,揣摩神的心理和神界生活,对神话进行想象与臆测。神话经过长久以来的传承和小说等文学浪潮,慢慢失去了原本的样子,变得更加浪漫。

也因此,神话的本身和民间的谣传对不上,矛盾突兀。宋真宗将高上大帝加封宗号,构建出“玉皇大帝。”在道教神话中,玉皇大帝是最高信仰“道”的神化,掌管天界众仙。

按照道教神话,玉皇大帝掌管所有的仙家,他应为西王母的“上司”,二人并不是夫妻关系,玉皇大帝也不等同于东华帝君东王公,然而,随着玉皇大帝

的形象越发高大,世人想要给玉皇大帝一个与之相配的雍容华贵的“皇后”,于是民间小说把玉皇大帝和西王母粘连成夫妻,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西游记》。西王母成了“王母娘娘”,与玉皇大帝是夫妻,共同掌管天庭众仙。西王母开设蟠桃宴邀请众仙相聚。此时西王母已经不再是“西王母”,而是被世人扭曲杜撰的“王母娘娘”,女神彻底沦落成了天公的附属。

从古时期独立的山神,到与东王公的配偶神,最终成为“玉皇大帝的皇后”,西王母的形象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儒家重男轻女思想下,她的神格被不断分化,最终地位被大幅削弱。

三、日本记纪神话中的女神形象

早在公元5—6世纪,日本已经开始向中国唐朝学习思想和制度,到了公元6—7世纪,儒学和儒家经典则大量传入日本。公元645年,孝德天皇仿造唐朝的经济政治制度等进行了大化改新,唐风盛行,儒学的气息更重。因此日本的创世神话中,可以明显看到儒学的痕迹和观念,这对塑造其女神形象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1]

(一)《古事记》与《日本书纪》

日本关于创世神话的记载主要有公元8世纪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部,简称“记纪神话”。各国的创世神话均有不同,但都离不开创世、造物、造人、建国的主题,“记纪神话”从神明降世创造国土的创世篇,讲述到派遣神的子孙去管理国土的开国篇,主要围绕着伊邪那美和天照大神两个女神展开,目的是为了向当时统一的民族说明:其一,日本国是由神诞生下来的国家;其二,天皇的血脉来自太阳神天照大神,是神的后裔,天皇万世一系治理日本国,就是神的血脉在保护国家,未曾改变过。

“记纪神话”被撰写出来的目的就是为维持政治统治的稳定,因此从中可以看到统治阶级需求下的女神形象及其意义。

(二)“记纪神话”中伊邪那美的形象

“记纪神话”中作为创世神之一的伊邪那美并不像女娲那样被誉为民族英雄,在她死后,因为丈夫去寻找她的时候,违背了誓言,被她丑陋的样子吓得抛弃了她,她含恨追杀丈夫,夫妻决裂后又扬言每天要在国度里杀死1000个人。她被日本民族称为“黄泉污秽之女神”。女神报复丈夫的行为并不被大众接受,即使是男性有失在先,日本的神话中很少有“符合因果报应”的情况出现,伊邪那美并不符合日本传统的大众价值观对女神的要求,因此失去了“民心”。

学者郭燕在比较女娲与伊邪那美时,曾这样说:“伊邪那美反映了妇女生育的不易和艰难,以及女神对于伦理观念的被迫服从。”她用夫权和儒家思想的维护者来解释伊邪那岐,称他在妻子的生育过程中负责指导妻子,保证其生产的顺利,这一过程恰恰反映出女性的活泼天性被伦理观念束缚和压抑的特点。

这里顺着郭燕的思路去审视伊邪那美和伦理道德的关系,就会发现儒家思想的痕迹不仅仅是安排女神要服从“礼”,更加强了男女有别的问题。^[12]在《古事记》中,伊邪那美和伊邪那岐绕柱跑,约定碰面之时就要结合。他们产下的第一个孩子是残缺儿,天神解释说是因为女子先开口,不好。于是两个神改正偏误,由男子先开口,终于产下健康孩子。这一神性的传播,使得“女不如男”的观念变得更官方化和神圣性,恰恰体现了撰写《古事记》时,日本民族的男尊女卑观念。

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来自中国。在西汉,董仲舒“阳尊阴卑”的等级观流传很快,给后世的男女观埋下了基础。由于儒家“三纲五常”观念的影响,唐代儒学传入日本后,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仅从伊邪那美的神话中,就可以明显感受到男尊女卑的痕迹。

(三)天照大神与“传统理想女性”的形象

学者葛慧玲认为,天照大神符合日本对于传统理想女性的形象需求,在她看来,“温柔,善良,忍让,宽容,母爱”^[13]是日本理想妇女应具备的品质。她论述天照大神对待须佐之男之时,没有因为弟弟来到领地胡闹而暴怒,而是多次忍让,最后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也没有大闹脾气,而是自己害怕躲了起来,这种“对男性罪恶的宽恕性”,体现了天照大神对于男性的“母爱”。

可以看到,葛慧玲一直强调“忍”这个字。天照大神在对待胡闹的弟弟时忍了许久,天照大神对待杀死了保食神的妹妹一事也忍了下来,而在天照大神忍无可忍的时候,她没有选择发泄自己的感情,而是“收起了爱,躲了起来”。这种忍耐的背后折射出当时对理想女性的道德要求。不同于对伊邪那美的描述,伊邪那美面对食言的丈夫会暴怒,敢发泄自己的情感,敢追杀他并与其决裂;而对天照大神的塑造,则突显她的宽容和忍让,她慷慨地把食物分给苇原中国,又耐心地教导养蚕的技术,而对众神的矛盾和灾难,都选取“避让”的角色。她没有用自己手中的“女权”来过多干涉自己的领地和子民,即便发怒也不过是收起了自己的“爱”。“记纪神话”中的天

照大神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恩赐”,她可以施舍恩赐给苇原中国,给自己的弟弟,给众神;也可以收回自己的恩赐,躲进天岩户,她只会悲伤害怕,却不表现愤怒。

如果说伊邪那美与夫决裂是对“记纪神话”中女性道德的反面诠释,那么天照大神这种对于男性的宽恕和包容,以及自身的忍让和退步,就是日本“记纪神话”中极力塑造的“理想女性”的样子了——女神不需要用强大的神力来治国,也不需要神力 and 权力来强调秩序,而要对待胞弟和子民容忍,隐忍。可用三个字来概括天照大神的个性,就是“好脾气”。这种好脾气的价值观反映的恰恰是接受了儒家思想多年的日本民族对于女性道德和价值的要求,日本接受儒家“三纲五常”的思想观念很早,5—7世纪以来中日对于儒学的交流和接受程度都非常高。“记纪神话”是为了维护天皇统治,宣传天皇万世一系血脉的神圣性而写的,女神不是因为“女”而成“神”,而是“如母爱一样包容男性,所以是女神”,这种对于女神权力的弱化,对于女性温柔、温顺、包容的刻画,不免让人觉得天照大神作为皇祖神的“卑微”之处。

比起中国女娲的“神性”,天照大神具有更多的“性”。这种对于女神形象的刻画类似于中国古代对于女娲的塑造,把造物 and 文明的光环加在女神身上,用更多的事迹来突显女神崇拜。这不同于女娲作为氏族首领 and 民族英雄的“神性”,也不同于伊邪那美的活泼率真 and 真实。

四、儒家体系对日本天皇权力建构的影响

从原始社会的“女性崇拜”到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了日本的女权由盛转衰。

(一)从绳纹时代到稻荷时代的女性崇拜

原始社会的日本盛行女性崇拜,国家的首领往往由女性担任。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女性具有用巫术 and 宗教统治国家、维持稳定的能力。这种宗教的权力往往大于世俗权力,这是早期女权制下的日本具有的明显特点。日本的“女性崇拜” and 中国的原始社会不同,除了对于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母性崇拜以外,更多的是关于女性本身带有的宗教色彩 and 神圣化的崇拜。

董波在《女性崇拜及其嬗变》一文中指出:“男性主宰不过是对女性主宰的一种内质回应,从性别文化学的角度,女性才是日本文化的支配者和主导者。”^[14]日本的女性崇拜并不是一种庞大的官僚体制,而是一种原始的集体主义。邪马台国时期,女王

卑弥呼去世后曾有男王想要即位，国人不服，于是又立了女王台与，国家这才停止动乱。可见女性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的作用。李广志在《论日本原始信仰中巫女的主体地位》^[15]中，直接将这种作用和女王作为国家祭司和巫女的作用挂钩，肯定了在古代日本社会女子以祭祀和鬼术治国的重要价值。

然而，这种女性崇拜是存在缺陷的，以女王的法术和国民的集体主义为依托的国家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女性柔弱无力的性别使得国家时刻需要“被保护”。在日本，国民间的豪族竞争保护者的角色，这种竞争过于激烈就会威胁到王室的利益，因此皇室开始向中国学习，引进中国的官僚体制。

(二)推古天皇“以外来男权维护女权传统”的官僚体制

推古天皇(公元554—公元628)之前，日本被称为大和，首领也不叫天皇而是大王，各个贵族部落依靠血缘世袭官职，以此来掌控朝廷或者是自己的领土，国家的首领并不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力，而是“宗教祭祀”的象征意义更为浓重，天皇的意义是天照大神的“权威”，而不是国家的“权力”。由于母权制度的残留，外戚干涉朝政且享有很大的权力，再加上天皇内部为了维持血统，继承制度混乱，皇子常由近亲结婚产生，因而早年夭折的情况屡见不鲜，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让皇子的安全受到威胁。^[16]为了保持皇位血统的纯正性，由皇后过渡性继承皇位，后退位。(推古天皇就是在外戚权力争斗下，为了保持皇室血统而即位的)这种女性以皇后身份成为天皇的现象，一直到男尊女卑的观念随着律制在皇族中普及开来才逐渐消失。

推古天皇，让圣德太子学习中国来建立官僚体制，以此来建构大和朝廷的权力机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来自男权的制度来保护母权制残留的传统，从此，儒家体系下的男权系统开始逐渐改变日本的女性权力。

上文说到，早期日本的皇位具有的更多的是宗教的意义，而不是权力的掌控，女帝代表的是血统的纯正和天照大神一脉的权威，真正的政治权力并不是由女帝说了算，人们对于天皇的理解也不是绝对的权力，女帝的作用如同早期社会女祭祀的职能一样，只代表了皇位的象征意义。

(三)大化改新后女性逐步丧失政治权力

孝德天皇的大化改新的举动让人们对于天皇皇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645年，孝德天皇仿造中国的父权官僚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了“律令制”，使得日本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天皇

的权力得到了强化，天皇不再是天照大神的代言人，而是国家的统治者。这一观念，开始在民间形成。由此，天皇的继承问题也就真正显得重要了。

随着中国的权力系统和儒家观念逐渐深入日本，“嫡长子继承制”成为日本天皇继承制的最好依据。这种以父权为主的继承方式逐渐使得外戚的权力弱化，随着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度，嫡长子继承制有效地保证了天皇血统的正统性，也避免了许多权力斗争和纠纷。在这一制度的影响下，旁系的继承被摒弃。从白凤(645—710)到奈良时代(710—794)，女皇的出现都是为了起到过渡作用，从而使得皇位的继承严格遵循着嫡系子孙的要求。随着第六代女帝孝谦天皇宠幸淫僧，危害国家，女性也逐渐与旁系一样被剥夺了继承皇位的权力。

(四)幕府时期女神神性和权力的分离

在781年，桓武天皇即位，3年后迁都平安，开启了“平安时代”。由此，日本的女权在政治上完全没落。随后866年至1086年大约200年的时间，日本进入了“摄关时代”。当时的天皇清河只有9岁，没有把持朝政的能力。原本只能由皇族人士担任的辅佐政权的“摄关”被外臣藤原良房取代，此后藤原氏取得了统治的实权，开始了对天皇和权力的把控。为了对抗这种情况，1086年，白河天皇让位给自己的幼子，自己作为太上皇掌握政权，即“院政”。这意味着天皇的父亲要从天皇的母族和外臣手里夺权，而武士趁机获利。他们通过皇室间的权力争夺，最终自己夺得了兵权。在武力统治时代，武士逐渐把握了实权。1192年，天皇的拥护者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创立“幕府”。此后，日本进入了幕府统治的时代。这段时期，别说是皇女和皇后，就连天皇也成了“太阳神”的象征。人民对其信仰不减，然而天皇的权力却基本被架空。从平安时代到织丰时代(1568—1603年)，日本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位女天皇。

直到1629年，日本才出现了第7位女帝。此时的日本处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在幕府的统治下，天皇权力已经如同傀儡，女神的神性和人性被分开。权力由将军掌握来保护代表“太阳神”的天皇，如同女人软弱无力只能成为精神象征、需要躲在男人的羽翼下一般。天皇的权力被夺走，但是人民群众对于天皇、天照大神血统的信仰仍然不减。幕府未能跨过天皇直接成立新的统治政权，为了稳固民心，他们不得不重新接纳了天皇作为权力的象征和信仰的集中体。天照大神也如同被架空的皇族权力一般，神性被供奉起来，权力则被剥离开来。

这之后出现的第八位女帝,后樱町天皇是为了弥补太子年幼而即位的,她没有任何的实权,她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保护皇统。八年后她让位给了自己的侄子,至此日本再也没有出现过女天皇。

中日对于男女问题的看法和“女性崇拜”的演变,都反映了儒家思想“阳尊阴卑”观念对权力系统和世俗观念的影响。两国的世俗皇权为了维护统治,都强调父权的稳定性。然而,中国的“君权神授”的概念来自黄帝,宋后逐渐过渡到“天公”手中,日本的“万世一系”则强调天照大神血脉的神圣性。两国女神对于世俗权力的重要性不同,中国的女媧和西王母的职能仅仅是辅助,而日本的伊邪那美和天照大神则是核心。

研究儒家思想对于中日女神形象的塑造和演变,以及对于皇室和民间男女观念的影响,可以使我们对历史上女性的价值和地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思考。

注释:

①《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媧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斩鳖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

参考文献:

[1]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

- [2]屈原.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2011.
- [4]应劭.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5]崔莉,梁青.中日生命女神的心理构造:以女媧、西王母、伊邪那美为中心[J].湖北社会科学,2017(3):136-142.
- [6]郭燕.女媧与伊邪那美命:中日始母神形象比较[J].世界文学评论,2009(2):214-217.
- [7]潘世东,左攀.女媧文化的女权解读[J].南阳师高等专科学学校学报,2012(4):22-25.
- [8]戴梦军.西王母形象演变过程原因新论[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4):93-96.
- [9]韩维志.论西王母文学形象在东汉的初步定型及其文化成因[J].江汉论坛,2012(6):79-84.
- [10]曲宁宁.从男女有别到男尊女卑:汉代妇女理论转向及其成因探析[J].思想战线,2016(2):123-12.
- [11]李佳.唐代儒书类文献东传与日本制度变革[J].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30(5):46-52.
- [12]安万侣.古事记[M].周作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 [13]葛慧玲.日本神话中的“理想女性”的原型:关于天照大神的考察[J].文学界(理论版),2010(12):81-82.
- [14]董波.女性崇拜及其嬗变:日本古代史的一条根本线索[J].世界民族,2011(4):79-83.
- [15]李广志.论日本原始信仰中巫女的主体地位[J].民俗研究,2010(1):117-127.
- [16]吴春燕.日本“女帝世纪”历史成因论考[J].唐都学刊,2011(3):48-5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From Goddess Worship to Male Superior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n Ancient Chinese and Japanese Goddess

LIN Qi, XUE C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Fujian 361024,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goddess and women in China and Japan has undergone the evolution from the original “goddess worship” to “men and women are different”, to “women inferiority”, and eventually to “the disvalue of women”, and the reason is related to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China and Japan also have very different views on women’s issues and femin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oddess images and mythological images in ancient books in the primitive period of China and Japan, macroscopically grasping the evolution of image of goddess of China and Japan in ancient times and emphasizing goddess culture reflected by goddess status and the significant impact that Confucian hierarchy has on goddess culture and female culture of China and Japan.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and Japanese goddess; goddess worship; male superiority and female inferiority; Nuwa

“坎普”的两幅面孔： 从《霸王别姬》和彩虹合唱团现象看“坎普”的中国表达

柯英

(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 215009)

摘要:电影《霸王别姬》的题材、表演和呈现方式等不乏“坎普”趣味,尤其是贯穿全片的“非本来”特质,赋予了该片独特的魅力,也在众多的解读和评说中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丰富了它的内涵。彩虹合唱团的作品则展示了“坎普”作为一种城市感受力的影响,通过对现代城市生活的自嘲式白描,轻松自如地在轻浮与严肃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霸王别姬》里的“非本来”性和彩虹合唱团现象所反映出的都市症候仅仅是“坎普”众多面孔中的两幅,而“坎普”感受力还有更多的面孔等待我们去认识和描画。

关键词:“坎普”;《霸王别姬》;彩虹合唱团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03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17-08

美国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在1996年回顾那些令她声名鹊起的先锋论文时,为自己成为“坎普”(“camp”)的第一位描述者而感到不可思议,在她看来,至少诗人奥登(W. H. Auden, 1907—1973)应该有所尝试,而他“当初没有写过类似我的《关于‘坎普’的札记》的文字,何其怪哉”^{[1]209}。这句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何她会认为奥登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坎普”描述者?只有陈冠中一笔带过地提到,解释这“可能是因为奥登是伊舍伍德的密友”^{[2]146},而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 1904—1986)是在桑塔格之前“少数用文字提到坎普的作家”^{[2]145}。

奥登比桑塔格年长26岁,二十出头就以诗歌上的杰出成就名冠英伦,成为新生代诗歌的代言人物,人们甚至直接把他参与的一个写作团体称为“奥登一代”(“Auden Generation”)。奥登游历于欧洲和美国,后来移居美国,伴随着他的足迹的是他对欧美文化的广泛吸收和大量的产出,也由此不断地震撼

着英美诗坛。他的诗歌和评论“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政治、音乐、宗教等多个领域。此外,他还与音乐家、导演合作撰写歌剧和纪录片剧本,为大学开设诗歌欣赏和创作课程,出席各种诗歌和文学活动”^[3]。奥登在后期更关注诗歌和艺术的审美层面,他对艺术现象的观察和艺术趣味的把握应该是极其精准和敏锐的,而也许意味更加深长的是,他还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些特质都与“坎普”密不可分。

桑塔格在文章里直截了当地声明,《关于“坎普”的札记》是向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致敬的。她在里面引用了王尔德的八则警句,每句都可视为紧随其后的几则札记的引子。王尔德是唯美主义的倡导者,也是因“不敢说出名字的爱”而获罪的文化名人,他“挑战的是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对他的审判“实际上也是文学天才与世俗世界的一次较量”^{[4]译序22}。这样实力悬殊的对决,其实还未开始就胜负已决。当王尔德身陷囹圄,为自己的行为痛悔不已时,他不会想到六十多

收稿日期:2019-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景观社会的思想者:苏珊·桑塔格视觉艺术文论研究”(12CWW002);江苏省青蓝工程和苏州科技大学科研启动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柯英(1976—),女,安徽望江人,文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英语文学和视觉艺术文论研究。

年后,一位美国的青年女学者会在他美学思想的滋养和启迪下,在高级文化和先锋文化的对峙中,从容地指向了二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坎普”,并通过媒体的力量,势不可挡地把“坎普”感受力带进了大众的视野。

“坎普”进入中国学术界^①,首先遇到的是对应的中文名称问题。李闻思、陈星君、陈冠中和徐贲等都梳理了该词的来源和演变^②,陈冠中还特意介绍和解释了几种大陆学界很少提及的译法:创意的译法有田晓菲的“矫揉造作”、沈语冰的“好玩家”、董鼎山的“媚俗”(可能是借“坎普”与“刻奇”的近亲关系)、王德威的“假仙”(台湾用语,指行为上的假装)^{[2]144}。他本人则认可和采用了“顾爱彬、李瑞华、程巍等的普通话音译”^{[2]144}——“坎普”。其实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与陈冠中的这篇文章发表时间最接近的一篇专论是王秋海的《“矫饰”与前卫——解读苏珊·桑塔格的〈‘矫饰’笔记〉》^[5],这里所说的“矫饰”正是“camp”,王子霞则将其直译为“营地”^[6]。徐贲引进了华语界的另一种译法:“敢曝”,倾向于认可该词的法语词源“se camper”,即“大胆展示自己”^[7]之意。此外,还有人将其译为“堪鄙”,并详加解释道:

因为,正如“媚世”和“滋世”一直被视为劣品的“鄙”,camp 正是要面对这个“鄙”,将之扩而大之,并用新的眼光进行新的组合,给予新的定义。“鄙”在中文里有低等之义,但又用于自谦,如“鄙人以为”,且在自谦里内蕴了傲意,如“正是鄙人”。“堪”是“经得起”“称得上”之义,所谓“可堪”“正堪”。译为堪鄙,表明“正是这种‘鄙’!且要怎么?怎是这种‘鄙’,听我道来”。“堪”和“鄙”两字都具有反讽之意味,正与 camp 作为美学之喜相契合。^③

上述各种翻译的出现,恰恰凸显出我们难以在中文里找到某一个合适的词来涵盖“camp”,在此情形下,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反而是不带有特定含义的音译“坎普”,本文也遵循此译。

中国学术界试着去品味和领悟“坎普”感受力,也试着用“坎普”理论对当下的文艺现象进行观察和评论。陈冠中如数家珍地举出了不少“国产”的“坎普”例子,比如武侠小说里的怪异女高手(李莫愁、灭绝师太、梅超风)、上海怀旧美女月份牌、香港周启邦夫妇拥有的粉红色劳斯莱斯和金色马桶、台湾小说《蛋白质女孩》里押韵的句子,等等,并由此得出了以下结论:“这样看来两岸三地还真是‘坎

普’的沃土,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敞开‘坎普’方面的感受力”^{[2]146}。

一、《霸王别姬》中的“坎普”：“非本来”的艺术特质

如果以案例的方式讨论“坎普”,就很难把电影排除在外,因为“或许电影评论……是当今“坎普”趣味的最有影响力的普及者,这是因为,大多数人仍然以一种愉快的、不做作的心情去看电影”^{[1]278}。1993年中国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影片《霸王别姬》(以下简称《霸王》)摘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一时间,导演、演员和影片本身都被卷入了舆论的漩涡。有人哀叹这是把中国文化的材料“按照西方的眼光阉割、夸大、再加上外国资本的华丽包装,戴上一个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光环,就赢得了国际影坛的青睐”,从中“看到的是中国电影的沉沦”^[8];有人批评影片中的同性恋成分与社会主义精神建设背道而驰,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同性恋早已扫除干净……还能向广大观众兜售这种精神垃圾吗?”^[9]不少戏剧界人士对该片持抵制态度,其中有人担心影片玩味同性,“西风东渐,会不会引出一场大地震?”^[10]也有外国学者印证了上述酷评并非捕风捉影,指出这部影片“作为一部商业制作,它把京剧和同性恋作为两个卖点,以迎合中国观众的恋旧和西方观众的好奇”^[11]。《霸王》问世之初之所以令不少人产生不适的观影体验,其实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因为无论是制作方式、演员遴选,还是情节刻画、影像呈现,该片都对对时的中国电影模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尽管一度被断言生命力不会长久,但是《霸王》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的研究者们,而且研究的角度越来越多样化,评论也越来越客观化,这似乎意味着评论界逐渐展示出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也间接地反映出影片的可挖掘性和研究价值。针对《霸王》的一些“坎普”特质,尤其是其“非本来”的特质,我们亦可把“坎普”作为解读它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以风格表达出来的世界观——不过,这是一种特别的风格。它是对夸张之物、对‘非本来’的热爱,是对处于非本身状态的事物的热爱”。所谓“非本来”,桑塔格认为“新艺术”提供了最好的例子,“它是最典型、发展最彻底的‘坎普’风格。‘新艺术’作品通常将一种东西转化为另一个东西”^{[1]279}。比如,照明设施不是常规的灯的形状,而代之以开花植物的造型;地铁入口也不是普通的通道,而是铁铸兰花柄的形状,等等。

《霸王》里集各种“非本来”性于一体的就是各

类负面评论的中心人物——程蝶衣。把这个角色，乃至扮演者张国荣推向风口浪尖的就是谈论该影片时无法回避的同性恋问题，或者说，同性恋也是谈论“坎普”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桑塔格指的“非本来”是“off”，有偏离主流之意，如对应于百老汇（Broadway）的外百老汇（Off - Broadway），以及对应于外百老汇的外外百老汇（Off - Off - Broadway），而同性恋，相对于在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异性恋，自然也是偏离的，是有别于多数的少数和异类。桑塔格也承认，“尽管不能说‘坎普’趣味就是同性恋趣味，但无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契合和重叠之处……总的说来，同性恋者构成了‘坎普’的先锋，以及最清晰可辨的观众”^{[1]290}。然而，《霸王》被很多人归类为同志片，其实是有商榷之处的：是否出现了同性爱情的影片就是同志片？或许，我们更应关心的是程蝶衣何以出现同性性向，是什么造成了他在情感上面的“非本来”性，而这又与他的艺术生涯有何关系？

儿童时代的程蝶衣被卖入戏班，其悲惨的身世似乎与其他失去双亲呵护的孩子没什么区别，但是与这些孩子相比，他又有几个不同寻常之处：他生长于妓院，母亲是风尘女子，为了方便在风月场抚养，便把他打扮成女孩，但他总有长大显示出男孩特征的一天，因此母亲不得已抛弃这个迟早都要被妓院驱逐的孩子，为了能让他在将来拥有可以谋生的一技之长，她毫不犹豫地剁掉了妨碍他学习戏曲表演的六指。幼小的程蝶衣即便一直男扮女装，也没有混淆自己的性别，可是他眉清目秀的女孩形象在戏班孩子的眼里却是个另类，而且还是一个弱小的、可以欺负的另类。他在短短的几小时里尝遍了各种痛苦：身体上遭受的剁指之痛、严寒之痛和精神上遭遇的失母之痛、欺凌之痛，而所有这一切的本源都是他自呱呱坠地开始就具有的“非本来”性。如此绝境下，浓眉大眼、练习武生的段小楼伸出的援助之手是何其温暖，他敢作敢当的小小男子汉气概给了程蝶衣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成了这个几乎是走投无路的小男孩唯一的精神支柱。

由于外形的柔弱特点，程蝶衣学习的是旦角。但在数年的勤学苦练中，他从未让旦角的表演和装扮影响自己的性别认识；反之，他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这一认识，即使承受残酷的体罚也宁折不弯，这在片中是由一个象征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戏曲界历来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的说法，这两出戏都是独角戏。前者表现的是《水浒传》里的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情景；后者表现的是一个叫色空的小尼

姑凡心大动，逃离修行庵堂的故事，两者分别是对武生和旦角演员表演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程蝶衣在练习基本功的过程中，自然需要唱《思凡》，但是无论挨师父多少毒打，他总是坚持把其中的一句台词“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念成“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以此反抗女性化的定位，企图摆脱与生俱来的“非本来”的属性，向命运发起一次次的抗争。然而，《思凡》还是成了最终摧毁他男性气质的导火索。为了得到去张太監府上演出的机会，包括段小楼在内的戏班的所有人都希望程蝶衣在试戏时不要再说错台词，可是固执的程蝶衣不愿屈从，在戏班面临忍饥挨饿的艰难处境下，他还是选择了固守个人的防线，一如往常地念出了“我本是男儿郎”。段小楼情急之下愤怒地把班主的铜烟锅塞进程蝶衣的嘴里猛烈地搅动，责骂他不该犯下这样的错误，而满嘴是血的程蝶衣愣了片刻之后，面带微笑清晰地说出了所谓“对”的台词。这里有个细节：其时的段小楼和程蝶衣，虽然没有全幅装扮，但都穿上了戏服，一个是武生打扮，一个是花旦装束。段小楼的暴力行为对程蝶衣产生了醍醐灌顶的作用，后者带着笑容同时也带着鲜血和伤口再度入戏，标志着他反抗戏班规矩和“非本来”性设定的终结，也标志着他认可了段小楼阳刚的男性气概，接受了自己无法逃脱的女装扮相的命运。电影的蒙太奇镜头把程蝶衣的试戏和在张太監府上正式表演《霸王别姬》完美地对接了起来，一个风华绝代的舞台形象已然呼之欲出。

如果说《思凡》风波平息的结果是程蝶衣确定了旦角身份，那么这还不能解释他性别身份的改变。正如一位在梨园耳濡目染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台上男旦艺术光彩夺目，台下都是铁铮铮的汉子，光照后世。相信他们若看到电影上的程蝶衣，定会不齿的”^[10]。说到上台台下的反差，我们自然会想到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人，他们离开舞台，仍是堂堂大丈夫的形象。但如果以此对照程蝶衣，似乎不太公平，因为在他性格形成期最为重要的少年时代，他还经历了一桩常人无法想象的悲惨事件，而这正是他彻底陷入另一重“非本来”特性，即性别倒错的悲剧之中。

戏班班主极力巴结的张太監已经垂垂老矣，但年龄的老去没有减少他变态的性欲望，他把魔爪伸向了刚刚经历了《思凡》之变的程蝶衣。此处也有一个细节：在张府演完戏后，对即将到来的摧残还懵然无知的程蝶衣走进张太監的内室时，看到他正在与一个年轻的女子在榻上亲热，女子随即兴趣地离

开,张太监接着就对程蝶衣实施了性侵害。程蝶衣万分屈辱地从台上的“女娇娥”变为台下和年轻女子一样的性玩偶,他从此就走进了台上台下合二为一的人生之戏,把心理性别身份定格在他为之抗争过的女性身份上。一个可悲的悖论又在于:正是太监府上的这次经历使得程蝶衣和段小楼声名鹊起,他们的艺术成就逐渐得到了戏曲界和观众的认可,终于成长为红极一时的名角,尤其对于程蝶衣来说,这就是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程、段二人最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合作剧目是《霸王别姬》,台下反复的排练和台上重复的表演等于是——遍遍地强化着程蝶衣“非本来”的性向选择,同时也使他在表演中全情投入,演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巅峰状态,令观众无不动容。在他的世界里,他就是坚贞的“虞姬”,而段小楼就是他的“霸王”,是师父讲戏时教诲再三要“从一而终”的对象。戏院老板向资深戏迷和京剧行家袁四爷介绍程蝶衣时,说他“人戏不分,雌雄同在”,袁四爷看着台上正在声情并茂地扮演着虞姬的程蝶衣,深以为然。饶有意味的是,“雌雄同体者肯定是‘坎普’感受力最伟大的意象之一”^{[1]279},无论是女人体现出的男性化气质,还是男人体现出的某种女性色彩,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程蝶衣已经是男身女心,又借助于舞台上的女性装扮,把“坎普”的艺术特性和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当观众看着程蝶衣扮演的虞姬时,实则经历的是一种双重的凝视,感受到的是“坎普”中的“坎普”:第一重凝视来自电影里观众席的视角,亦即摄像头展开的角度,指向的是男旦程蝶衣在舞台上柔媚十足的唱作念打;第二重凝视则来自电影外观众的视角,指向的是男演员张国荣扮演的千娇百媚的男旦形象。巧合的是,张国荣恰恰也是一个同性恋者,在他无可挑剔的精致五官和略显柔弱的身形中,的确也蕴含着一种女性化的阴柔之气,这也是演员与角色结合得非常贴切的一个例子。《霸王》采用了正面和侧面的方式来刻画程蝶衣的人戏一体,正面是程蝶衣柔情、悲情的舞台演绎,侧面是观众的评价和反应。与此同时,张国荣在一定程度上已与程蝶衣融为一体,连导演陈凯歌都认为他人戏至深,甚至已经超过他要表现的角色本身,演到动情处,“哀哀如丧考妣,人戏不分”^[12]。

戏里戏外、银幕内外的程蝶衣和张国荣都不遗余力地打造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力争完美的艺术素养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也有个体的认同需求。作为同性恋者,虚构

世界的程蝶衣和现实世界的张国荣都“把自己与社会的同化,寄托在审美感的提升上”^{[1]290}。他们的世界,落在审美维度之上,他们把生活投射到舞台/银幕上,从而使自己也成为审美对象和审美感提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尽管“坎普”不等同于唯美主义,但它仍然是“唯美主义的某种形式。它是把世界看作审美现象的一种方式”^{[1]277}。桑塔格进而解释,“这种方式,即‘坎普’的方式,不是就美感而言,而是就运用技巧、风格化的程度而言”^{[1]277}。程蝶衣和师兄弟们恪守“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梨园训诫,经受着严苛的训练,台上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无不凝聚着台下勤学苦练的汗水,体现出对技巧的重视。中国传统的戏曲表演讲究程式化,一招一式都有严格的规定,而这个程式化与桑塔格所说的风格化正是同一个词:stylization。袁四爷看完程、段的演出后,到后台与二人相见,称赞程蝶衣表演精准到位,但不留情面地批评段小楼没有按老规矩把霸王回营到与虞姬相见的台步走成七步,而是只走了五步,仅仅两步之差却大有文章:楚霸王气度尊贵,仓促的五步却会使他显得威而不重,流露出一股江湖的恶霸气。这正是对程式化表演的强调。

对于袁四爷的吹毛求疵,程蝶衣并无异议,然而段小楼并不以为然。《霸王》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设计,这一幕场景也不例外,处于冲突中心的三个人物表现各异:袁四爷以专家自居,高谈阔论,出手大方,重赏程蝶衣;段小楼早已洗去脸上的油彩,袁四爷的到来完全没有影响到他麻利地更衣;程蝶衣谦恭地站立一旁,仍是旦角装扮,当段小楼出言不逊顶撞讥讽袁四爷时,他忙着从中斡旋。段小楼已经不是戏台上的楚霸王,他恢复了本来面目,还原了“本来”性,但程蝶衣还是戏台上的虞姬,保持着“非本来”性。在其后的情节发展中,我们得知段小楼是急于去见“花满楼”的头牌妓女菊仙,袁四爷则是一个有断袖之癖的人,利用程蝶衣“失恋”于段小楼的机会在自己的府邸取而代之地扮上了霸王,以艺术之名成功地追求到了程蝶衣。在这场冲突中,出现了两个同盟:袁四爷和程蝶衣的同性恋同盟以及段小楼和菊仙的异性恋同盟,袁段之争从而演化成了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的艺术观之争,或者说“非本来”和“本来”之争。袁程之间达成一致的“非本来”的同性关系是二者“坎普”趣味的一个注脚,后来当段小楼不得已承认霸王回营需要走七步时,似乎昭示着影片中的“非本来”性战胜了“本来”性。

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人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浩劫之中。程蝶衣和段小楼在经

历了批斗、互相揭发和背叛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可以重新登台演出了。影片采用倒叙的手法展开叙事,以劫后余生的二人排练《霸王》作为开头,在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交代完毕之后,结局部分首尾呼应,二人仍在排练,可是程蝶衣却在哀婉的唱腔中拔出宝剑,完成了人生的谢幕表演,自刎于段小楼面前,实现了他的“从一而终”。这个结尾与原著相去甚远,但更符合程蝶衣的角色设定,他等待着最后一次与“霸王”同台,没有观众,没有美轮美奂的舞台,只有最纯粹的表演,艺术被还原到最本真的状态。桑塔格在论及“坎普”和同性恋之间的关系前,引用了王尔德的一则警句:“生活中反常的东西,对艺术来说却是正常的。而生活中唯一的事,是与艺术保持正常的关系。”^{[1]277}这段话用来解释程蝶衣的自杀也是贴切的,因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舞台和生活对他来说没有界限,或者说,他生活中唯一的事,就是艺术。在与段小楼搭档时,他就是虞姬,而虞姬终有一死,生活与艺术,反常与正常,都在死亡中被一一抹平。

二、彩虹合唱团现象:现代城市生活的自嘲式白描

《霸王》的艺术性与“非本来”性密不可分,其“坎普”风格也离不开同性恋情结,不过“坎普”并非只是一种被围困在性别纠葛之中的狭隘的感受力,因而桑塔格特别申明:“尽管同性恋者一直是‘坎普’趣味的先锋,‘坎普’趣味却不只是同性恋趣味。”^{[1]290}尽管如此,在伊丽莎白·哈德维克(Elizabeth Hardwick, 1916—2007)眼里,“坎普”仍然是带有限定意味的。她首先肯定了《关于坎普的札记》“是一部有关‘风格’的较早的、振奋人心的作品,该风格处在感受力难以言传的前哨”,但同时也指出,“‘坎普’的狭隘在于它仅能在城市里实现其林林总总的领域”^{[13]xiii}。哈德维克确实抓住了桑塔格“坎普”观中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城市性。桑塔格分析“坎普”在她之前没有得到探讨有三个原因:其一,感受力本身就是最难以谈论的东西之一;其二,“坎普”不是一种自然形态的感受力;其三,“坎普”是小圈子的东西——是某种拥有自己的秘密代码甚至身份标识的东西,见于城市小团体中间”^{[1]275}。不仅“坎普”之物多见于城市,而且“坎普”现象也往往是城市里所特有的。

2016年1月,一个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室内合唱团——彩虹合唱团(以下简称“彩虹”)带着一首“神曲”《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以下简称《张士超》)征服了中国的广大网民,一跃成为

最受关注的民间合唱团和表演团体。同年7月,该合唱团又发布了另一首歌曲《感觉身体被掏空》(以下简称《感觉》),再度引爆网络,一时间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网络事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彩虹”的成功是“坎普”风格在中国城市生活中被适时运用并被欣然接受的例子。其适时之处在于敏锐地把握住了城市里涌动的某些情绪,并以情绪主体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有效地利用了网络平台,病毒式地传播出去。

桑塔格把“坎普”分为两种,纯粹的和蓄意的。前者不是有意为之,而后者“全然是自觉的(当人为坎普而表演时)”^{[1]283}。桑塔格着墨更多的是第二种“坎普”,即在王尔德的警句里体现出来的那种“坎普”精神,她的札记“融合了坎普模式的典范——奥斯卡·王尔德的警句。这篇文章是对那些颠倒的、蓄意的事物的直觉、观察和宽容”^{[13]xiii}。桑塔格表示纯粹的“坎普”“绝对严肃”^{[1]282},因而纯粹的“坎普”创作者都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来进行创作的,但她又笼统地申明,“坎普的关键之处在于废黜严肃。坎普是玩笑性的、是反严肃的”^{[1]288}。这样前后不一的表述无怪乎会招致人们对她自相矛盾的批评,似乎有失严谨,但是如果循着她的逻辑推论,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反严肃”的“坎普”其实指的就是蓄意的“坎普”,就像“反小说”仍是小说,“反电影”仍是电影一样,在桑塔格这里,“反严肃”也是一种严肃。她继而模仿王尔德的吊诡语气写道:“更确切地说,坎普与‘严肃’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关系。人们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轻浮之事,也可以轻浮的方式对待严肃之事。”^{[1]288}这就等于取消了以严肃来区分纯粹的“坎普”和蓄意的“坎普”,无论是“严肃”的严肃,还是“反严肃”的严肃,“坎普”归根到底都是严肃的,只不过在蓄意的“坎普”中,严肃带上了王尔德那样的戏谑精神,而“只有那些适当地混合了夸张、奇异、狂热,以及天真的因素的严肃,才能算作坎普”^{[1]283}。

“彩虹”的作品可以归类为蓄意的“坎普”,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14],但这样的“胡说八道”又能直击人心,严肃地反映了城市生活中真实的方面,从而轻松自如地在轻浮与严肃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彩虹”创作了不少作品,但最广为人知的还是《张士超》和《感觉》,二者在风格上很接近,都有肃穆的合唱阵容,严肃的旋律,戏谑的歌词。

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借助各种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发布大量的信息、图片和视频等,其中不乏“神曲”,如龚琳娜的《忐忑》、筷子兄弟

的《小苹果》、岳云鹏的《五环之歌》，等等。这些歌曲或成为模仿秀的常见选曲，或通过广场舞风靡全国，或在公司年会、谐趣节目中频频亮相，可复制性强，表演难度不高，因而普及速度快。但遗憾的是只见其俗，未见其雅，只能算是刻奇艺术中媚俗的一面，具有标新立异的特征，与先锋艺术有一定的渊源，但是“选择模仿的只是先锋艺术中便于从技术上复制生产、广大受众乐于消费的那一部分，采取的是安全稳妥、理性运作的商业模式”^[15]。

“彩虹”的作品显然有别于上述“神曲”，它们易于观赏，可是难以复制，以雅的形式表现俗的（接地气）的内容，体现了“坎普”“不仅面对低鄙对象，也面对高雅对象……只是方式不一样”^③的雅俗合一的兼容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就常规化的合唱形式而言，无论是音乐厅的现场表演，还是电视或其他视频方式的录播，这些“标准的合唱，哪怕唱法再精湛，词曲再高大上也很难引起共鸣”^[16]，“彩虹”正是通过打破“标准”而令人耳目一新，如果脱离其原创性的“下里巴人”的歌词，则无法实现“体验的戏剧化”^{[1]287}。彩虹的成员里既有专业的音乐人才，又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演员，他们在职业上可能千差万别，但又有一个共同点，即同为城市知识青年，合唱团词曲的创作首先引起的是他们的共鸣，所以当他们在舞台上合力发声时，唱出的也是他们自己的心声。这对于与他们有着相似背景和身份的观众来说，产生的冲击力可想而知，这也是他们尤其受到城市知识青年热捧的原因之一。

《张士超》讲述的是发生在一线城市上海的一件很多人都经历过的琐碎小事：“我”下班回家忘了带钥匙，只能给合租的室友“张士超”打电话求助，可是他去闵行约会女友了，留下“我”徘徊在五角场的国定路，无助地在寒风冷雨中冻得瑟瑟发抖。超出常规的长长的歌名（在后来的演出中，歌名变得更长，改为《张士超你昨天晚上到底把我家的钥匙放在哪里了》），上海人熟悉的地名，完全是日常用语的“凄凉”倾诉，专业的男女八声部合唱，“先是快节奏的叙事方式交代起因，旋律高亢激昂。紧接着开始抒情，尾声段落则借用了周杰伦《牛仔很忙》中的副歌旋律。另外，加配古老的管乐器卡祖笛伴奏，多重严肃形式层叠”^[17]。这些互相冲撞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但这件几乎不值一提的小事背后，却隐藏着在大都市打拼的人群的辛酸：合租、举目无亲、捉襟见肘，令观众笑中带泪。在现场表演时，指挥和男声部成员全都身穿清一色的黑色西装，戴着黑色墨镜，干练整齐，连发型都一丝

不苟，唱出来的却是“凛冽的风/冰冷的雨/国定路的落叶满地/我已经冻得不行/张大哥你在哪里”这样落魄的场景，还有阿Q式的自我安慰：“钥匙啊钥匙/你快快出现/大不了我自己再去重新配一把……我那么有钱/一下配十把”，形象而直观地表现了光鲜的外表所掩盖的生活的艰辛。《张士超》的成功也触动了严肃音乐界的专家们，中国合唱协会指挥委员会副主任任宝平坦言：“国内的合唱作品不是过于严肃高雅，就是纯玩技巧，而这首作曲诙谐、生活化的歌词贴近生活，令很多老艺术家对‘神曲’有了全新的认识。”^[18]指挥家邹跃飞亦表扬“彩虹”的核心人物和词曲作者金承志是“理念先进的创作人才”^[19]，有望把合唱事业推向更高的平台。

《感觉》是更成熟的作品。如果说《张士超》是偶然走红的话，那么《感觉》则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在推出前、中、后的各个环节都有较为周详的安排，刻画的人群更广，因而受众面更宽。歌名来自从20世纪90年代便在各大电视台播放至今的某个保健品广告的广告词，其在中国耳熟能详的程度不言而喻。《感觉》也有故事情节，讲述的是在北京的一个公司，下午六点老板通知加班，而这首歌主要唱的就是被要求加班的员工的内心独白，“整首歌曲以非常轻松幽默加调侃的笔法，很容易让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有一种情绪的代入感”^[20]。包括钢琴伴奏和指挥在内的所有合唱团成员都头戴动物耳朵状的装饰，不同的是指挥的“耳朵”是竖立的，右手还套着一个熊爪状的巨大手套，演员们的“耳朵”则呈耷拉状。随着歌曲的逐步展开，观众才明白合唱团巧妙地利用了指挥和演员相对而立的演出阵型，象征性地表现了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对峙状态，强势的一方是指挥（老板）——“有一个老板叫作大卫/下午六点出现眼神恰似黑背”，弱势的一方是演员（员工）——“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耳朵”与“熊掌”原来代表的是狗耳朵和彪悍警觉的大型犬“黑背”的“狗掌”，看到这里时，观众里的“加班狗”大都心领神会，报以会心的一笑。

《感觉》里的“我”工作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但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歌中唱道：“起来征战北五环/我家住在回龙观。”回龙观被戏称为“睡城”，租住者多为节约生活成本的上班族，由于上下班途中花费的时间很长，住处的主要功能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而已。有人受到这首歌的启发，采集回龙观地区和望京地区（位于朝阳区）的各项数据将二者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回龙观地区的人们确实幸福感不高，倦怠感则很强，在消费、出行的方便程度和生活

品质上都要低于望京地区。^[21]《感觉》中两处极为夸张的歌词,一是听到要加班,“我”的第一反应:“我说这样不好吧/我要去机场接我年迈滴爸爸(年迈滴爸爸)/三十多年没见啦/他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二是倾诉加班之苦:“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戴了两年半/作息紊乱我却越来越胖”。来自“西伯利亚”的子虚乌有的爸爸当然无法成为“我”拒绝加班的理由,而“作息紊乱我却越来越胖”却是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其实“感觉身体被掏空”的不只是受雇于人的加班一族,《感觉》也无意于挑动劳资关系的对立。金承志特意澄清这首歌是“给每一个为生活所奔波的人以一种关注,通过音乐来告诉彼此,你并不孤独。然后我们可以手牵手迎接第二天更大的生活挑战”^[20]。

由此可见,《感觉》的“吐槽”不是去扑灭人们对生活的热爱,相反,这种幽默风趣的表达有助于人们释放出负面情绪,重新点燃生活的激情,因而要高于那些无病呻吟或者空洞无物的流行音乐作品。激情也是“坎普”感受力的重要方面,“没有激情,人们就只能得到伪坎普——即仅仅是装饰性的、四平八稳的东西,一句话,是花哨”^{[1]284}。不仅如此,“坎普”还能给人们带来乐趣。在接触“坎普”式的作品时,人们“不是在开它玩笑……(而)是从它那里得到乐趣”^{[2]151}。“彩虹”的音乐形式使其免受“亵玩”,内容又使人倍感亲切,“不仅能保持一种雅与俗的平衡,也不像工业作品那样生硬无趣,在提供话题性的同时,也特别容易触动到平凡人对于艺术的感触点”^[21],这正是“彩虹”的独到之处。

三、结语

桑塔格在写作《关于“坎普”的札记》时,保持的是形式主义的立场,称“坎普”艺术“不惜以内容为代价来突出质地、感性表面和风格”^{[1]278}。但毕竟艺术与生活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坎普没有清空内容。把坎普视为‘形式主义’的美学是错误的。正因为坎普陶醉于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夹缝地带,所以它对内容的顽固存在是全然乐此不疲的”^{[22]7}。其实,桑塔格并没有否定内容,而是说形式的分量要重于内容。没有内容,也就没有形式的参照物。比如,协奏曲没有内容,但在桑塔格看来却不是“坎普”,一个原因就是“它并不提供无聊或过度的内容与丰富的形式之间的一种对比”^{[1]278}。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该据此反向推论出“坎普”的内容都是“无聊或过度的”,那样的艺术不会引起

桑塔格这个“认真的现代主义者”^{[2]158}的兴趣。在桑塔格眼里,“坎普趣味是一种爱,对人性的爱”^{[1]291},这个爱的基础就是包容,尤其是对处于边缘的人和事物的一视同仁;她从王尔德对一切物品等量齐观的审美态度中,看出了“坎普”充满了包容性的“民主精神”^{[1]289}。《霸王》里的“非本来”性和“彩虹”的作品所反映出的都市症候,仅仅是“坎普”众多面孔中的两幅,而桑塔格引领我们感知和体会的这种感受力还有更多的面孔等待我们去认识和描画。

注释:

- ①由于受条件限制,收集资料无法顾及港澳台地区,因此此处的中国指的是大陆,涉及的文献也是在大陆出版发行的。
- ②详见李闻思.关于坎普的再思考:从《关于坎普的札记》到坎普电影[J].文艺理论研究,2015(5):137-145;陈星君.王尔德与坎普[J].贵州社会科学,2014(9):68-71;陈冠中.城市九章[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徐贲.伪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Camp)美学[J].文艺理论研究,2010(5):59-67。
- ③按照该文作者的解释,文中提及的“媚世”是指“kitsch”,甜媚的劣品之意,而“滋世”是指“cheesy”,陈腐的劣品之意。张法.媚世(kitsch)和堪鄙(camp):从美学范畴体系的角度看当代西方两个美学新范畴[J].当代文坛,2011(1):4-11。

参考文献:

- [1] Susan Sontag.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1.
- [2] 陈冠中. 城市九章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 [3] 郑思明. 我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 英国现代诗人奥登西方研究述评 [J]. 国外文学, 2011(3): 50-58.
- [4] 孙宜学. 审判王尔德实录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5] 王秋海. “矫饰”与前卫: 解读苏珊·桑塔格的《“矫饰”笔记》 [J]. 文艺研究, 2004(2): 63-68.
- [6] 王予霞. 性幻想中的艺术书写: 苏珊·桑塔格艺术理论评析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6): 93-97.
- [7] 徐贲. 伪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Camp)美学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0(5): 59-67.
- [8] 安然, 青萍. 戏曲的命运与电影的沉沦: 兼谈《霸王别姬》 [J]. 中国戏剧, 1993(12): 33-35.
- [9] 季余. 《霸王别姬》给观众带来了什么 [J]. 求是, 1994(2): 45-47.
- [10] 黄正勤. 程蝶衣的从一而终 [J]. 中国戏剧, 1994(4): 34-35.

- [11] 珍·库瓦劳.《霸王别姬》: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历史、情节和观念[J]. 李小刚,译. 世界电影,1996(4):187-205.
- [12] 李东然. 陈凯歌:别张国荣10年,别霸王别姬20年[EB/OL]. 三联生活周刊,(2013-03-31)[2018-04-21]. http://www.lifeweek.com.cn/2013/0331/40425_2.shtml.
- [13] Elizabeth Hardwick. Introduction [M]//Susan Sontag. A Susan Sontag Read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2.
- [14] 王磊. 彩虹合唱团变网红 被戏称“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EB/OL]. (2016-04-13)[2018-07-05]. <http://www.chinanews.com/yl/2016/04-13/7832958.shtml>.
- [15] 李明明. 关于媚俗(Kitsch)[J]. 外国文学评论,2015(1):213-226.
- [16] 马金同. 没官网,没公众号,没App,“张士超”怎么就火了?[J]. 公关世界,2016(2):79-80.
- [17] 谢宛霏,张敏.《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为什么这样火[N]. 中国青年报,2016-01-22.
- [18] 傅玛丽. 彩虹合唱团靠什么红下去[EB/OL]. (2016-08-03)[2018-10-20]. <http://www.bbtnews.com.cn/2016/0803/156709.shtml>.
- [19] 叶闻菁. 金承志:来自温州的“人民艺术家”[J]. 温州人,2016(15):72-77.
- [20] 爱地人.《感觉身体被掏空》用严肃音乐一本正经地搞笑[N]. 京华时报,2016-07-29.
- [21] 石菲. 让大数据成为决策依据[J]. 中国信息化,2016(10):31-34.
- [22] Michael Trask. Camp Sites: Sex, Politics, and Academic Style in Postwar America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wo Faces of “Camp”: The Expression of Chinese Camp in *Farewell My Concubine* and Caihong (Rainbow) Choir Phenomenon

KE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9, China)

Abstract: “Camp” sensibility can be found in the theme, performan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Farewell My Concubine*. The “off” nature of “camp”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that, it endows the film with a unique charm and opens a new window for us to look at its subtle implications. The works of Caihong (Rainbow) Choir, on the other hand, unfold “camp” as an urban sensibility, balancing the frivolous and the serious in a relaxed manner with self-mocking descriptions of the modern urban life. The “off” nature in *Farewell My Concubine* and the Caihong (Rainbow) phenomenon are no more than two of the many faces of “camp”, and more aspects of “camp” await our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camp”; *Farewell My Concubine*; Caihong (Rainbow) Choir

李渔《闲情偶寄》语言风格简论

惠萍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闲情偶寄》是李渔一生创作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随笔,其语言亲切自然、简洁平实,呈现出“言近旨远”“雅俗俱利、理致兼收”“简而文、新而妥”的语言风格。李渔语言风格的形成,与晚明心性之学的盛行、明清易代之际政治对出版的管控,以及李渔自身个性特征等因素息息相关。李渔用其独具风格的语言为我们构筑了《闲情偶寄》这座奇特的文化大厦。我们今天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李渔安乐有时、起居有度的休闲生活方式和戒奢从简、师法自然的休闲精神都值得 we 学习。

关键词:李渔;《闲情偶寄》;语言风格;休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0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25-04

李渔一生创作无数,但《闲情偶寄》是其为数不多的一本具有自传性质的随笔。他在书中分门别类地向读者讲述他关于戏曲、园林、器物、饮食以及养生等问题的看法,涉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殷切地指导人们怎样讲究吃喝玩乐、如何顺生颐养天年等。可以说,《闲情偶寄》真切记录了李渔一生的经历和思考,比较集中地展示了李渔对戏曲舞台艺术和世俗生活的热情、认知和创造,把它视为李渔的代表作亦不为过。它既是李渔艺术创作生涯的总结,也是他日常审美生活的理论来源。李渔写信给友人说:“弟以前拙刻,车载斗量,近以购纸无钱,多束诸高阁而未印……惟《闲情偶寄》一种,其新人耳目,较他刻为尤甚。”^{[1]215}

其实,《闲情偶寄》让人耳目一新的不仅在于李渔观察周围事物和日常生活的独特角度,而且还在于李渔语言表达的鲜明生动。笔者发现有关《闲情偶寄》语言研究的现有成果多集中在对其中戏曲语言的研究方面,对《闲情偶寄》一书整体的语言风格的研究则涉及较少。因此,笔者就从此处尝试研究。

一、《闲情偶寄》语言风格的特征

《闲情偶寄》虽是一本文言书籍,但所用白话较

多,可称之为“浅近文言”。全书比较通俗易懂,如果说有阅读障碍,也只是存在于一些对一般读者来讲不是特别熟悉的特殊用语和典故方面。除却这点,《闲情偶寄》的语言总体来讲亲切自然、简洁平实,言有尽而意无穷。语言风格也叫言语风格,是“语言表达上特有的气氛和格调”。“语言风格受特定的交际场合、交际目的支配,是运用语言的结果。语言风格不是语言体系自身的状态,不是语言民族特点或语言材料的综合,而是语言使用者运用语言的特点综合表现出来的气氛和格调。”^{[2]184}纵观全书,李渔《闲情偶寄》的语言呈现以下风格特色:

(一)言近旨远

“其言近,其旨远。”^{[3]1}意思是语言浅近而旨趣深远,这是友人对《闲情偶寄》的整体评价,也是对该书语言特色最恰切的描述。诚然,“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3]40}。

首先,“言近旨远”是作者表达自我、实现创作目的的一种主动选择。尽管《闲情偶寄》着眼于戏曲舞台和日常生活的文字书写,但李渔却把它视为一介平民藻饰鼎新盛世、回应主旋律之作。他在“凡例”中开篇明义做“四期三戒”,尤其是“点缀太平”

收稿日期:2019-06-15

作者简介:惠萍(1974—),女,河南社旗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新闻传播、编辑出版等领域的研究。

之说：“圣主当阳，力崇文教，庙堂既陈诗赋，草野合奏风谣，所谓上行而下效也。”^{[3]10}同时，还强调此举也意在“规正风俗”“警惕人心”，立意不可谓不高远。

其次，“言近旨远”是作者“寓庄论于闲情”创作手法的一种外在表现：托物言志，以小见大、以浅喻深。“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3]11}比如文中提到对葱、蒜、韭三种普通食材的描述：一开始从气味香浓到人们的好恶，“浓则为时所争尚，甘受其秽而不辞；淡则为世所共遗，自荐其香而弗受”，写出自己从中悟到的善身处世之艰；从自己一生对待此三物和香椿的态度引申出待人接物的中庸之道；并且还能从韭菜初生之芽的清香不臭联想到孩提之初心不变，没有惊人之语却也清新可喜，委实不易。李渔谈到人们饲养的家畜，“鸡司晨，犬守夜，猫捕鼠”，同样“有功于人而自食其力”，但待遇和下场却迥然不同：“鸡之司晨，犬之守夜，忍饥寒而尽瘁，无所利而为之，纯公无私者也；猫之捕鼠，因去害而得食，有所利而为之，公私相半者也。清勤自处，不屑媚人者，远身之道；假公自为，密迹其君者，固宠之方。”^{[3]363-364}李渔一边慨叹“是三物之亲疏，皆自取之也”，一边慨叹“亲疏可言而祸福不可言”，从而悟出的“居官守职之难”，最后还不忘对自己选择超然于宦海沉浮表示庆幸。个中描述虽有牵强附会之嫌，倒也能在细微处言人所未言，给人以更多的启发和想象。

(二)“雅俗俱利、理致兼收”即雅俗得当，兼顾义理与情致

此语和下文的“简而文、新而妥”都出自《闲情偶寄》的“居室部”，原本是谈“途径”和“置顶格”设计时的处理效果，拿来借以描述《闲情偶寄》的语言风格还是比较恰切的。

“雅俗俱利、理致兼收”原意是讲铺设弯路时，必须要在旁边开设耳门一扇，以便不时之需，且能兼顾义理和雅俗：“径莫便于捷，而又莫妙于迂。凡有故作迂途，以取别致者，必另开耳门一扇，以便家人之奔走，急则开之，缓则闭之，斯雅俗俱利，而理致兼收矣。”^{[3]183}李渔是较早重视观众的剧作家和导演，“笠翁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3]65}。李渔不仅在戏曲创作中对语言非常在意，而且涉及雅俗方面的考量，李渔的观点也是非常明确的：“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

雅；活处寓板，即于板处证活。”^{[3]76}不管是为了争取观众还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才情心志，李渔在创作中一直坚持做到雅俗兼顾而又“不失情理之正”。《闲情偶寄》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内容所涉一方面是雅人深致的时代习尚，一方面是凡人衣食住行的惯常。既谈戏曲文本的音律结构，也说舞台的生角旦丑；既关生老病死的养生之道，也涉藏污纳垢的便溺之所……且其总体语言风格既不失风雅，又可亲、通俗易懂。比如李渔谈“机趣”，他认为“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3]36}。更有比喻半途出家之人不能成大器、学歌不知阴阳平仄则如书中蠹鱼等：“凡作诗文书画、饮酒斗棋与百工技艺之事，无一不具夙根，无一不本天授。强而后能者，毕竟是半途出家，止可冒斋饭吃，不能成佛作祖也。”^{[3]37}“然学歌之家，尽有度曲一生，不知阴阳平仄为何物者，是与蠹鱼日在书中，未尝识字等也。”^{[3]177}仔细品味，无一不有道理。

清人黄启太在《词曲闲评》中说：“李渔一生著作，绝少雅音。”^{[4]21}当然，这里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指李渔的词曲。即便这样，如果说李渔创作的大多数传奇和小说都是通俗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我们仍可以把《闲情偶寄》视作李渔按照“不忍为薪”之木来打造的一个清新的雅俗兼顾的例外。

(三)“简而文、新而妥”即简约文雅、新异妥帖

李渔说：“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3]34}相比戏曲和传奇小说之街谈巷议的随意笼统，《闲情偶寄》的语言表达显得相当简约文雅，毕竟，李渔是把它作为“不忍为薪”之物来打造的。比较直观的是一些小标题的拟定，比如《词曲部》“词采”部分的小标题“贵浅显”“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演习部》“选剧”部分的小标题“别古今”“剂冷热”，以及《居室部》“窗栏”部分的小标题“制体宜坚”“取景在借”等。李渔对语言的洁净也有一定的追求，他认为洁净与否不在语言多寡，而在于是否恰到好处。因此文中一些观点的表达显得简洁精练、清新自然。比如，“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3]340}。“老子之学，避世无为之学也，笠翁之学，家居有事之学也。”^{[3]372}

“新而妥”包括“新异”和“妥帖”两个方面，二者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李渔首先在该书中声明：

“所言八事，无一事不新；所著万言，无一言稍故者。”^{[3]10}“人惟求旧，物惟求新。”^{[3]24}不管此语夸张与否，“新人耳目”的确是李渔孜孜以求的，“不载旧本之一言，以补新书之偶缺，不借前人之只字，以证后事之不经，观者于诸项之中，幸勿事事求全，言言责备，此新耳目之书，非备考核之书也”^{[3]12}。李渔还有“尖新”一说：“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则列之案头，不观则已，观则欲罢不能；奏之场上，不听则已，听则求归不得。尤物足以移人，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也。”^{[3]70}结合李渔一生的创作，我们对其书中一些新异的表达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比如在“贵人行乐之法”部分，谈到汉代注重休养生息的文景二帝和在意开疆拓土的武帝，其表达就跳出了惯常的思路，分别用“逸”和“劳”两个字来评价以上帝王，并附之以“逸”“劳”二字简单而妥帖的说明，使人乍读惊异而终不觉突兀。同样妥帖的表达更多还表现在对一些相关问题的表述和补充说明上，比如：“故习技之道，不可不与修容、治服并讲也。技艺以翰墨为上，丝竹次之，歌舞又次之，女工则其分内事，不必道也……其不及女工，而仍郑重其事，不敢竟遗者，虑开后世逐末之门，置纺绩蚕缣于不讲也。虽说闲情，无伤大道，是为立言之初意尔。”^{[3]166-167}兼顾各方，无伤大道，此所谓李渔“新之有道，异之有方”。当然，文中也不乏一些新异而不切合实际的论述，比如人之皮肤底色深浅取决于成胎时父母精血的多寡，“娶妻如买田庄”，“买姬妾如治园圃”等等，实在是囿于李渔自身科学知识的匮乏和当时陈规陋习的影响，在所难免，读者务必做到心中有数。

二、《闲情偶寄》语言风格的成因

《闲情偶寄》是李渔平生最为得意之作。他认为，《闲情偶寄》“不特工巧犹人，且能自我作古”^{[1]165}，“其新人耳目，较他刻为尤甚”，可见他对自己这部书十分满意。此书的写作缘起，李渔在《凡例》中明确表示为“四期”：一期点缀太平，一期崇尚俭朴，一期规正风俗，一期警惕人心。这里展现出李渔的家国情怀以及对世相民心的殷殷关注，较之他素常行为的任性不羁，反衬出一种特别的小心翼翼和刻意的中规中矩。再细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李渔文笔所涉绝不仅仅是“闲情”，亦不是“偶寄”，而是深有所寄，言为心声。“文章者，心之花也。溯其根苗，则始于天地。天地华英之气，无时不泄。泄于物者，则为山川草木，泄于人者，则为诗赋词章。故曰文章者，心之花也。”^{[1]34}李渔在《名词选

胜》的序中如是说。因此，李渔语言风格的成因也与之不无关系。

语言风格具有可感性、系统性、稳定性和独特性。“风格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长期的积累与沉淀。稳定性贯串于不同的作品中，并表现出大致相同的语言气氛和格调。风格一旦形成，一般不会轻易改变。但随着时代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风格也可能产生变化。因此风格的稳定性也具有相对性。”^{[2]186-187}也就是说，风格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也会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而变化。如果说，“语言风格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总结和分类，通常包括时代风格、民族风格、个人风格和表现风格”^{[2]187}。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李渔《闲情偶寄》语言风格形成的原因：

首先，受晚明心性之学的影响，独抒心性，自创“家居有事之学”，所以其言也近，其旨也远。晚明以降，作为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反动，李贽的“童心说”和以“公安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为代表的“性灵说”一度占据了思想界的重要位置，李贽更是宣扬“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5]21}，对世俗情欲和市民趣味给予了高度肯定。李渔深受这股思潮的影响，“童心”“孩提之心”“孩提之乐”等字眼，经常见诸笔端。他说：“人能以孩提之乐境为乐境，则去圣人不远矣。”^{[3]347}“予生无他癖，惟好著书。”^{[3]387}较之传统戏曲和小说的创作，小品文《闲情偶寄》更能呈现李渔尊重自我、个性解放的心路历程。他坦言：“老子之学，避世无为之学也；笠翁之学，家居有事之学也。二说并存，则游于方之内，外，无适不可。”^{[3]372}从这个意义上说，《闲情偶寄》确实是一本关于李渔个人理念及生活情趣的书，或许可以称之为“自我之书”^{[6]37}。因此，这本呈现“游于方之内，外，无适不可”的“自我之书”，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独抒心性于日常，就非常好理解了。

其次，受明清易代之际政治对出版管控的影响，“雅俗共赏”和“义理兼具”像“寓庄论于闲情”一样，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一方面，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市民经济的发展，为民间休闲娱乐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文化保障；另一方面，当时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大清王朝，在需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稳固政权的同时，又普遍采取高压文化控制政策控制局面，因此清初政府多次颁布禁书令。比如清初康熙年间力崇文教，但又要求不得出版有伤风化的作品。“康熙二年议准，嗣后如有私刻琐语淫词，有乖风化者，

内而科道,外而督抚,访实何书系何人编造,指名题参,交与该部议罪。”^{[7]23}前者孕育了李渔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休闲哲学,后者影响了李渔创作这部“不忍为薪”之作的表现手法和外在形态。因此,“冀人由雅及庄,渐入渐深,而不觉其可畏也。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实具婆心,非同客语,正人奇士,当共谅之”^{[3]11}。并不是说说而已,“用狡拾伎俩,作游戏神通”^{[3]16},是同时求得庙堂之许和民间之誉不得已而做出的明智之举。“是集所载,皆极新极异之谈,然无一不轨于正道,其可告无罪于世者此耳。”^{[3]11}

最后,受李渔自身经历和情志的影响,托之“闲情”,是非功过任评说,所以“简而文、新而妥”。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李渔,既没有子承父业寻医问药,也没有选择科举取士走所谓的正途,而是亦文亦商,坦然以营利为目的,写传奇、小说,编辑出版图书,组织家庭戏班,以戏曲自娱娱人,并携家班出入于达官贵人之家,极尽人生之乐。特别是最后一项,实际上成为李渔生前身后受人非议的主要缘由。尽管李渔经意不经意地表达出“生前荣辱谁争得”,但心中肯定郁积了诸多不平之气。李渔在《与龚芝麓大宗伯》书信中写道:“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赍志以没,俾造物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著为《闲情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1]162}此话看似平常却颇值回味:有些许谦虚,有些许得意,还有些许期许。李渔六十岁开始创作《闲情偶寄》,把自己平生的所历所思倾注笔端,“发他人所不顾之事,叙他人所不屑之状”,引经据典、文采斐然,展现出他独特的个性和才情。

《闲情偶寄》一书既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大俗大雅、悠游人间的文人日常家居生活图,也为我们勾勒出一代风流才子李渔的独特心路历程。一部自我表白、自我呈现之书,既在意“简而文”,也在意“新而妥”,某种程度上也许会更在意后者,即表达的稳妥。大概李渔经常在行文中突然跳出来或停顿一下做“补充说明”皆源于此,比如:“予贫士也,仅识寒酸之事。欲示富贵,而以绮丽胜人,则有从前之旧制在。”^{[3]182}“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3]256}前者回应清初崇尚简朴的要义,后者在发布与盗版取利者

决一死战的布告之后,又解释了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生气和大动干戈,来缓和一下气氛。

三、结语

纵观《闲情偶寄》全篇,不管是撰词度曲还是游山玩水,品花养草、谈吃论穿还是布室造园,抑或是欣赏女性之美,畅谈如何颐养天年,都不能视李渔为一个单纯的消极享乐主义者,他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营造一种独特的具有审美休闲氛围的生活,且一生践行不辍,即把日常生活休闲审美化。掩卷之余,一个时而自信时而自嘲、既幽默又风趣、集风雅和世俗于一身的一个可爱的老先生非常真实地凸现在读者面前。李渔用颇具独特风格的语言,为我们构筑了《闲情偶寄》这座奇特的文化大厦。

在李渔的生命实践中,他决不会耽于现实生活的种种限制而影响自己尽情享受人生。无论四季变换、贫穷富贵、坐卧行走,皆可享受生活。生岁不满百,行乐需及时。总之,李渔在日常生活的审美休闲中,恪守一种从心所欲而又顺天应时、讲究养生起居而又因便制宜的人人可以做到的生活原则。休闲是现代的说法,其理论核心是“将享受人生当作自我生活的一个部分,更具体地说,即反对过分关注物质,主张放缓生活节奏,提倡享受悠闲与自得的自由心态”^{[8]3}。因此,面对今天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我们不但要学习李渔安乐有时、闲适有度的休闲生活方式,而且还要学习他戒奢从简、师法自然的休闲精神。

参考文献:

- [1]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M]//李渔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 [2]王世凯.新编现代汉语教程:下册[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 [3]李渔.闲情偶寄[M].江巨荣,卢寿荣,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4]黄启太.词曲闲评[C]//俞为民,孙蓉蓉.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近代编第1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
- [5]李贽.焚书·续焚书校释[M].陈仁仁,校释.长沙:岳麓书社,2011.
- [6]韩南.创造李渔[M].杨光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 [7]魏晋锡.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C]//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8]郭丽萍.论晚明小品的休闲之维[D].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1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下转第35页)

全域旅游视角下我国省域旅游竞争力研究

王庆生,刘诗涵

(天津商业大学 管理学院,天津 300134)

摘要:基于对全域旅游概念的认知,梳理了全域旅游理论发展以及全域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关进展。依据区域旅游竞争力模型,并结合国家旅游统计体系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全域旅游示范区主要考核指标,以整体性、层次性、可获取性为原则,建立全域旅游视角下省域旅游评价指标。利用SPSS 23.0统计学软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系统聚类法对全域旅游视角下我国省域旅游竞争力进行定量研究,研究认为,我国东部和南部各省域全域旅游总体发展水平要高于西部与北部各省域,各省域地区旅游竞争力与该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为一致。

关键词:全域旅游;旅游竞争力;主成分分析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05

中图分类号:F5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29-07

一、研究背景

全域旅游是应对我国特定时期社会经济现象应运而生的,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旅游发展背景,是一个具有本土化和实践性的概念。关于全域旅游研究方面:刘又堂(2016)认为全域旅游主要是以旅游相关产业为主导,从而带动特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理念与新型开发模式,总结了现阶段全域旅游的基本特点,探究了全域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目的地功能变化的具体表现^[1];于洁、胡静等(2016)通过对我国全域旅游相关文献的研究,提出从2009年到2012年我国全域旅游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从2013年到2016年全域旅游研究处于成长阶段,对全域旅游内涵研究逐渐丰富,但是相关理论研究粗浅,研究范围单一^[2]。关于全域旅游开发方面:张道中(2017)以树山“旅游+”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来构建全域旅游^[3];杨振之(2016)认为全域旅游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与阶段,提出全域旅游要与该地区旅游发展与经济发展模式相匹配,通过全域旅游来促进区域发展。关于全域旅游内涵界定和探

究,在学术界与业界不尽相同^[4]。原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2016)指出全域旅游是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从单一景点旅游模式走向全域旅游发展模式,进行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从而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旅游发展理念与模式^[5]。吴必虎(2016)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全域旅游发展,并把五大理念作为全域旅游的发展导向,而全域旅游是五大理念发展的理论载体^[6]。简而言之,为了发展旅游业而到处创建景点、修建游乐场、旅游基础设施等并不等同于全域旅游,旅游相关产业等建设的系统性和布局规划的科学性才是全域旅游所重视的,它体现的是新时代我国旅游业新的发展方向。全域旅游的发展是对旅游目的地资源赋存的地区进行全方位旅游产业要素的提升,不断满足全域旅游时

收稿日期:2019-06-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373174);天津市高校学科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津教委人函[2017]22号)

作者简介:王庆生(1963—),男,河南偃师人,博士,天津商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旅游规划与区域旅游发展研究。

代下游客丰富多样的体验需求,从而实现旅游业带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王庆生和张行发,2017)^[7]。

现阶段,全域旅游测评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得到各区域广泛关注,尤其是各区域旅游示范区面临如何量化全域旅游成果这一问题,因而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全域旅游评价指标体系,不断深化全域旅游创建工作。在全域旅游标准化体系建设理论研究方面,石培华(2016)提出以标准化推进全域旅游创建工作,认为评价全域旅游示范区应从以下6个方面设计评价指标:一是旅游产品和形象特色;二是旅游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完善;三是该区域旅游产业优势明显、综合服务能力强大;四是政策上该区域要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旅游改革创新和保障机制体系要完善;五是要以文明有序、安全健康,游客旅游体验感满意的区域为主;六是该区域环境优势明显,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措施完善^[8]。李中、白长虹(2017)认为在全域旅游问题中要以实践导向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丰富了全域旅游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指导^[9]。黄海阳、李剡(2018)从旅游资源子系统、经济发展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3个维度设计全域旅游评价体系,从不同侧面反映全域旅游的现状、结构和趋势^[10]。在全域旅游评价体系实证研究方面:林明水、廖茂林、王开泳(2018)以我国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研究主体,从全域旅游的时空发展、产业链发展、相关旅游配套要素发展、管理体系与政策等方面,系统地设计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总结出影响全域旅游示范区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而选择适宜的开发模式^[11]。丰晓旭、夏杰长(2018)通过对全域旅游内涵进行总结探究,提出全域旅游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从产业域、空间域和管理域3个方面选取,运用主成分分析与熵值法,对我国各省域全域旅游进展进行尝试性评价研究^[12]。曹兰州、赵多平、魏小村(2019)从时空变异与演化的角度,对全国各省全域旅游发展进行测度分析,并对发展综合模式进行评价^[13]。徐珍珍、余意峰(2019)通过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手段对我国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进行定量分析,认为我国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不均衡,并提出旅游资源丰富度、旅游产业综合发展能力、基础设施现状、国家政策,是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14]。因此,全域旅游视角下的旅游业统计研究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目前在学界尚未有清晰的探讨研究。可

见,关于全域旅游的应用范围和内容仍处于初步探究阶段。

二、模型构建

(一)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因素、生态环境、相关政策等综合发展水平,与旅游业发展相互渗透从而决定了该区域旅游业发展的综合竞争能力(李创新、马耀峰、高军,2008)^[15]。但是,传统的旅游研究模式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全域旅游的特点和发展状况,忽略了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与经济收入的影响。因而依据整体性、层次性、可获取性等评价指标设计准则,结合现行的旅游统计体系,从旅游资源竞争力、市场竞争力、经济竞争力、环境竞争力4个维度设计、构建全域旅游视角下省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表1 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因素	指标	
旅游资源竞争力 P ₁	5A级景区数量 X ₁	自然保护区数量 X ₂
	世界文化遗产数量 X ₃	博物馆机构数 X ₄
市场竞争力 P ₂	接待旅客总量 X ₅	入境旅游人数总计 X ₆
	入境旅游外国人数总计 X ₇	
经济竞争力 P ₃	接待游客总收入 X ₈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总额 X ₉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X ₁₀	地区生产总值 X ₁₁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 X ₁₂	
环境竞争力 P ₄	住宿业企业数 X ₁₃	餐饮业企业数 X ₁₄
	五星级酒店数量 X ₁₅	铁路营业里程 X ₁₆
	等级公路里程 X ₁₇	旅客周转量合计 X ₁₈

(二)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为201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相关数据。其中,样本数据通过查找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与各省域旅游统计年鉴得到,数据来源具有真实性与可靠性。

三、省域旅游竞争力研究

主成分分析法是研究复杂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统计方法,通过少数主因子来反应复杂变量的内部结构。本文通过确定全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利用SPSS 23.0得到总方差解释主成分提取表(见表2),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可以使得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一)模型的检测

本文所选取研究的原始数据KMO值为0.749,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为0.000,综合其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二)主成分分析

通过表2可知:前4个主成分因子累积贡献率已达85.087(>85%)且特征值均大于1,表明这几

个主因子能够代表复杂变量来说明所研究各省域全域旅游的综合特征。

表2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1	9.319	51.775	51.775	9.319	51.775	51.775	6.141	34.118	34.118
2	2.961	16.451	68.226	2.961	16.451	68.226	5.546	30.812	64.930
3	1.846	10.254	78.479	1.846	10.254	78.479	2.272	12.622	77.552
4	1.189	6.607	85.087	1.189	6.607	85.087	1.356	7.535	85.087
5	.842	4.678	89.765						
6	.430	2.391	92.156						
7	.356	1.976	94.132						
8	.244	1.353	95.485						
9	.233	1.295	96.781						
10	.167	.930	97.711						
11	.116	.644	98.355						
12	.103	.573	98.928						
13	.087	.482	99.410						
14	.044	.244	99.654						
15	.022	.120	99.774						
16	.019	.108	99.882						
17	.015	.084	99.966						
18	.006	.034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由主成分分析法得到成分矩阵(见表3)与旋转后成分矩阵(见表4)。从表4可知住宿业企业数、餐饮业企业数、五星级酒店数量、入境旅游外国人数总计、入境旅游人数总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总额在第一主成分上所占比例较高,表明第一主成分能够反映这些因子的基本信息,主要表现为该省域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与基础设施服务能力,称之为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能力因子。5A级景区数量、博物馆机构数、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接待旅客总量、地区生产总值、旅客周转量合计、接待旅客总收入、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在第二主成分上这些因子信息需要高度重视,可以发现第二主成分主要表明各省域全域

旅游发展需要依赖当地旅游资源。旅游资源作为吸引力带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接待能力、市场需求旺盛,同时也为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奠定了基础。因此,旅游资源可作为第二主因子。等级公路里程、自然保护区数量、铁路营业里程在第三主成分上占有较高比例,表明在第三主成分上能够反映出这些因子的基本信息,这些因子能够说明当地全域旅游发展空间较大,称之为全域旅游发展潜力因子。在第四主成分上所占比例较高的指标为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表明旅游业对GDP的贡献率可作为全域旅游发展竞争力指标。

表3 成分矩阵^a

	成分			
	1	2	3	4
X ₁₁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946	.015	-.092	.173
X ₁₃ 住宿业企业数(个)	.944	-.121	-.044	.043
X ₈ 接待旅客总收入(亿元)	.925	.129	-.132	-.196
X ₁₀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亿元)	.921	.213	.096	.226
X ₁₄ 餐饮业企业数(个)	.915	-.204	-.137	.068
X ₁₈ 旅客周转量合计(亿人公里)	.838	.308	.069	-.091
X ₁₅ 五星级酒店数量(个)	.771	-.467	-.250	.166
X ₇ 入境旅游外国人数总计(万/人次)	.742	-.515	.056	-.060
X ₁ 5A级景区数量(个)	.730	.305	-.255	.197
X ₆ 入境旅游人数总计(万/人次)	.725	-.576	.272	-.098
X ₉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总额(百万美元)	.702	-.659	.096	-.047
X ₄ 博物馆机构数(个)	.698	.509	-.068	.291
X ₅ 接待旅客总量(亿人)	.686	.458	-.247	-.333
X ₁₇ 等级公路里程(公里)	.585	.603	.357	-.212
X ₃ 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个)	.214	.486	-.360	.075
X ₂ 自然资源保护区数量(个)	.471	-.164	.755	-.245
X ₁₆ 铁路营业里程(公里)	.129	.551	.619	-.159
X ₁₂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	-.088	.081	.544	.801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a. 提取了4个成分

表4 旋转后成分矩阵^a

	成分			
	1	2	3	4
X ₉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总额(百万美元)	.968	.018	.005	-.042
X ₆ 入境旅游人数总计(万/人次)	.949	.010	.203	-.011
X ₇ 入境旅游外国人数总计(万/人次)	.891	.144	.040	-.075
X ₁₅ 星级酒店数量(个)	.839	.354	-.272	-.013
X ₁₄ 餐饮企业数(个)	.773	.549	-.011	-.060
X ₁₃ 住宿业企业数(个)	.747	.580	.112	-.043
X ₄ 博物馆机构数(个)	.130	.869	.178	.180
X ₁ 5A 级景区数量(个)	.273	.810	-.007	.012
X ₁₀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亿元)	.514	.763	.274	.182
X ₅ 接待旅客总量(亿人)	.142	.749	.253	-.456
X ₁₁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647	.712	.074	.050
X ₁₈ 旅客周转量合计(亿人公里)	.390	.702	.393	-.108
X ₈ 接待旅客总收入(亿元)	.553	.697	.222	-.296
X ₃ 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个)	-.231	.586	-.091	-.110
X ₁₆ 铁路营业里程(公里)	-.214	.167	.799	.123
X ₂ 自然保护区数量(个)	.543	-.112	.751	.088
X ₁₇ 等级公路里程(公里)	.042	.584	.729	-.071
X ₁₂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	-.062	-.017	.142	.963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a. 提取了4个成分

(三) 主成分综合模型

依据主成分综合模型可计算出主成分综合值并

$F = (0.34118 F_1 + 0.30812 F_2 + 0.01662 F_3 + 0.07535 F_4) / 0.85087$ 对其进行排序,即可对全域旅游视角下各省域旅游竞争力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计算结果见表5。

表5 综合得分排序结果

省份	主因子 F_1	主因子 F_2	主因子 F_3	主因子 F_4	综合得分	排名
广东省	4.52415	-0.43805	1.38029	0.37728	1.72	1
江苏省	0.51178	2.48731	-1.34294	0.34078	1.11	2
山东省	-0.01984	2.20998	0.47306	1.11147	0.9	3
浙江省	0.79533	1.45015	-1.19036	0.40037	0.86	4
河南省	-0.74734	2.29777	0.06509	1.04941	0.63	5
四川省	0.04924	0.84758	1.04444	-0.33971	0.32	6
湖北省	-0.09366	0.64596	0.58387	0.02704	0.21	7
上海市	1.45275	-0.91837	-1.78249	-0.30676	0.19	8
北京市	0.43039	0.21686	-2.05782	-0.61816	0.16	9
福建省	0.88107	-0.4781	-0.5009	-0.34498	0.14	10
陕西省	-0.17931	0.41516	0.04879	-0.26948	0.06	11
安徽省	-0.16719	0.46376	0.36727	-0.93038	0.03	12
湖南省	-0.08209	0.17681	1.0281	-0.90182	-0.03	13
重庆市	-0.01905	-0.21784	-0.54997	-0.1475	-0.11	14
云南省	0.37865	-0.51765	0.77946	-1.19265	-0.13	15
黑龙江	-0.33461	-0.77654	1.3438	2.63934	-0.16	16
河北省	-0.80611	0.51582	0.60798	-0.98625	-0.21	17
辽宁省	-0.28332	-0.23091	0.37385	-0.49617	-0.23	18
海南省	-0.11551	-1.05603	-1.08843	2.22761	-0.25	19
江西省	-0.25312	-0.2414	0.85484	-1.02363	-0.26	20
广西	-0.04413	-0.53919	0.4672	-0.94534	-0.29	21
内蒙古	-0.44617	-0.83344	2.23909	1.45563	-0.31	22
山西省	-0.86091	0.16355	0.0125	-0.98318	-0.37	23
甘肃省	-0.88658	-0.22109	0.04492	0.47738	-0.39	24
吉林省	-0.61055	-0.42907	-0.07381	-0.08544	-0.41	25
天津市	-0.1632	-0.80957	-1.22545	-0.37459	-0.42	26
新疆	-0.71869	-0.36727	-0.01686	0.0158	-0.42	27
贵州省	-0.45689	-0.31435	0.59575	-1.63644	-0.43	28
宁夏	-0.60136	-1.00751	-1.03638	1.41326	-0.5	29
青海省	-0.63117	-1.1762	-0.68632	0.25939	-0.67	30
西藏	-0.50255	-1.3181	-0.75856	-0.2123	-0.71	31

评价结果显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上海、北京、福建、陕西等地的全域旅游综合竞争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这些省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等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目前全域旅游发展优势最为明显,竞争力强劲;安徽、湖南、重庆、云南、黑龙江、河北、辽宁、海南、江西、广西、内蒙古、山西等地的全域旅游竞争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其中有些省域如河北、山西、云南等区域也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限于经济综合服务能力较弱、交通不便、管理模式粗放、缺乏核心旅游产品,在全域旅游发展进程中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导致综合排名下滑,在全域旅游大背景下,这类省域的旅游综合竞争力水平提升空间相对较大。甘肃、吉林、新疆、贵州、宁夏、青海、西藏等省域在发展全域旅游时处于竞争中的弱势,就资源赋存与生态环境讲,这些地区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自然环境优势,只是此类省域在发展全域旅游时,开发经营模式不科学、管理混乱,多数区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综合协调能力差、旅游产品缺乏体验感、远离主要客源市场,此类地区在发展全域旅游时要重视这一现实状况,充分利用好自身优势进行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跨区域资源整合,创新旅游发展模式优化产业链,来提高全域旅游综合竞争力,从而带动与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国内31个省级行政区中,广东全域旅游发展最具有代表性,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全域旅游发展一定程度上优于北京和上海,天津竞争力相对下降,青海和西藏全域旅游综合竞争力最弱。这是因为在全域旅游大背景下的各省旅游综合竞争力变得更加复杂,不再是由原来单一依托旅游景区景点为主,而是与该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旅游相关产业链、宣传营销能力、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政策法规和文明素质等密不可分。例如,广东资源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其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基础设施、管理秩序、政策法规等相关因素比较完善,在发展全域旅游时,竞争力优势就能够凸显。反观西藏,在全域旅游发展中其生态环境优势突出,自然资源赋存吸引了一批游客前往,但该区域存在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且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弊端,导致前往游客数量受到很大限制,通过综合各类相关因素得出其全域旅游竞争力较差的结果。天津由于所处的区位条件,即是优势也是劣势。一方面由于天津在京津冀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中存在较大的互相竞争关系,北京经济综合实力与资源优势明显,而河北旅游文化资源丰富,相对而

言,天津旅游资源相对少、形象定位不明显、产业规模小,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产品。不过,在全域旅游大背景下以及京津冀一体化政策的推动下,天津可以变劣势为优势,抓住机遇,天津目前积极发展全域旅游,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总之: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上海、北京、福建、陕西这几个地区的全域旅游发展目前在全国最具有代表性,占据着优势;其余省域的全域旅游竞争力相对处于弱势。安徽、湖南、重庆的全域旅游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吻合,山东、河南等地区凭借其深厚的文化资源优势与特色化营销宣传模式,旅游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已成为旅游大省。天津随着GDP的跌落,再加上毗邻的北京所具有的强大旅游客源市场竞争力,旅游业也受到了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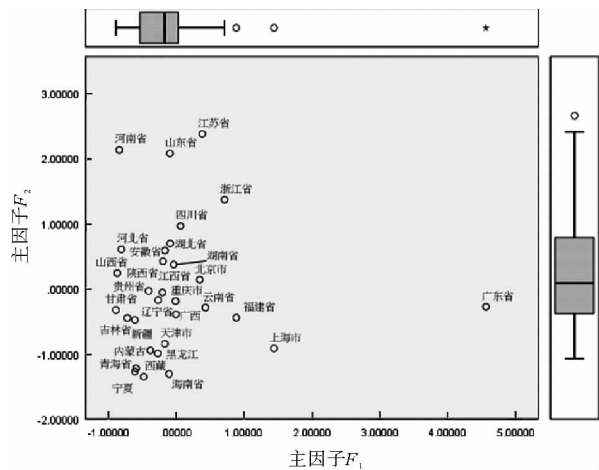


图1 回归变量图

将主因子 F_1 (经济发展较好,旅游综合服务能力强)与主因子 F_2 (旅游资源丰富),通过回归变量得出回归变量图(如图1)。根据图中主因子 F_1 和主因子 F_2 的得分大小,可分为四个区域:Ⅰ区表示全域旅游发展较好,经济发展水平高、旅游综合服务能力强且旅游资源丰富。该区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旅游业发展强劲。Ⅱ区表示旅游接待能力一般,旅游资源优势明显。通过提高该区域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可以弥补当地旅游发展的不足,进一步发展全域旅游。Ⅲ区表示该地区经济发展水水一般,旅游资源赋存一般。该区域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旅游资源,深挖内涵来增强核心竞争力。Ⅳ区表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能力突出,资源优势不明显。该区域可以凭借其经济综合协调发展能力,以科学技术为手段开发创新型旅游模式,吸引多样化需求的游客,满足其体验需求。在国家全域旅游相关政策的推动下以及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现状下,该区域全域旅游发展增长空间不可估量。根据回归

变量图所处的位置,对所选取的31个省级行政区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综合竞争力进行分类,结果如表6。

表6 竞争力系统聚类表

省份	聚类结果	省份	聚类结果	省份	聚类结果	省份	聚类结果
广东	IV	四川	I	海南	IV	新疆	III
北京	I	天津	IV	云南	IV	内蒙古	III
上海	IV	河南	II	广西	III	贵州	III
江苏	I	湖北	II	陕西	II	甘肃	III
浙江	I	安徽	II	山西	II	宁夏	III
山东	I	湖南	II	黑龙江	III	西藏	III
辽宁	III	江西	III	重庆	IV	青海	III
福建	IV	河北	II	吉林	III	——	——

四、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在全域旅游视角下,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我国各省域旅游竞争力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发现:

(1)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对全域旅游发展有显著的影响,我国省域全域旅游发展东部地区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部地区优于北部地区。

(2)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能力、旅游竞争潜力、旅游资源、旅游业对GDP的贡献能力这四大竞争力主成分因子对旅游竞争力的方差贡献率分别是:34.118%、30.812%、12.622%、7.535%。由此可见,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能力,对全域旅游视角下各省域旅游业发展影响最为明显,所以要提高该地区旅游业发展,增强竞争力,首先要通过该区域经济带动和综合服务能力相结合,实现旅游发展的全域化。

(3)旅游资源丰富的省域,旅游竞争力不一定强,可见在拥有旅游资源赋存的同时还要求旅游资源具有较高质量,高质量的旅游资源包括该资源所在地区的开放力度、交通通达度、资源保护力度、经营管理完善度、治理良好度等。旅游竞争力较弱但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通过旅游业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往往发展潜力巨大。

(4)从各省域旅游竞争力综合排序中能够发现,排名靠前的省域和靠后的省域差异显著,但要认识到在全域旅游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旅游业正在朝着资源优化配置、产业融合、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政策法规等全方位优化升级,对一些资源丰富但排名靠后的省域来讲,可以依托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对核心旅游产品进行转型升级并加大宣传力度,不断优化产业链来弥补基础设施的薄弱,最终通

过旅游业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达到真正的全域旅游发展模式。

(二) 讨论

由于全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认同,尚处在探究阶段,本文作为探讨性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

(1)各省域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较为复杂,特别是在全域旅游背景下,各因素互相影响,需要从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角度去研究,而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存在单一性,其综合评价体系结果的科学性还需要不断去验证。

(2)在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由于全域旅游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目前处于探讨与发展阶段,影响指标较多,本文一定程度上遵从了可获取性原则,可能会忽略某些评价指标体系,对指标选取没有深入挖掘,其完整性和系统性需要不断完善。

(3)通过对全域旅游视角下我国各省域旅游竞争力研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我国全域旅游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使全域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 [1]刘又堂.全域旅游视阈下旅游目的地功能变化[J]. 社会科学家,2016(10):90-94.
- [2]于洁,胡静,朱磊,等.国内全域旅游研究进展与展望[J]. 旅游研究,2016,8(6):86-91.
- [3]张道中.“旅游+”开启乡村旅游“4.0时代”:以树山为核心的全域旅游构建[J]. 旅游纵览(下半月),2017(1):40,43.
- [4]杨振之.全域旅游的内涵及其发展阶段[J]. 旅游学刊,2016,31(12):1-3.
- [5]李金早.从景点旅游模式走向全域旅游模式[J]. 紫光阁,2016(3):42.
- [6]吴必虎.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全域旅游发展[N]. 中国旅游报,2016-02-03(4).
- [7]王庆生,张行发.全域旅游开发的若干思考[J]. 城市,2017(7):56-61.
- [8]石培华.以标准化推进创建工作[N]. 中国旅游报,2016-02-19(3).
- [9]李中,白长虹.实践导向与理论创新[J]. 旅游学刊,2017,32(12):1-3.
- [10]黄海阳,李剡.全域旅游统计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研究[C]//中国旅游研究院.2018中国旅游科学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旅游研究院,2018:15.
- [11]林明水,廖茂林,王开泳.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竞争力评价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1):83-90.

- [12] 丰晓旭, 夏杰长.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及其空间特征[J]. 经济地理, 2018, 38(4): 183 - 192.
- [13] 曹兰州, 赵多平, 魏小村. 中国省级全域旅游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9, 35(4): 547 - 555.
- [14] 徐珍珍, 余意峰.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及其影

- 响因素[J]. 世界地理研究, 2019, 28(2): 201 - 208.
- [15] 李创新, 马耀峰, 高军. 基于 SPSS 的中国各省区旅游竞争力研究[J]. 软科学, 2008(4): 98 - 104.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 Study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rovincial Tourism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 - for - One Tourism

WANG Qingsheng, LIU Shihan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g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All - for - One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All - for - One tourism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All - for - One tourism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model of All - for - One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 tourism statistics system and the main assessment indexes of All - for - One tourism demonstration area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e provincial tourism evaluation index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 - for - One tourism were establis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ity, hierarchy and accessibility. Based on SPSS23.0 statistical software, us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system clustering method to research on provincial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quantitatively, the researchers fi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provincial tourism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provinces of our countr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estern and northern provinces and that All - for - One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s relatively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Key words: All - for - One tourism;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上接第 28 页)

A Brief Study on Li Yu's Linguistic Styles of *Xian Qing Ou Ji*

HUI P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Xian Qing Ou Ji*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mong Li Yu's few autobiographic works. The simplicity and succinctness in language have demonstrated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the writer had advocated, namely, "to express profoundness through plain words" "to combine both the elegance and the vulgarity" "to balance both reason and emotion" and "to achieve refinement and appropriateness through brevity and novelty". The formation of these styles rests upon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popularity of the study of the mind in late Mi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al supervision on publication in the tur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thor himself. With a style full of his personality, Li Yu contributed a magnum opus of *Xian Qing Ou Ji* with cultural uniqueness for us. In the modern time with rapid lifestyle, Li Yu's leisurely life style and his principles of living simply and naturally are worth learning from.

Key words: Li Yu; *Xian Qing Ou Ji*; linguistic styles; leisure

沙集电商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及优化路径探析

刘建军

(中共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河南 郑州 450017)

摘要:沙集电商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实质上是个体农户创新、其他散户复制扩散的市场自发行为的集合。沙集模式得以裂变复制、创新扩散的条件是第三方销售平台、物流体系和适应农民群体特性的产业产品选择等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沙集电商集群的发展也面临着县域小微企业发展的普遍难题。推动沙集模式可持续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审时度势推动传统农民网商向现代公司转型发展,做实做强电子商务协会并作为产业重组的引擎,加强产业规制并提高产业集中度和领军企业规模实力,引导产业价值链各环节跨区域重组整合甚至推动产业经营类型转变,夯实电商人才支持等。

关键词:网络创业;农民网商;沙集模式;创新扩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06

中图分类号:F7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36-05

2006年12月,徐州市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一个青年偶然发现商机,返乡创业成立本村第一家尝试简易拼装家具的网店。此后,本地追随者大量出现,沙集镇家具网销业快速成长和集聚,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农村电商集群。2011年,当时的阿里研究中心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沙集模式”。本文试图在探索沙集网商发展历程尤其是现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抓住关键因素概括出类型化、样板化的电商发展模式,进而分析这种模式成功运作所必需的条件、存在的突出局限,继而预测出风险点,提出未来调整走向,为具备同类发展起点的农村地区电商产业集群式发展提供镜鉴。

一、沙集电商产业集群发展的演化阶段

电子商务是基于网络化的销售手段和运营平台而形成的商业运作形态,农村电商产业集群实际上是采用电商手段的线下特色产业经营实体在特定农村地区大量集聚出现形成的集群化发展格局。十余年来,沙集网商在组织形式上,经历了由个体工商户到股份制公司,从“多、小、散、弱”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发展到规模化规范化工厂制作,认识沙集模式的演进

过程、阶段性特征等可以更好地把握其内涵实质。沙集电商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 个别首创、示范扩散(2006—2009年)

正是2006年底沙集镇东风村个别农户偶然的创新活动带来可观的收益,在农村血缘关系、熟人社会搭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你传我告,多数农户稍待观望旋即蜂拥而上,集体模仿推动了创新快速扩散。2008年开始,网店模式被全镇村民们快速复制,呈现细胞裂变式扩张、爆发式增长。尽管2009年3月,东风村网商首创者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但截至2010年底,沙集镇将近70%的农民网商没有实体加工厂,有厂的绝大多数也没有摆脱家庭作坊式生产,很多网店没有自己设计的产品,网商间简单地相互模仿、压低价格、偷工减料进行市场推广,利润率大为缩减。这一阶段主要是由外地实体店进货进行网销从中赚取差价,电子商务只是作为辅助销售手段而没有改变本地产业结构。

(二) 市场倒逼、创新升级(2010—2012年)

从2010年开始^[1],东风村的网销产业已经超过了废旧塑料回收产业,而且还有一些塑料回收企业

收稿日期:2019-06-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培育的模式创新与路径选择”(15CJY063)

作者简介:刘建军(1981—),男,河南叶县人,博士,中共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经济师,研究方向为政府经济学、政治社会学。

正向网销家具转型中,加上2011年的快递公司集体涨价、天猫“商城新规”等普遍性影响和经营能力不足造成订单不多的个别原因,有的网商开始关闭家具网销业务而转行经营。此后,存活下来的网商,开始新的探索:一是公司化转型。多数网商完成公司注册和商标申请,从最初的个体家庭作坊升级为具有现代化厂房、公司化运作的现代企业,沙集镇网销业进入店厂一体、产销结合、自产自销阶段。在经营的产品品种上,从最初的简易家具拓展为家居、服装、服饰等;在产品材料选择上,从最初的板式家具增加到实木家具、软包家具、钢构家具。二是行业自律组织自发出现。2010年12月16日,当地网商自发成立沙集镇电子商务协会,旨在解决恶性竞争问题,规范产品质量,打造沙集地域性商标。三是在销售渠道上,从最初的单一在淘宝开店发展到多平台同时运营。沙集镇家具网销业在全国的市场份额达到了80%以上,家具网销带动了关联产业集聚发展,改变了地区产业结构,单一的网销环节逐渐深化丰富为“电子商务”全产业链条发展。

(三)集体反思、优化提升(2012年至今)

2016年,沙集镇成为全国第一个“所有村都是淘宝村”的乡镇,随着电商产业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全国居民消费向品质化生活阶段迈进带来的对产品外观设计、功能操作的便捷性等提出了更多更高要求,沙集电商因产品无标识、板材甲醛超标、使用低劣油漆、虚假宣传等问题经常被一些职业打假人盯上。^[2]加上全国范围内东北、江西等地家具网销业兴起,外部市场环境剧变和本地内部白热化恶性竞争,这些都迫使沙集网商重视商品品质提升和发展路径反思。一是组织形态变革。鉴于企业结构不合理对竞争秩序和创新能力的影 响,2012年,沙集镇东风村第一批网商经营者中7人合资成立了沙集网商中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这预示着行业兼并重组和规模化龙头企业即将出现。二是重视创意和知识产权保护。2012年初,东风村“专利风波”激起很大矛盾。此事件激发了网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注重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更加突出个性化、品牌化、多元化,从简单模仿到自主设计、个性化定制、设计外包。沙集镇2012年后专利申请数激增,2014年,沙集电商新产品占比从此前不到5%上升到20%左右,不少农民电商在有创新产品后,选择暂不向市场推广而是申请专利后再逐步销售推广^[3]。三是产业链生态优化。产业规模的形成促发了专业化分工与产业链协作体系的出现。地域网商生态系统逐渐优化,出现了产业链上下游供产销各主体协作共生、良

性互动、营商环境改善等形态变化,并积极开拓家具拼装业之外其他产业类型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二、沙集电商产业集群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实质

从2009年原阿里研究中心认证东风村为全国第一批淘宝村,到沙集镇成为全国第一个淘宝镇,再到睢宁县成为全国首个淘宝县仅用9年时间。沙集模式实现关联产业发展并示范带动更多产业集群,促进了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从组织形态和演进路径上看,沙集模式实质上是同一地域内个别农户自发创新、本土其他散户集体模仿复制的线上电子商务经营者集群带动上下游实体产业的散户经营者线下集聚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一)在产业发起上,源于个体农户自发创新

“沙集模式”由领军农户自发式产生,整个发展过程完全是自发自觉的市场主导行为,年轻领军人物面向市场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成为沙集网商集体发展和模式演进的不竭动力。电商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个别先行创新带来高额利润——乡邻模仿复制进而不可阻止的恶性竞争导致利润率降低——市场倒逼优秀个体率先创新升级”的螺旋式循环,最终自下而上地获得政府层面的官方认可。十余年来,沙集网商群体始终以曾经外出务工的返乡年轻人居多,其中,30岁以下的占70%以上,他们是创新的主体力量,并通过“拖家带口”带动了父母一代参与其中,对当地产业升级发挥着引领作用。^[4]

(二)在运作机制上,“网商+平台公司+当地农户”

沙集镇简易组装家具产业的电商化发展主要是“无中生有”“两头在外”:原材料来源于外地、制成品主要销往外地,甚至生产装备采购自外地,本地主要从事该产业的设计、加工制造和网销环节。电子商务产业链呈现出“网商从第三方网络销售平台接受订单——自行或联系合作加工商定制生产——委托物流配送——收回在销售平台公司的货款”。交易主要采取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的B2C形式,几乎没有B2B交易形式。

(三)在组织结构上,以个体网店为主体形式

沙集网商生产组织形式经历了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形式到现代化公司(标准厂房、产品组合、现代化管理)的转变。这决定了经营管理仍脱离不了农户家庭经营或家族企业的管理内核,并在整体上呈现出的散户结构共同决定了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农户网商自发进行兼并重组、规范行业竞争秩序的难度很大。

三、沙集模式成功复制扩散的条件

个别实践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成功模式,需要同类个体之间在发展条件上的总体相似性,且一种模式的条件约束越少,其推广适用的范围越广。沙集镇简易组装家具产业电商化集群的产生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它不依赖于当地原有的资源禀赋^①、产业基础,也没有地方政府过多资源介入其中,并且沙集镇区位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和人才素能一般,发展起点是个很普通的苏北县域,所以探讨这个草根农村网商群体的成长规律具有更普遍的示范借鉴意义。^[5]

(一)第三方电商平台的低成本进入

农民自建销售渠道、市场信息获取和市场开拓推广的能力不足,生产制造环节的技术门槛和基础投资高且市场风险较大,但直接借用电商平台从事销售环节,具有技术难度小、初始资金需求量小等低壁垒特点,风险也是农民可承受的。所以,这种商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又是必然的。例如,咸阳市武功县3/4的网销产品是采购自新疆、甘肃等省区的特色农产品,借助电商平台就可发挥本地较好的交通区位优势发售全国。

(二)产业的市场特性

一是产品的技术经济特性。从需求方面看,组装家具功能实用、款式时尚、能够轻松拆卸搬移,且价格较低,适应了城市租住的青年群体的需要。从供给方面看,中低档简易拼装家具具有技术门槛低、资金投入需求低、产业资源整合难度低等特性,美工、文案、摄影等技能要求较高的事务可由少数专业服务公司提供,农民网络经营所需要的条件简单,运营的最低起始资本规模和人员数量要求都不高,适应以高中及以下学历为主的农民网商群体。二是农村熟人社会特性。血缘地缘关系构建的农村社会网络使得电商技术在农民间学习传播更加便利,少数个体的偶然性营利行为极易发酵成集体行为。三是生产组织单元适应农户特性。数千年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让农民群体自由无束、利益直接,又喜欢攀比、喜欢跟风模仿。沙集网店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经营单元,家庭成员间信任度高,产权清晰,劳动付出和利益收获直接匹配,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积极性。

(三)快递业的快速发展

资源禀赋、配套产业基础、物流运输成本是影响企业运营的重要因素,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便捷的交通区位、较低的仓储成本和运输成本、快捷及时的物流配送等,使“取材当地”与“无中生有”越来越不

成为影响产品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沙集镇当地并不具备家具生产的相关产业基础,也不是木材的原产地。更宽泛地说,当地传统优势产业或要素禀赋情况等不是发展电子商务或形成电商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而物流条件、区域品牌效应、产业协作链的组织发动和整合力量等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

(四)地方政府的后置性服务

在电商产业自发萌芽的初期,睢宁县、沙集镇两级政府没有干预,而是在产业共性问题凸显后及时介入。这种“后置性服务”为沙集网商放开手脚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氛围。一是介入时间上的滞后性。在沙集电商发展过程中,农户网商共同面临的宽带基础设施、融资、经营技能等困难和产业层面的秩序规范、品牌塑造、整体竞争力提升等问题依次出现,睢宁县政府都是后置性地做出服务调整:从2007年1月鼓励回乡创业促进全民创业、2008年和2009年持续帮助网商解决宽带以及贷款等难题到2010年制定发展规划、2012年电子商务万人培训、2013年出台电子商务推广实施方案、2014年和2015年加强培训考核以及2016年出台《电子商务引领经济跨越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每年都根据阶段性突出问题做出解决努力。二是工作性质的扶助性。睢宁县及时发掘认真审视沙集典型,通过税收、贷款等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全面复制推广“沙集模式”,而不是“攫取性”、管制性。共青团睢宁县委作为群团组织积极提供“柔力”服务:组织青年网商成立沙集镇网络创业一条街和睢宁县共青团网络创业示范基地,颁布了《推进青年创业小额贷款工程意见》,建立“网商·助力贷”为青年网商创业提供贷款支持。三是工作内容的有限性。睢宁县政府介入电商产业主要在公共服务方面给予支持,比如给予税收优惠、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组织评选培树典型、购买培训服务、政策引导、建设行业协会组织和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电子商务物流中心的空间载体,实现了居民生活区和生产功能区的分离。睢宁县政府在沙集镇设置了消防大队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电商监管分局,镇电商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了综合执法局,联合对电商家具市场进行综合整治。

四、沙集模式的局限性

总体而言,散户复制扩散型电商产业集群内农户网商的发展面临着小微企业的共有难题:创新能力和动力不足、融资困难、成本控制受到规模约束、质量控制和品牌塑造意识不够等。此外,还存在电商产业特有的一些发展难题。随着沙集散户网商竞争日益激烈,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利润率不断下降,

亟待调整转型。

(一)企业结构不合理对竞争秩序和产业一般利润水平造成影响

市场自发型产业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自然演化,形成龙头骨干企业的过程漫长、难度很大,十余年来沙集网商的结构形态仍是以农户小微网商为主体单元。从单个企业的雇工数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经营产品种类、年销售额等指标来看,目前,沙集镇网商仍呈散弱格局:截至2017年底,全镇6万人口、拥有网商1.62万户、网上销售额约90亿元,相关从业人员近3.6万人(其中包括外来创业的1.1万人),考虑到一户经营多店情况,目前70%左右的网店仍是个体农户网店。全镇农户年网销额约50万元,考虑到家具行业原料成本和运输成本占比较高,以20%的较高利润率计算,单体网店(一般两三个人)年利润不到10万元。由于企业规模小,质量标准难以统一,成本控制缺乏规模基础,且不能投资高端设备影响了产品质量的提升,陷入低端薄利的同质化竞争之中,尽管家具行业的地域品牌已经形成,但缺少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大型龙头企业集团作为线下资源整合者,形成全国知名企业品牌。

(二)发展意愿和发展能力不强导致源头创新不足

农民网商群体甚至更广泛地说是乡镇企业家群体客观地缺乏财富掌控能力、洞悉市场风向的敏锐眼光、超前预测和规避应对风险能力,普遍存在小富即安、单打独斗的问题。一是从创新主体上看,农耕经济一家一户、财产私有、自给自足、极少发生交换等特点决定了农民在主观意识形态上局限在小天地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尚未改变农民骨子里追求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他们在主观意愿上,担心产权重组会让他们失去对企业资产的控制力,让别人主宰了自己的命运,而满足于自己当老板的状态。这造成更多的农户从自身眼前现实需要出发,而对抱团发展热情不足。2006年以来沙集镇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每一次创新活动的创新源都是从业较早的个别人士,多数农民网商目前总体上对网店发展缺乏长远的规划思考。创新源长期一成不变地固定在个别企业单向思维上是风险巨大的,只有创新源的不断交替出现、创新点的多发继发,这样的创新活动和产业生态才是可持续稳定发展的。二是从创新成果上看,沙集家具产业的创新活动外观设计专利为主,生产技术及工艺流程等方面的革新较为罕见。三是从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运用上看,沙集镇简易拼装家具行业由于产业进入门槛不高,

出现不惜压低产品质量争夺客源的恶性竞争,而创新摸索过程需要冒着失败的风险并付出迂回成本,创新成果却很容易被剽窃,造成创立质量品牌标准缺乏道德支撑。这就要求农村有培育能人并发挥能人示范作用的机制。

五、沙集散户复制扩散型电商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调整取向

沙集电商产业是在区位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一般以及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的产业生态里集群发展的,这就决定了其至少在产业技术、产业组织等层面上不可能引领农村电商潮流,还会遇到我国农村电商集群发展存在的共性问题。后发区域实现赶超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政府,通过科学筹划、倾斜支持、基础保障,可以让产业少走弯路,减少自然演化的时间延迟和资源浪费。在沙集网商进一步发展壮大过程中,睢宁县政府层面要及时引导转型发展:

(一)深入推动网商个体户向规模化公司转型发展

股份合作制很好地适应了农民的特性,是适应乡镇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的重要制度设计。在这种制度模式下,农户既是拥有表决权的投资者享受分红、承担风险,又是劳动者拿取日常工资报酬(有保底收入)。推动当地网商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提高产业竞争能力,当地政府要:一是以项目配套资金支持和引导外部社会资本投资等多种方式推动农民网商进行公司化股份化改造,摒弃家庭制下因亲情关系影响造成权责利不清的问题,实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支持个别骨干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成立股份合作制公司,成为影响和引领行业内其他网商协调一致、抱团对外的领军企业和行业标杆。二是发展“总部经济”。在来料加工生产再对外销售的经营模式下,逐步通过开放合作,把生产加工环节放置在原材料集中地,依托各自邻近的区域性物流中心进行订单管理、物流服务,根据沙集“指挥中心”的订单指令开展生产,沙集镇逐渐要把重心转移到市场调研、产品设计、客户服务、品牌营造上。

(二)提高产业组织化水平

电子商务协会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制约沙集网商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是完善组织规则。通过官方授权行使行业自律管理职权,做实做强电子商务协会,强化协会的权威和号召力。电子商务协会要完善决策规则、推进执行体制改革,提高中小网商的比例和协会在网商群体中的代表性,组织活动采取一人一票制或者会费份额制,提高

管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二是加强会员服务。协会作为沙集集体商标管理者、集体品牌的重要运营者,要完善统一的集体商标使用规则并依规则实施管理,对符合集体商标使用规则要求的任何会员都赋予免费使用沙集集体品牌的权利,并积极协调促成专利持有人和其他会员的协议分享,推进技术交流和商贸合作,对商家破坏经营规则和侵犯知识产权的恶性竞争行为进行打击。三是加强产业规制。行业协会担负着组织和协调网商关系的责任,为避免后进者与先行者之间形成简单复制、同质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定期市场调研预测确定阶段性市场容量规模,由代表各方利益的行业协会组织规定行业最多企业数目和 CR3 的最高产能份额等方式,使先行者对后来者乃至当地产业发展形成适度控制性影响。四是把协会作为产业重组的引擎。加强地方党组织的思想引导,使农户摆脱把财产控制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的狭隘思想观念,引导后来者自主选择投资进入既有企业或协会组织名下建立的股份制经营实体等方式,采用协会代管、大网商品牌下的加盟网店代销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逐渐将协会下的股份制公司发展成行业骨干企业,引领和整合行业资源,提高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三)提高产品质量层次

一是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县镇两级政府可通过组织外出学习考察、推进业内交流、财税支持创新、鼓励行业重组等举措,促进和保护领军网商人物的源头创新甚至颠覆性产业创新,通过提质、转产实现产业升级。二是引导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网商进行整合,提高网上平台和网下实体店的集中度,壮大做

强每个产业环节,走特色化、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减少同质竞争。三是夯实人才支撑。针对一方面存在课程重理论灌输轻实操训练,培训规模大、参与人数多但课堂嘈杂、教学效果不佳,电商培训流于表面形式收效不明显,另一方面电商培训参与人数多需求大,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建议联合沙集网商协会、邻近高校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和本地农民网商“订单式”培训基地,根据农户知识水平和网商经营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分层次分类型精简开办培训班,精选电脑操作、网店运营和市场营销、典型案例等方面课程知识,加大实训力度,着力帮助网商解决经营实践遇到的难题。

注释:

①尽管,睢宁县邻近的邳州市是胶合板加工基地,泗阳县是全国两大意杨产业基地之一,为睢宁县木质家具业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原材料。(参见:李柱:《从沙集模式解读农村电子商务》,《江苏农村经济》,第315期,第61页。)

参考文献:

- [1]汪向东,梁春晓.沙集模式引发的思考[N].企业家日报,2014-06-21(W03).
- [2]李先昭.“沙集模式”冲刺3.0版[N].新华日报,2017-08-16(1).
- [3]李刚.沙集:领跑农村电商3.0时代[N].新华日报,2017-07-21(3).
- [4]叶秀敏,汪向东.东风村调查:农村电子商务的“沙集模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8.
- [5]陆尹玮.淘宝村的沙集模式[J].决策,2014(6):6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Shaji E-business Industry Cluster

LIU Jianjun

(Policy Research Office of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Zhengzhou, Henan 450017,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Shaji e-business industry cluster is essentially a collection of individual business innovations and other retail rural investors' copying and spreading. Its fissile re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diffusion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ird-party sales platform, the logistics system and the selec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s which adap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rmers. It also faces the general problem of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the county.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haji e-business industry cluster, it requires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encour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farmer Netizens to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treat the e-business association as the engine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o strengthen the industrial regulation and enhance the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nd the scale of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to guide the cross-regional re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links in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operation mode.

Key words: network entrepreneurship; farmer network merchants; Shaji model; innovation diffusion

中原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

——基于2000、2018年截面分析

周倩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招生就业处,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基于2000、2018年截面数据,对中原城市群常住人口、城镇人口、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等指标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各阶段中原城市群的空间发展态势。研究发现:城市群常住人口、GDP均保持向高等级城市集中的趋势,郑州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凸显,城市群核心发展区域城镇人口集聚速度变缓,但GDP增速最强。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协同联动发展,常住人口和城镇人口集聚能力变强,就近就地城镇化明显。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快速增长。

关键词:中原城市群;空间演化;城镇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07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41-05

2016年12月,国务院批复《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涉及5省30座地级市,建设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中西部地区创新创业先行区、内陆地区双向开放新高地和绿色生态发展示范区。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以郑州为中心,引领中原城市群发展。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形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针对中原城市群空间发展格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对空间格局的解读^[1-2];二是对专项空间格局进行探讨,如旅游、交通网络等^[3-4];三是针对特定区域和重点地域进行分析,探讨城镇化路径和城市发展模式等^[5-7]。总体而言,研究对布局描述或特定地区特定专项内容的分析较多,对全域格局中人口产业布局与变化情况阐述较少。

本文以中原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分析2000、2018年中原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以及经济的布局格局与空间变化的趋势,探讨变化规律。

一、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范围

中原城市群包括河南省的郑州、开封、洛阳、南阳、安阳、商丘、新乡、平顶山、许昌、焦作、周口、信阳、驻马店、鹤壁、濮阳、漯河、三门峡、济源,山西省的长治、晋城、运城,河北省的邢台、邯郸,山东省的聊城、菏泽,安徽省的淮北、蚌埠、宿州、阜阳、亳州等5省30座地级市,国土面积28.7万平方公里。2018年,中原城市群总常住人口1.63亿人,GDP 7.21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1.75%和8.01%。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思路

以中原城市群范围内的30座地级市为基本单元,选取2000、2018年两个时间截面,其中各市2000年数据来自CSMA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2018年数据来自各市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通过对常住人口、城镇人口、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投入,GDP为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等4个关键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探讨中原城市群空间变化趋势。其中,常住人口指在当地居住半年及以上时间的人口,城镇人口为居住于城市、集镇的人口,GDP与第二产业增加值

收稿日期:2019-07-10

作者简介:周倩(1987—),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招生就业处工程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研究。

均为当年统计数据,数据统计时间与口径一致。

研究通过城市层级以区域为单位和各地级市为基本单元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通过指标对比,分析经济社会活动在各视角范围内的分布情况,探讨中原城市群内部的层级差异与空间差异;计算各城市层级和各地级市占城市群的总体比例,通过不同时间截面的数据变化情况分析经济社会活动在不同城市层级和各地级市之间的变动情况。

分城市层级研究中,将城市群内所有地级市单

元划分为四个区域:一是城市群中心城市郑州市;二是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市;三是核心发展区,包括平顶山市、漯河市、鹤壁市、商丘市、周口市、济源市、晋城市和亳州市;四是其他地级市。分城市空间研究中,将城市群内所有地级市单元划分为郑州大都市区、核心发展区(不包括郑州大都市区城市)、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南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和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见表1)。

表1 空间板块区域划分

空间板块	包含地级市
郑州大都市区	郑州市、开封市、新乡市、焦作市、许昌市
核心发展区	洛阳市、平顶山市、漯河市、鹤壁市、商丘市、周口市、济源市、晋城市、亳州市
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安阳市、濮阳市、长治市、邢台市、邯郸市、聊城市、菏泽市
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淮北市、蚌埠市、宿州市、阜阳市
南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	驻马店市、南阳市、信阳市
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	三门峡市、运城市

二、不同城市层级发展态势分析

(一)城市群分层级经济社会活动分布

城市群各层级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如表2所示。表中平均值为同层级区域内总人口(或总GDP)规模除以同层次城市的数量。从规模体量上看,中心

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平均规模明显突出,2018年城市群中心城市郑州市常住人口1013.6万人,人口突破千万,其他地级市总量庞大但平均规模相对较小,城镇人口、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布与常住人口一致。

表2 2000、2018年中原城市群分层级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城市层级	常住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GDP(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		
	总数	平均	总数	平均	总数	平均	总数	平均	
2000年	中心城市	628	628	376	376	738	738	307	307
	副中心城市	626	626	154	154	423	423	231	231
	核心发展区	5290	441	911	76	2538	212	1104	92
	其他地级市	9330	583	1480	92	4071	254	1764	110
2018年	中心城市	1014	1014	744	744	10143	10143	4451	4451
	副中心城市	689	689	397	397	4641	4641	2068	2068
	核心发展区	5220	435	2588	216	22312	1859	11096	925
	其他地级市	9384	587	4670	292	34982	2186	15723	983

(二)城市群分层级的人口分布变化

常住人口增长情况如表3所示。中原城市群常住人口从2000年的15874万人增加至2018年的16307万人,年均增速0.15%,增速较慢,总量增加。

城镇人口增长情况如表4所示。城镇人口从2000年的2920万人增长到2018年8398万人,平均增速达到6.04%,远高于同期全国3.4%的平均水平,城镇人口集聚的总体势头明显。

常住人口层次分布呈现明显极化特征:一是中心城市所占比例明显提升,中心城市郑州市区域占比从3.96%增至6.22%;二是核心发展区和其他地级市常住人口比例减少,区域占比分别减少1.31%和1.23%;三是副中心城市和其他地级市略有增减,变化不大。

表4 2000、2018年中原城市群分层级城镇人口分布变动情况

城市层级	2000年	2018年	2000、2018年	2000、2018年
	城镇人口 区域占比	城镇人口 区域占比	区域占比 变动	城镇人口 增速
中心城市	12.87%	8.86%	-4.01%	3.86%
副中心城市	5.28%	4.72%	-0.55%	5.39%
核心发展区	31.19%	30.81%	-0.37%	5.97%
其他地级市	50.67%	55.61%	4.94%	6.59%
总计	100.00%	100.00%	0.00%	6.04%

表3 2000、2018年中原城市群分层级常住人口分布变动情况

城市层级	2000年	2018年	2000、2018年	2000、2018年
	常住人口 区域占比	常住人口 区域占比	区域占比 变动	常住人口 增速
中心城市	3.96%	6.22%	2.26%	2.70%
副中心城市	3.94%	4.22%	0.28%	0.53%
核心发展区	33.32%	32.01%	-1.31%	-0.07%
其他地级市	58.78%	57.55%	-1.23%	0.03%
总计	100.00%	100.00%	0.00%	0.15%

城镇人口层级分布差异明显,与常住人口变化趋势不同。一是其他地级市层级城镇人口平均增速最快,区域占比明显提高。该区域常住人口增速仅为0.03%,常住人口区域占比在减少,主要是因为区域内有大量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二是中

心城市郑州市城镇人口变动趋势与其他地级市相反,中心城市增速慢仅为 3.86%,在四个区域中增速最慢,区域占比变动减少最多。

(三)城市群分层级的经济分布变化

GDP 增长情况如表 5 所示,2000、2018 年中原城市群 GDP 年增速达到 13.17%,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各城市层级年增速均在 12% 以上,呈现高速发展态势。

GDP 层级分布有所差异:一是经济活动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依然明显,郑州市 GDP 占城市群比重从 9.5% 提高至 14.07%,副中心城市洛阳市则从 5.44% 提高至 6.44%;二是核心发展区和其他地市 GDP 占比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与常住人口下降趋势一致。

表 5 2000、2018 年中原城市群分层级 GDP 分布变动情况

城市层级	2000 年	2018 年	2000、2018 年 区域占比变动	2000、2018 年 GDP 年增速
	GDP 区域 占比	GDP 区域 占比		
中心城市	9.50%	14.07%	4.57%	15.67%
副中心城市	5.44%	6.44%	1.00%	14.24%
核心发展区	32.67%	30.96%	-1.71%	12.84%
其他地级市	52.39%	48.53%	-3.86%	12.69%
总计	100.00%	100.00%	0.00%	13.17%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情况如表 6 所示,2000、2018 年中原城市群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增速达 13.51%,说明城市群工业化进程加快。

各层级城市第二产业发展差异明显:一是中心城市郑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从 9.02% 提高至 13.35%,增速最快。二是核心发展区受中心城市辐射,第二产业增加值区域占比从 32.41% 提升至 33.29%,增长 0.87%,年增速 13.68%,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三是其他地级市区域占比下降,增速较慢。

其他地级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区域占比下降主要原因是城市发展结构调整,如南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南阳市城市发展调整,第二产业增加值区域占

表 7 2000、2018 年中原城市群经济社会活动空间分布情况

	常住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GDP(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人均 GDP(元)	
	2000	2018	2000	2018	2000	2018	2000	2018	2000	2018
郑州大都市区	2406	2852	744	1723	1759	19874	1302	9416	7310	69677
核心发展区	4137	4070	696	2005	1934	17222	1918	8199	4674	42309
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1990	1953	312	939	637	6090	503	2640	3202	31174
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	699	763	133	397	340	3038	227	1398	4870	39799
南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	2556	2268	343	1044	1061	8325	1294	3298	4150	36709
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4085	4400	692	2290	2032	17530	2190	8386	4975	39844
总计	15874	16307	2920	8398	7764	72078	7432	33338	4891	44201

(二)城市群人口空间布局变化

常住人口布局有所变化(见表 8)。郑州大都市

比下降 2.44%。

表 6 2000、2018 年中原城市群分层级工业总产值分布变动情况

城市层级	2000 年第	2018 年第	2000、2018 年	2000、2018 年
	二产业增加 值区域占比	二产业增加 值区域占比	区域占比 变动	第二产业增加 值年增速
中心城市	9.02%	13.35%	4.33%	16.01%
副中心城市	6.78%	6.20%	-0.57%	12.95%
核心发展区	32.41%	33.29%	0.87%	13.68%
其他地级市	51.80%	47.16%	-4.63%	12.92%
总计	100.00%	100.00%	0.00%	13.51%

中原城市群经济社会活动空间分布情况如表 7 所示,可以看出中心城市郑州市单体规模最大。从 2000 年到 2018 年,人口、经济在各个层级城市的分布情况有所变化。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的常住人口与 GDP 总量呈现明显的集聚趋势,但中心城市郑州市的城镇人口增速变缓,副中心城市洛阳市城镇人口增速更快;核心发展区和其他地级市常住人口区域占比不断减少,GDP 比重也不断下降,但城镇人口比重高速增长,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也在 12% 以上,主要是因为城市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

三、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发展态势分析

(一)城市群经济社会活动空间布局

中原城市群空间布局以各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进行经济社会活动分析,发展情况如表 7 所示。从城市群总体分布来看,从 2000 年到 2018 年常住人口总量变化不大,而城镇人口、GDP 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在此期间增长明显,整体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提升态势。

各区域中,郑州大都市区作为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中心,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基础相对较好,从 2000 年到 2018 年发展势头最好,2018 年人均 GDP 遥遥领先;核心发展区经济发展仅次于郑州大都市区,空间上紧邻郑州大都市区,受其辐射带动;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人均 GDP 最低;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人口最少,经济体量最小。

区常住人口明显提高,从 2000 年到 2018 年区域占比增加 2.1%,年均增速 0.9%,年均增速最高,说明

常住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除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和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区域占比略有提升外其他区域常住人口区域占比呈下降趋势。

城镇人口增长布局与常住人口变化不同。郑州大都市区中的郑州市城镇总人口最多,744万,其次为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中的邯郸市,城镇人

口526万;从区域上看,郑州大都市区区域占比降低,从2000年到2018年城镇人口区域占比变动减少4.97%,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区域占比增长明显,从2000年到2018年城镇人口区域占比变动增加3.58%,其他区域变化较小。

表8 2000、2018年中原城市群分区域常住人口、城镇人口变动情况

	2018年常住人口 区域占比	2000、2018年 区域占比变动	2000、2018年 常住人口增速	2018年城镇人口 区域占比	2000、2018年城镇 人口区域占比变动	2000、2018年 城镇人口增速
郑州大都市区	17.49%	2.33%	0.95%	20.52%	-4.97%	4.77%
核心发展区	24.96%	-1.10%	-0.09%	23.87%	0.03%	6.05%
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11.98%	-0.56%	-0.10%	11.18%	0.50%	6.31%
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	4.68%	0.28%	0.49%	4.73%	0.17%	6.26%
南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	13.91%	-2.20%	-0.66%	12.43%	0.69%	6.38%
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26.98%	1.25%	0.41%	27.27%	3.58%	6.88%
总计			0.15%			6.04%

(三)城市群经济发展格局空间变化

GDP格局呈现极化趋势(见表9)。郑州大都市区GDP区域占比最高,区域占比27.57%和年均增速4.92%,在中原城市群中增幅最高;除东部区域GDP区域占比增长0.24%略有提升外,其他区域GDP区域占比均在下降,可见中原城市群中郑州大都市区一家独大的现象;第二产业增加值变化与

GDP变化有相似之处,如郑州大都市区区域占比变动依旧最高,占比28.24%,区域占比增长10.72%,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区域占比变高,分别增长1.16%和1.14%,其他区域占比均在下降;从年均速度看,郑州大都市区年均增速最高,年均增速达11.62%,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次之,年均增速10.64%。

表9 2000、2018年中原城市群分区域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变化情况

	2018年GDP 区域占比	2000、2018年 区域占比变动	2000、2018年 GDP年增速	2018年第二产业 增加值区域占比	2000、2018年第二产业 增加值区域占比变动	2000、2018年第二 产业增加值年增速
郑州大都市区	27.57%	4.92%	14.42%	28.24%	10.72%	11.62%
核心发展区	23.89%	-1.02%	12.92%	24.59%	-1.21%	8.41%
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8.45%	0.24%	13.36%	7.92%	1.16%	9.65%
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	4.21%	-0.17%	12.93%	4.19%	1.14%	10.64%
南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	11.55%	-2.11%	12.13%	9.89%	-7.51%	5.34%
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24.32%	-1.86%	12.72%	25.16%	-4.30%	7.75%
总计	100.00%	0.00%	13.18%	100.00%	0.00%	8.70%

从2000年到2018年,中原城市群不同社会经济指标在空间发展上态势呈现不同特征:常住人口逐渐向高等级城市集中,欠发达区域的城镇人口增长加快,空间区域均衡化;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呈现极化,郑州大都市区区域占比变动最高,东部产业承接转移区和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效果出现,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较快,区域占比提高。

四、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通过对中原城市群2000年和2018年的截面数据分析,从城市层级和空间区域两个视角出发,分析了2000年、2018年中原城市群常住人口、城镇人口、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4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中原城市群中心城市郑州市单体体量突

出,郑州市中心城市地位凸显,其中常住人口、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等指标的区域占比在持续上升,城镇人口区域占比下降。

(2)其他地级市常住人口区域占比减少,城镇人口区域占比增速最高。该城市层级包含了广大乡村,经济水平基数较高等级城市差,人口流出数量多,因此常住人口和GDP区域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但得益于外出务工人员经济带动影响,就近就地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反而实现了高速度的城镇人口增长。

(3)城市群空间布局上呈现郑州大都市区增长极,受工业外溢影响,东部工业发展迅猛,城镇人口与GDP得到快速提升;原本发展基础较弱的区域常住人口在持续减少,但城镇化与工业化方面都得到明显提升。

(二) 研究展望

本研究分析了2000、2018年中原城市群经济社会分布与变化情况,分析了城市群空间发展的总体态势。为了更好地把握城市群发展趋势与规律,未来还需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一是通过城市群经济社会动力梳理,对城市群空间发展历程与形成机制进行系统解读;二是辨析新发展背景下,生态环境、人口流动、经济动力转换、政策变化对城市群空间发展带来的影响;三是对城市群未来发展趋势与潜在的问题进行判断,从而提出有效的建议。

参考文献:

- [1] 王春杨,吴国誉,张超.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成渝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5,22(11):20-24.
- [2] 彭鹏,周莹.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及影

响因素[J].中州大学学报,2019(2):23-28.

- [3] 韩志刚,崔彩辉,苗长虹,等.基于成本距离的河南省多尺度可达性空间格局[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2):127-136.
- [4] 张宏乔.基于信息流的中原城市群城市网络空间特征及演化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1):60-64,70.
- [5] 王刚毅,刘杰.基于改进生态足迹的水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以中原城市群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1):80-90.
- [6] 宋永鹏,张宇,元媛,等.中原城市群核心区城市用地扩张的生态环境效应[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49(1):13-25.
- [7] 谢永琴,曹怡品.基于DEA-SBM模型的中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效率评价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8,25(2):135-14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nalysis on Spatial Evolution of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ZHOU Qian

(Department of Recruitment and Employ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of 2000 and 2018, this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urban population, GDP, and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of the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studies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each stag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and GDP of urban agglomeration maintain the trend of centralization to high-level cities. Zhengzhou's status as a national central city is prominent. The urba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rate in the core development area of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slowed down, but the GDP growth rate is the highest. The demonstration zones of cross-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 are developing in a coordinated way.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bility become stronger, and the local urbanization nearby is obvious. The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of the demonstration zone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e eastern part of China has increased rapidly.

Key words: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urban space structure; urbanization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认定及其规制

鞠真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人工智能是科技发展的前沿成果,具有类似人类的创作能力。创作是著作权制度的核心。具有类似人类智慧的计算机参与“创作”给著作权制度带来冲击。作品性质与权利归属是著作权的基础内容。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外观上与自然人创作成果基本一致,但纯粹的人工智能“创作”过程无法赋予其“智力成果”属性。为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所蕴含的价值,同时维护著作权法的稳定性,可以依据人工智能生成物中自然人的智力贡献认定其具有“智力成果”属性,从而赋予其作品身份。在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属制度构建中,将权利归属于使用者更为合理。当然,赋予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属性有利于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蕴含的价值,但也带来了侵犯隐私、“数据圈地”等新治理问题。只有构建数据权利保护规范,提高人工智能生成物价值判断标准,完善人工智能侵权规则,才能在授予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同时,保护社会其他主体合法权利,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著作权;智力成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08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46-06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问题提出

英国逻辑学家图灵最早提出人工智能的构思。他在1950年发表的《计算机与智能》一文中提出“机器能否思考”的问题,并对人工智能展开论述,被称为人工智能研究先驱。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用以指代具有类似人类智慧的机器。其后,人工智能受到广泛关注,诸多学者开始探讨人工智能的应用与风险。同时,自版权制度诞生以来,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随着版权产业的深刻变革,版权制度也随之调整。^[1]当前,人工智能对著作权制度的冲击已经成为现实。新闻传播领域,人工智能基于提前预设的文字模板可以直接生成新闻稿件;文学创作领域,日本公立函馆未来大学创造的人工智能成功“创作”小说《电脑写小说的一天》,微软公司发明的“小冰”,出版了《小冰诗集》。人工智能生成物与自然人创造的作品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自然人创

作是当前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人工智能生成物难以成为“作品”。但是,人工智能生成物又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如果放任对人工智能成果的自由使用,容易造成市场失序,也不利于智慧成果的发展。故而,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成为作品?又应当归属于谁?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与作品

对于非自然人成果能否成为作品的讨论,在人工智能生成物出现前就存在。很多非自然人成果,如猴子自拍,海豚绘画等能否成为作品,引发知识产权学界大量讨论,但动物“创作”、自然力“创作”的成果具有偶然性,影响范围较小。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出现引起学界激烈讨论。一方面,人工智能具有类似人类智慧,故而人工智能生成物与自然人创作作品存在某些一致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结果更为迅速,所带来的影响力更大。原本作为著作权客体的计算机软件,正在迅速从协助创作的工具

收稿日期:2019-07-08

作者简介:鞠真(1995—),男,江苏泰州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技法治。

成为独立内容来源。^[2]在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纠纷中,法院认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此类“作品”在内容、形态,甚至表达方式上日趋接近自然人,但是自然人创作完成仍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条件,作品应当由自然人创作完成,所以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具有“作品”属性。法院依据创作主体非自然人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并非作品。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作品属性?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形成

首先是人工智能的形成。形成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创作”的前提。人工智能的形成主要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设定人工智能基础算法。设定算法是人工智能运行的基础内容。在算法设定环节中,设计者必然要选取某些创作要素从而限定人工智能最终的输出结果。算法设定环节中的要素选取会对人工智能最终生成物产生影响。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通过算法设定,以生成诗歌为目的的人工智能不会生成小说。另一部分是深度学习。算法只是赋予了人工智能最基本的逻辑框架。人工智能必须通过对人类行为的学习、模仿才能具有类似人类的智慧。例如微软公司的“小冰”,在生成能够与人类创作基本一致的诗词前,需要大量学习既有的诗词。“小冰”在学习要分析诗词行文方式,提取其中的行文规律,选取最为适宜的创作方式。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具有类似人类智慧的重要基础。在算法设定和深度学习双重影响下,人工智能逐渐可以模仿人的行为。人工智能的算法设定与深度学习环节都会对最终的输出结果产生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决定最后的输出结果。

其次是创作内容的输入。当前的人工智能与自然人存在的最大的差异就是自主性。自然人具有独立意志,在日常生活中会形成特定的创作意图。但是人工智能依旧是机器,尚不具备主观思想,不会像自然人一样自主形成创作意图。在自然人对人工智能设定相应的创作要求后,人工智能才会开始形成相应的内容。创作意图的输入是人工智能生成物形成的重要环节,对人工智能的最终生成物具有直接影响。

然后是人工智能内部计算。在自然人输入相应内容后,人工智能会基于设定的算法,结合深度学习结果,分析输入内容。在分析输入的内容后,人工智能便会基于分析结果进行“创作”。在此过程中,输入内容、基础算法和深度学习结果都会发挥相应作

用。人工智能内部计算环节独立于自然人控制,是人工智能“创作”过程的黑箱。

最后是结果输出。结果输出是人工智能“创作”的最终环节。如果人工智能输出多个结果,自然人可以结合自身意愿挑选输出结果。自然人还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修改。自然人挑选过程没有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添加新的价值,但经过自然人修改的人工智能生成物就包含有明显的自然人成果,不属于纯粹的人工智能生成物。

梳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形成环节可以发现,对人工智能输出结果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三种因素,一是人工智能基础算法的设定,二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数据构成,三是自然人在人工智能“创作”中输入的内容。人工智能的内部计算与结果输出环节都是之前环节的延续,并没有添加新的影响因素。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

作品是指在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具有独创性,并能够以某种形式固定的智力表达。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包含双重属性,一是外部属性,一是内在属性。可以直接从作品本身判断的属性是外部属性,必须依据作品背后的内容确认的属性是内在属性。独创性、固定性是作品的外部属性,智力成果属性是其内在属性。

1. 作品的外在属性

作品独创性要求作品是独立创作完成的,并具有一定创造性。首先,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独立创作完成?独立创作完成的意义在于与现有成果存在明显区别,不属于复制他人作品。人工智能是在学习模仿现有作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内容。有学者将此称为对既有数据的汇编。人工智能生成物虽然基于既有数据,是对已有作品的模仿,但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表达方式不会与既有作品完全相同,人工智能生成的是新内容。当然,如果某些人工智能产品生成的内容与既有内容存在高度相似性,不存在独立价值,则不具有作品属性。

其次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造性判断。创造性是强调作品所蕴含的特定价值。一方面,对自然人创作的方式、技巧进行学习模仿是人工智能生成物形成的基础。通过算法设定和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具有相应创造逻辑与技术。另一方面,当前人工智能生成物与自然人作品已经难以区分。由此可以认定,至少在外观上,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最低标准的创造属性。当然,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生成物并不具有特定价值,则无法达到最低标准的创作属性,也就不能称之为作品。将大量垃圾作品作为知识保护也

不利于人类知识的发展。

最后是作品的固定性。作品的固定性要求作品能够以某种方式呈现并保存,而不是仅仅存在于人的思想活动中。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形成要经过最终输出环节。人工智能输出最终结果后其生产物就会具有相应的载体。所以,人工智能生成物也具有固定性。

2. 作品的内在属性

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智力成果,是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符合作品属性最具争议的内容。虽然人工智能具有类似人类智慧,但是人工智能并不是真正的自然人。人工智能与自然人的差别不仅仅是身份差别,更是智慧能力的差别。当前人工智能尚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人工智能对人类思维能力的模仿,仅仅及于人类思维表面,难以深入人的潜意识之中。人工智能学习必须依靠程序,从人类行为中提炼出规则。但人的行为并不会局限在规则之上,规则并不是人类行为的全部。作品创作正是如此。人类创作过程包含着特定思想、情感等自然人特有的智慧的生成与表达。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只是通过创作技巧计算出来的,缺乏自然人创作过程中的情感、思想等因素表达。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情感是刻意模仿的结果,不是人工智能的真实感受,人工智能也难以明白自然人在特定情绪下的感受。所以,人工智能生成物仅就人工智能本身“创作”而言,并不能称之为智力成果。也许在未来发展中,人工智能会产生真正的智慧,能够独立思考,但在当前,人工智能只是模仿人类的机器,是规则应用的集合。所以,王迁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应用算法、规则和程序的结果,与创作存在本质区别。^[3]当然,有学者提出通过算法设定,人工智能计算过程可以是随机的,输出的结果就是随机的,并不是机械的结果。但是随机选择只是概率事件的发生,并不是智力创作的结果。当前人工智能尚不具备真正的人类智慧,人工智能生成相关内容只是计算而非创作。^[4]然而,无法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属于智力成果,人工智能生成物就无法得到著作权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外观上与自然人创作作品并无明显差异,具有市场价值,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运用越来越广泛的发展趋势下,人工智能生成物价值会越来越大。从维护社会秩序和投资人经济利益角度出发,人工智能生成物必然要受到相应制度保护。如果在形式上最为接近的著作权法无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那么势必要建立新的法律制度。在人工智能刚刚开始发展阶段就突

破现有法律框架风险较大。如果总是基于技术及效应的充分显现而创建新的社会规范,那么最终将导致法律对技术“匡正”的失效和无力。^[5]针对社会发展中新事物,应对的最好方法是对现有法律资源进行深入的挖掘和优化整合,充分利用现有法律和法理的合理部分加以解决。^[6]著作权法依然是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最佳途径。我们必然要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智力成果。

诚然,当前人工智能尚不具有真正意义上自然人的智慧能力,但是依然可以从人工智能生成物中发掘出属于智力成果的要素。英国为了保护与计算机相关的成果,将计算机生成的作品规定为“在没有作者的情况下,由计算机生成的作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该规定建立于计算机可以不借助任何人类贡献实现创作的假设之上,但是否真正存在可以不借助任何人类贡献实现创作的计算机是存疑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质疑中提出了自然人在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中的存在。人工智能是一个复合词,在英文中表述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其中 Intelligence 表示智能,而 Artificial 表示人造的,人为的。人工智能是人创造的智能,对人工智能的探讨不能离开人。自然人的存在是当前制度下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智力成果属性的重要基础。人工智能生成物中自然人的智慧贡献可以视为智力成果。人工智能生成物中,存在三项智力成果来源。首先是算法设定者的智力贡献。人工智能算法设定者,在设定算法时必然要考量到最终生成物的可能样态,并在特定因素上作出选择。其次是数据提供者的智力贡献。没有数据提供者在创作原始数据过程中的智力贡献,人工智能就无法学习规则,输出内容也就无法保证。最后是人工智能使用者的智力成果。人工智能使用者在对人工智能输入内容时,会输出具有特定创作目的的内容,或者选取具有特定意义的条件。该输入内容构成特定创作目的。当然,有学者提出将人工智能设计者和学习数据提供者的智力成果计算在内会造成重复权利。但是,此处探究的是人工智能生成物中是否具有智力成果属性,是否存在人的智慧思维贡献。至于人的智慧贡献主体、贡献方式则属于权利归属探究的问题。所以,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智力成果属性,可以构成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作品。借助于人工智能生成物中自然人的智慧贡献既保护了人工智能生成物所蕴含的价值,又维护了现有法律体系的稳定性。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

存在权利,必然存在权利的所有者。在确定人

人工智能生成物属于作品,可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后,必然要探寻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归属制度的探讨,学界主要分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和提供必要安排主体权利说两种观点。

(一)授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是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学说。关于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讨论,不仅涉及法律制度,更加涉及人类伦理、价值、认同等深层影响因素,对法律主体制度具有极大冲击力。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认为,可以借鉴法人制度,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7]当然,人工智能在“创作”过程中的特定贡献也是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的重要依据。人工智能“创作”主要依赖于内部计算过程,自然人参与程度减少。^[8]人工智能不再是仅仅具有辅助作用的传统创造工具,而是具有相对独立生成能力的智慧机器。在著作权法中,对出现争议的权利归属主要采用按贡献程度判断的标准。在人工智能“创作”中,虽然存在自然人参与,但是人工智能对最终成果贡献度最为显著。直接将人工智能作为拟制法律主体,可以避免著作权法对作者身份的限制。与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相关的还有职务作品说,即将人工智能视为“雇员”,依据职务作品规则确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归属。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和职务作品说将人工智能作为独立的“创作”主体,具有独立创作能力。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不仅仅突破现有法律框架,更在深层意义上突破人类基本制度。首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类比法人制度不合理。法人虽然作为拟制主体,具有独立地位,但是法人行为依靠自然人作出,法人并没有脱离自然人存在。人工智能在运作过程中,存在计算黑箱,自然人无法得知人工智能计算过程。人工智能存在独立于自然人的“创作”过程。所以,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与法人制度存在差异,并不能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提供理论支持。其次,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也与激励理论相悖。激励理性人创作动力,推动人类知识体系发展是设立著作权法的基本思想。人工智能并不具有与自然人完全相同的智慧能力,不会因其成果受到著作权保护而产生“创作”动力。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出既不需要经济激励,也不需要人类作者所需要的精神激励。^[9]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承认其作品属性,依然是对人工智能背后的设计者、使用者的激励。由人工智能享有著作权缺乏实践意义,并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同时,在法律制

度中,法律主体与客体身份固定。人才是法律主体。将本作为法律客体的机器上升至法律主体,降低了人在法律主体制度中的独特意义。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不仅相对应,而且彼此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得转换,所以权利主体不能是权利客体,权利客体也永远无法成为权利主体,只可能是法定支配权的对象。^[10]最后,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与现有人类伦理体系存在冲突。人类主体地位建立于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之上。^[11]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此类基本特性。人工智能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特性,不能获得自然人的认同。

当前人工智能尚未生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智慧,探究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为时尚早。人工智能并没有产生独立思考能力,不具有与自然人等同身份的价值。并且,人类的主体地位是在历史演进中通过人类发展积淀而成的。即使人工智能逐渐发展出真正的独立意志,也不会直接获得主体地位。人工智能获取独立的主体地位应当由人工智能自己争取。所以,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所主张的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尚不具备现实价值。

(二)授予使用者权利的合理性

提供必要安排主体权利说是指,将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提供必要贡献的自然人作为权利主体,主要分为集体权利、设计者权利、使用者权利三种。例如,英国版权法就将为计算机生成作品提供必要安排的人视为作者。

集体权利是指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授予所有参与的自然人,主要包括人工智能设计者、人工智能学习数据提供者以及人工智能使用者。人工智能最终生成物来源于所有参与者的意志。人工智能设计者、深度学习数据提供者、使用者都向人工智能传递了特定的价值观点。所有参与者的意志构成整体创作意志。集体权利是将所有对人工智能生成物作出贡献的自然人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享有著作权。设计者权利是指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授予人工智能设计者。人工智能设计者在算法设定中,会对最终生成物作出一定的安排,选取特定的限制因素,作出某些预先设定。所以,人工智能设计者不仅是对人工智能本身的创作,更是对人工智能最终生成物具有直接影响。使用者权利是指将著作权授予人工智能使用者。人工智能使用者是产生最终生成物的直接贡献者。使用者选取的关键词是人工智能生成相关内容的基礎。人工智能使用者在对特定关键词选取时,可以视为对最终输出物的创作过程。

提供必要安排主体权利说考量了人工智能生成

作品过程中自然人的贡献,基于此而授予其权利。但是多主体的参与使得具体权利归属并不清晰,且有的主体存在双重权利。首先,人工智能设计者享有重复权利。人工智能设计者在算法设定环节对特定因素的选取会对人工智能生成结果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人工智能设计者对最终生成物并不具有直接创作意图。人工智能设计者创作意图存在于人工智能本身。同时,人工智能设计者已经基于计算机软件版权等规定获得权利,能够形成较好的保护,在不存在新的贡献基础上再次授予权利并不适宜。所以,对人工智能设计者赋予著作权并不合理。其次,人工智能学习数据提供者享有数据权较为合理。与人工智能设计者相似,人工智能学习数据提供者并不对特定的最终生成物存在直接创作意图。并且,基于其权益内容,人工智能学习数据提供者通过隐私、商业秘密、数据权利等制度保护更为合理。最后,人工智能使用者享有权利相对合理。人工智能使用者对人工智能最终生成物具有直接的创作意图,并且直接影响生成物的具体特征。所以,人工智能使用者应当享有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

四、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规制

(一) 构建数据保护制度

数据的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逐渐凸显。分析处理数据是人工智能“创作”的基础。当前我国并没有具体规定数据权利的法律规范,只有符合隐私权的数据受到法律保护,缺乏数据权利保护规则。例如,人工智能学习数据提供者,因缺乏直接创作意图,无法成为著作权主体。完善数据保护规则是保护深度学习数据提供者的重要方式,也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合理内容。在未来发展中,要完善数据权利构建,确定数据权利主体,制定数据交易流通的规定,制止随意窃取数据的行为。强化对数据权利的保护,也有益于激发数据价值,形成新的产业领域。

(二) 提高人工智能生成物价值判断标准

人工智能“创作”效力远远高于自然人。利用人工智能迅速创造的版权形成“数据圈地”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问题。若专业化的人类职业创作者因高效率的人工智能的竞争而退出市场,我们的社会将会失去一些真正高贵且具有人类品性的深刻作品。^[12]为平衡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利主体个人利益,必然要对人工智能生成物予以限制,以避免人工智能“作品”肆意破坏市场秩序。作品的创造属性是限制人工智能生成物的重要方式。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认定,必须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价值进

行考量,避免大量不具有创作价值的“知识垃圾”蔓延。当然,对人工智能生成物价值的判断是一项平衡措施,故而也不能对其提出过高的要求,只要其具有特定的创作价值就可以作为作品予以认定。

(三) 制定人工智能侵权责任承担规范

人工智能作品侵权是人工智能“创作”中极易发生的情况。人工智能“创作”是对现有数据的学习、模仿。一方面,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中对现有数据的直接使用可能会侵犯数据生成者的权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中可能存在对既有作品的抄袭、复制等情况,侵犯他人著作权。人工智能并不具有主体资格,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人工智能的设计者、使用者将是责任主体。关于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制度的构建,可以参照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原则。人工智能设计者、使用者依据各自过错情况分配责任大小,以保护他人权利。

五、结语

人工智能作为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虽然只是人类能力的模仿者,但其作为机器的特性使其具有很多超越自然人的优势,成为新一轮产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人工智能以模仿人的智慧为核心,而人的智慧成果是著作权制度的重要基础。就其外观而言,人工智能生成物已经与自然人创作成果近乎一致,成为当前著作权法实践的新问题。人工智能生成物,在“独创性”“固定性”等外观上可以满足作品属性,但是在内在的“智力成果”要求上,纯粹的人工智能“创造”过程难以认定存在“智力成果”属性。为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同时维护著作权法稳定性,可以借助于人工智能创作中自然人的智力贡献,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认定为智力成果,从而赋予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在著作权归属上,授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还为时尚早。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使用者更为合理。当然,人工智能作为新的技术也带来相应风险,只有构建数据权利保护制度,提高人工智能生成物价值判断标准,完善人工智能侵权风险责任承担规则,才能有效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易继明. 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 [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5): 137-147.
- [2] 熊琦.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J]. 知识产权, 2017(3): 3-8.
- [3] 王迁. 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J].

-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5):148-155.
- [4] Simon Haykin. 神经网络与机器学习[M]. 申富饶,徐焯,郑俊,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389.
- [5] 吴汉东. 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5):128-136.
- [6] 苏平. 知识产权论丛[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55.
- [7] Colin R D. An Evolutionary Step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J].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2011(11):601-619.
- [8] 梁志文. 论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保护[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5):156-165.
- [9] 朱梦云.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制度设计[J]. 山东大学学报,2019(1):118-126.
- [10] [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 德国民法总论[M]. 张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56.
- [11] 李扬,李晓宇. 康德哲学视点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问题探讨[J]. 法学杂志,2018(9):43-54.
- [12] 曹源. 人工智能创作物获得版权保护的合理性[J]. 科技与法律,2016(3):488-50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Identific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Copyrigh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JU Zhen

(School of Administrative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cutting-edge achie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reation is the core of copyright system.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puters with similar human wisdom in “creation” impacts the copyright system. The appear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creation achievements of natural persons, but the p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 process cannot give it the attribute of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value contained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copyright law, natural person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can be identified as having the property of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according to their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thus giving identity to their work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 copyright ownership system,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attribute the right to the user. Entrus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with copyright attribute is beneficial to protecting the value contained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but it also brings new governance problems. Only by perfecting the data rights protection standard, improving the value judgment standar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and perfect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fringement rules can the legal rights of other subjects in society be protected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be promoted while gra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pyright.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pyright;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一带一路”创新下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邓文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200042)

摘要:“一带一路”是创新之路,其发展依赖于创新的推动,而创新的发展与知识产权密不可分,知识产权应是“一带一路”创新的核心要义。文化创新、品牌创新、技术创新作为“一带一路”创新的主要内容与重要支撑,离不开版权、商标、专利发展的合力。应在“一带一路”创新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形成以培育精品化版权为重点,倡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以构筑版权管理体系为核心的版权战略,助推“一带一路”文化创新;形成以培育高知名品牌为重点,促进商标使用,以构建商标发展体系为核心的商标战略,助推“一带一路”品牌创新;形成以培育高价值专利为重点,以规避专利价值外溢风险为关键,以搭建专利布局体系为核心的专利战略,助推“一带一路”技术创新。

关键词:“一带一路”;创新;版权;商标;专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09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52-05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而提出的重大倡议,是当前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一带一路”是创新之路^[1],其发展依赖于创新的推动,而创新的发展与知识产权密不可分。完整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对改善“一带一路”知识产权法治营商环境^[2],推动“一带一路”文化、品牌、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知识产权应是“一带一路”创新的核心要义

“一带一路”是创新之路,或者说“一带一路”就是最大的创新。创新作为“一带一路”发展的源生动力,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战略命题。文化创新、品牌创新、技术创新是“一带一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化的创新离不开版权的推动,品牌的创新需要重视商标的保护和培育,技术的创新重点在于专利的驱动。可以说,要实现“一带一路”创新这一伟大发展战略,需要知识产权的高度参与(如图1所示)。

知识产权的发展,是创新力的来源与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新智力成果的形成与发展

离不开版权的推动,合理的商标战略是沿线国家借助“一带一路”这一历史机遇创造并发展品牌的关键,专利驱动为“一带一路”倡议工作的推进提供源源不绝的再生动力。知识产权应是“一带一路”创新的核心要义,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战略,既是驱动“一带一路”创新的内在要求,又是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的外在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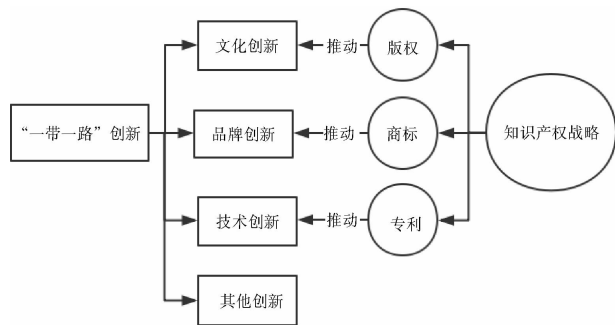


图1 “一带一路”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结构关系图

二、版权战略助推“一带一路”文化创新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显著^[5]。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出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的版权作品,并实现版权作品

收稿日期:2019-06-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驱动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职务发明制度研究”(16ZDA076)

作者简介:邓文(1992—),男,江西新余人,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

的价值,继而成功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的创新、融合、发展,应是版权战略需解决的核心难题。

(一)重点是培育精品化版权

精品化版权应是指具有较高智力创造高度的外在表达,其区别于一般作品的核心在于作品版权价值的衡量。作品应是具有“独创性”的外在表达^[4],这种外在表达必须具备一定的价值才有可能构成版权资产^[5]。但并非所有具备价值的外在表达都应纳入受企业管理与运营的版权资产的范畴,唯有这种外在表达的价值达到一定高度,才有管理与运营的需要。因此,需要对外在表达所形成作品的价值作出合理的评价,而作品的价值一般又受作品的“独创性”程度、作品的权利稳定状态等因素的影响。^[6]因此,正确衡量作品版权价值,尽量培育出“独创性”程度高、权利状态稳定的作品,是走精品化版权道路的关键。

“一带一路”是文化之路,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为精品化版权作品的形成提供了地缘优势^[7]。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更容易催生出高价值的版权作品。对“一带一路”企业而言,既要以为更为开放的态度,融合多元文化元素,创作出更高智力创造的版权作品,又要防范风险,区别意识形态、价值形态,形成差异化共生创造机制;既要对自己创作的版权作品进行“适时性”“适当性”的“独创性”审查,又要根据作品的性质、内容形成企业特有的版权价值评价体系;既要重视“走出去”,实施积极的授权许可战略,许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作品,又要重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秀作品通过许可、转让等方式“引进来”,从而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创新、文化发展、文化繁荣的战略目标。

(二)关键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意识形态、价值形态以及历史文化的显著差异,给我国海外企业开展版权创造、保护、管理与运用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于主要依托版权价值获益的我国海外企业而言,应始终坚持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基础上形成版权发展战略。

“因地制宜”强调企业要重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文化的调查,要尊重当地的意识形态、价值形态、文化差异,将版权作品中与当地意识形态、价值形态、文化差异剧烈冲突的部分及时剔除出去,同时在版权作品中融入当地文化元素,如此既通过文化的“差异性”提高了作品的独创性程度,又通过文化的“融合”使作品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接受。“因时制宜”强调企业应根据时势的变化,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流行文化的转变、宗教文化的

变化等,及时调整版权作品内容,“适时性”融合区域文化元素,转变版权发展战略,提升作品版权价值^[8]。“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发展版权作品,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宣扬了中国的版权文化,又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进行了有益的融合,不仅符合文化融合、发展的主旋律,也符合“一带一路”发展的初衷。

(三)核心是构筑版权管理体系

构筑完整的版权管理体系是“一带一路”文化创新进程下我国海外企业版权战略布局的核心。完整的版权管理体系应由版权创造体系、版权保护体系以及版权运用体系组成。

就版权创造体系而言,应重视构建“一带一路”版权作品创造激励机制及“一带一路”版权作品状态数据库,一方面鼓励作品的创作,尤其是精品化版权作品的创作,对于智力创造程度较高的作品,应以自身需要为前提,及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好版权登记工作,尽管版权登记并非代表登记人即为版权作品的权利人,但版权登记在版权转让、版权诉讼环节均具有很强的证明效力;另一方面注重对重点作品实时监测,重点作品包括高价值的版权作品、易被侵权的版权作品等。就版权保护体系而言,应努力形成立体化的版权侵权救济体系,对版权侵权来说,因适用法律规则的不同^[9],在我国受合法保护的作品可能构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品的侵权,要做好相应的版权法律查明工作,在决定作品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要做好重点调查,对疑似构成“实质性”近似的作品要重点确认,在“实质性”近似的判断上,应采取较国内法院更为宽松的判定方法,同时,形成版权侵权预警机制,构建版权侵权数据库^[10],尽量避开侵权的“雷区”;对版权维权来说,应根据当地的法律规则以及司法实践状况,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的法律机构合作,联合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版权维权方略。就版权运用体系而言,应重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共赢”背景,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构和企业,构建“一带一路”版权交易平台,合力共筑良好的版权营商环境;与此同时,以为更为包容的姿态授权传播版权作品,允许“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据自身的特殊需要在不违背作品权利人根本意志的情况下对作品进行适当改编和利用。

三、商标战略助推“一带一路”品牌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海外企业创造、发展自有品牌,扩大品牌知名度的重大机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自有品牌发展时间较短,品牌影响

力、竞争力不强,一方面是受发展中国家的局限,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企业“走出去”不多,品牌辐射面太窄。要抓住“一带一路”这一重大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品牌发展布局,打造品牌文化战略高地,努力在全世界国家形成“中国品牌”。

(一)重点是培育高知名品牌

高知名品牌应是指持续使用时间较长、市场声誉较高、宣传区域较广且为公众所熟知的商业标识^[11]。从法律层面而言,品牌是建立在完整的商标体系之上的,品牌价值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商标价值加以展现,两者密不可分。商标是品牌的重要载体,是品牌经济的关键支撑,高知名品牌培育离不开商标的支撑。

中国海外企业应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高知名品牌作为商标布局的重点,一方面是因为与普通商标相比,高知名品牌本身凝结了较高的商誉与价值,其品牌辐射面更宽、品牌竞争力更强、品牌影响力更深,高知名品牌的形成本身就代表了企业于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培育高知名品牌就是培育企业品牌竞争力;另一方面,与中国经济发展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2],品牌意识不强,中国企业应努力抓住这一机遇,积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防商标品牌战略,争取在经济发展较缓慢的国家率先形成品牌效应,继而逐步扩大品牌影响力,将中国品牌从“一带一路”沿线辐射到全世界,实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一伟大任务。

(二)关键是注重对商标的使用

商标的生命在于使用^[13],使用是商标活的灵魂,商标的价值是通过对商标进行使用而实现的。注重对商标的使用是实现“一带一路”品牌创新的关键,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商标使用活动,扩展商标使用方式,拓宽商标使用范围,应是我国海外企业制定商标品牌战略的重点。就开展商标使用活动而言,我国海外企业应在查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商标法律条文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需要,确定开展商标使用活动的具体国家或地区,并结合当地营商环境拟定具体的使用策略;就扩展商标使用方式而言,坚持“稳中求进”,既要在查明法律风险基础上,联合“一带一路”企业进行商标许可或特许经营,又要“稳扎稳打”,以培育、壮大自身品牌为重心,努力扩大企业自身对商标的使用;就拓宽商标使用范围而言,应积极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睦邻友好之关系,共建品牌创新联盟、品牌发展联盟,

积极寻求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的合作机会,利用“一带一路”优势拓宽商标使用范围。

(三)核心是构建商标发展体系

完整的商标发展体系应包括商标注册体系、商标管理体系、商标运营体系和商标保护体系。商标注册是权利人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前提,完善的商标注册体系是商标发展体系构建的起点与基石。企业应根据自身产品定位与布局,尽快锁定目标市场,通过选择“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单一国家注册”等商标注册途径,并根据需要申请防御商标与联合商标,在商标注册因在先注册或抢注遇阻时,应及时与在先权利人或抢注人沟通,争取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获得商标在该国的注册专用权,在协商困难时,及时改变注册思路,通过争讼或更换申请商标的方式获得商标注册,及时完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标布局。完整的商标管理体系是商标发展体系构建的重要保障。应建立“一带一路”商标档案,内容既包括企业自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标布局状况,也包括竞争对手的商标申请状况,“全方位”监测商标动态^[14];同时区分核心商标、重点商标、普通商标,“多层次”开展商标管理工作,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商标管理架构。灵活的商标运营体系是商标发展体系的核心。我国海外企业应重视“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力量,联合当地的政府部门、外商投资部门、品牌发展部门,积极探索商标运营新路径、新思路,以扩大自有品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品牌影响力,搭建“一带一路”沿线中国知名商标体系^[15]。立体的商标保护体系是商标发展体系的基石。企业在进入“一带一路”目标市场时,应联合当地法律机构开展商标自由实施尽职调查工作,排查商标侵权法律风险,积极预防商标侵权;同时,应有体系地、有战略目的地部署商标维权策略^[16],组合运用“协商”“仲裁”“诉讼”等维权手段维护自身合法商标权益,同时坚持以“友好”“互利”“共赢”为方针,积极争取将“一带一路”商标侵权者转化为商标被许可者,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品牌创新。

四、专利战略助推“一带一路”技术创新

“一带一路”创新战略的实现更多依赖于技术创新发挥作用,专利发展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关键。换言之,专利战略是技术创新发展的核心,而技术创新是推动“一带一路”创新实现的重要动力,完整的专利战略对“一带一路”创新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专利业已成为现代国家与企业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并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

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创新发展战略的带动下,如何利用“一带一路”优势提高专利质量,规避因“一带一路”发展带来的专利价值外溢风险,找准专利布局方向,是专利战略的核心内容与关键。

(一)重点是培育高价值专利

高价值专利应是指研发创新难度高、权利状态稳定、产品市场前景广阔、技术竞争力强的专利^[17]。我国海外企业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家获得竞争优势,关键在于对高价值专利的培育。

提升专利质量,培育高价值专利,涉及专利创造、保护、管理、运用全链条。应根据研发目的的不同将高价值专利区分为保护核心技术专利、获取先发优势专利以及对抗竞争对手专利。保护核心技术专利应围绕核心技术构建严密专利网,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竞争企业规避设计难度;获取先发优势专利应是我国海外企业依据技术发展方向而确定的前瞻性专利布局;对抗竞争对手专利应是围绕竞争焦点布局有针对性的专利,形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竞争企业具有对抗作用或牵制作用的专利筹码。同时,“一带一路”创新进程中,企业要考虑专利对于自身提升产品竞争力的作用,建立完整的专利管理体系和专利布局体系,不能把专利当作片面的“形象工程”,而是要将专利融入企业的运营中,考虑专利布局与企业创新是否有直接关系,关注专利是否覆盖产业链上的主要竞争对手^[18]。按照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专利审查标准,从产业和竞争的维度进行整体布局,管控专利风险,提升专利运用水平,助推“一带一路”专利商用化进程。提升专利质量,培育高价值专利,适应了我国由要素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的战略转变需求^[19],是保障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进程中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二)关键是规避专利价值外溢风险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容易催生专利价值外溢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既包括以俄罗斯、奥地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又有以中亚五国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国间专利保护水平的差异。为了尽快运用他国企业专利,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部分国家可能通过弱化专利保护的方式,变相保护国内企业的专利侵权行为,由此形成的风险称为专利价值外溢风险。

为规避专利价值外溢风险,企业应尽可能模块

化拆分核心专利技术方案,将“核心产品专利”细分为“部件专利”“组件专利”“零件专利”^[20]，“核心产品专利”由多个“部件专利”组成,“部件专利”由多个“组件专利”组成,“组件专利”由多个“零件专利”组成,由此形成特有的专利倒树图,再综合“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专利检索与分析结果,形成专利布局策略。

除模块化拆分核心专利技术方案外,我国海外企业应利用自身积累的资本优势与技术优势,尽可能加快专利技术更新周期,缩短专利技术的创新时间^[21]。同时,将部分核心技术放弃通过专利加以保护,转而通过商业秘密的形式进行保护。

(三)核心是搭建专利布局体系

专利布局是“一带一路”专利战略的核心。完整的专利布局体系应包括专利内部布局方案与专利外部布局方案。我国海外企业应借助相关的专利检索工具例如 SIPO、EPO、USPTO、DI Inspiro,根据当前研发进展、研发目标、研发成果等展开可专利性调查,重点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专利检索与查新工作,针对企业自身技术编制出密集的专利网络,根据自身实力与未来发展计划,确定准备申请的专利以及专利申请指向的国家,从各方面保证企业的技术能够得到专利的全面保护,从而形成完整的专利内部布局方案。同时,基于企业在行业领域或产业领域内进行产品与市场控制的需要,比如对于产品销售额度高、市场控制力度强的“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企业可以申请全面的专利保护;对市场控制能力弱的“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企业可以对关键技术进行专利保护,以此形成完整的专利外部布局方案。

五、结语

创新就是生产力,企业赖以强,国家赖以盛。^[22]“一带一路”创新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更深层次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转型期和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实现的发展关键期,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创新与知识产权创新相融合,鼓励我国海外企业形成以培育精品化版权为重点,倡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以构筑版权管理体系为核心的版权战略,助推“一带一路”文化创新;形成以培育高知名品牌为重点,促进商标使用,以构建商标发展体系为核心的商标战略,助推“一带一路”品牌创新;形成以培育高价值专利为重点,以规避专利价值外溢风险为关键,以搭建专利布局体系为核心的专利战略,助推“一带一路”技术创新,最终实现文化自信、品牌自信和技术自信。

参考文献:

- [1] 万劲波. 深化科技创新合作建设“一带一路”创新之路 [EB/OL]. (2019-04-22) [2019-05-10].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422/c40531-31042101.html>.
- [2] 吴汉东.“一带一路”战略下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选择 [J]. 人民论坛, 2017(3): 94-96.
- [3] 刘威, 黄晓琪. 主动应对文化差异 助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 [EB/OL]. (2017-04-21) [2019-05-15]. http://www.cssn.cn/zt/zt_djch/ydylgjhzgflt/ydylyzjjd/201704/t20170421_3495086.shtml.
- [4] 王迁. 著作权法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5] 邓文. 知识产权资产价值转化研究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
- [6] 吴婧. 版权价值评估方法探析: 以图书版权为例 [J]. 中国版权, 2015(5): 58-60.
- [7] 谭文富. 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 [J]. 理论观察, 2018(6): 2.
- [8] 罗雪英, 王璐妍.“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研究 [J]. 科技与出版, 2019(4): 47-51.
- [9] 许菁, 卢金路, 杨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制度比较研究 [J]. 出版发行研究, 2018(7): 72-75.
- [10] 丛立先. 出版融合中的企业版权战略 [J]. 中国出版, 2016(19): 15-18.
- [11] 王莲峰. 商标法学 [M]. 2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2] 张乃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重构 [J]. 法学, 2016(5): 93-103.
- [13] 王莲峰. 论商标的使用及其认定: 基于《商标法》第三次修改 [J]. 公民与法(法学), 2011(3): 2-5.
- [14] 马丽华. 企业商标档案管理系统必不可缺 [N]. 中国贸易报, 2015-04-23.
- [15] 谢静. 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与应对策略的分析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9): 166-167.
- [16] 邓文, 麻冬圆. 论科技创新环境下企业知识产权布局 [J]. 科技与法律, 2017(4): 48-53.
- [17] 马天旗, 赵星. 高价值专利内涵及受制因素探究 [J]. 中国发明与专利, 2018(3): 24-28.
- [18] 国家知识产权局. 企业应积极打造高质量专利 [EB/OL]. (2019-01-03) [2019-06-03]. <http://www.nip-so.cn/onews.asp?id=44928>.
- [19] 杨正宇. 由“知识产权收益”窥探“知识产权入典”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 143-150.
- [20] 何敏. 论企业专利运营中的 SEBS 平台 [J]. 知识产权, 2016(5): 84-89.
- [21] 王莲峰, 牛东芳.“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应对策略 [J]. 知识产权, 2016(11): 94-97.
- [22] 习近平. 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EB/OL]. (2019-04-26) [2019-06-18].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6/c_1124420187.htm.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Overse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under the Innov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DENG W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s the road to innovation. Its development depends on the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hould be at the core of innov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al innovation, brand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the main content and important suppor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novation, which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ynergy of copyright, trademark and patent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we should cultivate quality copyrights,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o appropriate condition, and build a copyright management system as the core strategy so as to boost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we should cultivate high-profile brands and promote the use of trademarks to promote brand innov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we shall also cultivate high-quality patents to avoid reduction of patent value and build a patent strategy with complete patent layout system to promote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novation; copyright; trademark; patent

汉藏语系诸语言里调类生成的两大模式

金有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汉藏语系诸语言的调类生成、演化,至少有甲、乙两种不同的模式。甲式涉及汉语、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诸语言,乙式涉及藏缅语族诸语言。甲式的声调发生学模式属于“先舒促、后高低”模式,先分出舒调、促调,再分高调、低调。舒调里分出平声、上声、去声,促调变成入声。乙式的声调发生学模式属于“先高低、后舒促”模式,先分出高调、低调,然后高调、低调再各分出舒、促各调。探讨汉藏语系诸语言的调类生成、演化模式,对于汉藏语言有关问题的研究,比如探寻同源词或关系词、相关语言的分类问题等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汉藏语系;调类;汉语;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10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57-0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语言研究工作者对我国境内的汉藏语系诸语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海外的同行在此期间也对汉藏语言进行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很多著作。目前,海内外学者都已经把汉藏语言研究逐步引向深入,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 对汉藏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
2. 对汉藏语言的系属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提出的“汉藏语系”是否能够成立。

美国学者白保罗(P. K. 本尼迪克特)教授在《汉藏语言概论》^[1]一书中,提出的汉藏语系不包括壮侗、苗瑶两语族的语言的新观点,给我国的汉藏语言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思考和推动,这一观点使得我国汉藏语言学者重新对汉藏语言的系属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论证。

在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方面,汉藏语系同源词或关系词的研究是其核心内容。其实,对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而言,同源词或关系词的研究也是其

核心内容。所以,同源词或关系词的研究对当前汉藏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在汉藏语言同源词或关系词的研究上问题还不少,不仅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技术上的问题。理论上的问题,比如:

1. 同源词与借词的界限在哪里?
2. 一个词在声韵调三方面要全部都对得上才算同源词,还是有两项对得上就可以算同源词?

技术上的问题主要是目前还没有一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共同汉藏语语音面貌的构拟体系。

目前虽然已经有一些汉藏语言学者提出了共同汉藏语语音构拟系统,但是这些构拟系统似乎还不能帮助我们辨认出更多的汉藏同源词。笔者认为,判断一个古音构拟系统是否合理,不能只看这个系统的表面情况,比如表面的系统性、简洁性之类,还要从多方面加以检验,比如,至少应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1. 构拟原始汉藏共同语的语音系统;
2. 寻找出更多的汉藏语系的同源词或关系词;
3. 说明古音学上某些特殊现象,如古无轻唇音,

收稿日期:2019-06-10

作者简介:金有景(1931—1999),男,浙江义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中医学研究。本文初稿是1990年10月提交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本文由金有景先生之子、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金欣欣编审整理、授权发表)

声旁“余”[d][z]两读之类；

4. 解读先秦文献中的疑难问题。

下面谈谈笔者对汉藏语系诸语言里调类生成模式的一点思考,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一、汉语声调的起源问题

在讨论汉藏语言声调的模式以前,有必要先看看汉语的声调起源情况。笔者认为,在远古,汉语还没有声调,因为当时还不具备产生声调的需要和条件。

一般说来,一种语言为了清楚地表达词义,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音节。比如现代北京话有一千三四百个音节,中古汉语(《切韵》音系)有三千五六百个音节。每当一种语音变化造成了音节数量的锐减时,语言本身会有一种补偿要求,希望用其他手段来增补音节,使音节的数量满足表达的需要。上古汉语由于复辅音的减少和变化,使音节数量锐减,语言本身就具有了补偿的要求,声调的产生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从语音生成的角度看,像汉语这样的语言要产生出声调,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在条件。这种条件有两个:

1. 具备能够辨义的“音高”“音长”两个要素。
2. 具备合适的声调“载体”,即适合产生声调的音节形式。

声调主要寄托在元音上,它要求具有元音占相当比例的音节结构;它还要求有一种整齐匀称的声韵组合,以便较好地适应一种特定的声调体系。比如,北京话的音节就是这样一种声韵组合。汉藏语系中的某些语言比如藏缅语族的嘉戎语^[2],复辅音很丰富,音节数量比较大,而且还有形态变化^①,客观上还没有产生声调的需要。同时,嘉戎语基本上不具备能够辨义的“音高”“音长”,又没有合适的声调“载体”。所以,嘉戎语在目前是不能产生声调的。

那么,远古时期的汉语是否具备产生声调的需要和条件呢?笔者认为,从本文上述声调产生的两个内在条件看,即使此时远古汉语已经有了“音高”“音长”两个要素,但是由于远古汉语有较大数量的音节,所以没有补偿的要求。另外,远古汉语有比较丰富的复辅音,还未形成合适的声调载体,所以此时不可能产生声调。

在谐声时代和《诗经》时代,情况则发生了改变。谐声时代,声母复辅音虽然仍然很丰富,但已经条理化、系统化,韵尾复辅音已经消失,韵尾单辅音也只剩下 - mp、- nt、- ŋk、- mb、- nd、- ŋg、- mʔ、

- nʔ、- ŋʔ 等 9 个。所以在谐声时代后期,可能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元音占相当比例、比较整齐匀称的阴、入、阳三分的音节体系^[3]:

1. 阴声:主要收 - mb、- nd、- ŋg 尾;
2. 入声:主要收 - mp、- nt、- ŋk 尾;
3. 阳声:主要收 - mʔ、- nʔ、- ŋʔ 尾。

这就为四声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另外,此时声母复辅音条理化、系统化,韵尾复辅音消失,韵尾单辅音减少,音节数量也大为减少。因此,在音节数量上就产生了补偿要求。可以推测,可能在谐声时代末期已出现了声调的萌芽。到《诗经》时代,已出现了声调,这一点从《诗经》的押韵情况^[4]可以得到证明。^②

以上讨论了产生汉语声调的需要和条件。尽管汉藏语系其他声调语言产生声调的需要和条件与汉语不一定相同,但是在讨论有关语言的声调产生的模式时,还是可以用来参照和比较的。

二、汉藏语言声调的基本模式

研究汉藏语的学者都清楚,汉语、壮侗语、苗瑶语本身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调类的对应关系,而藏缅语本身,藏缅语与汉语、壮侗语、苗瑶语之间却不存在调类的对应关系。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别呢?学术界迄未对此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汉藏语系诸语言里调类生成存在着两大模式,这一观点,可以较为妥善、合理地说明:为什么汉语、壮侗语、苗瑶语为一方,藏缅语为一方,这两方之间会存在着调类有、无对应规律的差别。

笔者认为,远古人的语言里没有声调,声调是后来产生的。上文谈到了汉语声调的产生情况。汉藏语言声调生成有两种基本模式:甲式,包括汉语、壮侗语、苗瑶语。乙式,为藏缅语。^[5]

在列出汉藏语系调类生成的两大模式之前,要先说明一下汉藏共同语的音节收尾问题。笔者认为,汉藏共同语里没有开音节,全是闭音节,而且都收 - mb、- nd、- ŋg 这类双辅音尾。下面即以 - aŋg 韵的音节为例,把甲、乙两大模式表解如(一)、(二):

(一) 甲式(汉语、壮侗语、苗瑶语)

以	零期	- aŋg(先分舒促)	
汉	I 期	舒调(- ŋg → - ŋ → - ø)	促调(- ŋg → - ŋk → - k → - ?)
	II 期	平声、上声、去声	入声
	III 期	平声、上声、去声各分阴调	分阴入(清声母)、阳入(浊声母)
语	为	(清声母)、阳调(浊声母)	母)
例			

甲式的声调发生学模式属于“先舒促、后高低”模式。甲式先分出舒调、促调,再分高调、低调。舒调里分出平声、上声、去声,促调变成入声。

(二)乙式(藏缅语)

以拉 枯 语 为 例	零期	-ɑŋg(先分高低)			
	I期	高调(-ɑŋg)		低调(-ɑŋg)	
	II期	舒调 (-ŋg→ -ŋ→-ø)	促调 (-ŋg→-ŋk、 -g→-k→-ʔ)	舒调 (-ŋg→ -ŋ→-ø)	促调 (-ŋg→-ŋk、 -g→-k→-ʔ)
III期	1调、3调、4调	6调	2调、7调	5调	

乙式的声调发生学模式属于“先高低,后舒促”模式。乙式先分出高调、低调,然后高调、低调再各分出舒、促各调。

三、甲式、乙式在汉藏语言中的体现

现以汉藏语言的具体实例对上述甲、乙两种调类模式做一说明。

(一)甲式

相对于乙式来说,甲式比较简单。它不仅很好地解释汉语声调系统的生成、演化过程,而且可以很好地解释壮侗语、苗瑶语声调系统的生成、演化过程。目前,汉语、壮侗语、苗瑶语可以说基本上都已演化到第Ⅲ期,个别语言可能略有参差。现举例说明如下:

1. 汉语

以笔者的家乡话吴语下朱话(浙江省义乌市)为例。^③下朱方言有8个调类^[6],如下:

调类	调值	例词
阴平调	33	官 kua: ¹
阳平调	11	桓 hua: ²
阴上调	42	管 kua: ³
阳上调	31	缓 hua: ⁴
阴去调	55	灌 kua: ⁵
阳去调	35	换 hua: ⁶
阴入调	323	括 kua: ⁷
阳入调	212	活 hua: ⁸

2. 壮侗语

以壮语(属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为例。

壮语武鸣话(广西武鸣县,壮语标准音)有8个调类^[7],具体情况如下:

调类	调值	例词	汉语调类
第1调	24	na ¹ 厚, tam ¹ 春(米)	阴平
第2调	31	na ² 田, tam ² 塘	阳平
第3调	55	na ³ 脸, tam ³ 织(布)	阴上
第4调	42	na ⁴ 姨母, tam ⁴ 抵撞	阳上

第5调	35	na ⁵ 箭, tam ⁵ 低矮	阴去
第6调	33	no ⁶ 肉, tam ⁶ 踩(脚)	阳去
第7调短	55	nap ⁷ 插, tap ⁷ 肝	阴入
第7调长	35	na:p ⁷ 挟, ta:p ⁷ 塔	阴入
第8调短	33	nap ⁸ 束(纱), tap ⁸ 蹬	阳入
第8调长	33	na:p ⁸ 缴纳, ta:p ⁸ 座(房子)	阳入

3. 苗瑶语

以苗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为例。

苗语川滇黔方言的大南山苗话(贵州省毕节县先进乡)有8个调类^[8],具体情况如下^④:

调类	调值	例词	汉语调类
第1调	43	nto ¹ 湿	阴平
第2调	31	nto ² 天	阳平
第3调	55	nto ³ 砍	阴上
第4调	21	nto ⁴ 分	阳上
第5调	44	nto ⁵ 吐	阴去
第6调	13	nto ⁶ 边	阳去
第7调	33	nto ⁷ 织	阴入
第8调	24	nto ⁸ 紧	阳入

从以上3种语言的声调情况可以看出,汉语、壮侗语、苗瑶语的调类对应比较整齐,有规律可循。

(二)乙式

乙式的情况较为复杂。藏缅语族诸语言中,调类的生成、演化情况不尽一致,初步可以分为5类。

1. 第一类

调类生成、演化最充分,如拉祜语(属藏缅语族彝语支),已演化到第Ⅲ期。现代拉祜语标准音(以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勐朗坝的拉祜语为代表)有7个调类^[9],举例如下:

调类	调值	例词
第1调	44	te ¹ 做, ni ¹ 看, tʃho ¹ 人
第2调	31	ho ² 哭, do ² 喝, no ² 你
第3调	53	do ³ 想, ly ³ 忘记, na ³ 五
第4调	35	fa ⁴ 藏, ho ⁴ 香, puu ⁴ 苍蝇
第5调	ʔ21	ha ⁵ 爱(孩子), da ⁵ 好, va ⁵ 猪
第6调	ʔ54	bo ⁶ 射, hy ⁶ 要, ya ⁶ 鸡
第7调	11	ma ⁷ 教, ti ⁷ 钉(钉子), o ⁷ 饭

以上第3调的实际调值是52,第4调的实际调值在35与24之间。另外,从方言对比中可以看出,第7调是后起的调类,因为迄今有些拉祜语方言点读第7调的字,数量比较少,有不少在拉祜语标准音读第7调的词,在这些方言点里读成第2调或第5调。

2. 第二类

调类生成、演化最不充分,迄今尚未有最原始的

声调。例如藏语的安多方言。

中国境内的藏语一般分为三种方言:卫藏方言、康方言、安多方言,其中,卫藏方言与康方言都已有声调,数目不等,唯独安多方言没有声调^[10]。这一现象对于研究汉藏语言的声调产生问题是有意义的。

3. 第三类

调类生成、演化较不充分,但已有声调萌芽。比如珞巴族语言之一崩尼—博嘎尔语(属藏缅语族景颇语支)的声调就属这一类。

崩尼—博嘎尔语(以西藏米林县博嘎尔话为代表)的声调情况^[11]如下:

珞巴语已有高调、低调的读法,但声调高低并不区别意义。一个词或音节的声调往往可高可低,但是一般都有它习惯的音高。例如 dz a:“茶”习惯读低升调,ŋ o:“我”、no:“你”、ko:“他”习惯读高平调。

像崩尼—博嘎尔语这样的声调情况,大致相当于第 I 期的初期。

4. 第四类

如普米语(属藏缅语族羌语支)。普米语仅有两个调类,它的调类生成、演化大约相当于第 I 期。

普米语箐花话(云南省兰坪县河西乡箐花村)的基本调类情况^[12]如下:

普米语的两个调类,一为高调(高平调),一为低调(低升调)。在语流中另有两个变体,一是高降(高平调的变读),一是低降(低升调的变读)。

调类	调值	例词
第 1 调	55	bu ¹ 虫子,by ¹ 太阳,bō ¹ 有
第 2 调	13	bu ² 蒸,by ² 利息,bō ² 冷

5. 第五类

如景颇族语言之一景颇语(属藏缅语族景颇语支)、怒族语言之一怒苏语(属藏缅语族彝语支)。景颇语有 3 个调类,怒苏语有 4 个调类。它们大致相当于调类生成、演化的第 II 期。

(1) 景颇语

景颇语的恩昆土语(云南省盈江县铜壁关乡)的基本调类情况^[13]如下:

景颇语的 3 个调类,分别是低降调、高平调、中平调。另有一个全降调 51 调,基本上起语调的作用,不是独立的调位。

调类	调值	例词
第 1 调	31	tha ¹ 砍,mu ¹ 看见,khja ¹ 三脚架
第 2 调	55	tha ² 骂,mu ² 事情,khja ² 右
第 3 调	33	tha ³ 起(波浪),mu ³ 好吃,khja ³ 蝉

(2) 怒苏语

怒苏语(主要由云南省原碧江县一带的怒族使用)的基本调类情况^[14]如下:

怒苏语的 4 个调类,分别是高降调、高平调、高升调、低降调。

调类	调值	例词
第 1 调	53	la ¹ 闪电,va ¹ 斧头
第 2 调	55	la ² 裤子,va ² 竹子
第 3 调	35	la ³ 矛,va ³ (脚)掌
第 4 调	31	la ⁴ 月亮,va ⁴ lo ¹ 肚子

从以上所举几种藏缅语调类生成、演化的情况看,藏缅语族诸语言的调类生成、演化情况比较复杂,乙式自不能代表所有藏缅语族各语支语言的调类生成、演化情况。上文乙式的第一类情况以外的其他语言,比如第二类藏语的安多方言,第三类崩尼—博嘎尔语,第四类普米语,第五类景颇语、怒苏语,其调类生成、演化的具体模式还有待深入研究,才能做出进一步的概括。

四、余论

现对甲乙两式的特点做进一步的对比和说明。

(一) 甲式的特点

甲式涉及汉语、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这种模式的声调有三个特点:

第一,在现代调类系统中,声母清浊与声调有对应关系,原则上清浊声母要分归不同的声调,即根据声母的清浊区分为阴阳两大类(分阴调和阳调,很多情况下阴调读高调,阳调读低调);

第二,在声调的归类上没有较大的灵活性,比较明确、固定,较少游移不定的可能;

第三,在同一种语言的各方言间,乃至各亲属语言之间,存在着比较明确整齐的调类对应关系。

(二) 乙式的特点

乙式涉及藏缅语族诸语言,比如拉祜语,这种模式的声调也有三个特点:

第一,在现代调类系统中,声母清浊与声调没有对应关系,未依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阴调和阳调,每一个调类,不论高调或低调,都可以兼有清声母和浊声母;

第二,在声调的归类上不如甲式明确、稳定,有较大的灵活性,比较不确定,较多游移不定的可能;

第三,在同一种语言的各方言之间,乃至在各亲属语言之间,不存在严格整齐的调类对应关系。

(三) 小结

从以上分析来看,汉藏语系诸语言的调类生成、

演化,至少有甲、乙两种不同的模式。至于是否仅仅限于这两种模式,现在还不能肯定,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笔者认为,在汉语和藏缅、苗瑶、壮侗诸亲属语言之间是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同源词或关系词的,笔者曾撰文探讨过这一问题^[15]。但是,从以上甲、乙两种模式来看,在研究汉藏语言的同源词或关系词时,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既然藏缅语与汉语、壮侗语、苗瑶语分属两类不同的调类生成模式,这两组语言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严格的声调对应规律,那么在分析同源关系时,就不应该在调类对应关系方面苛求于它们。在探讨苗瑶、壮侗诸语言是否属于汉藏语系的问题上,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注释:

- ①瞿霭堂先生《嘉戎语概况》(第67—69页)指出:嘉戎语有丰富的复辅音声母(201个)和辅音韵尾(58个),有丰富的屈折形态(外部)变化,有11种音节结构形式。“嘉戎语的声调一般来说无音位价值。但少数情况下,也使用音高作为辨义手段。比如3000多个词中,只有一对用音高区别意义的单音词,10来对以第二音节的不同音高区别意义的双音词,还有少数语法成分也用声音的高低区别意义。”
- ②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第32页)指出:“如果我们拿中古的调类去看《诗经》的押韵,大体是平上去入同调类的字相押。这类的韵至少要占半数以上。其他混押的不及半数。这很可看出来《诗经》的用韵大体是分调类的。”
- ③下朱村在义乌城东十里,属平畴乡,现为江东街道办事处。
- ④原书个别误排的地方已经改。与汉语调类的对应为引者所加。

参考文献:

- [1] P. K. 本尼迪克特. 汉藏语言概论[M]. 乐赛月, 罗美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 1984(内部资料).
- [2] 瞿霭堂. 嘉戎语概况[J]. 民族语文, 1984(2): 67-69.
- [3] 金有景. 上古韵部新探[J]. 中国社会科学, 1982(5): 181-198.
- [4]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32.
- [5] 金有景. 关于远古语言语音面貌的若干设想[J]. 古汉语研究, 2002(2): 14-17.
- [6] 金有景. 义乌话效摄三四等字的分别[J]. 中国语文, 2013(1): 62.
- [7] 韦庆稳, 覃国生. 壮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0: 9.
- [8] 王辅世, 主编. 苗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19-22.
- [9] 金有景, 主编. 中国拉祜语方言地图集[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 [10] 金鹏, 主编. 藏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6.
- [11] 欧阳觉亚. 珞巴族语言简志(崩尼—博嘎尔语)[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10.
- [12] 陆绍尊. 普米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15.
- [13] 刘璐. 景颇族语言简志(景颇语)[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4: 8-10.
- [14] 孙宏开, 刘璐. 怒族语言简志(怒苏语)[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6: 12.
- [15] 金有景. 远古、上古阴、入、阳声的辅音韵尾问题(提要)[J]. 南都学坛, 1988(4): 29-3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Two Patterns of Tone Formed in Sino - Tibetan Language Family

JIN Youji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t least two patterns of tone category formed in Sino - Tibetan language family. The first includes Chinese, Kam - Tai languages, and Miao - Yao languages while the second refers to Tibeto - Burman languages. The first pattern divides tones into relaxing tones and rapid tones at first and then into high tones and low tones. The relaxing tone is divided into level tone, falling - rising tone, falling tone, and the rapid tone is transformed into entering tone. The second pattern divides tones first into high and low tones first and then into relaxing and rapid tones. It is significant to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one category of Sino - Tibetan language family, which help research on the issues like the related words and cognate words and other related language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Sino - Tibetan language family; tone category; Chinese; Kam - Tai languages; Miao - Yao languages; Tibeto - Burman languages

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解读与传译

谷 峰

(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摘要:徽州民歌是我国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我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徽州民歌的域外传播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徽州民歌的外宣翻译将有助于推广我国的传统文化,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徽州民歌中充满了独具地域特色的乡土语言,这些语言模因复制于徽州浓厚的地域文化和徽州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其语言简练,但蕴含着浓浓的地域文化基因,此为徽州民歌翻译的难题之一。在概述模因论和解读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的模因化过程的基础上,以徽州民歌中的方言模因和熟语模因的传译为例,探究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传译,以期助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

关键词:徽州民歌;乡土语言;模因;方言;熟语;翻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11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62-04

乡土语言是乡土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指“一切具有地方特征、口口相传、通俗精炼,并流传于民间的语言表达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1],其“土”体现了文化的差异性,越“土”越有本土自然本色,“也就越能体现文化的内核,反映异质的东西,而有个性化的文化才值得推广”^{[2]103}。由此可见,乡土语言蕴藏于乡土气息较浓的艺术作品中,并彰显着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就乡土语言的研究范围而言,主要包括“熟语、习用语、谚语、歇后语、俚语、成语、格言、俗语和方言”^[3]。徽州民歌中无处不在的乡土语言,生动地再现了徽州区域的社会风气、乡土人情、自然风貌等,同时也增强了徽州民歌的艺术感染力,对徽州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土语言是徽州民歌的载体,讨论徽州民歌对外翻译传播,其乡土语言的翻译难以逾越。下文在概述模因论和解读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的模因化过程的基础上,重点探究方言模因和熟语模因的传译,以期对徽州民歌的翻译研究有所裨益。

一、模因论概述

牛津大学教授道金斯(Dawkins)曾提出语言信息传递的基本单位或模仿的基本单位——模因(meme),并认为这种模因具有类似于基因有要求被复制的特性。^[4]此后学术界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论提出阐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模因论(Memetics),此理论借助生物进化的范式诠释语言信息单位的复制、传播和吸收,对语内、语际语言信息的复制、语言基因传播中所表征的相似模因的继承现象以及语言演化过程中语言模因规律的研究独辟蹊径,为学界解读语言模因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独到的视角。简而言之,语言模因作为一种语言信息的基本单位,要靠复制、传播得以生存。弗朗西斯·海利根(Francis Heylighen)认为作为语言信息基本单位的模因在复制传播过程中将经过同化、记忆、表达、传播阶段并周而复始形成一个环路,其中有些语言模因选择存在于某一个阶段,当然有些语言模因在优胜劣汰过程中被淘汰。^[5]

然而,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语

收稿日期:2019-09-30

基金项目:2017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徽州民歌外译的文化调适研究”(AHSKQ2017D57)。

作者简介:谷峰(1979—),男,安徽巢湖人,硕士,巢湖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言交际者对各种语言符号的取舍与使用体现了各种语言模因因子或语言模因因子群的相互竞争,各种模因词汇和表达方式之间亦存在优胜劣汰的现象,以争取被语言交际者接受、交流和传播,或争取在语内和不同语言间相互传译。演变为强势的语言模因需要具备三个显著的表征:保真性、多产性、长久性,即强势的语言模因因子在复制传播过程中信息要精确、散布要广泛、复制要长久,其中模仿传播是语言信息单位得以模因的关键,复制传播是语言信息单位实现模因的前提。在现实的语言交际过程中,语言模因在语言演化和发展过程中得以强势传播或保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便是其中的语言基因具有较强的表现力,例如网络流行语经模因复制传播到人们的日常语言交流当中。但是,在人们的语言交际过程中,一些形异义同的语言信息单位因其能满足语言交际者表达的需要而被模因复制、传播,但这些语言模因应用于不同的交际语境中会形成同义语言模因共存的竞争状态,难免会产生优胜劣汰的现象。“如果其中某一构成同义关系的新语言信息更加生动形象,更具模因复制的合理性,就更易于被语言使用者广为接受,进而得到更为广泛的模因复制和传播”^[6]。

二、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解读

乡土语言的成长环境源于地方土壤,经由特定的乡土水土“滋养”出来,具有一种内在的乡土活力与能量,其成长的环境与传播者是乡土语言继承和传播的直接源头。乡土语言具有一种乡土色彩,更具有模因复制的保真性、多产性、长久性等优势,可以从中梳理出一种乡土色彩、气韵与精神。在乡土语言的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如下两种类型:“一类是模仿的,又称客观的,是写实性的,这是一种传统的乡土语言。二类是表现的,又称主观的,是理想情感性的,它有传统乡土语言的根基。”^[7]任东升和闫莉平也曾指出,“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共同构成地域文学,乡土语言经过传播实现乡土语言模因化”,并提出乡土语言模因的来源及构成模型。^[8]本文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列出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构成图,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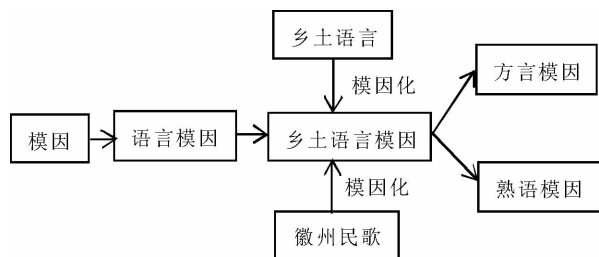


图1 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构成图

徽州民歌中的乡土语言“是依地域而生成的,其次才是因人的秉性不同产生表述方式的特点,语言的地方特色是本体。蕴含着一个关于乡土的人性、人生、人情的认知结构”^[7]。存在于徽州民歌中的乡土语言也是一种模因,是经过同化、记忆、表达、传播等方式模因复制而成的,正如何自然教授所言,“语言中的字、词、句、段,甚至篇章等,只要通过模仿被复制,都有可能成为模因”^[9]。具体而言,在经过模因、语言模因和乡土语言模因三个阶段之后,乡土语言经过模因复制到徽州民歌,形成了存在于徽州民歌中的乡土语言,其中主要包括方言模因和熟语模因。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如何还原徽州民歌中极具地域文化色彩的乡土语言模因,是学术界需要考量的问题。文章在分析徽州民歌中的方言模因和熟语模因的基础上,重点探究他们的传译策略,以期对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翻译有所裨益。

三、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传译

乡土语言彰显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葛浩文曾开宗明义地指出,“构成作品长久吸引力的就是‘乡土色彩’”^[10]。对于这些独具“乡土色彩”的语言的翻译,谢天振教授曾指出:“‘土得掉渣’的语言让中国读者印象深刻并颇为欣赏,但是经过翻译后它的‘土味’荡然无存,也就不易获得在中文语境中同样的接受效果。”^[11]因此,如何向目的语读者传译出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独具的“乡土色彩”,已成为探究徽州民歌外译策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 方言模因的传译

何为方言?卡佛(Carver)指出:“方言属某一语言的变体,本身具有一套完整的语法、语音及词汇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语言变体。如果这些特征囿于某一限定的相对统一的区域内,即为地域方言;如果一个社会团体的全体成员所说的话明显带有这些特征,即为社会方言。”^[12]徽州地域的乡土语言根植于厚重的徽州文化,模因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生产实践之中,其中高密方言无处不在。这些方言经过模因复制传播到徽州民歌,是对徽州民歌的地域性色彩起中介作用的重要元素,正如周领顺和丁雯所言:“方言作为语言变体,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它能直接、准确地表达人们的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和心理意识。”^[13]徽州民歌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我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徽州民歌中的乡土方言的翻译已成为我国对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徽州民歌中的乡土方言模因的传译主要有三种方法:其一

是标准语译法,即将源语中的乡土方言传译为目的语中的标准词汇,其中采取“厚译”(thick translation)译法是有有效的途径之一;其二是口语通俗译法,即用目的语中较为熟悉、通俗的口语体方言转译源语方言;其三是方言套译法,即用目的语中意义对等的另一种标准方言套译源语方言,常借助“归化”(domestication)法实现方言的套译。

以徽州绩溪民歌《亲家》中的“叫佢关关门,担起门闩乱打人”和“叫佢抹掰苞萝,坐在田里哭婆婆”两句为例。徽州民歌中承载着浓厚乡音乡情的方言是徽州地区一方风土人情的“活化石”,蕴含着浓浓的地域文化色彩,徽州民歌正是通过不同的乡音方言,表达着不同的乡土风情,形成了不同的乡土审美旨趣。在这首民歌中,包含模因复制于徽州绩溪特有的方言称谓“佢”,表示“她、他、它”的意思,方言“担”,即“端着、拿着”,而“苞萝”即“玉米”。从目的语读者接受的角度,此三方言可采取标准语译法,将源语中的乡土方言模因传译为目的语中的标准词汇,既“求真”,即“顾及原文意义的行为”,又“务实”,即“顾及读者需求的行为”^{[2]104},以符合译者语读者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有鉴于此,可将这两句分别译为“Tell her to close the door; She picks up the latch to hit other persons”和“Ask her to pick corns; She sits in the field to blame her mother-in-law”,译文采取“尽可能让读者不动,把作者推到读者那里去”^[14]的翻译路径,比较贴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习惯,充分体现了目的语读者视域与源语文化视域间的视域融合,从而实现方言模因传译的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二) 熟语模因的传译

“熟语是语言的精华,短小精悍,寥寥几字即可传达出丰富的含义,且通常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15]徽州民歌中的熟语主要模因复制于徽州地域的格言、惯用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由于熟语语言简练、生动自然,能展现地域色彩,贴近生活,故而徽州民歌中的熟语模因运用颇多。在传译这些熟语模因时,既要准确译出源语的意思,又要充分考量源语的本土文化特色。具体而言,要透彻理解熟语模因的抽象意义,注意保真其生动形象的语言特征,根据具体情况可采取四种翻译方法:一是套用目的语中相应的熟语;二是以生动形象为主的熟语多采用直译法;三是以喻义为主的熟语多采用意译法;四是对部分意思较含蓄的熟语可作适当的翻译增补,如文本外增译^[16]。

以徽州歙县民间反映当地地貌特征及居民特性

的民歌“黟县蛤蟆歙县狗呀,祁门狢狢翻跟斗吆”为例,其中具有乡土色彩的熟语模因“黟县蛤蟆”“歙县狗”模因于徽州广大劳动人民丰富的地理常识,既是经过长期锤炼的乡土语言的精华,又承载着古徽州两县的隐喻化象征。具体而言,“黟县蛤蟆”模因于黟县附近有山形如蛤蟆,蛤蟆性静,隐喻黟县人擅于勤俭守业;“歙县狗”模因于歙县附近有山形如犬,犬尽忠尽义,隐喻歙县人重忠实、讲团结。源语采用了隐喻化手法,翻译时不能仅仅采取直译的翻译范式,而是要灵活地采取文本外增译的策略,化隐为明,释义熟语模因的文化内涵。根据上述提及传译熟语的方法,可综合采取直译和和文本外增译,将“黟县蛤蟆歙县狗呀”译为“With its territory shaped like a toad, the people in Yixian county are as diligent as toads; with its territory shaped like a dog, the people in Shexian county are as devoted as dogs”,译文在忠实地再现源语文化特色的同时,让目的语受众既感悟到源语所表达的含义,又感受到隐喻的形象性及生动性,进而实现熟语模因传译的跨文化阐释,让西方读者领略到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文化内涵。

四、结语

乡土语言是乡土文学的重要载体,探究乡土语言的翻译,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域外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徽州民歌属于我国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的乡土语言模因使得徽州民歌乡土色彩浓郁,这些语言模因无疑是我国民歌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徽州民歌中的许多乡土语言模因复制于徽州的地域文化及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在传译这些模因性较强的乡土语言时,要具有受众意识,充分考虑源语的语言生态环境以及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力。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弥合这些源语乡土语言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距离,才能传播好这些乡土语言模因的含义。本文在概述模因论和解读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基础上,以徽州民歌中的方言模因和熟语模因的传译为例,探究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传译,以期助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

参考文献:

- [1]周领顺.“乡土语言”翻译及其批评研究[J].外语研究,2016(4):77-82.
- [2]周领顺,周怡珂.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的“求真”与“务实”:基于葛浩文翻译实践的讨论[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103-109.
- [3]周领顺.“乡土语言”翻译及其批评研究[J].外语研究,

- [4] DAWKINS, RICHARD. *The Selfish Gen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06.
- [5] 尹丕安. 模因论与翻译的归化和异化[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1): 39-41.
- [6] 熊明丽. 从模因论看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J]. 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 124-128.
- [7] 刘恪. 中国现代小说乡土语言的产生及发展[J]. 中州大学学报, 2012(2): 47-54.
- [8] 任东升, 闫莉平. 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中乡土语言模因的传译: 以三部长篇小说沙博理译本为例[J]. 外国语文研究, 2018(4): 49-58.
- [9] 何自然. 语用三论: 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150.
- [10] 葛浩文. 葛浩文文集[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 40.
- [11] 谢天振. 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231.
- [12] CARVER, CRAIG M. *American Regional of Dialect: A Word Geography*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7: 4.
- [13] 周领顺, 丁雯. 汉学家乡土语言英译策略对比研究: 以葛浩文译《酒国》和蓝诗玲译《鲁迅小说全集》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6): 1-14.
- [14] 王东风. 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观比较[J]. 中国翻译, 2008(2): 5-10.
- [15] 黄勤, 余果.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黑白李》三个英译本中熟语翻译比较[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4): 29-39.
- [16] 尹邦彦. 试论中国惯用语英译的对策[J].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7(3): 101-10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me in Folk Language of Huizhou Folk Songs and Its Translation

GU 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Chaohu University, Chaohu, Anhui 238000, China)

Abstract: Huizhou folk songs are like a bright pearl in the o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our coun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reading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Huizhou folk song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good translation of Huizhou folk songs will help populariz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mprove China’s international impression. Huizhou folk songs are full of folk language with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se language memes are reproduced from local culture of Huizhou and the practice of local people. The language is concise and contains strong genes of regional culture, which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ranslating Huizhou folk songs.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meme and interpreting the meme process of folk language in Huizhou folk songs, this paper tak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alect and idiom memes in Huizhou folk songs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translation of folk language memes in Huizhou folk songs, aiming at helping the spread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Huizhou folk songs; folk language; memes; dialects; idioms; translation

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的对比研究

程张根, 曹琳, 汪雅雪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外语系,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采取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对比研究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的类别和频数分布。结果发现:美国经济学期刊主要使用第一人称,总体上凸显了作者身份;中国经济学期刊多用物称,总体上隐匿了作者身份。第一人称复数虽然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均有出现,但是频数差异显著,而且美国期刊作者主要用其凸显高风险性的“原创者”作者角色,中国期刊作者则借之表明低风险性的“实验操作员”和“论文设计者”角色。

关键词:经济学期刊;摘要;自称语;作者角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12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66-04

一、引言

作者自称语作为学术语篇互动元话语的一个重要子项,是作者表达研究立场和态度时高频使用的元话语资源,关系到作者主体性身份的显现程度。作者自称语之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得到语言学界的高度关注,诸多研究探讨了其在中外学术语篇中的使用情况,如彭芹^[1]等对比了中外岩土类期刊英文摘要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发现国内期刊鲜见使用第一人称,提醒相关学科的学者和编辑予以重视。李民^[2]等考察了中国学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学术论文中对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异同,得出前者多用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凸显团体属性、后者多用单数形式强调研究独特性和新颖性的结论。高霞^[3]基于可比语料库研究发现中外学者间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差异显著,但差异倾向并不一致。相比之下,作者自称语作为一个整体得到的关注则少得多。不同的学术团体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交流和互动,跨学科语言差异正逐渐成为学术英语研究的新热点^[4]。经济学学科论文摘要是否呈现相似的特点?这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考察

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的使用情况,探索并阐释其共性与差异。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统计和对索引行的定性分析,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 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分别使用哪些自称语?频数是否有差异?2. 所体现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异?有何差异?背后的原因何在?

二、语料采集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自建两个小型英文语料库: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语料库(简称CNC)和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语料库(简称USC)。前者语料选自国内经济学顶级期刊《中国工业经济》,后者语料摘自美国经济学顶级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为了保证较好的可比性,两个语料库只收录上述两个期刊同一时段(2018年)的摘要文本,且均由随机抽样的50篇英文摘要组成。语料库的库容方面,CNC为15092词,USC是6502词,可见平均篇幅上,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远超美国,高达2.3倍之多。有鉴于此,统计节点词频数的时候,本研究不但报告其观察频数,也列出每万词中出现比率的标准化工频数,以保证可比性。

收稿日期:2019-08-29

基金项目:2018年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规划课题“基于英美国家APP的英语移动学习之实证研究”(AGZ18051);2017年度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科研项目“国内外经济类期刊英文摘要特征的统计分析与比较研究”(2017KYR06);2017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南海问题’的中国外宣译介研究”(SKSM201703)

作者简介:程张根(1984—),男,安徽潜山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语料库语言学。

使用 Antconc 软件,分别在两个语料库中检索各类作者自称语:第一人称复数词“we、us、our”、第一人称单数词“I、me、my”、第三人称词“the author(s)”、物称词“this/the study/research/paper”。对于作者自称语缺省的情况,本研究首先利用正则表达式检索被动语态,其次通过人工方式识别语义上省略“by the author(s)”的索引行。各类自称语的频次数据绘制成表,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并通过观察索引行进行分析、解读。

表 1 中美经济学期刊英文摘要作者自称语的种类与频数

作者自称语	观察频数		标准化频数		
	CNC	USC	CNC	USC	
第一人称	I, me, my	0	14	0	21.5
	We, us, our	54	138	35.8	212.2
第三人称	The author(s)	0	0	0	0
	This/the + paper/article/study/research	132	12	87.5	18.5
物称	被动句中省略“by the author”	45	3	29.8	4.6
缺省					
合计	231	169	153.1	259.9	

另外,从表 1 亦可直观发现三个基本特点:1. 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主要使用物称型作者自称语(如“本文”“本研究”),而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则主要采用第一人称代词(如 We/I 等);2. 第三人称代词(如“笔者/the author(s)”)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未出现;3. 在作者自称语“缺省”方面,中美期刊摘要差异显著,标准化频次比为 29.8 : 4.6,中国远高于美国(近 6.5 倍)。

中国作者之所以衷情于“本研究”这种物称型自称语,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物称符合学术语篇要求的公正、客观和严谨,也符合国内期刊论文摘要写作规范。美国同行广泛使用第一人称自称语,则源于第一人称具有直接高效和行文流畅的优势,有助于简明扼要地阐述原作的內容。另外,中国学界倾向于认为第一人称显得主观,影响学术结论的客观性,而美国学者相信第一人称不仅不妨碍学术语篇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而更有利于作者推销自己的成果和观点,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得到编辑、同行和读者的认可,增加自己论文被同行检索、下载和引用的机会。此外,美国作者将论文视为辩论性语篇,需要双向的互动、参与和介入,因而在众多作者自称语中,第一人称最具吸引力。

第三人称是“折衷”性的作者自称语,既无第一人称的“高调”也无物称的“低调”,理论上比较符合中国学者的心理,而语料库数据证实第三人称不仅被美国作者遗弃,也未得到中国作者的青睐。

作者自称语的缺省是依靠被动语义结构来实现的,如例 1。被动结构的优点是简洁明了,丰富句

三、结果与讨论

(一) 作者自称语的种类与分布

表 1 统计了两个语料库中作者自称语的种类与频数。从中可以看出,就自称语总数而言,CNC 语料库的观察频数高于 USC,但是标准化频数呈现迥异的结果,中国经济学期刊中的作者自称语总数显著少于美国(153.1 : 259.9)。作者自称语是构建作者身份的重要手段,而中国作者缺乏对其充分的利用。

式,结构紧凑,信息密集,便于体现学术语篇的客观性。但是,过度使用会造成摘要行文单一,句子变得冗长且缺乏活力,影响文字经济性和可阅读性,如例 2,为了缺省作者隐藏身份而强行使用被动语态,反而造成句子头重脚轻,伤害了摘要的可读性。而且,频繁地以“去人称化”的方式隐匿作者会形成“冷冰冰”的印象,导致摘要缺乏“人情味”,削弱吸引力,影响论文在学术话语社区的宣传和推销。中国学者表现出的对被动语义结构的滥用和误用,非但不会增强学术语篇的客观性和严谨度,反而违背了在学科同行中推介自己研究成果的初衷。

例 1: We present a model in which participants respond to their beliefs about the researcher's objectives. Bounds are obtained by manipulating those beliefs with “demand treatments”. (USC 语料库,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年第 11 期)

例 2: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factor flow, structural upgrad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t the respective stages, the motive force of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40 years is depicted. (CNC 语料库,《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9 期)

由表 1 的数据还可发现: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以物称为主(占 57.1%),辅以第一人称复数自称语(占 23.4%)和缺省自称语(占 19.5%);在美国方面,作者自称语中,第一人称占

绝对统治地位(89.9%),其中以复数为主,亦不乏单数。特别指出的是,第一人称虽然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有使用,但是频次差异显著(248:21.5),美国远高于中国。此外,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未出现第一人称单数自称语,而在美国方面,第一人称单数的频次甚至高于物称(21.5:18.5)。

不同的作者自称语在学术语篇中具有相异的特征和效果。第一人称自称语体现作者敢于彰显自己的权威和自信,勇于凸显自身学术贡献,不回避自身的学术责任;其中,第一人称复数能体现较强的作者参与度和贡献度,第一人称单数更是展示作者权威和信度最强有力的标志语。在凸显作者的角色和地位方面,第三人称效果稍逊于第一人称。物称即非人称或以抽象实体指称,如“本文”“本研究”,其本质是隐藏作者身份,意在强调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借助被动句式形成的作者自称语缺省情况,其实质是使作者回避,让作者彻底隐身,以期获得研究客观性的认同。

也就是说,表1数据揭示了一个道理: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多被隐藏,甚至彻底隐身,但是通过少量的第一人称复数得到一定的“曝光”,却未曾通过第一人称单数得到强烈的凸显;而在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得到充分的“曝光”,甚至被强烈地凸显。这种巨大差异可能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中庸

之道,个人不喜欢出头、冒尖,惯于隐藏身份,一般不高调宣示个人贡献,而西方文化奉行个体主义,认为个体身份高于群体身份,强调个体,重视个体独立性、个体责任。因而,相比中国,西方学者在学术语篇中更勇于用第一人称表明自身立场、态度、自信和权威,强调自己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责任。这一点在中美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频次差异上得到充分的印证。

表1显示,第一人称复数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有出现,起到了凸显作者身份的作用。然而,其所体现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异?本研究继而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考察分析。

(二)作者自称语“we”体现的作者角色

根据柳淑芬^[5]的分析框架,第一人称在学术语篇中可以体现四类角色,即原创者、观点持有者、实验操作员、论文设计者,具体如表2所示。原创者主要用于报道研究结果和结论,体现了最高的风险性和责任度,在本研究的语料库中主要通过 find、conclude 等谓语动词实现。观点持有者属于较高风险性和责任度的角色,可以展示作者的学术观点,主要与 argue、claim 等谓词搭配。实验操作员属于较低风险性和责任度的作者角色,用于陈述研究方法过程,借助 exploit、use 等谓词实现。论文设计者是风险性和责任度最低的作者角色,一般用于介绍研究目的与内容,搭配的谓词主要是 examine、study、explore 等。本研究探索并阐释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we”所体现的作者角色之异同。

表2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we”体现的作者角色

作者角色	话语功能	主要句型
原创者	报道研究结果和结论	We + find/show/propose/conclude/develop/estimate/ provide/present/identify/measure/model/quantify
观点持有者	展示作者观点	We + argue/claim/prove/reject
实验操作员	阐述研究方法和过程	We + exploit/use/apply/compare/combine/consider
论文设计者	介绍研究目的和内容	We + examine/study/explore/test/analyze/focus on/report on/evaluate

表3 第一人称代词“we”体现的作者角色对比统计

风险性	作者角色	观察频数		标准化频数	
		CNC	USC	CNC	USC
高	原创者	6	71	4.0	109.2
	观点持有者	5	5	3.3	7.7
低	实验操作员	12	11	8.0	16.9
	论文设计者	14	13	9.3	20.0
合计	37	100	24.5	153.8	

表3统计了第一人称代词“we”体现的不同作者角色情况。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共出现37次第一人称代词“we”,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作者风险性最低的角色“论文设计者”,每万词的标准化频数为9.3;其次是作者风险性较低的角色“实验操作员”,标准化频数为8.0;而高风险性的作者角色“原创者”和“观点持有者”出现频次偏低,标准化频数分别为4.0和3.3,合计尚不及低风险

性作者角色的任何一个子项。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第一人称代词“we”共出现了100次,出现频次最高的是作者风险性最高的角色“原创者”(标准化频数为109.2次),占比高达71%;其余依次是“论文设计者”(20.0次)“实验操作员”(16.9次)和“观点持有者”(7.7次)。综上所述,第一人称代词“we”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体现出了不同的作者角色,在前者中主要体现低风险性的作者角色,有助于降低作者责任度,在后者中则重点体现高风险性作者角色,有利于凸显作者的学术贡献。

由此可见,第一人称代词“we”在中美学术语篇中虽然同样起到凸显作者身份的作用,但是微观效果却仍有差异,相比中国经济学期刊,美国更为高调,更能突出作者的学术贡献。在学术语篇中,第一

人称能够彰显作者的主体性,体现作者对研究的高参与度和高介入度。第一人称的使用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在于能够凸显作者的学术贡献,帮助作者在学科话语社团中构建权威学者身份,助推作者在论辩性学术语篇中亮相身份、赢得主动,也有利于作者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学术界兜售和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缺点在于,对作者身份的凸显,意味着作者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责任,容易招致学科同行的质疑和批评。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缺点,中国学者使用第一人称时才有所保留,即使用到第一人称,也会规避第一人称单数,只取第一人称复数;即使用到第一人称复数,也会偏向表现低风险性的作者角色。究其深层缘由,可能主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在集体主义文化风格和中庸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二语写作中往往偏于保守、力求稳妥,虽然希望凸显个人学术贡献,增强个人影响力,但是不愿冒着被同行批评和诟病的风险,背负过重的学术责任。中国学者隐匿作者主观自我和趋于使用低风险、低责任度的保守做法,固然有助于减少来自同行的质疑和发难,但是同时也错失了推介学术成果和构建学术身份的良机。在《中国工业经济》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往往都是中国顶尖的经济学研究者,未来会是向国际期刊投稿、实现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因此,高水平的研究者更应关注国际学术写作惯例与风格,强化对英文学术写作规范的习得,走出母语汉语谦虚谨慎的文风束缚,在合适的语境中有意识地多用第一人称,并敢于通过第一人称展现自己的研究结论和学术观点。

四、结语

本文基于自建的微型语料库,对比分析了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的使用情况,有以下研究

发现:美国经济学期刊主要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其中以“we、our、us”复数人称为主,亦不乏单数人称“I”,总体上凸显了作者身份;国内经济学期刊多用物称,同时辅以第一人称复数和缺省主语的被动义结构,总体上隐匿了作者身份。第一人称代词复数“we”虽然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均有出现,但是频数差异显著,而且美国期刊作者主要用其凸显高风险性的“原创者”作者角色,中国期刊作者则借之表明低风险性的“实验操作员”和“论文设计者”角色。造成以上差异的现实原因主要是中美学术写作规范的不同要求,深层原因则主要是中美文化风格的差异。随着我国对学术成果“走出去”的呼声越来越高,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向国际期刊投稿。建议国内摘要的写作规定早日实现与国际规范接轨,在学术语篇中解禁第一人称,允许论文作者适当地展示自己的学术贡献,一来提高文章可读性,二来彰显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中国本土学术成果的对外传播。

参考文献:

- [1] 彭芹,张海峰. 中外岩土类期刊英文摘要的语态与第一人称代词分析[J]. 编辑学报,2017(6):538-540.
- [2] 李氏,肖雁. 英语学术语篇互动性研究:以第一人称代词及其构建的作者身份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2):18-23.
- [3] 高霞. 基于中外科学家可比语料库的第一人称代词研究[J]. 外语教学,2015(2):30-34.
- [4] 李晶洁,侯绘丽,张曦. 浅谈 Hyland 的学术语篇人际意义研究[J]. 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23-27.
- [5] 柳淑芬. 中英文论文摘要中作者的自称语与身份构建[J]. 当代修辞学,2011(4):85-8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elf-mention Words in Abstract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conomics Journals

CHENG Zhanggen, CAO Lin, WANG Yaxu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Anhui Business College, Wuhu, Anhui 241002, China)

Abstract: We adopted the corpus-based approach and conducted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self mentions in abstracts of economics journals in China and the US. We find that American economics journal abstracts mainly use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 thus highlighting the author identity while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prefer non-personal pronouns, thus downplaying the author identity. The first person plural pronoun “we” is used both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journals abstracts, however, it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requency as well as in author identity with “we” serving mainly as high-risk roles like “originator” in the US journals and low-risk roles like “architect” or “operator” in Chinese journals.

Key words: economics journals; abstract; self-mention; author identity

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与提升： “一带一路”新闻语篇的积极话语分析

徐 靖

(郑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在国际舞台上,国家形象与话语权密切相关。国家形象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与话语权的提升息息相关。“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以后,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一带一路”不仅承接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而且将惠及范围从国内伸向了国外。三年多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家组织积极响应支持,86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我国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增进和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以及文化包容等发面发挥着积极地作用,为我们积极对外塑造和输出国家形象提供了新的机遇。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家形象;构建;共赢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13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70-05

一、引言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最早由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一带一路”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起源于我国古代与西域的沟通通道,继承着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先河。如今的“一带一路”不是简单地复制曾经的辉煌,我们既要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好“一带一路”建设,又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历史的基础上将现代中国的国家形象更加准确、全面地对外传播。“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事,而是各国共同的事;不是中国一家的利益独享地带,而是各国的利益共享地带。“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实体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契机,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实现互利共赢。

近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西方敌对势力炮制的“中国威胁论”,还有所谓的“军事威胁论”,这从客观上反映了西方媒介对我国的偏见。中国的国家形

象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西方媒体长期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宣传报道,试图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丑化中国的形象。西方国家片面的歪曲报道,影响了我国的国家形象。而国际话语权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外宣传至关重要。如何将“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对外传播以塑造国家形象呢?

二、研究方法

1999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Martin教授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这一全新的命题。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PDA)由批评话语分析发展而来,不同于批评话语分析,它提倡积极改革并给出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期望通过赞美那些美好的篇章来构建和谐共处的社会。积极话语分析在语篇的价值取向和语料来源等方面弥补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不足,其研究是运用多模式、多功能和多层次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语篇中的积极话语含义,体现了话语的建构作用。积极话语分析主要以评价理论为基础,对话语中的各个系统进行词汇层面的分析,

收稿日期:2019-09-13

作者简介:徐靖(1994—),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采用积极的态度去解读话语,以期建立一个指向和谐社会的的话语分析模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本文试从积极话语分析角度出发,摆脱评价理论的限制,以语料库驱动手段观察扩展语境,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一带一路”的新闻语篇对我国国家形象的构建。

三、扩展语义单位模型

共选理论是新弗斯语料库语音学最重要的理论阐述。它深入到词汇、语法、意义交织为一体的密切关系中,重构了语言描述的视角和方法框架,并催生了相关的新的研究领域。Sinclair 阐述的扩展意义单位是共选理论在操作层面的模型化表述:各种共选关系及其研究方法都集成于该模型。扩展意义单位模型将共选组成的词语序列作为扩展意义单位,包括节点词(core)、搭配(collocation)、类连接(colligation)、语义倾向(semantic preference)及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五个要素。节点或者语境中的关键词指的是我们得到的索引行(concordance lines)中间都有一个共同的词,即检索词,我们称之为节点(core)。孤立地看待语言中的词有着显而易见的不足,这是语言学界广为接受的看法。20世纪5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 Firth 就提出了搭配(collocation)的概念。为了有效分析词语搭配,人们提出了搭配强度(collocability)的概念。搭配研究关注的是词语之间的“结伴关系”,但是局限于词汇层面。类连接(colligation)则不再局限于词汇层面,而上升到词类乃至语法层面,即语法互选,如形容词与名词构成类连接。

四、研究设计

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中国、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要,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顺应了全球合作的潮流。中国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传承丝路精神,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开辟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的语言学研究价值。China Daily 是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在 China Daily 检索主题词“the belt and road”和“one belt, one road”分别检索到新闻 12338 篇和 6279 篇,按照相关性(relevance)排序,选取相关性最强的 125 篇新闻,自建小型真实文本语料库。该语料库共包含 125 个文本,78430 个形符,7553 个类符。本研究使用的软件有:文本整理器、AntConc 3.2.3、

BFSU Collocator 1.0,按照扩展意义单位模型分析法,依次分析节点词、搭配、类连接、语义倾向和语义韵。

五、扩展语义单位模型下积极话语分析

(一)节点词

词频统计是语料库研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手段,通过节点词研究者可以发现语言的显著特征。本研究利用 AntConc 3.2.3 检索功能得到本语料库的关键词,剔除功能词后,得到频率最高的 20 个实词(见表 1)。

表 1 前 20 个高频实词

Rank	Word	Frequency	Rank	Word	Frequency
1	China	1243	11	more	242
2	road	1102	12	silk	241
3	belt	914	13	world	219
4	Initiative	578	14	infrastructure	202
5	countries	492	15	Asia	200
6	Chinese	301	16	projects	186
7	trade	295	17	investment	182
8	economic	280	18	new	181
9	cooperation	264	19	global	173
10	development	245	20	billion	172

表 1 显示,China Daily 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合作与发展。中国要继承和发扬丝路精神,把中国自身的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以和平开放、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不仅让中国自己过得好,也要让沿线各国过得好。

“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根本利益,有效促进经济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有序自由地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有利于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合作。“一带一路”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二)搭配

Firth 认为,搭配是词语之间的“结伴关系”,在语料库索引行中,以节点词为中心、左右的词数之和为跨距(span),跨距内每个位置上出现的词即节点的搭配词(collocates)。通过词汇的搭配强度,研究者可以发现词汇的共现趋向。计算搭配强度的主要算法包括:互信息(MI, mutual information 和 MI3)、Z 值(Z-score)、T 值(T-score)、Log-log 值、卡方值(χ^2)、对数似然比(Log-likelihood ratio)、Dice 系数等。由于互信息值算法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互信息值和 Z 值容易将低频词视作检索词的强大配

词,而 T 值有偏重高频词的问题。本研究将使用 Log - log 值借助搭配词进行内容分析。在 BFSU Collocator1.0 中输入“cooperation”,左右跨距分别设

置为 5,按照 Log - log 由高到低排序,得到如下结果(见表 2):

表 2 cooperation 的搭配词分析

NO.	Collocator	T - score	Log - log	NO.	Collocator	T - score	Log - log
1	International	7.3905	9.8189	11	bilateral	2.5678	4.7007
2	Forum	5.794	9.1412	12	higher	2.0793	4.5024
3	capacity	3.7196	7.7564	13	agreements	2.7143	4.495
4	exchange	3.3576	6.5321	14	ways	2.001	3.948
5	mechanism	2.8631	5.8673	15	China - Africa	2.2833	3.8644
6	industrial	3.1098	5.6149	16	cross - border	2.2833	3.7442
7	platform	2.9045	5.4975	17	closer	1.954	3.6652
8	regional	3.3254	5.4423	18	Nepal	2.0632	3.6551
9	zones	2.7633	5.2437	19	Beijing	2.6919	3.6481
10	signed	2.6495	5.1707	20	Patterns	1.6714	3.6033

根据表 2 可知,cooperation 在跨距内的显著的搭配词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除去一些地名,大多的搭配词具有积极的含义。我们将它们分为组织性搭配词(一些动词的搭配)、描述性搭配词(合作的领域、合作的方式)和评论性搭配词(形容词、副词)。组织性搭配词是一些动词,如: exchange, signed 对节点词“cooperation”进行“组织”,如中国与海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繁荣、贸易互补。描述性搭配词如: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bilateral, patterns, cross - border 等,对“cooperation”进行描述。这些搭配词可以说明合作的领域以及合作的方式,“一带一路”是多边的,各国共同参与。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评论性搭配词是一些形容词和副词,如: higher, closer, regional, international 等。这些词具有积极的内涵意义,说明“一带一路”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在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坚持打开国门的政策,在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和沿线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贸易和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开辟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特征有形容词(adj + cooperation)、名词(n + cooperation)、连词(conjunction + cooperation)、动词(v + cooperation)、介词(preposition + cooperation 和 cooperation + preposition)、指示词(directive)、形容词性物主代词(possessive pronoun)、数词(number)以及副词(adverb)。限于篇幅,现将与“cooperation”搭配最多的形容词和名词作以下分析:根据统计数据,形容词“adj + cooperation”出现 166 次(见表 3),大约占有效索引行的 52.7%。主要涉及国际的(international)、经济的(economic)、多边的(multilateral)、双赢的(win - win)、更深的(further)等。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在此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独唱,而是中国与沿线各国一起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合作与交流,发挥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经观察,形容词与 cooperation 的搭配结构所体现的语义韵为“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范围内加强经济贸易合作,让世界变得更加亲密。”

所有索引行中,名词“n + cooperation”共 49 次,约占所有索引行的 16%(见表 4),主要涉及的词汇有能源(energy)、生产力(capacity)、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贸易(trade)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理应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一带一路”是多元的,合作领域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物

(三) 类连接、语义倾向和语义韵

搭配研究关注的是词语之间的“结伴关系”,而与搭配相关的另一概念是“类连接”(Colligation)。类连接关注的也是“结伴关系”,但类连接所关注的“结伴关系”不再局限于词汇层面,而是上升到词类乃至语法层面,即语法互选。换言之,类连接就是有关词类或语法类别的共现关系,它可以被看作是搭配的更高层次,与语言的句法方面有密切联系。

包含“cooperation”的索引行共 315 条,经观察,预料中“cooperation”节点词左右两侧的显著类连接

流交通、投资、产能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合作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民间资本、专业投资机

构、各国企业以及各界有识之士都可以广泛参与进来。

表3 “adj + cooperation”索引行部分展示

1.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 among other projects .
2.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3.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 and to improve the
4. is a proposal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ut forward by
5. China ' s first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ctivity carried out
6.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at the National Center
7. world closer and enhance global cooperation , be it in trade
8. To achieve win - win cooperation , China must enlist global
9.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Asia -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10. like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 the Belt and Road
11.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 the think tank of
12.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 the think tank of
13. countries involved to build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e their macro policies
14. boost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 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15. a large - scale Initiative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it advocates

表4 “n + cooperation”索引行部分展示

1. petroleum products , energy cooperation etc. That raised a kind
2. a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 seek a new pattern
3. to the need for increased cooperation on energy , covering a
4. significance of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in her speech .
5. The infrastructure and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Serbia and Uzbekistan
6. for livingby prioritizing the capacity cooperation in all areas .
7. opportunity for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apacity cooperation. China ,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apacity cooperation will
9. Budapest to promote health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build a platform for
10. Human Resources for Health Cooperation Network , the China - CEEC Hospital
11. promotes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t a higher

名词与 cooperation 的搭配结构体现出中国与其他各国合作的领域和方位。经观察,名词与 cooperation 的搭配产生了一种“中国希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与沿线国家产能、创新与教育等方面的合作”语义韵。

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地理历史环境、意识形态等因素造成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部分西方国家出于某些目的,其媒体通常用“有色眼镜”报道中国,将中国描述为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威胁者”。“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当下的全球经济合作潮流,推动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共同繁荣,彰显了人类互联互通、和平发展的美好理想。

六、讨论

七、结论

Sinclair 将语义韵视作节点词与搭配语境共同的特征,主张将语义韵置于扩展意义单位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本研究摆脱以往话语与评价理论结合的模式,从积极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通过观察和分析节点词、其搭配以及类连接,从而发现了语义倾向及语义韵。我国对于“一带一路”的报道紧紧围绕“加强各方面的合作以求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主题展开,向世界人民表达了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规划对接为基础,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柱,以金融互利合作为重要保障,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

西方媒介话语建构的中国形象,是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国话语权缺失和被西方媒体弱化的状态下“他者”化的表述体系,并非对中国现实状态合理与客观的认知与理解。积极话语分析旨在对话语中的各个系统进行词汇层面的分析,采用积极的态度来解释话语。积极话语分析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既定目标,营造和构建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本研究以 Sinclair 的扩展意义单位模型为指导,结合语

“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

料库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数据驱动的意义单位分析,深度分析《中国日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与提升,以求通过现象挖掘本质。研究发现,《中国日报》通过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的新视角。“一带一路”倡议继承了古老中国的历史,借历史上的开放包容开拓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和谐世界”以及“互利共赢”的国家形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象发生巨变,经济持续繁荣,社会局势稳定,政治、法律、经济领域不断改革,中国与世界各国不断拓宽交流与合作,这些让中国的国家形象更趋正面。“一带一路”倡议凸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的共性主题,不仅着力于自身的经济、外交事业等国家层面建设,而且,“一带一路”已经延伸到能够为全世界国家谋利、为全世界人民造福的高度。这体现了中国珍爱和平,追求亲善友好、互利合作的国际关系,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新时代,我们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扎实推进互联互通、自由贸易,加强农业、产能、能源、灾后重建等各领域合作,扩大双向投资和贸易,促进双边贸易可持续发展,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 [1]陈风华. 语料库视角下“一带一路”系统功能认知阐释[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24):53-56.
- [2]储殷,黄日涵.“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家形象构建的巧实力分析[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2):78-84.
- [3]侯卫栋. 浅析“一带一路”战略对提升国家形象的作用[J]. 管理视窗·公共管理,2015:54.
- [4]司炳月,吴美莹. 积极话语分析视角下演讲中态度资源的对比分析[J]. 语言教育,2017(17):22-27.
- [5]覃杰. 两大舆论场与软实力构建——“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的国家形象传播战略[J] 今传媒,2017(5):53-54.
- [6]王春强. 中国崛起与国家形象的构建[J]. 财经研究,2014(10):1-2.
- [7]徐家金,熊文新. 基于学习者英语语料的类联接研究概念、方法及例析[J]. 外语电化教学,2009(127):18-23.
- [8]张晓琳. 从语义韵与类连接角度分析《德伯家的苔丝》动词特征[J]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3(6):35-36.
- [9]张力.“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国家形象构建[J] 新闻观察·新闻思辨,2014(22):46-47.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Analysis on Positive Discourse in “The Belt and Road” News

XU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 national ima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discours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the national ima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right to speak.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experts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13. “The Belt and Road” not only accords with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western and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but also benefits foreign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actively responded to support, and more than 86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China. China actively develops economic partnerships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nd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and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mutual trust,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clusion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actively shape and export our national image.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win-win

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几点看法

陈国剑

(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媒体融合”至今仍是一个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概念,与之相关的理论、策略研究及预测也存在着争议,故不能不顾学术传统地引用,也不能不分领域地进行模仿。当前形势下,推动媒体融合的当务之急是实现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传播工具与互联网乃至移动通讯的互动、互补和互融,以权威品牌和高质量内容抢占舆论高地,重点任务是围绕互联网数据平台的建设和使用做好数字化工作,以保障实现优质内容的“互联网+”。

关键词:媒体融合;现实意义;新闻传播工具;传统媒体;“互联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14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75-05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已将新闻出版业推进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媒体融合时代,“互联网+”正在将传统的、分割的、排斥的热媒体和新兴的、关联的、包容的冷媒体联结在一起,形成“众声喧哗”式的全媒体交流状态,“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一种不可阻挡的浩荡潮流,成为媒体领域一场不容回避的自我革命”^[1]。为顺应形势发展、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有效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也为了开创出版工作新局面、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繁荣,中共中央自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从提出“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到提出“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从制定实施《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到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2],为媒体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注入了强劲动力,推动我国的新闻出版工作进入了新的境界。“全国各地各新闻单位尤其是中央主要媒体积极投身媒体融合发展,‘移动优先’成为共识、‘用户意识’深入人心、‘爆款产品’屡屡刷屏……从‘相加’到‘相融’,向着‘融为一体、合而为一’阔步迈进,一个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不断提升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在全媒体时代浪潮中成长壮大,写下媒体融合发展的‘中国答卷’。”^[3]然而,必须意识到我国的媒体融合当前正处在从“相加”向“相融”过渡的关键阶段,在新闻界取得的成就固然可喜,但放眼整个出版界,其发展前景依然堪忧。尤其是为数众多的处于“小、散、滥”状态的期刊出版单位,该怎样借融合发展自己呢?可以说,在业界尚没认清媒体融合的规律、尚没领会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之前,尚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就相关问题做如下阐述。

一、媒体融合的应有之义

“媒体融合”于20世纪70年代末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提出,于21世纪初被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引用、研究,现已成为中国新闻出版界的一个最热门词汇。它虽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的确是一个被中国编辑学研究曾经忽略过的课题,以致于编辑(出版)学界对于媒体融合的认知较为模糊,甚至还有不少偏见。因此,在谈及媒体融合的应有之义时,还需要正本清源,看一看美国学者最早的提法。

197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Nicholas Negroponte 教授用一个图例提出了“Media Convergence”

收稿日期:2019-09-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学术论著出版业态与编审评价体制研究”(13AXW007)

作者简介:陈国剑(1964—),男,河南平顶山人,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主要从事书刊编辑工作研究。

概念。“他用三个圆圈分别代表印刷出版业、电脑业和广播电视业,这三个圆圈逐渐重叠表示印刷出版业、电脑业、广播电视业这三个产业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并且这三个圆环重叠的部分将会是发展最快的。”^[4]1983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 Ithiel De So la Pool 教授在其著作 *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提出了“The Convergence of Modes”概念。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5]由此而论,“Media Convergence”这个“模棱两可的时髦词”^[6]原来指的是媒体传播形态的趋同现象或媒体进化的规律。例如,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多种媒体已经或正在趋同于“互联网+”的传播形态,从而融汇形成新的媒体模式和业态——数字化媒体和与之相对应的数字出版业。在我国,1996年发行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开启了中国学术期刊的光盘版与印刷版同步发行模式;其后,随着“中国期刊网”的开通、“中国知识基础设施”(CNKI)工程的建设,几乎所有的中国学术期刊都加入网络数据库中,以致于互联网已成为学术期刊的重要传播渠道,使中国学术期刊出现了邮政发行量下降、网上检索和阅读量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随着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和推广,中国学术期刊出现了集群化、集团化的趋势。中国学术期刊的这种印刷版、数字版兼容的传播形态,以及基于互联网信息平台的集群化、集团化趋势,正是媒体融合在期刊出版业的具体表现。所以说,媒体融合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

我国学者对于媒体融合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颇有创造性,不仅明确了媒体融合的概念,而且充实了媒体融合的内容,并衍生出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滤去诸多不着边际的论述,最全面、最明晰的解释当为:“传媒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是信息技术进步推动下的传媒产业的升级和重组,是一个跨越发展的途径。一般意义上讲的传媒融合主要是指不同媒体形态、不同媒体单位之间的融合,广义上更广泛的传媒融合还包括传媒与经济、文化、技术、资本、业态之间的融合。”^[7]这便是我国目前所大力倡导的媒体融合的应有之义,其中“不同媒体形态的融合”,即是编辑学视野中的“媒体融合”。这是因为编辑学是以职业为导向、以伦理规范为要旨的学科,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围绕出版实践所形成的编辑工作的规律,仅涉及媒体模式的创新。按照王振铎的解释,媒体模式是“某种讯息群的组合,文化符号的集装箱”^[8],例如口语媒

体、文字印刷媒体、音像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等,不仅外部形态、内部结构、传播方式不同,而且由此衍生出来的媒体功能、特征和发展趋势也不同,所以“媒体模式”就反映为“媒体形态”。

按照丹尼斯·麦奎尔的观点,“大众传媒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9]。可以肯定,并非所有媒体形态都能融合,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也不允许存在任何形式的垄断。所以,专业化群体所要关注的自然是与专业媒体形态直接相关的技术及机构的融合,既不能听风是雨做池鱼之虑,也不可亦步亦趋邯郸学步,而只能在领会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的前提下进行有明确对象的探索。

二、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当务之急

关于基于报纸而兴起的新闻学与基于广播而发迹的传播学的定位问题,在美国虽然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绿眼罩人”与“卡方人”^[10]之争,直到现在尚拢而不合,但普遍的社会认知已将其视为同一领域,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传播工具,媒体融合研究所考察的对象也主要是这类大众传媒。更重要的是,新闻传播工具在反映舆论和形成、引导舆论过程中具有巨大的作用,“在当代西方,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媒体与政治关系的一个极端形态正在形成,这就是‘政治媒体化现象’”^[11]。在政党较量中,政客们特别注意利用新闻传播工具制造舆论,维护和树立个人的形象、扩大自己的影响;在国际事务中,霸权主义者热衷于操纵新闻传播工具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或采用双重标准,歪曲事实、煽风点火、挑拨是非、进行“妖魔化”宣传,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从艾森豪威尔到奥巴马,美国历届总统都深谙此道,他们借助于报纸、广播、电视等赢得了大选,并操纵着这些新闻传播工具相继实施“冷战”“颜色革命”、挑起“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策动“围堵中国计划”,已成为一种传统。这或许是推动美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和传媒应用技术不断进步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是将“新闻”和“出版”视为姊妹专业。虽然从当前的学科目录上还看不到“出版学”^[12],但在学科教育方面,“中国出版高等教育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3]。在一些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不仅设有“新闻学”“传播学”专业,而且还设有“广播电视学”“广告

学”“编辑出版学”^[14]等专业。在学术研究方面,“编辑学研究正在深入,正在稳步地前进”^[15]。至于为什么在中国编辑学研究与学科教育会成为出版研究和学科教育的先声,个中原因乃“出版”与“编辑”两个概念在1930年代的国人心目中尚处于“混沌”状态,有时分殊,有时混一。有从资本经营印刷、发行产业角度称为“出版”的,也有从文化学术教育传播角度称为“编辑”“校译”的。中国的学者们深受国学传统的影响,更看重编辑的功夫,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其中也大有学问啊!”^[16]以致在1980年代初掀起了编辑学研究的热潮。其时,作为移植而来的学科,新闻学已经落地生根,传播学正在破土萌芽,故有学者认为“编辑学”之名过于笼统,建议借鉴新闻学的体系划分或结合传播学研究称其为“出版编辑学”或“编辑传播学”^[17]。后来学界将其定义为偏正结构的“编辑出版学”并置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闻传播学类基本专业,不仅没有摆脱国学传统的影响,反而又混淆了学科渊源。这也说明,虽然我们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工作,但在研究方面却从骨子里喜好编辑文化,故难免会不自觉地将新闻学问题、传播学问题混淆为编辑学问题。由于这种学科间的关系,以及中美学术传统的差别,我们应该遵从“物以类聚”的原则去处理媒体融合问题。就此而论,当前国内诸多关于媒体融合的论著几乎都忽略一个限定词——“新闻”(可能用“资讯”更准确),我们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点是新闻媒体。因为,在此方面已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借鉴,尤其重要的是,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目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着新情况。“美国人口虽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80%—90%的新闻,都由美国等西方通讯社垄断。美国等西方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18]置身于这样一个传媒全球化大环境中,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新闻舆论方面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从涉藏、涉疆问题到人权、宗教问题,面对西方新闻媒体的片面报道和抹黑,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反击或抗议。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报道迅速及时且打着“言论自由”“价值中立”的幌子、以新奇怪异低俗相包裹,西方新闻媒体使部分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产生一种“美好幻觉”,认为它们所提供的新闻都是真实和客观的、它们的评论都是善意的。一些所谓的“公知”则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随声

附和西方新闻媒体,宣扬“普世价值”,借“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造谣生事,丑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形象,或扭曲史实颠覆中国传统优良价值观。正所谓“三人成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迫切需要乘势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9]。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传统传媒业态一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我国媒体融合从技术、机制到具体进展都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网的整合——在网络层上实现互联互通、在业务层上互相渗透和交叉、在应用层上趋向使用统一的IP协议,“最终形成一套网络中兼容多种业务的运行模式”^[20]。再如报纸微博、微信、客户端三位一体的移动传播布局——建立新型多功能一体化采编平台、运用多媒体技术,实现新闻的“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21]的“中央厨房”运作模式。可以说,计算机信息技术驱动的媒体融合发展为我国新闻传媒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当前5G通信技术刚刚起步,正是我国新闻传媒做大做强关键时间节点,积极推动新闻传媒深度融合已是当务之急。

三、实施媒体融合的重点任务

有学者将媒体融合归纳为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等五种类型^[22],也有学者认为媒体融合有技术融合、网络融合、业务融合、终端融合等四种主要表现形式^[23]。从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的发展史可概括出如下结论,“当媒体制作的物质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时,编辑形制便有新的发展”^[24],从而衍生出新兴媒体,而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将会进入一个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时代——也就是说,媒体是在融合中创新发展的,媒体融合可概括为三种情况:一是传统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二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三是新兴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所谓新兴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时间的、发展的概念,例如纸书相对于简册、活字印刷图书相对于雕版印刷图书、广播相对于报纸、电视相对于广播都是新兴媒体,其形态或运营模式往往是因为制作工艺或传播技术的进步而有所创新。当前的新兴媒体主要是指诞生于报刊、广播、电视这三种大众传媒之后的互联网媒体和移动通信媒体——人们按顺序称之为“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其运营模式本质上是网络、媒体、通信三者的大汇流。而当前的媒体

融合虽然包含有传统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例如报刊出版机构的集团化、广播与电视台站的整合)、新兴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例如互联网与手机平台的融合),但最为重要的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最为关键的是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融合,即传统媒体的“互联网+”。

正如《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所述:“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积极发挥中国互联网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把握机遇,增强信心,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对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具有重要意义。”^[25]因为互联网能够不受空间限制地进行文档、图片、音像等各种形式的信息的交互传播,使用者多、生产成本低、传播效率高,推动各类传统媒体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无疑会增强我国新闻出版业的信息生产和服务能力、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所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部署、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适应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举措。”^[26]之所以将传统媒体的“互联网+”视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重要任务,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在内容建设方面,传统媒体是媒体融合的最可靠资源。目前为止,原创性高质量的内容仍然来自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因其权威性和从业人员的专业性而具有强大的生产力和影响力,但其传播方式单一、速度慢、覆盖范围小,且受众没有互动性。虽然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受众可实时互动转发,但由于缺少甚至没有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把关人”,互联网媒体的内容可谓重复不断、错谬连篇,可靠性低、规范性差。要发挥二者的优势,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达成“互联网+传统媒体”的传播形态——这不仅是传统媒体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互联网媒体健全自身的需要。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传播的实践中,内容生产永远处在整个传媒产

业链和价值链中上游位置,掌握了内容优势地位的媒体,往往能够凭借优质内容在媒体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27],如果不加强内容建设,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目标恐将遥不可及。

其二,在技术建设方面,互联网是媒体融合的最佳媒介和基础。与“互联网+”紧密相关的是数字化——简单而言,就是将诸多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一系列二进制代码,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进行存取交换处理。这里,复杂多变的信息既包括媒体传播的内容,也包括媒体内部管理及外部调研等涉及各类数据。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媒体数字化已不成问题,所搭建的互联网信息平台除具有使信息的沟通变得更加简单快捷外,还具有信息采集、加工处理、发行等编辑出版工作主要环节的功能模块。所以,数字化的程度决定着媒体融合的深度,实现优质内容的“互联网+”是媒体参与融合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实现媒体采、编、传播过程及效果评价、选题论证、管理工作的数字化则直接关系到媒体运营模式的创新。并且,一个互联网信息平台所发布的数据可以被另外一个互联网信息平台作为数据源使用,互联网信息平台也是移动通信媒体的基础设施。所谓的“第五媒体”实质上就是“第四媒体”的延伸(也可称其为互联网传播移动化),所谓的“大数据”“云计算”“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都涉及数字化资源,所以做好“互联网+”在新兴媒体的技术建设方面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对待媒体融合应有的态度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正确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统筹协调、坚持创新发展、坚持一体化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按照积极推进、科学发展、规范管理、确保导向的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26]不仅明确了推动媒体融合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而且也阐述了实现媒体融合的工作理念和路径。在理解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我们对此应秉持正确的态度,既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能盲目跟风。

其一,要率先解决当务之急。报纸、广播、电视

等新闻传播媒体必须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的趋势,运用多媒体、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发展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实现传统媒体与互联网乃至移动通讯的互动、互补和互融,以权威品牌 and 高质量内容抢占舆论高地。这一点,既刻不容缓,也不容置疑。

其二,要着力落实重点任务。所有的传统媒体都应主动参与“互联网+”行动,围绕互联网数据平台的建设和使用做好数字化工作。有条件的媒体应该建设自主可控的平台,把生存发展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条件的媒体可以有选择地使用商业平台,探索技术、积累经验,通过集群化拓展生存空间。要认识到,媒体融合不单是内容的“互联网+”,而是媒体工作的数字化,随着媒体融合的发展,新的新闻出版业态必将形成,旧的编辑形制必将革新。传统媒体从业人员要顺应形势,主动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积极尝试媒体工作数字化。还要认识到,无论媒体的形态无论如何演变,“内容为王”的诉求永远不会改变,保障内容质量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永远也不能丢。

其三,要反对教条主义。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应用实践,均不能生搬硬套既有的原则、概念和方法。何况“媒体融合”至今仍是一个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概念,相关的理论、策略研究及预测也存在着争议,故不能不顾学术传统地引用,也不能不分领域地模仿。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不少传统媒体已经纷纷迈出了向新媒体融合的步伐,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28],以科学的态度,有针对性地研究新闻传播工具、图书、学术期刊等不同种类的媒体的融合理念和路径。编辑学研究则应将重点放在编辑工作的数字化转型上,深入探讨新兴媒体的质量保障问题。

参考文献:

[1] 钟轩研. 媒体融合是一场不容回避的自我革命[N]. 人民日报,2019-04-03(4).

[2]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N]. 人民日报,2019-01-26(1).

[3] 黄小希,史竞男,王琦. 守正创新有“融”乃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融合发展成就综述[N]. 人民日报,2019-01-27(1).

[4] 黄晓新,刘建华,卢剑锋. 中国传媒融合创新现状、问题与趋势[J]. 中国传媒科技,2017(4):19.

[5] 吴欣然. 分离融合:看媒介发展[J]. 新闻世界,2009(6):80.

[6] 宋昭勋. 新闻传播学中 Co nvergence 一词溯源及内涵[J]. 新闻学与传播学,2006(1):51.

[7] 柳斌杰. 把握大势 融合创新 构建传媒新格局[J]. 传媒,2014(5):11.

[8] 王振铎,赵运通. 编辑学原理[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117.

[9] 丹尼斯·麦奎尔. 大众传播模式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

[10] E. M. 罗杰斯.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 殷晓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485-490.

[11] 唐海江,吴高福. 西方政治媒体化评析[J]. 国际新闻界,2003(2):17.

[12] 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 [S/OL]. [2019-07-07]. <http://c.gb688.cn/bzgk/gb/showGb?type=online&heno=4C13F521FD6ECB6E5EC026FCD779986E>.

[13] 方卿,刘银娣. 我国出版高等教育30年[J]. 出版发行研究,2008(10):19.

[14]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等文件的通知:教高[2012]9号[EB/OL]. [2019-07-0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3882/201209/t20120918_143152.html.

[15] 邵益文. 编辑学研究正在稳步前进:《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年)》序[J]. 出版科学,2016(2):128.

[16] 赵家璧. 编辑忆旧[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9.

[17] 周文熙. 有关编辑学的几个问题[G]//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科研办公室. 论编辑和编辑学.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179-185.

[18] 刘昉献. 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和对策研究[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5(1):9.

[19]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10-28) [2019-08-03].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20] 徐爽,彭东红. “三网融合”运维浅谈[J]. 中国新通信,2019(7):105.

[21] 高秉喜. 让“中央厨房”为提升地市报“四力”助威[J]. 传媒,2017(5):34.

[22] GORDON Rich. The meanings and implication of convergence[G]// KAWAMOTO K. Digital journalism: emerging media and the changing horizons of journalism.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57-73.

[23] 董年初. 媒介融合与政府监管[G]//黄楚新.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报道.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8-19.

[24] 陈国剑. 编辑形制的发展与物质技术进步的关系[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6):112.

(下转第94页)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两会新闻报道特点研究

——以2018—2019年两会新闻报道为例

王莹,秦双飞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两会是我国每年召开的重要时政会议,对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促进党和人民心连心起着重要作用。每年两会期间,全国各大媒体都力争在报道中体现自己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人民日报》作为我国第一大党报,其对两会的报道策划对其他媒体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微信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群体,微信公众号也成为很多网民和广大干部群众接收信息的重要渠道,应该受到各大媒体的重视,但是目前仍有媒体疏于微信公众号的维护,其传播效果很不理想。目前,《人民日报》官方微信两会新闻报道策划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传播模式,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符合“三贴近”原则,较好地诠释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深度与广度兼具、框架与创新并存。

关键词:《人民日报》;两会;微信公众号;新闻报道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15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80-0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两会)是我国每年召开的重要时政会议,两会的新闻报道是人民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因此媒体的传播效果好坏对党和人民都至关重要。目前,微信公众号拥有较大的受众群体,其传播力和影响力应该受到媒体的重视。《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已经成为其两会新闻报道的重要传播阵地之一,并形成了自己的传播模式和传播特色,其多角度、多层次、人性化的报道风格和报道思维不仅符合受众的心理需求,而且遵循了新闻报道规律,使传播政治化功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一、《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18—2019年两会报道的量化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18年3月3日—3月20日两会召开的18天时间里,《人民日报》官方微信总发文371篇,日均发文约21篇;其中“与两会相关”的报道166篇,占比约45%,日均发文约9篇。

据统计,2018年2月13日—3月2日的18天时间《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总发文348篇,日均发文约19篇;从环比数据来看,2018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发文总量和日均发文量较平日均有所增加。

从表2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在2019年3月3日—3月15日的两会召开的13天时间里共计发文265篇,日均发文约20篇;其中“与两会相关”的报道71篇,占比约27%,日均发文约5篇。根据统计,2019年2月18日—3月2日的13天里《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共计发文274篇,日均发文约21篇;从环比数据来看,2019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总量和日均发文量环比上个周期均有小幅度减少。

从2018年及2019年《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两会期间发文量的同比数据可以看出,2019年两会期间“与两会相关”的报道日均发文量和总占比与2018年相比都有所下降。

收稿日期:2019-08-25

作者简介:王莹(1979—),女,河南商丘人,硕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传播学。

表1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18年3月3日—2018年3月20日报道数量统计表

日期 项目	日期																	日均	合计	
	3/3	3/4	3/5	3/6	3/7	3/8	3/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与两会相关的报道数量	3	4	11	10	7	6	6	4	8	7	8	8	4	4	19	20	19	18	9	166
当天报道总数量	19	19	19	19	20	18	20	20	20	19	20	19	19	18	24	26	27	25	21	371
与两会相关的报道占比	16%	21%	58%	53%	35%	33%	30%	20%	40%	37%	40%	42%	21%	22%	79%	77%	70%	72%	43%	45%

表2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19年3月3日—2019年3月15日报道数量统计表

日期 项目	日期														日均	合计
	3/3	3/4	3/5	3/6	3/7	3/8	3/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与两会相关的报道数量	5	5	14	10	5	5	5	4	3	3	4	1	7	5	71	
当天报道总数量	21	19	22	24	18	21	20	21	21	19	19	19	21	20	265	
与两会相关的报道占比	24%	26%	64%	42%	28%	24%	25%	19%	14%	16%	21%	5%	33%	26%	27%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在2018年两会期间“与两会相关”的报道从3月3日至3月5日总体呈上升趋势,3月6日至3月16日发文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在3月17日至3月20日两会的最后4天发文数量较两会前期突然增加,并在3月18日达到本年两会发文量的最高峰;2019年两会期间“与两会相关”的报道数量从3月3日至3月5日总体也呈上升趋势,并在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当天达到高峰,发文数量14篇,3月5日至3月14日发文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在3月15日会议闭幕当天报道数量达到二次小高峰,发文7篇。经过对比,2018年3月3日至3月5日《人民日报》官方微信“与两会相关”的发文量低于2019年同时期,3月6日发文量相同,3月7日至3月18日期间,只有3月15日2018年的发文量低于2019年,其余时间均比2019年发文量高。

总体来看,2018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量的峰值出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期间,2019年发文量的峰值出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和闭幕当天,两会期间的其余时间两年的日均发文量占比均不高;这说明《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两年两会会议期间除了重大事件、重要节点外,均未形成“刷屏”式报道。

两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报道类型多样,除了实事求是地向受众传达两会的最新消息外,还注重互动与宣传,力争最大限度传播信息和引导舆论。根据《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两会报道的内容将其按照主题不同分为11个类别,从图1的分类情况可以看出,在11个类别中两年均占比较高的为“政策的传达与解读”、“政府人员声音”和“两会相关”三类报道,这说明《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两会报道中更加侧重政策方针及最新消息的传达及政府亲民形象的传播,这准确地契合了《人民日报》作为党报的使命与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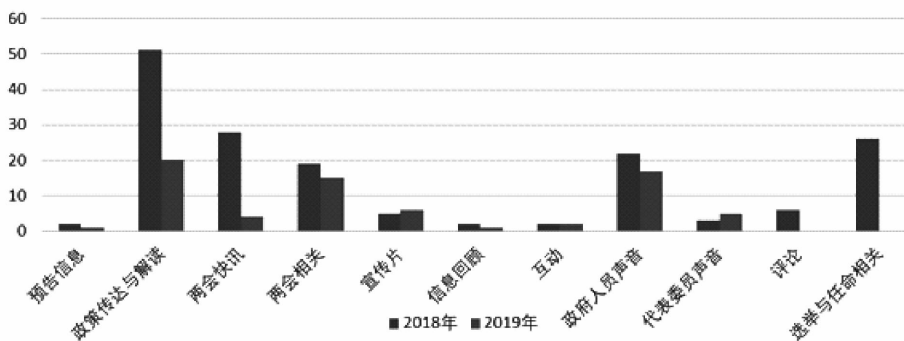


图1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2018—2019年两会报道主题分类统计

二、《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两会报道策划的特点分析

(一)硬新闻,软标题

两会作为全国性的时政会议,其严肃性不言而喻。媒体以往的经验是此类硬新闻要做到严谨、严肃,一般采取灌输式理论说教的报道方式,大量会议

新闻、会议报告形式的报道充斥整个网络,标题更是“不苟言笑”。而在近两年的《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看到了更多“接地气”的软标题,比如《剧透!今年两会要办这些大事,将影响你的生活》《盘他!看看一根线能盘出啥》《看了这份账单,我都不好意思偷懒了》《“丑校服”886?网友:这个

提案太惊喜!》《宝宝不高兴问题很严重……今天部长通道上这些话“亮”了》等类似标题,不仅使用网络上流行的“热词”拉近了与网民的关系,而且运用轻松、活泼的语调将会议内容表达出来,极其具有趣味性,增加了新闻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提高了新闻报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授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泾渭分明,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收信息,“灌输式”的新闻方式不再适合当前的媒介环境,媒体必须以受众的阅读习惯为参考进行信息的传播。《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在两会报道中采用的“硬新闻,软标题”的做法,使其新闻报道越来越“接地气”,这种改变不但没有影响其公信力,反而吸引了更多的网民阅读新闻,增强了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这种软标题契合了微信公众号的强传播的特性,更能够引发二次传播,让《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在加强党的方针政策扩散的同时也在引导舆论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二)报道数量适度,报道角度更加符合“三贴近”原则

两会是全国性的大事件,符合新闻价值“五性”中的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在以往大部分的新闻报道中,媒体均以大篇幅、刷屏式的报道策划显示两会的重要性,但是这样的报道方式往往造成信息重复率大增、重要信息被覆盖、受众信息接收疲劳等效果,传播力和影响力不佳,因此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掌握报道的“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在2018—2019年的两会报道策划中,《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关于两会的报道数量总占比分别为44%、23%,日均发文分别为9篇和5篇,说明《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在报道数量上求精不求多,重点在于报道内容的整合与解读。虽然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发文数量并不多,但是每篇报道的浏览量都在10万+,说明其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经过对《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关于两会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其发布内容更多的是关乎人民的日常生活,报道角度体现新闻价值的接近性。比如2018年发布的《李克强: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定了!政府工作报告: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好消息!除了流量费,这些费用也要降》《今年,这些人将获得实实在在的实惠!快看看有没有你》等报道以及2019年发布的《定了!今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好消息!今年在全国实行“携号转网”》《关

于金融乱象、网约车、减税降费……刚刚部长们都回应了》《从陕北到中南海,习近平一直很关心这件“小事儿”》《怎么缓解看病难、如何振兴中国足球?7位部长这样回应》等多篇报道都与民生息息相关,并且这类报道在两会的报道中占比均较高。从这方面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舍弃了严肃的会议报告模式,报道内容重视传达两会的惠民政策,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一方面“使报道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使群众爱听、爱看、爱传”^[1];另一方面也让政府的亲民形象深入人心。

(三)报道方式不拘一格,体现全媒体与融媒体特点

全媒体和融媒体的构建不仅仅体现在报道载体上,也体现在新闻来源、报道形式、新闻内容、传播受众等方面。^[2]《人民日报》目前不仅报道载体有十几种,其报道方式也不拘一格,给受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新闻体验,体现了全媒体与融媒体的特点。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在两会期间的报道从新闻来源来看除了来自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日报微博、人民日报新媒体、人民网等,还有来自新华网、新华社、环球网等媒体,充分吸收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优势,有效实现了内容的融合、平台的融合、渠道的融合,^[3]达到了资源、内容和宣传的共融,使传播效果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

在近两年的两会报道中,《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都融合运用了图文新闻、图片新闻、视频新闻、图解新闻等方式进行报道,并运用了“应景”的微视频、微动画和微纪录片以及充满创意的H5视频、两会答题赢大奖等特殊的方式进行报道和宣传,其不拘一格的报道方式使两会的报道“活”了起来,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以2019年两会为例,《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制作的H5《点击!你将随机给一位陌生人视频通话》,受众点击拨号后可以随机和一位陌生人视频通话,这些视频电话接通后受众似乎真的可以和新闻中的人物视频,现场感和参与感极强,而视频中的“陌生人”大部分是“网红”人员,其中更多的是来自扶贫地区,这样的传播能让更多人关注扶贫,从而有助于扶贫地区产品的销售和宣传,为脱贫攻坚做出贡献,《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试图用这种让受众惊喜的方式传达“汇聚你的梦想,关注你的关注”的理念;《盘他!看看一根线能盘出啥》这条H5视频受众点击“铅笔”向右滑动,这支“铅笔”就会画出各种有趣的漫画,配合一个个小故事讲述了人民的“声音”以及人民生活的变化,

通过“这支笔”传达了“2019 两会,你的声音都能被‘看’见”的理念;《看了这份账单,我都不好意思偷懒了》这条创意报道用户只要点击“开始打印”字样就会出现模拟打印机的声音和展示 2019 年政府 KIP 的图像,同时在最后还可以选择受众自己的 2019 年 KPI,每一页账单上面还加上了符合主题的背景音乐,受众能够在快乐的体验中了解更多政策措施,同时传达了“政府很拼,我也不好意思偷懒”的价值观;《中国 24 小时》视频展示了精彩纷呈的中国河山和自强不息的中国人;微动画《孙悟空的三个锦囊》用动画传播“有困难,找代表”,也令受众印象深刻。除此之外,《两会答题来了!拼脑力,赢大奖!》的活动更加调动了受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好的思想、观念、内容,要通过生动的形式、多样的手段表达出来。”^[4]《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这样“不拘一格”的两会报道,少了许多“死板”,增添了更多有趣好玩的元素,提高了受众的体验感,增强了两会报道的吸引力和感受力。

(四)报道内容深入浅出,广度与深度兼具

随着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和交流对话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传媒政治宣传的难度,如果媒体不改变说教式的政治宣传模式,不仅宣传效果会打折扣,也会使人们产生逆反心理,导致主流价值的边缘化。^[5]《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对于两会的报道突破了传统的“说教式”政治宣传,采用多主题、多角度、多方式的报道,使报道内容深入浅出,广度与深度兼具,在传播效果上更胜一筹。

在广度方面,《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报道涉及两会相关的方方面面。两会期间的报道话题在以贴近百姓生活为主的前提下,涉及经济、政治、医疗、环境等各方面,涉及人员从儿童到老人,从学生到工人,从公务员到百姓,真正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其报道角度不拘泥于单一主题,改变了以“领导讲话”为视角的报道角度,开始从百姓视角报道两会,使新闻的可读性更强,宣传效果立竿见影。

在深度方面,《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图解新闻彰显了其作为主流媒体的独特性与深刻性。作为新闻记者,首先必须清楚新闻是给谁看的,然后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新闻语言,两会的新闻报道其受众是广大群众,如果将两会的新闻报道写得晦涩难懂,大部分受众都难以理解,那么其报道就属于无效报道。《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图解新闻将深奥难懂的政策性文件及报告利用图解的方式表达得浅显易懂,也因此成为《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独有特色。

比如 2018 年《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目了然!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一图了解》《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办事该找谁?一图带你看看》,以及 2019 年发布的《一起来算!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加减法”》《一图看懂!2019 年两会将这样改变你的生活》等图解新闻深入解读了政府的政策措施,传播了政府的最新消息。另外,在 2019 年 3 月 16 日,《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发文《谈“紧日子”与“好日子”,习近平两会这样讲“辩证法”》对两会进行深度总结,角度新颖,内容深刻,也是鲜少有媒体能够匹敌的。

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媒介日益成为政治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6]媒介对于政治信息的报道和解读不仅仅代表着一家媒体的政治立场,更关乎党的政治形象的传播。关于两会的新闻报道媒体要做到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对政治信息进行兼具广度与深度的解读,需要媒体人具有深厚的政治素养,而作为党媒,《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显得更专业也更懂得人民。

(五)报道模式成熟,框架与创新并存

经过近几年的摸索,《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报道模式已经十分成熟,除了有固定的几类报道主题形成了自己的报道框架外,其报道方式、标题等都有规律可循,并且在坚守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

2018—2019 年《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都在 3 月 2 日以《两会,将这样影响小明的生活》为题拉开了两会的序幕;在两年两会的报道中《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都采用了“两会快讯”的方式即时传播最新消息,并且及时发布两会有关政策的追踪报道,比如 2018 年及 2019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分别报道了两会关于“降低流量费”和“携号转网”的政策,在 3 月 6 日即分别发表了《关于流量费,三大运营商集体表态!这些用户将受益》《关注:关于携号转网和降资费,三大运营商表态了》两篇新闻进行回应,实现了“前呼后应”的效果;“孙悟空”也已经是两年两会中必出现的“人物”;“金句”和“箴言”是两年两会中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另外,2018 年《人民日报》拍摄了《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中国一分钟》,2019 年制作了《中国 24 小时》等宣传视频以提升国家和两会的影响力;在标题方面,两年的两会报道有很大的相似性和相关性,比如 2018 年《好消息!政府工作报告送出 20 个大红包》《不到 800 字!政府工作报告极简版来了》《与你密切相关!2018 年,中国要干这 60

件大事》与2019年的《与你有关!政府工作报告送出20个民生红包!》《政府工作报告简版来了!只有600字》《@所有人:中国今年要干这80件大事》等标题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报道模式;除此之外,“好消息”“前所未有”“与你有关”等标题中的词语也成了《人民日报》报道两会的一种特有“标识”。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两会报道固有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在内容方面,《人民日报》不拘泥于会议新闻、时政报道的严肃的表达方式,采用趣味性的“软标题”,故事化的内容表达方式,亲民化的话题选择;在新闻体裁方面,消息、评论、深度报道等各占一定比例;在形式方面,《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将两会报道做得有“声”、有“图”、有“色”、有“趣”,并且几乎每年都会打造一款让受众津津乐道、让业界望其项背的H5创新,比如2018年的《一条来自人民大会堂的视频邀请》、2019年的《点击!你将随机给一位陌生人视频通话》都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也成为其独有的特色。

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注意力难以聚集,媒体必须站在人民的角上理解人民真正的需要,制作出受人民欢迎的新闻报道,才能体现新闻媒体真正的

价值。《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关于两会的报道独具特色,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报道模式和框架,也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真正将人民需要的新闻通过人民喜欢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体现了《人民日报》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同时也显示了《人民日报》媒体人较高的政治素养。

参考文献:

- [1] 本书编写组. 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8:96.
- [2] 周茂君. 全媒体新闻报道[M]. 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2018:10-11.
- [3] 本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171-172.
- [4] 本书编写组. 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8:79.
- [5] 钟媛媛. 传媒责任伦理研究[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99.
- [6] 薛可,余来辉,王宇澄. 媒介接触对新社会阶层政治态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J]. 新闻大学,2019(3):37.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fficial WeChat News Reports of *People's Daily* during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llustrating with th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2018—2019

WANG Xuan, QIN Shuangfei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As the largest party newspaper in China, *People's Daily's* report about NPC and CPPCC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other media. WeChat has a large number of users, and WeChat public account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many netizens and cadres to receive information, 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by the major medi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media lacking in the maintenance of WeChat public account, and its communication effect is not ideal. At present, official WeChat news reports of *People's Daily* about NPC and CPPCC has formed a set of mature propagation mode, its content and form are more and more humanized, more and more in line with the “three close to” principle, a bett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ty of the party spirit and universal,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to the depth and breadth concurrently, framework and innovation coexist.

Key words: *People's Daily*;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weChat public account; news reports

新媒体语境下国企宣传与舆论环境优化

白昌中

(中国远洋海运报社,上海 200127)

摘要: 自媒体的崛起带来了网络意见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国有企业与网民的接触方式更趋复杂。在网络空间中,舆论的走向更难以预测。这都给国有企业的舆论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国有企业新闻舆论管理部门亟需梳理并强化国有企业宣传预案,做好网络舆情的应对准备,及时控制二次舆情和次生舆情的发生,消除网络舆论可能产生的现实矛盾,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关键词: 国有企业;网络舆论;舆论引导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16

中图分类号: G206;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19)05-0085-04

随着互联网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空间已经发展成为整个社会舆论的主导性生成系统,如果网络舆论对国有企业不利,不仅影响企业的形象、扰乱企业的运营,更会给党和政府深化改革开放、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来一定的影响。新媒体时代做好新闻宣传,推动友好型网络舆论环境建设,国有企业必须在做好系统内部凝神聚力、谋求发展的新闻宣传之外,理解新媒体的运行逻辑,依据新媒体的传播特征做出有效的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

一、新媒体的传播逻辑及其对国有企业的影

就目前特征而言,新媒体主要是指以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为核心的数字化传播系统及其延伸性应用。处于活跃状态的新媒体主要是以微信、头条号,以及抖音等网络直播用户所支撑起来的自有媒体和社交媒体。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升,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用户不断增长,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喻国明教授早在2016年就明确提出:“毫无疑问,今天的网络舆论是我们社会的主流舆论。”^[1]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主体、内容,还是传播规则来看,网络舆论都与渠道集中、严格把关的传统舆论形态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并已经对整个社会舆论管理

体系产生了新的挑战。相比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影响,网络舆论环境的改变对国有企业影响相对较小,但也正在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数以亿计的自媒体带来的意见形态的多样化,使舆论引导工作更显复杂

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8.29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8.17亿,网络普及率接近60%。在社交媒体日益成为主导,自媒体平台日渐增多的情况下,个人、群体和组织都具备了通过自媒体和社交媒体陈述见闻和发表评论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出现,为我国已然存在的意见多样化、价值多元化提供了表达的出口,各种思想交织激荡的状态更加明显。而这种状态为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一是舆论引导工作很难识别引导对象,因为不同的媒体平台、不同的自媒体用户所处地域不同、阶层不同、需求不同、观念不同,很难判断它对同一件事情会有什么看法和意见。二是传统媒体背景下,舆论引导工作是抓大放小,即集中针对能够在新闻媒体上发声同时具有影响力的人群,交流情况、说明原因、达成理解,而那些不能借助媒体发声、不能直接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的群体的意见,则暂时被忽

收稿日期:2019-05-10

作者简介:白昌中(1980—),男,内蒙古巴彦淖尔人,硕士,中国远洋海运报社编辑部主任。

略,或者通过党政系统的内参等组织传播方式收集和處理。这是传统媒体时代传播成本高昂、覆盖率有限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但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現,使得众多网民有了传声筒、不同意见都可以利用自媒体传播,各种意见得以显露并扩散。也就是说,各种意见都有了声音,已经不能忽视。

上述现实情况对国有企业的新闻宣传带来的影响在于,它需要在新闻宣传层面关注新的领域。国有企业的新闻宣传,在传统上讲主要包括系统内宣传和对外宣传两个层面。系统内宣传主要是国有企业在本经营管理领域和职工队伍中进行的组织化传播,主要反映企业发展业绩、创新经验等方面的内容,其目标是进行内部信息交流并凝聚职工精神;对外宣传主要是在本企业生产经营和产品、服务所处国家、地区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媒体、行业媒体及日渐涌现的自媒体中,通过反映成绩、展示品牌和服务形象,达到服务企业發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作用。由于存在严格的把关,以上两个层面的宣传发动,基本都有效地控制在国企新闻宣传部门的管理之下,形成了成熟的惯例并能够很好地规避不利舆论的影响。但是,随着国有企业的产品、服务的社会影响力日渐壮大,国有企业资源分配的市场化程度也在增加,加之上市带来的信息公开要求,与普通网民的接触点增多,面临的网络舆论形势趋于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时代以通过控制主动宣传的内容和频率来影响舆论,在新闻宣传上更多以我为主的模式,在网络舆论时代已不适应形势要求。

(二)网络舆论的接触点更加复杂,需要国有企业做好接触点管理

接触点管理原为整合营销传播的关键概念,是指“用合适的媒介,通过恰当的手段,在正确的时间内与消费者进行品牌沟通”。抛去概念的营销性质,我们可以把接触点理解为新闻信息传播与受众发生关系,进而产生信息交流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所在。在传统媒体时代,接触点相对较少,状况相对单一,管理起来相对容易。这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资源分布相对不足,许多接触点缺少收集信息、表达意见并得以扩散的载体。这就导致传统媒体的接触交流是在固定渠道和层面进行,即使发生了在当今可能导致舆情的事件,也能够通过媒体的属地管理机制进行有效处理。但是在网络时代,分布广泛、无规律、多元的接触点正成为可能搅动网络意见市场的燃点。更加复杂的状况在于,每个人手中都有便携设施,接触点的信息到底是由谁传播出去、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出去,都非常难以察觉。比如,在某服务现

场发生的矛盾,即便当事人并不想将事情扩大,但是周边围观者却可能将其录制并上传到网络,进而引发人们的关注。这些都是以往新闻舆论管理工作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对于国有企业的新闻舆论管理工作来说,形势将更为复杂。因为各级党政机关还有传统的属地管理机制和专门的新闻宣传部门予以应对,而国有企业除了总部之外,接触点跨越了属地,下属单位往往没有足够的权限第一时间应对舆论形态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国有企业“走出去”的力度加大,其产品和服务不仅与国内网民接触频繁,在国外更为复杂和陌生的舆论环境中,新闻事件产生和新闻舆论形成的偶然性更强。它往往会毫无征兆地从某个事件中发酵,然后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像电光火石一般倾泻到整个网络空间,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何在网民接触点发现有利于品牌管理的事件,并规避不利于品牌管理的事件和舆论,都需要国企新闻宣传管理者具有极强的新闻敏感和舆论嗅觉,以及快速反应的能力,而这需要建设内部通顺的舆情反馈和应对机制。

(三)网络空间高度的融通性,降低了二次舆论和次生舆论产生的难度

如果我们把社会交往空间和网络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首先,它们的可进入性是不同的。社会交往空间要求交往者必须身在现场,如果有陌生人进入,交往活动就会暂时中断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对陌生人回避;而网络社交媒体的可进入性明显要宽容很多,除非做出特别设定,绝大多数都是开放的。其次,它们的可贯通性也不一样,现实空间由于对身体的在场具有明确的要求,使得交往者的空间位移需要耗时间甚至需要获得秩序的赋权,但是网络社交媒体的参与者往往坐在电脑前或者用手机在不同的交往空间随时切换。这就使得网络舆论与传统舆论之间产生明显的差异。一是网络舆论传播速度更快,这是因为它可以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同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中不同的自媒体之间流动,传播学称之为病毒式传播。二是它非常容易产生二次舆论和后续舆论。这是因为传统的舆论主体往往因为空间限制不能同步提供反馈信息,而网络社交媒体则因为网民随时随地的同步交流可使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提供更多的信息。近年来屡见不鲜的“人肉搜索”、新闻反转、议题转换往往就是在一个舆情出现后的较短时间里发酵产生的。

国有企业在新闻舆论引导过程中需要注意系统

化。如果某个接触点出现了舆论引爆点,往往就会导致连锁反应。比如出现了安全生产事故,网民在舆论热议中非常容易将猜测延伸扩大到管理者、管理模式、财务报表、环境影响、用工制度等,甚至通过人肉搜索发现更多引爆眼球和舆论的“料”,使新闻事件变得更加无法应对和控制。因此,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的基本要求,仍然是有效应对已经发生的舆论,同时尽快分析、尽可能预判并尽最大努力处理可能随之而引发的新问题、新矛盾。

二、新媒体语境下国有企业网络舆论环境的优化策略

(一)借用国家智力资源,做好有关国有企业运营的理论宣传

观察近年来发生的有关国有企业的较为典型的负面舆情,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除了一些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的案例属于网络舆情的直接引爆点外,多数有关国企的网络争论则属于“牵涉性舆情”,即在谈论其他话题时受到牵连而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比如民营经济融资面临困难时抱怨国有企业受到了政策优待、在民营经济进退讨论中不满国进民退、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讨论国有企业引发的问题、在深化改革的讨论中也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热点议题。这些牵涉性舆情的产生,固然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但也与当前社会的一些错误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市场经济应该以民营经济为主,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与市场经济存在矛盾。以这种错误理论为前提,国有企业在网络讨论中往往被先天地置于不利地位。

在我国,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即便是在国际上,欧美发达国家也都有大量重资产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在欧洲许多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但即使事实如此,要想改变国有企业的舆论形象,仍然需要下大力气扭转这种偏见,而这必须通过理论宣传来解决,因为理论宣传的根本就是要解决人们思想上的问题。

以此为目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资产管理部就需加大对国有企业优势和地位的研究,扭转经济学中对国有企业的不友好话语,同时转变社会看

待国有企业的态度。首先,国有企业新闻宣传部门可以邀请国内著名科研机构,设立科研基金,梳理有关国有企业的历史渊源和属性特征,出版有影响力的国有企业研究成果,扭转学界对国有企业的误解。其次,在新闻媒体多做理论宣传,说明国有企业对国计民生所做的贡献、国有企业在运营效率、服务质量等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创新,以及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感等层面的优越性,其目标在于扭转对国有企业关心和关注的群体的认知。最后,在新媒体平台如学习强国、网易公开课、知乎和逻辑思维等开设有关国有企业的专题讲座,将国有企业的真正形象传递给普通网友。只有扭转了社会认知的误区,国有企业才会摆脱在许多场合被质疑的地位。

(二)做好网络舆情的及时应对,避免二次舆情和次生舆情的冲击

德国学者贝克将后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认为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从技术—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财富,日益为生产风险的阴影所笼罩”^[2]。我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需求日益由物质层面的生理需求转向人身安全、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社会处于深刻转型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交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各级党政机关、企业组织甚至是个人来说,完全不出现舆情事件不太可能。这是现实情况,首先要给予正确、清醒的认识。但与此同时,这种现实也并不意味着当事者不需要努力控制舆情的发生和应对舆情的冲击,因为负面舆情必然会给当事企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小到企业产品、服务的市场认可和经营利润受到破坏,企业的股票价格波动、下跌,大到企业的品牌形象严重受挫,在国内外的外部发展环境遭到重创,更有甚者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网络舆论跨空间流动性增强、意见表达者空间贯通性增加的情况下,若应对不当,还会出现二次舆情和次生舆情。因此在预判舆情的同时,当事者更需要做好的就在于若出现了不利的舆情事件时,能够及时应对、提供事实真相、说明事件因果、消解舆论热度,以控制舆情的空间蔓延度和时间延伸性。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由于体量巨大、运营复杂且跨越了部门和地域,既很难控制住由于事件本身导致的原生性舆情的出现,更难以做到经营管理的完美化而完全回避次生舆情和二次舆情的出现。如何更好地应对网络舆论,就成为更直接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宣传部门善于借助大数据和舆情监测服务,日常性、主动性地分析舆论

压力,预判舆论风险,有针对性地做好日常运营的管理工作。在网络舆情发生后,有能够快速反应的成熟预案和操作规程,有一支专业应对网络舆情的团队,第一时间分析核心议题,及时公布权威信息,全程接受主流媒体和公正、客观的新媒体的采访和监督,通过诚恳、公开透明和充沛的正面信息投放,最大化地消除网民误解和疑虑,降低舆情热度,尤其要避免因小失大,即不想揭露当前事件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承担的责任,结果导致事情越闹越大。

(三) 严格经营管理,借助网络舆论预判修补问题

张涛甫教授将社会风险分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硬风险和社会舆论引发的软风险两类,而网络舆论应对则据此可以分为硬应对和软应对两种。硬应对是指根据网络舆论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解决矛盾化解危机,软应对则是对网络舆情过分敏感,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网络舆论上而忘记了从事实生产与服务。软应对实际上歪曲了网络舆论治理的本义,因为舆论是社会的皮肤、是现实生活状态的晴雨表,它由现实生活状态所引发,而它的化解也应由社会生活的改善而消除,因此,网络舆论治理的本质是通过网络舆论创新社会治理手段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现在却被很多单位变成了治理舆论本身。曾润喜教授因此提出,“网络舆情治理的最高层次应该是‘治未病’”,^[3]即控制住社会风险,其次是从舆论的表达中发现和解决社会深层问题。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应当将“治未病”和“硬应对”置于网络舆论应对的首位。这就要求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制订经营管理制度,做好科学决策控制风险,因为若是发生重大漏洞,在网络状态下很难不被舆论关注;它还要求国有企业管理者紧抓生产安全,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条件下,生产安全特别是事关网民生活的安全问题几无遮蔽可能;国有企业管理者还需要提升产品品质,在短缺经济时代已过去、市场交易全球化状态下,产品质量对比鲜明,产品质量问题已成为网络舆情事件爆发的核心领域;国有企业管理者需要强化服务管理,保持服务效率提升服务水平,这是国有企业与消费者产生接触的直接方式,在智能手机普及的当下,服务质量往往会成为网络舆情的引爆点。要知道,在网络时代,多数舆情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社会生活中现实问题引发的,而非言之过也。

参考文献:

- [1] 喻国明. 网络舆情治理的要素设计与操作关键[J]. 新闻与写作, 2017(1).
- [2] [德]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 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04: 96.
- [3] 曾润喜. 网络舆情治理的关键是“治未病”[J]. 中国传媒科技, 2018(1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Publicity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and Optimiza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BAI Changzhong

(China COSCO SHIPPING News, Shanghai 200127, China)

Abstract: The rising of the “We Media” has brought abou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online opinions, and traditional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have more complicated ways on connecting with the internet users. In cyberspace, the direction of the public opinion is harder to predict, which brough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the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for the news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in the state – owned enterprise to reorganize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plan for the enterprises, preparing for the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nd controlling the occurrence of the secondary public opinions and eliminating the realistic contradiction, which create a good extern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for the state – owned enterprise.

Key words: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新时代背景下教育信息化推动地方本科院校发展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周芬芳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新时代,党和国家部署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战略,要求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在对教育信息化大背景分析的基础上,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通过对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估,搭建以教育信息化推动地方本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四梁八柱”框架,从信息化促进学校立德树人、智慧教学、智慧服务、教育治理四个主要方面进行探索。

关键词: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地方本科院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17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89-06

一、新时代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

党的十九大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国教育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深水区。党和国家部署在2035年前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其长远意义在于创新教育服务业态、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作为河南省省会城市的地方本科院校,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旗帜,遵循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以教育信息化作为创新办学、培养人才的征程中披荆斩棘的利器,培养和输出大量高质量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服务郑州市和河南省的社会经济发展。

(一)新时代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地位

自1978年教育部批复建立中央电教馆,中国的教育开始了信息化征程。2010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将“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作为六大保障措施之一专列一章,并明确指出:教育信息化是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1]

2019年国家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作为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纲要性文件,为新时代我

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整体目标和要求,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并重点部署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陆续出台了本地区的教育现代化规划和本区域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政策措施,河南省也从2018年底启动了规划和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

2018年4月教育部颁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指出,教育信息化已经步入以创新为标志的2.0时代,教育信息化从1.0升级转型到2.0,就要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开启智能时代教育的新征程。^[2]落实2.0行动计划要以紧紧抓住新时代的教育变革趋势并注重“互联网+教育”的理论创新为发展核心,以立足“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服务新模式作为基础模式,采用新型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教育大数据等)与教育教学进行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最终实现根本目标,即培育新时代具有创新创造能力的引领性人才,最终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二)河南省以评估促进高校信息化发展

河南省在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教育信息化2.0

收稿日期:2019-07-06

基金项目:2016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资助计划“基于云平台的高职移动学习研究”(16A880045)

作者简介:周芬芳(1978—),女,河南郑州人,教育技术学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信息化应用和智慧教学环境。

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在全国首开先河,制定了《河南省高校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信息化校园建设所必须具备的基本信息化设施条件、公共信息基础支撑平台、平台与信息系统等产生或承载的数据流和资源流、围绕教育治理和育人过程开展的智能化信息服务、基础保障措施及要求和安全保障等六大项制定了详细的标准规范。指标体系除了以上6个一级指标外,还有17个二级指标(详见表1)、51个观测点和200项观测点描述,也包含一些技术和概念上超前的引导性参考指标,指标体系的整体可操作性强。

表1 河南省高校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试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设计分值	分值小计
基础设施	网络设施	27	80
	云模式	16	
	智能环境	21	
	基础运维	16	
基础支撑平台	基础服务平台	50	90
	基础数据平台	40	
数字资源	数字资源建设	60	80
	数字资源应用	20	
智慧教育	智慧教学	48	150
	智慧服务	52	
	智慧管理	50	
治理体系	领导力	51	100
	执行力	49	
网络信息安全	网络基础安全	36	100
	数据安全	24	
	网络隐患及事件处置	20	
	网络安全舆情	20	
	总计		

河南省教育厅组织全省信息化专家在2018年底和2019年春分别对河南省本科院校与专科院校进行了信息化评估,推进各高校在“摸底子、堵短板”基础上,创新信息化发展理念,转变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方式,促进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笔者所在单位也通过评估厘清了现状,找到了学校信息化的短板和提升目标,以评促建、以评促用的效果良好。

二、我校信息化建设现状

(一)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信息化现状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是2016年在原中州大学的基础上,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截至2019年4月,现有教职工1137人,7个学科门类,本科专业25个,专科专业44个。有省级重点学科1个、省级教学团队4个,^[3]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个。近年来,学

校以“一二三四”工程为抓手,“以人为本、以生为本、以本为本”办好本科,以信息化为支撑,全面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整体推进地方本科的发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自2001年开始建设校园信息化,期间作为2015年河南省网络学习空间试点学校和2016年郑州地方高校信息化试点高校,进行了数字校园的深入建设,2017年开展了智慧校园一期工程。目前,校园上网认证用户16131人,有各类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通识课以及MOOC课程382门,省级在线开放课程7门。

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在扎实地推进,保障了智慧校园建设的顺利进行与效果发挥。信息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建有两个标准B类网络中心机房,四校区网络互联,主干万兆,桌面千兆,完成了有线、无线校园全覆盖。建设有V-cloud私有云,核心服务器基本实现虚拟化,大部分业务应用均迁移至私有云内运行。学校教室全部实现多媒体化,可满足多媒体教学需要,并建有智慧教室若干,可实现常态录播与智能感知。学校图书馆实现自动化智能管理,实现自助查询、借还、预约、智能上架、生物感知门禁等。

(二)信息化发展短板分析

逐条对照评估指标,我们发现了学校在信息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些“短板”也是诸多地方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共性。

1. 治理体系

学校设有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然而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定位一直是教辅单位,职能权责局限于为其他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在协调与部署信息化工作时难度较大,管理职能较弱。

在领导力和执行力两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如信息化未实现归口管理,信息化项目工作机制不健全;没有专门的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人才队伍的激励制度与借力机制不够灵活;规章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化经费投入不够稳定;信息素养提升的培训不够制度化,对信息化应用/教学能力考核激励机制教弱;合作共建机制欠缺。

2. 基础支撑平台

基础支撑平台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校内信息资源的利用率有待提高;信息化自助服务、业务流程平台及虚拟办事大厅(网上办事大厅)还需进一步完善,跨部门、跨系统的业务系统应用较少;学校层面的大数据应用面较窄,仅对某些院系学生有为数不多的应用(学生职业与成绩分析)。大数据平台、大数据开展

支撑学校决策分析的应用急需建设与完善。

3. 资源建设与智慧教育

多个教学平台并存,没有统一管理平台,缺少全校范围的学习平台,试题库与资源库建设还需加强,图书馆利用率还有待提高;虚拟仿真实验室等硬件条件能满足科研与教学需求,但虚拟仿真实验课程较少,与教学结合急需加强;科学运算资源有待建设和应用。

教学模式还未完全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作为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应用于教学的机制还未形成,信息化与教学融合程度不够。大数据在学校层面做到全方面支持决策、服务决策还很不足。

4. 网络安全建设

在信息化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有:重要数据灾备系统不完善,第三方网络的学生上网数据保存方面存在安全漏洞。技术层面上在防篡改、预警、报警、日志方面需要加强。

三、以评促建,提升信息化发展水平

通过评估发现问题后,学校领导高度重视,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针对短板逐步弥补,硬件软件一起补,同时强化特色优势,一步一步将信息化工作做好、做扎实。

(一) 加强治理体系建设

2018年调整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文件中,强化了CIO的作用。领导小组由书记、校长担任组长,主管信息化的校领导担任常务副组长。为推动CIO制度落实,专门制定了CIO工作制度和职责,由主管信息化的副校长担任CIO,统筹学校各部门信息化建设,进行统一的规划、统一的管理与协调部门间的配合。

理顺信息化建设部门职能,将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作为专职机构,具体协调与推进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学校以校发文件的形式对中心职责进行强化,增加了统筹规划、统筹管理、顶层规划和协调各部门的职能,但在实际工作中转变职能还需要时间。

2018—2019年,为健全管理制度,学校相继发布了18份关于信息化管理的规章制度与管理办法,从归口管理到数据治理,从专家委员会章程到信息员的管理办法,涉及机构、人员、项目管理、系统应用、门户网站、系统应急处理、数据安全等方面,从制度上规范信息化工作的开展。

(二) 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建设

为保障资金稳定投入,以学校信息化建设专项

经费为主要投入,以申请立项、校企合作建设等多种方式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将常规预算、专项投入、自筹资费等方式相结合,根据学校发展形势和师生需求,优化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经费比例,并逐步加大信息化运行经费投入。

人才队伍也是目前高校的一个短板,在短期人才不到位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学校+公司+运维+学生团队的方式,对管理、运维、服务等各环节起到支撑。今后不断加大对信息技术管理及服务队伍的建设力度,增加技术岗和管理岗职数,建立一支专职的信息化技术支持服务队伍,人员规模至少达到在校师生总数的1%。完善队伍的专业结构,加强技术队伍人员的培养与培训,通过学习深造,提高人员业务素质 and 水平。同时加强对学校各个关键部门的信息员队伍的建设管理,争取将兼职信息员变成专职信息员,推动信息化与各部门业务的深度融合。

(三) 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与安全防护能力

根据国家网络安全法与信息安全管理的要求,将网络安全提升到政治层面,网络安全与消防安全同等重要,出现问题“一票否决”。加强了制度建设,针对网络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网络舆情、数据安全等方面制定了多项安全制度和管理条例,建立具有管理权的信息安全小组执行机构,来执行信息安全制度、分配安全职责并协调组织内部信息安全工作的实施。

针对网络安全责任与安全隐患,及时界定安全责任边界,落实安全责任制。党政一把手是网络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各部门领导是直接责任人,签订网络安全责任书,层层分解,责任到人。抓好常态化人防、技防和网络安全问题的应急处置工作,形成规范化网络安全管理机制,落实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的要求,增强系统安全性。督促第三方网络的管理公司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消除网络安全存在潜在风险。

(四) 开展应用推广和考评,加强评价

以《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为抓手,整理出学校面向校内部门/学院的信息化考核指标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将对部门/学院的信息化考核列入年度考核中,同时对网站、信息员、应用系统等进行考评,促进应用推广,促进教师教学改革和学校管理方式的变革。

教学创新不仅仅是改革技术的应用,更要改变教师已经养成的传统思维形式和教学模式,势必面临巨大阻力。学校通过制度建设要求教师必须进行教学创新融合,通过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和奖惩措

施,鼓励和奖励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融合创新的教师,用“向上拉”+“从下推”的方式,促进提高教师自主进行教学研究和创新的能力。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在利用信息化深入促进教学改革、教学诊改方面还需要静下心来逐步推进,在线学习、在线考试要扎扎实实地做,以取得更显著的课堂改革效果。教学大数据的采集要想清楚要哪些数据,如何采集需要的学习大数据,数据挖掘和分析模型以及数据展示要结合教育教学实际,才能做到全方面支持决策、服务决策,为师生提供教学和学习的预警帮助。

四、信息化推动地方本科建设的突破点

在新时代背景下,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校园信息化2.0发展规划在顶层设计时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奋斗目标和指导思想,以《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为行动方向和路径,以《河南省高校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试行)》为抓手和检验标准,深入结合学校的发展特点,搭建以信息化推动地方本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四梁八柱”(如图1所示),其中的“四梁”——立德树人、智慧教学、智慧服务、教育治理是我们的突破点和重点努力方向。“信息化基础设施”和“八项支柱”的内容已涵盖在评估指标体系中,故不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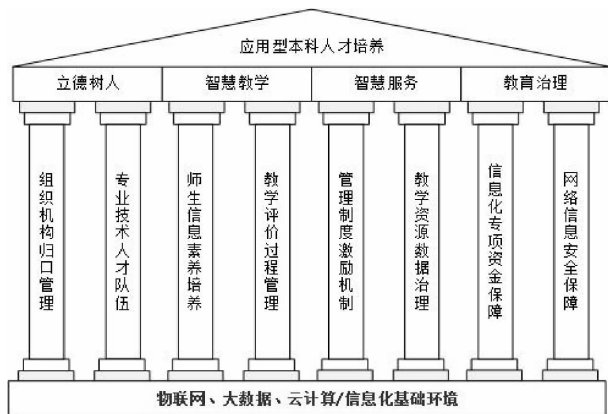


图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信息化建设的“四梁八柱”框架图
(一)以信息化促进立德树人

1. 立德为先

《中国教育现代2035》中提出8个“更加注重”,第一条就是更加注重“以德为先”。本科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告诉我们,要坚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学校通过网络平台及时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努力探索思政进课堂的方式,打造含金量高的思政课,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思想进头脑。与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签约共建马克

思主义学院,集中市委宣传部和学校力量做好思政工作。学习上海高校思政课程经验,倡导各科教师以“课程思政”为载体,把“家国情怀”带进课堂,讲好“中国故事”“民族故事”“身边故事”,把价值观念和塑造融入所教课程中,实现“科学武装头脑,人文滋养心灵”。在课堂上利用信息技术加强与学生的交流,讨论型、辩论型的课越来越多,在线学习平台上交流模块上闪烁着师生思想交流碰撞的火花。逐步建设由在线课程、微课、视频等组成的思政课网络资源库,开设线上、线上线下混合的思政选修课。在提升思政课教师信息化能力素养的基础上,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实现思政课网络化考试的全面实施。

2. 树人为本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需要更多主动适应信息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教育必须重新思考在人的智慧与机器智能结合的环境下教什么和学什么。变革教育首先需要变革教学。学校在迎接本科合格评估的过程中,重新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四个转变:教学方式向以学为主转变,教学资源供给方式向以学定教转变,教学空间向线上线下结合转变,教学评价向以数据驱动的过程评价为主转变。^[4]利用智慧教室环境、翻转课堂模式、SPOC等途径,在学习过程中锻炼学生逐步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牵头建立河南省高等教育信息化2.0建设改革创新联盟、河南省应用型本科院校教材建设联盟,联盟内高校间资源共享,MOOC课程互相开放、教材互相开放、学分互相认证,学生可以在线学习外校的课程,取得学分,锻炼了学生的学习能力。以人工智能、信息化教学作为教师培训手段,真正将教师信息化素养培训落到实处,无形中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二)以信息化促进智慧教学

教育现代化首先是教师现代化,必须先提升教师信息化素养。针对实际教学应用中仍存在着师生对信息技术不想用、不会用、形式上用和实际上不用等现象,《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要求,实施“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随着智慧教室的建设和多种新技术进入课堂,首先要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水平,培养教师利用学科教室、未来课堂等现代化的智慧学习环境进行教学的能力。教师借力信息化手段,通过智慧的教、学、管、评,基于大数据进行面向学生个体的学情分析和教学改进,最终打造本科教学的“金课”,淘汰

“水课”。

对于信息化职能部门来说,在新校区规划建设时要更注重与教学管理部门结合,按照国家智慧教室建设规范构建易于使用的智慧教学环境,建设拥有讨论交互系统、AR/VR 教学、物联感知系统、远程求助系统、中央集控系统、课堂录播(微格)系统、信息查询系统等功能的智慧教室。关注和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学习、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从而实现智慧教学,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

(三)以信息化促进智慧服务

《2.0 行动计划》提出,要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优化教育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深化教育大数据应用,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的支撑体系,全面提升教育管理信息化支撑教学业务管理、校务服务、科研服务等工作的能力。

2018 年,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开展了信息系统应用推广年活动。加快数据中心的建设工作,初步完成常用系统的统一认证,打通了各个系统的底层数据,进行统一信息门户建设,并具备了对数据初级的统计和分析能力。作为地方高校,资金比不上一流大学充裕,对于应用系统的购买,要基本具备应用推广条件再购买,要把买到的先用好,逐步增加业务系统。

目前学校正在以为用户提供智慧服务为目标,加速统一门户和统一平台建设,解决跨部门、跨业务系统的协同问题。在服务于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发展和服务于教师德能勤绩的基础上,打造方便易用的移动校园一站式服务大厅,整合企业微信,整改服务流程,为师生提供个性化服务,用信息化手段来推动学校管理的创新,用流程监控方式提高业务部门办事效率。对各业务系统长期使用积累下来的数据进行分析,提供业务优化手段以改善学校管理现状。借鉴其他高校的“三张清单”形式,做到事项清单标准化、办事指南规范化、审查工作细则化和业务办理协同化,实现“一张表管理”和“一站式服务”,切实让师生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增强用户获得感。目前已实现的功能有:成绩查询、课表查询、校历查询、电话查询、工资查询、维修申报、招聘查询、录取查询、问题反馈等,后续还将深入业务部门进行流程的调研,持续推出更多的线上跨业务流程的服务和决策支持服务。

(四)以信息化推动教育治理

《2.0 行动计划》中提到,“加快形成覆盖各级各类学校、学习者和教与学全过程的教育管理与监测

体系”,“推进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治理方式变革”,“构建安全有序的教育信息化环境,加强标准建设,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确保网络和数据安全”。^[5]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在 2017 年启动了智慧化校园项目,以“统一数据标准、统一身份认证、数据交换、智能报表”四大应用为重心建设数据中心。在参照教育管理信息化高等学校管理信息标准的基础上,搭建了学校的统一数据标准和数据规范,实现了认证、业务数据和共享数据的统一编码。

建立数据使用和管理制度,出台了学校网络数据管理办法,以“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为目标,完成校务信息系统整合工作,打破数据壁垒。文件明确要求学校所有应用系统必须接入数据中心,为数据中心提供唯一的、准确的数据,接口开放、共享,各系统对自身数据负责。以制度促进数据分级分层有效共享,避免数据重复采集与重复维护。数据中心的建设完成,加强了不同管理应用之间的数据交换和共享的力度。

通过建立双活存储系统和未来 1—2 年的数据治理工作,提高学校整体工作效率,提升学校数据整体的安全性和质量,为管理精准化、决策科学化打下坚实的数据基础。加快数据中心的决策分析平台建设,支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实现诸如对学生画像、精准资助、学习预警、学生安全预警、就业支持等教学管理场景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最终实现用大数据进行科学决策。

五、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要办好办强,要争创一流本科专业,离不开教育信息化的有力推动。本文在研究政策背景的基础上,结合河南省高校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探索了地方本科院校信息化普遍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提出了教育信息化推动地方本科高校建设的“四梁八柱”框架,并针对信息化促进立德树人、智慧教学、提供个性化服务、完善教育治理方式进行了探索。研究立意角度较新,但也浅显和粗略,今后将对信息化推动地方本科高校建设的“四梁八柱”框架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 [1]南国农.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新使命[J].电化教育研究,2011(12):10-12.
- [2]张臻.教育信息化 2.0 背景下在线开放课程应用模式变革与思考[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9(1):17-22.
- [3]蓬勃发展中的郑州工程技术学院[J].中国高等教育,

[4] 曹阳,郑伦楚. 通识教育改革进程中新生研讨课的创新

探索与效果评估[J]. 中国大学教学,2019(1):56-60.

(责任编辑 许峻)

[5] 雷朝滋. 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开启智能时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lleges Promoted by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Taking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ZHOU Fenfang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Management,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cceleration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s strongly requir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taking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we find the shortcomings of informationization construction, adopt a series of measures, and build a “four beams and eight pillars” framework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olleges and personnel training with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Meanwhile, the function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in promoting the moral cultivation, intelligent teaching, intelligent service and educational governance are explored.

Key words: new era;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local colleges

(上接第 79 页)

[25]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5〕40号[EB/OL]. [2019-07-07].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7/04/content_10002.htm.

[26]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摘要)[C]//钱莲生. 中国新闻年鉴. 中国新闻年鉴

社,2015:17.

[27] 邹海涛. 对融媒体时代“内容为王”的思考[J]. 今传媒, 2017(11):150.

[28] 洪杰文,杨菲. 理念、技术与内容:新媒体技术背景下传统媒体转型的“三驾马车”[J]. 新闻前哨,2015(2):6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ome Views on Promoting Media Convergence

CHEN Guojian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 concept that has not been widely recognized so far, and related theories, strategies and predictions are also controversial. Thus, it can be neither quoted regardless of academic traditions nor imitated in different fields.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top priority of promoting media convergence is to achieve the mutually interactive, complementary and dissolvable relationship among internet and mass media like newspapers, radio and television or even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 order to seize the highland of public opinion with its authority and high-quality content. The prime task is to prepare for the digital work in term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data platform, so a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Internet +” with high-quality content.

Key words: media convergenc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news media; traditional media; “Internet +”

智慧教室环境下高校情景教学模式的变革路径探究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胡 钰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情景教学模式在高校已经实施很多年了,但是在科技和时代的进步面前,在学生学习能力不断增强面前,情景教学模式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而智慧教室的建设和使用,为高校情境教学模式的变革提供了一些可能。文章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探索在智慧教室环境下情景教学模式可能会发生的变革,以期能为高校教学模式的探索、教学研究、建设与实践应用提供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参考。

关键词:高校;智慧教室;情景教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18

中图分类号:G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095-05

一、高校情景教学模式现状

(一)现状

情景教学法(也称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1],其核心在于激发学生的情感。

情景教学法是20世纪30年代由英国应用语言学家提出,刚开始主要应用于幼儿学习和教学过程中,后来发现这种方法在中小学教学过程中效果也非常好,慢慢扩展到大学和其他很多培训机构。到上个世纪末,使用情景教学的范围越来越广,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情景教学模式,一般来说,采用“情景教学”,可以通过“感知——理解——深化”三个教学阶段来进行^[2]。感知阶段,创设画面,引入情景,形成表象;理解阶段,深入情景,理解内容,领会感情;深化阶段,再现情境,丰富想象,深化内容理解。

目前公认的情景教学六大创设途径也即情境教学的六大要素,即生活展现情境、实物演示情境、图画再现情境、音乐渲染情境、表演体会情境和语言描述情境^[3]。我国高校的目前情景教学主要应用在某一门具体的课程之中,比如排球课、音乐课、心理学课程等等;或者使用某一个情境教学途径,很少能够全面使用,而且也不具备全面和立体使用的条件。

(二)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们使用的情景教学法最多的是语言描述情境,表演体会情境偶尔会用,其他的都比较少。其他情境创设的方法都很好,可是在高校情景教学中使用起来成本太高,有些根本不具备实施条件。

科技的进步带来科技产品的快速迭代和更新,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学生已经被深深吸引。教师在课堂上能使用的情境创设途径有限,大部分使用的都是语言创设情境和PPT制作的简单背景,调动的只有学生的视、听觉,而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情感,很难抵得过手机的魅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情景教学模式的变革没有跟上时代的

收稿日期:2019-07-02

基金项目:2018年度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基于智慧教室开展《市场营销》课程情景教学的实践研究——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186120017)

作者简介:胡钰(1977—),女,河南永城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和教学改革研究。

发展,再沿用原来的情境创设方式,可能就会被淘汰。因此,高校的情景教学模式呼唤新的变革。

二、智慧教室环境下教学模式的构建

(一)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智慧教室的建设情况和构建模式

1. 智慧教室建设概况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过多次的考察和方案比较,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学校自身的特点,把智慧教室并入智慧校园的规划和建设中。学校在 2016 年进行了“智慧校园”的顶层设计,并于 2017 年启动了“智慧校园”的具体建设。智慧教室的一期规划是建设 16 个智慧教室:英才校区 7 个,即 1—6 号楼每个教学楼一个,外国语学院在原来实验室的基础上,单独增配一个外语智慧教室实验室;金河校区综合楼 3 个,特教教学楼 6 个。

2. 智慧教室的构建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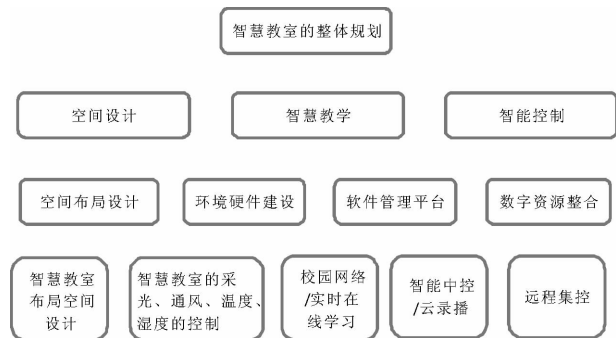


图1 智慧教室的整体规划内容

3. 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模式框架结构

智慧教室的建设目标有三个:一是学校层面,实现精品课、评优课、公开课的实时录制和存储,实现校园网和因特网上直播教学,实现学校教学资源库建设,对学校的教学状况进行信息化教学监督,提高学校教学管理效能,增加学校知名度。二是教师层面,实现教学自我反思、自我评价、教师备课管理;课堂教学研究、教研活动开展、教学活动管理等。三是学生层面,学校日常教学能通过录播系统自动上传生成网络课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可以不限时空的在线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学生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网络平台,提供学生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

(二) 智慧教室下的 SMART 教学模式

1. 智慧教室的概念

在网络技术、富媒体技术、传感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充分发展的时代,高校教室环境应是一种“能优化教学内容呈现、便利学习资源获取、促进课堂交互开展,具有情境感知和环境管理功能的新型教

室”,这种新型教室就是智慧教室,是一种典型的智慧学习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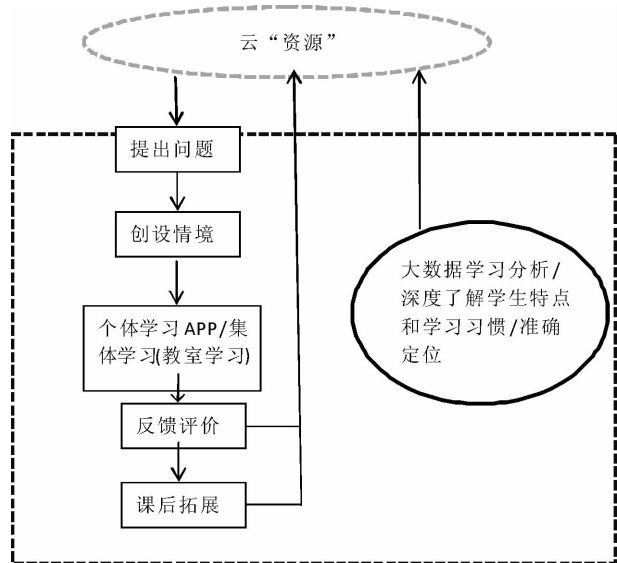


图2 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模式框架结构图

智慧教室的“智慧性”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的优化呈现、学习资源的便利性获取、课堂教学的深度互动、情境感知与检测、教室布局与电气管理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概括为内容呈现(Showing)、环境管理(Manageable)、资源获取(Accessible)、及时互动(Real-time Interactive)和情境感知(Testing)五个维度,简称为“S. M. A. R. T.”,这五个维度正好体现了智慧教室(Smart Classroom)的特征,可称为“SMART”教室的概念模型^[4]。

2. SMART 智慧教室教学模式

我校智慧教室的构建模式借鉴了传统的 SMART 模式,在此基础上突出了情景教学和学生能力培养模块,创新了 SMART 智慧教室情景教学模式(见图 3)。智慧教室的“智慧”体现在学生自主学习(S:Self-directed)、学习兴趣的激发(M:Motivated)、学生能力的培养(A:Ability)、即时互动(R:Realtime interactive)和情景教学(T:Teaching context)的呈现。

(1) 学生自主式学习(S: Self-directed)

按照教师的授课要求,智慧教室环境下要求学生事先要预习课程,查阅相关资料,提出一些问题,因此学生必须自主式学习才能满足智慧教室中“学”的要求。

(2) 学习兴趣的激发(M: Motivated)

智慧教室的授课方式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教室,需要学生保持较高的专注力和兴趣点,课堂互动、小组讨论和头脑风暴都是接触点,都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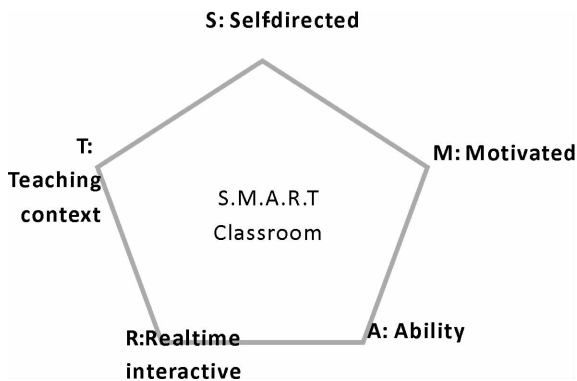


图3 智慧教室 SMART 模型

(3) 学生能力的培养 (A: Ability)

自主式学习方式加上学习兴趣的激发,在此基础上,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已经初步具有基础了,如果再加上教师的适时引导和情境教学的环境创设,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会更上新台阶。

(4) 即时互动 (R: Realtime interactive)

“即时”互动主要表现在智慧教室支持教学互动和人机互动。操作页面简单,功能明了,能保证互动过程流畅,能实现教学过程的记录和直播,为以后学生的学习行为分析提供基础数据,从而为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评估提供支持。

(5) 情景教学 (T: Teaching context)

智慧教室可以创设很多教学情境,这是智慧教室最“智慧”之处。通过双屏或多屏显示呈现教学内容,其中一个可以呈现教学内容,另外一个可以进行情境展示,还可以变成交互式白板,还可以手机投屏,实现即时互动面对全班同学展示,让大家都能看到彼此的想法和选择,增强了课堂的趣味,培养了学生的专注力和兴趣点,提高了教学效果。

三、智慧教室环境下高校情景教学模式变革的路径选择

(一) 情景教学模式的创设途径

1. 语言描述情境

情境教学十分讲究直观手段与语言描绘的结合,但在很多情况下,直观情境创设比较难实现,因此语言描述情境反而是使用频次最高和范围最广的情景教学模式。教师以语言描绘创设情境,对学生的认知活动起着一定的导向性作用,语言描绘提高了感知的效应,情境会更加鲜明,并且带着感情色彩的语言会作用于学生的感官,主观感受得到强化,从而激起情感,进而引导学生进入特定的情境之中。

2. 实物演示情境

以实物为中心,简单准备必要背景,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用以演示某一特定情境。例如在讲解《市

场营销》课程关于定价部分的内容时,准备5个不同颜色和款式的水杯,以及五种不同的饮品(绿茶、红茶、红酒、咖啡和水)。通过不同的搭配,讲解定价的原理与技巧。

3. 生活展现情境

把学生带入大自然,带入社会实际活动中,从生活中选取某一个或者几个典型场景作为学生观察的客体,把教学内容鲜明地展现在学生眼前。

4. 图画再现情境

图画是展示形象的重要手段,用图画再现教学内容,实际上就是把教学内容形象化。教材插图、挂图、剪贴画和符合教学情境的简笔画等都可以用来再现教学内容情境。

5. 音乐渲染情境

音乐语言是非常奇妙的,它以独特的旋律、节奏,塑造出音乐形象,把听者带到特有的意境中。目前在高校的情景教学中,音乐类课程使用比较多,其他课程的教学使用非常少,几乎没有。

6. 表演体会情境

情境教学中的表演有两种:一是进入角色,即“假如我是教学内容中的××”;二是扮演角色,是担当教学内容中的某一角色进行表演。由于学生自己进入、扮演角色,教学内容中的角色不再是课本上的插图,而是活生生的身边的人物。因此学生对教学内容中的角色会产生亲切感,通过角色扮演会加深内心体验。在讲解《市场营销》课程营销环境时,会找6—7个同学,由一个同学扮演企业经营者,其他同学扮演企业经营遇到的各种环境,然后企业该怎样制定对策,学生非常感兴趣,而且对教学内容的理解非常深刻。

(二) 智慧教室环境下情景教学模式的变革路径

在目前的情景教学过程中,原来的多媒体教室已经不能满足情景教学创设情境的需求了。智慧教室的规划建设与 SMART 教学模式的构建,突破了原来多媒体教室的局限,为高校情境教学带来了发展契机,为此把二者结合起来,具体分析情景教学模式可能的变革路径(见表1)。

1. 情境创设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变

传统的情景教学模式是老师在讲台上教授知识,教师采用语言或者多媒体课件为学生描述一个情景,让学生想象一个场景。在这个被动创造的情景中,学生是被动的,很难体验到老师塑造的这样一个情景,故很难做到“身临其境”,那更不能体验到“心临其境”的状态。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力量,可以在保证教学任务完成的情况下,让课堂变得“生动”

起来。智慧教室借助于现代科技,借助于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借助于VR成像技术^[5],知识和信息并不是安安静静地躺在书本上,而是可以“动”起来,以更形象和生动的表现方式呈现在课堂上,实现了情景教学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变。

表1 智慧教室环境下情景教学模式的变革路径

项目	传统的情景教学模式	智慧教室下的情景教学模式
情景教学(T)	静态/教师单人表演	动态/多媒体场景设置/声、光、电的场景模拟
教师教学(T)	主导地位	引导地位
学生学习(S/T)	被动学习	主动学习
思考方式(S)	教师引导	主导思考
信息传播方向(R)	单向传播	多向传播
培养目标(A)	知识传授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一体化
学习模式(M/S)	个体学习	团队学习

2. 教师教学由“主导到引导”的转变

传统的情景教学模式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占主导地位,教师要讲述一个场景,让学生想象一个场景,教师主导着整个教学过程。在智慧教室环境下,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再是主导者,而是要根据教学内容提出具有思考意义的问题,借助一定的场景布置或者情景设置,引导学生去思考和讨论,引导学生争辩,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得出结论。

3. 学生学习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传统情景教学模式下,学生是被动接受知识和信息的输入,在课余还要继续强化知识的输入和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智慧教室环境下,知识和信息的输入改变了路径,不再是教师在课堂上填鸭式的灌输。在授课之前,教师已经布置了问题,需要学生自己查阅相关资料,才能回答布置的问题,不主动学习就回答不了问题,在课堂上就无法进行学习的环节。不主动学习,就不能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和争辩,也参加不了小组讨论作业,也无法对别的小组的作业发表意见。智慧教室推动了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学生角色的变革,实现了学习效果的较大突破。

4. 思考方式由“引导到主导”的转变

传统情景教学模式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和思考。在智慧教室环境下,原始问题由教师提出后,如何解决问题全靠自己 and 小组成员的主动积极思考^[6];在课堂讨论和争辩环节中,要针对问题的解答提出解决方案,而且在小组讨论中既要能对别的小组的问题或者回答提出质疑,还要能回答别的小组提出的疑问,如果没有主动思考和深入研究问题和相关知识资料,是不能完成这个学习环节的。

5. 信息和知识流传播方向由“单向到多向”的

转变

在传统情景教学模式下,大部分信息和知识是由教师向学生流动的,教师占据着信息流的主导地位。在智慧教室环境下,信息和知识不仅通过教师流向学生,还可以通过智慧教室构造的音频、视频、虚拟环境、场景模拟等流向学生;所有人在网络的平台上是平等的,知识和信息既能从教师流向学生,也能从学生流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信息的流向是多向的,不同的问题和情景会激发师生不同角度的思考,互相借鉴、互相质疑、互相学习,教学相长将是新的信息和知识流动带来的福利,这是传统教学模式可望而不可即的状态。

6. 培养目标由“知识传授向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一体化”转变

传统情景教学模式中,教师主要教的是知识和信息,由知识到能力的转向则需要一个内化的环节,这个内化的环节需要学生自己深度的理解、对话、讨论、实验、实践和再学习再内化,循环往复几个回合,知识可能才能转换为能力。智慧教室环境下,能力培养从一开始就进入了角色。教师布置的课前作业就需要学生带着问题思考,如果没有一定的学习能力是无法进入问题解决环节的;在搜集资料环节中,如果没有一定的电脑操作能力和网络使用能力,就不可能完成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在准备问题答案过程中,如果没有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就无法完成答案的整理工作,在讨论环节就不能很好的参与讨论,也不能很好的回答别人的质疑。智慧教室环境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是一体的,二者无法分开。

7. 学习模式由“个体向团体”转变

传统情景教学模式下,教师上课虽然是按照班级来上,但是有些学生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认真复习;而有些学生上课凑数,下课更不复习。考试面向的还是学生个体,学习终究是个体的事情。智慧教室则打破这样的格局,除了签到和个别问题的抢答,课程的其他环节都是以小组的形式进行的。课前作业要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课堂讨论以小组形式进行,课后作业的准备和展示也是以小组形式进行,学生个体融入一个个小组,在每次的学习和讨论过程中,互相磨合互相学习,团队精神由此而得到培养。

四、智慧教室环境下实施情景教学模式变革引发的思考

(一) 为学校的教学管理提出了挑战

传统的情景教学模式下,教学主要是由教师主

导,是教师的个人教学行为,是教学艺术,基本上不涉及教学管理方面的变革。智慧教室环境下,情景教学不再是教师个人的教学行为,而是教学管理整体事务,教师只是其中的一个构成部分。智慧教室的空间规划和建设,涉及声、光、电的控制,涉及温度、湿度的协调,涉及教室桌椅结构的调整和布局,涉及录播设备的使用和控制,涉及线路的铺设和布局,尤其是建设完成以后的管理和维护,怎么使用,谁来维护,谁来负责等等。比如笔者所在学校的教室管理是教务处统一管理,后来又调配到各院管理。英才校区的智慧教室目前每个学院一个,由各个学院管理使用;金河校区的智慧教室目前归口到教务处,金河校区的学院可以安排使用,教务处统一协调分配。设备维护还是由信息中心负责。这样看来目前三个机构在管理和维护,在使用初期问题不大,但是后期的维护和协调成本会比较高,为我们的教学管理提出了挑战。

(二)高校教师面临知识和技能的“继续充电”

智慧教室下情景教学模式的变革,不仅仅是教学硬件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教师这个“软件”的变革,如果没有教师的变革,再好的硬件设备都还是设备,而不能变成情景教学模式的组成部分,不能成为“智慧”教室。因此,教师是否改变决定了“智慧教室”的智慧与否。

关于智慧教室建设和使用,我们还处在边建设、

边使用和边完善的阶段。智慧教室的建设和使用不是静态的,也不是最好的设备建设好后就一步到位了,也不是老师自然而然就会了,而是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怎样才能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老师不断提高自己,需要学生不断地克服自己的惰性,需要智慧教室的建设方不断地改进,也需要学校管理不断改变和调整,实现智慧教室的功能最大化,这才是智慧教室建设的初衷。

参考文献:

- [1]朱俊魁.情境教学法理论探讨[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0(3):24-28.
- [2]安翔,杨洁.情景模拟教学法在营销类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1):55-57.
- [3]吴刚.论中国情境教育的发展及其理论意涵[J].教育研究,2018(7):31-40
- [4]黄荣怀,胡永斌,杨俊峰,等.智慧教室的概念及特征[J].开放教育研究,2012(2):22-27.
- [5]智飞飞,乜勇.我国智慧教室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的可视化分析:基于共词分析的知识图谱研究[J].数字教育,2018(2):51-56.
- [6]胡旺,杨成.基于智慧教室的教学模式设计研究[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5(4):87-92.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Reform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Classroom

——Takeing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HU Y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Situational teaching mode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many years, but in face of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situational teaching mode is also facing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 of intelligent classroom provide some possibilities for the reform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le changes in situational teaching mode under intelligent classroom environment, hoping to provide som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exploration, teaching research,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y; intelligent classroom;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现状调查及提升路径研究

赵爱婷, 张晓玉, 高雪琴

(兰州文理学院 旅游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在教师礼仪素养内涵界定的基础上,立足于兰州市,通过中小学、高校教师及学生的调查,对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的现状进行剖析,从而找出问题所在。兰州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从顶层设计、各级学校日常引导、关注学生需求和满意度、提升教师幸福感等四个方面来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礼仪素养状况。

关键词:教师礼仪素养;现状调查;路径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19

中图分类号:G4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100-05

一、教师礼仪素养内涵界定

2016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教师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2018年5月,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教师具有很强的示范性,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教师礼仪素养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行为规范,受到学生的关注与学习,这关系着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内关于教师礼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课堂教学礼仪、服饰礼仪、形象礼仪、教学语言礼仪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基于各教师群体的针对性研究、重要性研究、影响研究等。学者欧小松(1997)提出,教师礼仪包含说的礼仪、听的礼仪、体态礼仪和服饰礼仪四个方面的内容^[1],金正昆(2007)认为教师礼仪包括师德、师表、师言、师缘、师行五个方面的内容^[2],袁涤非(2018)则提出教师礼仪包含形象、言谈、工作、活动、社交、涉外等六个方面的内容^[3]。此外,学者王红(2003)首次通过学生调查来研究高校教师礼仪的现状^[4],学者王菁(2010)对学生、教师、教务管理三个层面进行了调查与分析^[5],学者张家波、李斌辉(2017)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了90后教师的礼仪

现状及应对策略^[6],学者李佳(2017)则从文化内涵与教育价值入手研究了教师礼仪素养的教育途径与方法^[7]。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关于教师礼仪的研究范围较广,但研究主题仅限于现状研究、对策研究、部分教师群体的研究,以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笔者在充分吸收学者们对教师礼仪的研究基础上,将教师礼仪素养的内涵界定为思想品德修养、文化修养、艺术修养、教育能力修养、社交修养、着装形象、仪态形象等七个方面的内容。

二、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的现状调查

(一)调查设计与实施

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笔者针对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设计了专项调查问卷,采用实地问卷调查与网络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共计发放并回收问卷243份,有效回收率100%。同期,笔者对兰州水车园小学、实验小学、树人中学、兰州一中、兰州文理学院、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等7所学校进行了实地调查,访谈教师30名、学生50名,收集了教师及学生关于教师礼仪素养方面的问题和意见,以补充问卷调查中的不足。笔者采用spss 21.0对问卷数据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同时结合访谈结果,获得了

收稿日期:2019-06-10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厅2017年度高校科研项目“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校园礼仪传播模式研究”(2017A-128);兰州文理学院2018年度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新时代甘肃省自助旅游服务体系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2018JCQN002)

作者简介:赵爱婷(1984—),女,甘肃兰州人,硕士,兰州文理学院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旅游产业及市场研究。

以下关于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的现状 & 需求情况。

(二) 调查结果分析

1. 样本特征

此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中小学教师、初高中教师以及大学教师均有涉及。被调查教师中,小学教师占 39.92%、大学教师占 25.1%;女教师 83.13%,男教师占 16.87%;20—35 岁教师占 39.51%,36—50 岁教师占 56.38%;本科教师占 64.61%,硕士学历教师占 20.16%。此次调查中,小学教师及大学老师居多,女性教师居多,新入职及中年教师居多,本科及硕士教师居多,样本特征符合教师礼仪素养调查的目的及要求,能够反映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及需求的现状。

2. 教师对职业的归属感

在被问及是否热爱教师职业的问题时,42.8% 的教师选择了非常热爱,39.09% 的教师选择了比较

热爱,总计 81.89% 的教师对教师职业的归属感较强,热爱本职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 16.42% 的教师选择了一般,部分教师由于家庭等外部环境因素或教师工作的强度而产生了消极情绪,影响了其对职业的认可 and 归属感。

3. 教师对礼仪素养要素的重要性程度

如表 1 所示教师礼仪素养的重要性程度均值平均值得分达到了 4.52 分。教师对礼仪素养的重要性程度依次是:思想品德修养(4.77 分)、文化修养(4.74 分)、教育能力修养(4.68 分)、仪态形象(4.51 分)、着装形象(4.35 分)、艺术修养(4.28 分)、社交修养(4.28 分)。所有要素评价的赋分值区间为 4.28 至 4.77,重要性程度为“非常重要”,尤其是思想品德修养、文化修养和教育能力修养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礼仪素养要素。

表 1 教师对礼仪素养的重要性程度调查结果

选项	频数(百分比)					均值
	不重要	轻微	一般	比较重要	非常重要	
思想品德修养	6(2.47%)	2(0.82%)	1(0.41%)	24(9.88%)	210(86.42%)	4.77
文化修养	5(2.06%)	1(0.41%)	1(0.41%)	39(16.05%)	197(81.07%)	4.74
艺术修养	5(2.06%)	0(0%)	25(10.29%)	106(43.62%)	107(44.03%)	4.28
教育能力修养	5(2.06%)	1(0.41%)	5(2.06%)	44(18.11%)	188(77.37%)	4.68
社交修养	3(1.23%)	1(0.41%)	29(11.93%)	102(41.98%)	108(44.44%)	4.28
着装形象	3(1.23%)	1(0.41%)	29(11.93%)	84(34.57%)	126(51.85%)	4.35
仪态形象	2(0.82%)	1(0.41%)	15(6.17%)	77(31.69%)	148(60.91%)	4.51

注:以上数据由 243 份问卷数据经 spss 软件均值分析结果整理而得

4. 教师对自我礼仪素养的感知

表 2 教师对自我礼仪素养的感知调查结果

题目\选项	从不	偶尔	一般	经常	每天	均值
校园内衣着整洁得体	6 -2.47%	1 -0.41%	13 -5.35%	66 -27.16%	157 -64.61%	4.51
课堂中仪态举止大方	5 -2.06%	1 -0.41%	18 -7.41%	67 -27.57%	152 -62.55%	4.48
课堂及课外言谈规范	5 -2.06%	2 -0.82%	25 -10.29%	80 -32.92%	131 -53.91%	4.36
维护教师形象	5 -2.06%	1 -0.41%	19 -7.82%	85 -34.98%	133 -54.73%	4.4
注重保护校园环境	5 -2.06%	6 -2.47%	47 -19.34%	87 -35.80%	98 -40.33%	4.1
公共场合礼仪在先	5 -2.06%	1 -0.41%	26 -10.70%	91 -37.45%	120 -49.38%	4.32

注:以上数据由 243 份问卷数据经 spss 软件均值分析结果整理而得

如表 2 所示,教师对自己在校园内及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习惯的评定中,依次为校园内衣着整洁得体(4.51 分)、课堂中仪态举止大方(4.48 分)、维护教师形象(4.4 分)、课堂及课外言谈规范(4.36 分)、公共场合礼仪在先(4.32 分)、注重保护校园环境(4.1 分)。在被问及重视礼仪素养的原因时,41.15% 的教师认为是对学生有重要影响,28.4% 的

教师认为体现着教师的精神面貌,15.23% 的教师认为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教师群体对礼仪素养的重要性及积极效果有明确的认知。此外,高达 75.31% 的教师认为着装打扮应该适当约束来符合教师身份;84.77% 的教师认为自己的着装形象美观大方,符合形象,也有 4.12% 教师认为自己前卫时尚有时代感。

5. 教师对礼仪素养的提升需求

被调查教师在被问及教师最为缺乏的礼仪要素时,其选择依次是:艺术修养(62.55%)、社交修养(52.67%)、教育能力修养(36.63%)、仪态形象(34.98%)、着装形象(32.92%)、思想品德修养(14.4%)。在对礼仪要素相关问题的调查结果进行性别的分类统计结果中,男教师和女教师的调查结果一致。此外,有68.72%的教师认为非常有必要针对教师开展礼仪培训,22.63%的教师认为比较有必要。在被问及如果在学校内开展礼仪讲座或培训时,70.78%的教师认为会参加。在调查中还发现,教师认为需要加强对学生在日常生活礼仪、社会交往礼仪、校园礼仪等方面的培养和培育,教师自身的言传身教是提升学生礼仪素养的重要手段。

三、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的现状剖析

教师们普遍认为礼仪素养非常重要,对学生具有较大影响,但是对教师礼仪素养的践行还不够全面。很多教师入职后并没有参加过专题培训,部分女教师在教师节、三八节等时期参与过礼仪形象、插花、茶艺、形体等方面的讲座。此外,大部分教师更加重视提升自己在教育能力修养、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而对其他方面的内容有所忽略。

(一) 职业道德修养

思想道德修养是教师在工作生活中应遵循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是对教师在工作行为方面的标准和要求,同时又是教师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首先就表现在教师对本职业的热爱。在调查中显示,兰州市81.89%的教师对教师职业的归属感较强,热爱本职工作。在教师队伍的管理方面,甘肃省自2015年12月起将师德表现纳入了教师日常行为规范、年度考核指标和评价监督体系之中,实行“一票否决制”。但是,部分教师的恶劣行为仍然给教师群体的整体师德形象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职业道德修养是教师群体应该持续学习和坚持的礼仪要素。

(二) 文化修养

新时代背景下,学生对信息的获取方式更加多元化,新生代学生不光以教师的专业水平来评估教师,更多的还会以教师的文化知识覆盖面来评估教师,这对教师的文化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的职业具有学科专业性,很多教师仅在本研究领域内或课程领域内能够做到精通熟练,文化修养并不足为道。2014年甘肃省教育厅举办“语言文字文化大篷车”活动,针对各地师生开展讲座,但并没有在每年都持续性开展。兰州市红古区教育局也曾在

2017年举办中小学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培训会,以培养更为全面的高素质教师队伍。目前兰州市已经在逐渐重视教师文化素养方面的引导,但还未呈现出常态化机制,各级学校对教师的引导重点差异化显著,在文化素养方面略显不足。

(三) 教育能力修养

笔者认为,教育能力修养即为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但是,教师的知识技能程度和教学能力并不完全相关,若教师不能将其有效传递给学生,就无从谈教学效果。因此,教师必须在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注重教学能力的强化,如通过“互联网+”教学技术的应用和课堂设计提高课堂的高效性,是教师教育能力修养提升的重要手段。在教育能力提升方面,兰州市目前呈现良好状态。教育部、甘肃省教育厅、兰州市教育局各级部门通过教改项目、教学成果奖项、教学大赛、教育培训等活动的组织,不断激发一线教师不断加强教育教学能力,各级学校也通过座谈、讲座、教学工作坊等多种形式的教学研讨活动提升教师的教育能力。

(四) 仪态形象

日常生活中,深受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喜欢的教师,总是那些学识渊博、热情友好的育人楷模,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学生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对学生的言行举止产生良好的引导作用。在调查中显示,兰州市被调查到的所有教师都认为仪态形象对学生有重要影响,也体现着教师的精神面貌。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教师要在学生面前树立威信,用自己的魅力来征服学生,除了教师涵养之外,更多取决于语言、表情、交流方式等仪态形象要素。作为一名教师,尤其要注重自己在各种场合的行为举止,尤其在课堂中、校园内,使教育教学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 着装形象

在访谈中,大部分教师表示会更多关注教师的外在形象,同时也更加重视自己在校园内、课堂中、与学生交流中的礼仪形象,而在其他社交场合则会转换角色,不去刻意维持。从对兰州市各级学校部分学生的访谈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对教师的着装形象非常在意,形象靓丽的教师能给他们带来更加阳光、舒适的课堂体验。学生对目前教师的着装形象并不太满意,大部分同学认为教师可以穿着得典雅而时尚。礼仪是一种外显的行为,教师若能在着装形象方面达到美的标准,还需要掌握一定的礼仪知识和技巧。比如不同的场合下,可以按照环境和

交流对象的不同有所差别,在表现美的同时,体现教师的形象魅力。

(六) 社交修养

笔者认为,教师社交修养主要体现在与学生及家长关系的处理上。大学生已是 00 后,小学生已是 10 后,年轻而又朝气的新生代学生成了我们的教育受众。2018 年 5 月中国青年报联合腾讯发布了《00 后画像报告》显示,31.2% 的 00 后希望获得更好的“成长辅导”,自我认知方面以开放(56.1%)、独立(43.5%)、自信(42.2%)、热血(39.9%)等选项为主。在对兰州市中小學生、大学生的访谈中,也发现了这样的特质。显然,教师在与学生及家长的关系处理上需要更多的社交礼仪知识和技巧来作为支撑,在交流中语言、行为的合理使用,以及如何把握尺度以正确处理学生间问题,需要教师的不断学习和提升。

(七) 艺术修养

兰州市教师普遍认为自己比较缺乏艺术修养,在访谈调查中也发现,很多教师表示业余时间会很关注音乐会、歌舞剧、话剧等的表演艺术,但学校组织集体观影的情况还比较少,期望能够获得更多关于艺术表演类的观影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与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一直在推行的普惠艺术教育项目“高雅艺术进校园”对于提高师生艺术修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但此类项目受惠面有限,还不能够在各级校园内普及实施。此外,兰州虽为省会城市,每年能够引进或创作的艺术类节目有限,还不能够满足广大教师群体的需求。

四、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提升的路径研究

兰州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从顶层设计、各级学校日常引导、关注学生需求和满意度、提升教师幸福感等四个方面来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礼仪素养状况,从而能够办人民更加满意的教育,具体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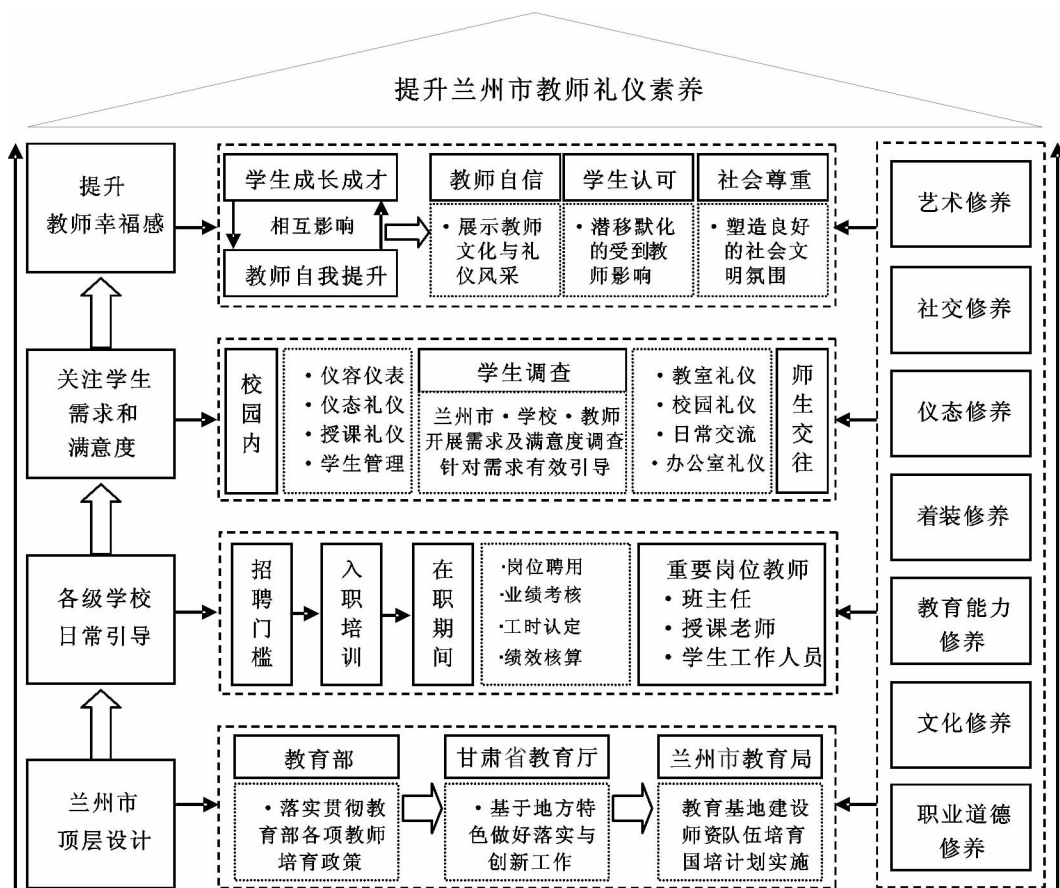


图 1 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提升路径研究

(一) 做好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提升的顶层设计

在这方面,兰州市教育局可以集中力量于兰州市高水平教师教育基地的建设和教师教育师资队伍的不断优化,积极探索兰州市教师队伍整体礼仪素养提升的自主性培育模式。通过组建礼仪

素养培训师队伍,定期开展关于教师礼仪素养的培训工作,全面提高兰州市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在职业道德、文化、教育能力、仪态形象、着装形象、社交、艺术等方面的能力和修养。再者,教师“国培计划”的具体操作中,可以在体现地方性的同时增强和丰富“教师礼仪素养”模块的学时和内

容,做到普惠和特色化,大力提升全市教师的整体礼仪素养。

(二)各级学校加强对教师礼仪素养的日常引导

各级学校在教师队伍的引进与培养中占有绝对的主动权。首先,在教师的引进中,应该严格把关,增加关于教师礼仪素养的测试内容,引进更为素质全面、业务见长的青年教师。与此同时,师范类高校也应加强对师范生关于教师礼仪素养的有效引导。其次,在对在在职在岗教师的岗位聘用、业绩考核、工作量计算、绩效工资分配等方面,也应充分体现礼仪素养的重要性特点,尤其是对于班主任、主要任课教师、学生工作人员等与学生交流密切的重要岗位教师,在他们的评价与管理中,更应该针对其工作特点,增强对礼仪素养的考核和认定。最后,各级学校应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体现常态化的激励导向,通过最喜爱教师、模范教师评选等活动的开展,奖励在教师礼仪素养方面的优秀教师,实现各级学校师资队伍优化与提升。

(三)更加关注学生对教师礼仪的需求和满意度

调查中发现,学生们大都喜爱时常微笑、面容谦和、语言有温度、亲和力强的教师,也喜欢着装靓丽大方、仪态优雅的教师。除了给学生教授知识和能力之外,给学生带来视觉、听觉、感触等方面的美好感知也应是教师的重要任务。在教师礼仪素养的提升方面,我们应更加关注学生对教师礼仪的需求和满意度。基于此,兰州市教育局,以及各级学校,同时包括每位教师,应该通过对全市、全校、全班的教师礼仪需求调查来掌握学生对于教师礼仪的关注点、重要性等需求情况,通过对教师礼仪的各级有效引导和改善,为学生们提供更加满意的礼仪教育。

(四)通过教师礼仪素养培育提升教师的幸福感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2018)》提出,到2035年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教师幸福感来自自我的认可和学生群体、社会群体对教师的认可。让每位教师在各自岗位上有幸福感,也就是每一位教师都愉快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幸福地享受着每一份教书育人工作的乐趣。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是相互促进与学习的过程,教师从学生中了解到新时代的礼仪需要,学生从教师身上感受文化与礼仪的风采,在不断的自我提升中,能够实现学生和教师的共同成长。广大教师若在教师礼仪素养的七个方面都有所提升,将大大提升教师的自信心,以及学生、社会群体对于教师的评价和感知,从而提升教师群体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 [1] 欧小松. 略论中学教师的礼仪修养[J]. 零陵师专学报, 1997(1): 47-51.
- [2] 金正昆. 教师礼仪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3] 袁涤非. 教师礼仪[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4] 王红. 大学生谈教师礼仪现状[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03(3): 19-21.
- [5] 王菁. 高职教师职业礼仪素养的现状和问题[J]. 教育与职业, 2010(35): 78-80.
- [6] 张家波, 李斌辉. “90后”教师职业礼仪素养现状及应对策略[J]. 现代教育科学, 2017(9): 96-100.
- [7] 李佳. 优质校建设视阈下高职教师礼仪素养的价值内涵与教育对策[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7(19): 72-75.

(责任编辑 许峻)

Investigat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 Etiquette Literacy in Lanzhou and Research on the Ways to Improve it

ZHAO Aiting, ZHANG Xiaoyu, GAO Xueqin

(School of Tourism, 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teachers' etiquette literacy and then investigates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Lanzhou.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 etiquette literacy in Lanzhou, so as to find out the problems. Teachers' etiquette literacy can be improved by the following four ways: improving top-level design, providing guidance for all school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s and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and improving the happiness of teachers.

Key words: teachers' etiquette literacy; on-site investigation; path research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师职业技能培养模式研究

李敏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以核心素养培养需求为导向,对教师培养方案进行研究,构建教师核心素养培育新模式。基于核心素养培育,加强与地方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对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进行重塑。围绕核心素养要求,构建“教师教育课程学习、第二课堂和教育实习”相结合的“三位一体”教师培育新模式。

关键词:核心素养;培养模式;教师培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20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105-04

一、引言

教育部在2015年发布《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的意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明确表达了“核心素养”的教育理念要求,加强培养具备“核心素养”“适应社会未来发展”的学生。尤其对于高等教育,“核心素养”被认为是现代教育理念的重要基因,对于学生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讲,核心素养理念的出现,是新时代教育理念变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正式提出:教师应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和数学教育的基本理论,具备教师职业基本素养以及一定的教学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中提出:应培养一大批师德高尚、专业基础扎实、教育教学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突出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为适应当代教育教学实际情况和保证教育质量,推进教师核心素养的构建和塑造势在必行。

将教师核心素养的塑造与人才培养模式紧密结合是有效的推进方式,但教师的核心素养有哪些?基于核心素养的塑造理念,高等院校教师该如何获得核心素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实现教师专业发

展的一个关键是教学实践,在实践中丰富经验,提升智慧。然而,在部分高等院校的培养体系中,重知识而轻能力的现象普遍存在,人才培养目标并不能完全实现。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理念,结合学科特点和当今时代特征,培养让社会满意的卓越教师,已成为当前地方高师院校的主要任务。因此,高师院校如何改革教师培养模式,增进核心素养等问题亟待研究。

国内最早关于核心素养的描述是王敏在1956年翻译苏联一篇论文中提出的核心素养一词。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开始对核心素养的内涵及其构成展开研究。近十年来,国内外对核心素养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比如2012年的PISA测评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新概念,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随后,桂怀德、徐斌艳等国内学者也对核心素养进行讨论、研究,把核心素养定义为情感态度、价值观、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综合体现^[2]。马云鹏在《关于核心素养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核心素养是学习者在学习时所应达到的综合性能力,同时阐述了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并把核心素养的内涵定义为情感态度价值观、知识和能力等^[3]。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核心素养的内涵、构成

收稿日期:2019-06-1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2019-JSJYJC-017)

作者简介:李敏(1980—),女,河南新乡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校教育教学及课程改革研究。

要素以及教师职业技能培养,有关教师核心素养培养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虽然部分高校开展了初步探索与实践,但是相关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与背景条件各不相同,适用范围也存在局限。因此,教师的核心素养培育模式的构建亟待研究。

二、核心素养的内涵及教师培养过程存在的问题

(一)核心素养的内涵

核心素养受到教育界专家们的广泛关注。不少专家认为核心素养是学习者在学习时所应达到的综合能力^[4],其内涵包括情感态度价值观、知识和能力等,也有专家研究了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5]。受教育部委托,以林崇德教授为领头人的专家们在研究素养的本地化和课程化方面获得了一些成果。比如对核心素养内涵的界定,林教授认为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6]。笔者比较认同林教授给出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界定。我们认为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基于高等院校的培养机制,所形成的适应社会环境变化需要的品德素养、专业技能、终身学习能力和创新力。这也是我们构建的培养模式想要实现的目标。

(二)教师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教师培训过程中师德师风教育的缺失

教育的最终目的,从古至今,都是为了让学生向“善”的方面发展,弥补行为品德的缺失。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对“教”“育”分别下了定义:“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讲述了两层意思:教育的目的,培养学生是为了使其向善,从好的方面发展;教育的途径,即教师的品德行为,会被学生所仿效。教师良好的师德师风会被学生所模仿,同样,不良的品德行为也会被学生所仿效。当下师德师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教师对教育事业缺乏认同感,对学术缺少责任感。部分教师缺乏自律意识,对学术缺少使命感,对学校发展缺少主体意识,与同事相处缺少团队精神等方面。然而当今对教师的培训过程中大多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了有关师德师风的教育。

2. 教师职业技能培养过程存在的问题

高等教育关系到学生的就业,关系到整个教育体系的完善,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亟需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优秀教师队伍。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对于

高等教育教师队伍的培养,我国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机制局限于“高师教育高校办”的传统思路,高师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高等教育实际相脱离。教师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不能很好结合,教学基本功薄弱,创新能力不强,难以适应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为此,大力提高教师职业技能,构建“三位一体”教师培育新机制势在必行。

三、教师核心素养培养模式构建

(一)师德师风教育模式构建

1. 引导教师加强学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引导教师不断加强师德师风方面的学习,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按照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改革要求,不断提高个人修养,按照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来约束自我。以古哲先贤的道德品质为范本,以当代道德模范人物为标准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操守。

2. 培养教师的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教育是一项社会事业,涉及千家万户。学生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一个有责任感、勇于担当的教师常常能受到学生的喜欢和效仿。而作为学生家长,更青睐与有责任感、勇于担当的教师。把孩子放到有责任感、勇于担当的教师班级中是家长最放心的事情。因此教师作为学生的领路人应该时刻关注学生思想动态,经常性和他们进行心灵交流。在生活上,要关心学生学习环境、生活环境的变化,营造更加合适的学习环境。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适时增减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方式,按照不同的学生学习状况,布置恰当的作业。注重教学中的细节问题,为每一个学生能听懂本节课负责,为每一个学生能独立完成作业负责,为每一个学生学会融会贯通负责。

3. 鼓励教师规范言行、以身示范

教师职业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在学生心目中,教师是标准,是表率。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教师是校园里最直接的模范和榜样。在学生心灵的塑造过程中,教师的示范作用至关重要。教师的言谈举止、服饰穿着、兴趣爱好都会引起学生的模仿,会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的示范作用也最具有说服力。例如,教师利用PPT教学,缺少演练过程时,学生会效仿教师使用计算器、计算机等工具。反之,教师一笔一画的黑板演练,会潜移默化地告诉学生理论推导需要亲力亲为。每一个学生的身心发展,会受到所有任课教师的影响。正所谓,喜欢老师才会喜欢相应的课程,喜欢老师才会有良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教

师之间要协调一致,团结协作才能对学生有更好的示范效果。

为此,要鼓励教师形成团队,搭建交流平台,不断磨合,共同进步。教师要注意从学生身上学习,增长自己见识做到教学相长。从学生身上学会如何去教他们,知道怎样改变教学方式方法才最有效。时常站在学生的角度去引导他们学习,学会换位思考。教师也要规范自己的言行,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做到热爱学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既要把爱心倾注于全体学生,又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观。不嫌弃任何一名后进生,要正面教育,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耐心对待学生的过错,在行为和外表上为学生做出良好的榜样。

4. 细化规范,构建严格的保障机制

正是由于教师的言行举止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人格的定型和个性的塑造,所以在教师培训过程中更应该注重教师师德师风的培养。只有不断地进行师德师风教育,强化教师的表率作用,规范教师的行为,约束教师的言行,才能保证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此外,建立一套对教师师德师风行为的科学评价制度也十分重要。要加大对师德师风的监督检查力度,充分发挥监督的作用,多渠道了解学生、家长、社会对学校建设和教师师德的反映,制定科学的评价方案。

(二)“三位一体”的教师职业技能培养模式构建

从理论和实践中探索核心素养培育的具体要求,使教师树立较高的核心素养意识,培养教师先进的现代化教学观念,推进课程改革,提升教师的核心素养,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核心素养的培育。加强与地方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构建“三位一体”教师培育新模式,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更好地服务与指导地方教育。“三位一体”教师培养机制是指构建“教师教育课程学习、第二课堂和教育实习”相结合的教师培养机制,通过教师教育课程学习、第二课堂和教育实习等多种途径,共同提高教师素养、教学技能与学科教学整合能力,旨在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教学技能,更好地为地方高等教育服务。

1. 教师核心素养培养课程体系构建

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教师核心素养培育为课题,以文献研究和实践研究为主要方式,确定教师核心素养培育的各阶段的目标、任务、实施办法。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优化,提高课程综合化程度,加强对高等教育教学方法课程的

改革,建立一套适应核心素养培育要求的新课程体系。

设置独立的教育类课程模块,开设面向高等教育改革的系列辅修课程,在选修课程中渗透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内容。在传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的基础上,增加专业教学技能训练,开设相关的技能课程。加强“普通话”“书法”课程建设,同时加强对教师现代教育技术的系统培训。

2. 教师职业技能实训模式构建

根据核心素养培育的具体要求,对教师职业技能训练队伍的设置、专业化、职业化及训练任务的分解、落实等进行研究,搭建“地校结合”的职业技能实训模式。

(1)完善训练机制,保证教师职业技能实训成效

充分利用微格教室,实行实时数字录像,数字音频及课件点播,电子巡查及听课等功能,无干扰教学评估观摩,保证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的成效。同时,组建专业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队伍,根据各类课程在训练中所承担的任务,将总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具体责任人。

(2)实行“地校结合”,做好教师校内演练

通过邀请地方高等院校的教学名师,优秀辅导员对教师的教学基本技能,辅导员工作方法和教育调研方法进行指导。聘请优秀的高级教师作为教师的兼职导师,通过手把手的教和反复训练保证了教师校内演练效果。

(3)丰富第二课堂,提升教师职业技能水平

丰富教师培训的第二课堂,把普通话展示,三笔字比赛,简易教具制作,演讲比赛,微格教学等技能训练,多媒体课件制作与教学展示等引入到培训中来,实行课前20分钟演讲制度,坚持常规训练方法与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结合。举办各类教师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如三笔字大赛,诗朗诵比赛,辩论赛,教师技能大赛等活动。同时,邀请高校一线教育研究人员、教学名师讲授观摩课,出任教师各类教育教学比赛活动的指导教师和评委,指导教师课堂教学技能训练,确保训练效果。

(三)教师“双边协同”教育实习模式构建

为了保证教师实习实践效果,促进高校与地方实习学校有效合作,搭建实习平台,共同指导培训教师的实习实践工作,“双边协同”教育实习指导方式。通过聘任实习基地学校的骨干教师作为培训教师的实习指导教师,在课堂教学(包括备课、教案规范,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板书设计,作业批改等环

节),班级管理 and 教育调查实践等方面给予一对一的指导,并进行影子教学,让实习教师对优秀教师的教育教学方法有更深入的感受。高校教师和实习基地学校教师共同担任实习鉴定员,对实习教师的实习工作进行总结,并作出评价,适时开展优秀实习教师成果展,进行说课与教育教学技能展示,以及进行教育调查报告验收。“双边协同”教育实习模式的实施,使得原有的教师培养机制由封闭走向开放,极大地提升了实践教学和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成效,保证学生教育实习,实习质量,切实解决教师实习效果差的问题。

四、结束语

本文结合高等教育课改标准以及教师核心素养培育要求,对“核心素养”的概念进行了解读,从教师职业技能培养过程和师德师风两个方面分析了当前教师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构建教师“师德师风”教育模式和“三位一体”教师职业技能培养机制。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教师的责任感、规范言行及严格的保障机制四个方面构建了教师“师德师风”教育模式。“三位一体”教师职业技能培养机制则是构建教师核心素养培养课程体系 and 校内演练策略,创建教师职业技能日常训练及职业技能竞赛新模式和“双边协同”教育实习模式,通过多方协作共同促进教师的教育教学技能,增强

教师核心素养培养。

参考文献:

- [1] 辛涛,姜宇,王焯辉.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课程体系建构[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11.
- [2] 桂德怀,徐斌艳. 数学素养内涵之探析[J]. 数学教育学报,2008(5):22-24.
- [3] 马云鹏. 关于核心素养的几个问题[J]. 课程教材教法,2015(9):36-39.
- [4] 王光明,卫倩平,赵成志. 核心素养视角下的跨学科能力测评研究[J]. 中国教育学刊,2017(7):24-29.
- [5] 姜宇,辛涛,刘霞.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实践途径与策略[J]. 中国教育学刊,2016(6):29-32.
- [6] 林崇德. 21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7] 王光明,张楠,周九诗. 高中生数学素养的操作定义[J]. 课程·教材·教法,2016(7):50-55.
- [8] 邢艳春. 高校大学生核心素养评价考核机制研究[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7(12):119-123.
- [9] 韩庆艳. 以学科核心素养为指向的教学实践能力提升路径[J]. 中国成人教育,2018(24):88-91.
- [10] 任艳华. 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机对接[J]. 中国教育学刊,2016(2):74.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raining Model of Teachers' Vocational Skills Based on Core Accomplishment

LI M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mand of core accomplish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raining program and constructs a new model of training core accomplishment of teachers. Based on training of core accomplishment, th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eachers' education should be rebuilt. Focusing on the requirements of core accomplishment, a new "trinity" teacher training model is constructed, which combines teachers'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second classroom, and practical teaching.

Key words: core accomplishment; training mode; teacher training

小麦谷朊蛋白的改性研究及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王建中¹, 姚虹²

(1. 河南省食品工业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53;

2.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小麦谷朊蛋白具有量大价廉、蛋白质含量高、风味特性好、氨基酸组成齐全等特点,在食品工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小麦谷朊蛋白结构的原因使其溶解性、乳化性及乳化稳定性等较差,限制了谷朊蛋白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为提高其加工性能,常进行改性处理,本文介绍了小麦谷朊蛋白的改性方法及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关键词:食品工业;小麦谷朊蛋白;改性;应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21

中图分类号:TS2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109-05

小麦谷朊蛋白又称面筋蛋白。1728年意大利科学家 BECCARI 首次从小麦粉中分离出小麦谷朊蛋白,1745年他又找到了从小麦面粉中得到小麦谷朊蛋白的方法。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小麦谷朊蛋白的价值逐渐受到重视,使用量也逐年增加。我国盛产小麦,谷朊蛋白作为小麦淀粉加工的副产品,具有量大价廉、蛋白质含量高、风味特性好、氨基酸组成齐全等特点,在食品工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小麦谷朊蛋白的溶解性、乳化性及乳化稳定性、起泡性及起泡稳定性等性能较差,极大地限制了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通过对谷朊蛋白进行改性,改善其溶解性、乳化性、起泡性、凝胶性等是拓宽谷朊蛋白应用范围的重要手段。

1 小麦谷朊蛋白的组成及结构

1907年,OSBORNE 根据溶解性的不同,把小麦谷朊蛋白分为麦醇溶蛋白、麦谷蛋白、清蛋白和球蛋白4种。清蛋白可溶于水或稀的盐溶液,占小麦蛋白总量的3%~5%,热稳定性差,60℃变性^[1]。球蛋白不溶于水,可溶于稀盐溶液,占小麦蛋白总量的6%~10%,加热可凝固。麦醇溶蛋白可溶于70%的乙醇溶液,为单体蛋白,分子量较小,其含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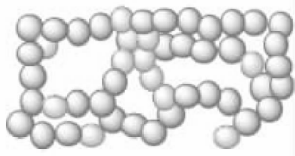
约占小麦总蛋白的40%~50%,富含谷氨酰胺和脯氨酸。麦谷蛋白可溶于稀酸或稀碱溶液,由17~20种不同的氨基酸组成。由于其组成氨基酸多为极性氨基酸,麦谷蛋白以分子量在40 kD~300 kD的聚合物存在,其含量约占小麦谷朊蛋白总蛋白含量的30%~40%^[2]。

清蛋白和球蛋白富含赖氨酸、色氨酸和精氨酸,营养价值高,含有较多生理活性蛋白质,对加工品质影响小。麦醇溶蛋白是通过共价的二硫键以及分子间作用力氢键、疏水键等作用连接在一起的单体球状蛋白,麦醇溶蛋白赋予面团延展性。麦谷蛋白是由多个蛋白亚基组成的大分子聚合物,通过二硫键连接,赋予面团黏弹性。依据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的迁移率不同,将麦谷蛋白分为低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和高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麦谷蛋白和醇溶蛋白按照一定比例通过氢键、疏水作用等非共价键和二硫键等共价键形成的紧密交联的三维网状结构,赋予面团特有的黏弹性^[3],两者的功能性质对面团品质有重要影响^[4]。图1为面筋的形成过程,图2为小麦醇溶蛋白、麦谷蛋白及面筋蛋白的SEM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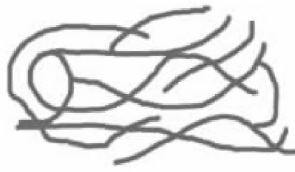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19-08-21

基金项目: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食品工业中小麦谷朊蛋白改性技术的研究”(142300410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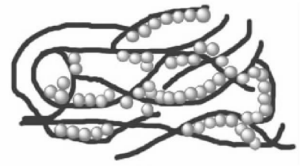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王建中(1963—),男,河北赞皇县人,河南省食品工业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食品技术开发、食品安全等方面研究。



a. 麦醇溶蛋白



b. 麦谷蛋白



c. 面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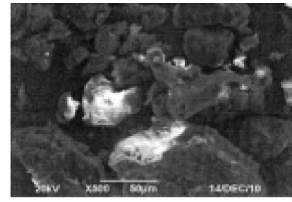
图1 面筋的形成过程示意图



a. 麦醇溶蛋白SEM图



b. 麦谷蛋白SEM图



c. 面筋蛋白SEM图

图2 小麦蛋白SEM图

2 小麦谷朊蛋白的改性

小麦谷朊蛋白中含有大量疏水氨基酸和不带电荷的氨基酸,由于疏水作用区域较大使其溶解度较低,限制了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通过物理、化学等技术手段改变小麦谷朊蛋白的结构,从而改变其功能性质,进而改善谷朊蛋白加工性能,拓展其应用范围是目前小麦谷朊蛋白研究的热点^[5]。目前,小麦谷朊蛋白改性的方法有化学法、物理法、酶法、基因工程法、复合改性法等。

2.1 物理改性

物理改性是通过对蛋白质进行超高压、机械处理、热加工、冷冻、微波、超声波、脉冲电场等方法,改变蛋白质的高级结构和分子间的聚集方式,从而改善植物蛋白的功能性和营养特性^[6-7]。

超高压技术最早用于金属、陶瓷等材料的加工,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物质的晶体结构发生变化,如在高温、高压下,石墨可以转化为金刚石。超高压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初是用于灭菌,其基本原理是在高压下,微生物的形态结构、细胞壁膜等发生不可逆的变化,从而达到保藏食品的目的。1986年,日本京都大学粮食科学研究所林力丸教授首次将超高压技术用于食品加工,1989年日本农林水产省设立专项计划,资助超高压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研究。在食品生产中,超高压技术是将物料置于超高压设备中,在100 MPa~1000 MPa的压力和一定的温度下,对物料进行处理,使物料组分中的分子间力等弱作用发生变化,导致食品中蛋白质、淀粉等大分子的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使其性质发生变化,而超高压对共价小分子影响较小,因此对食品中的维生素及色、香、味影响较小^[8]。

超高压技术用于蛋白质的改性是食品超高压技术应用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常见的有静态超高压和动态超高压均质处理技术^[9]。静态超高压技术是用水或其他液体传递压力于真空柔性密封包装中的被加工食品,动态超高压均质技术是利用高压作用于液体,产生强大的剪切力、撞击力和空穴爆炸力等综合作用于被加工食品。

研究表明,超高压处理对麦醇溶蛋白和麦谷蛋白的溶解度、起泡性有一定的影响,且呈现一致的规律性。在压力为0~500 MPa的范围内,麦醇蛋白和麦谷蛋白的溶解性、起泡性均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在300 MPa时,溶解性和起泡性均呈现最佳状态^[10]。超高压处理破坏蛋白质的氢键、疏水作用和静电相互作用等非共价键作用,影响蛋白质的水合性质,使溶解度发生变化。压力在300 MPa以下,随着压力的增大,破坏了蛋白质分子间作用力,使蛋白质分子的三级结构被破坏,蛋白质的伸展程度发生变化,增强了其侧链亲水基与水的作用,从而使其溶解度增大;但当压力过大时,更多的疏水基团暴露出来,使蛋白质的溶解度降低^[11]。

蛋白质具有乳化性是由于其结构中既有亲水基团又有疏水基团,在超高压作用下,不仅使其亲水基团增加,同时也使疏水基团增加,从而提高了其乳化性。因此,蛋白质的溶解性和乳化性变化通常是一致的^[9]。

超高压改性是物理过程,不引入化学物质,对食品的安全性、食品营养素及风味物质的保留都非常有益。但国产超高压设备性能不稳定,易损坏;实现超高压的设备昂贵,且多数是间歇式的,实际生产效率会受到一定的影响^[12]。

微波改性、超声波改性等对小麦谷朊蛋白的改

性,是通过微波或超声波作用于物料,通过破坏蛋白质分子间的氢键、疏水作用等弱作用力,使蛋白质松散,更多的亲水基团或疏水基团暴露出来,从而改变蛋白质的溶解性及乳化性等^[13]。

2.2 化学改性

化学改性是利用化学物质作用于谷朊蛋白侧链上的基团,使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残基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蛋白质的结构,引起谷朊蛋白功能和性质变化。化学改性有水解、酰化、磷酸化、脱酰胺、糖基化及蛋白质的交联等方法。

酰化是指蛋白质分子的亲核基团与酰化试剂作用而将酰基引入蛋白质分子的过程,如乙酰化、琥珀酰化等。酰基的引入改变了蛋白质分子的构成及结构,从而改变其性质。乙酰化改性是利用乙酰基替换小麦蛋白质分子侧链上的赖氨酸 ϵ -氨基,从而改变其性能。张红印等^[14]对小麦谷朊蛋白质乙酰化改性后,表明其溶解度、乳化性、起泡性等有较大的提高。张红印等^[15]还对谷朊蛋白的乙酰化和琥珀酰化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乙酰化和琥珀酰化改性对小麦面筋蛋白功能性的提高程度有所不同,琥珀酰化改性明显优于乙酰化改性。李玉莹等^[16]对乙酰化麦醇溶蛋白溶液及与麦谷蛋白共混液流变性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乙酰化降低了麦醇溶蛋白-麦谷蛋白共混溶液的结构黏度指数,改善了成膜、纤维化等性质,进而改善了其应用效果。

脱酰胺是将谷朊蛋白中天冬氨酰胺和谷氨酰胺的酰胺侧链转变为带负电荷的羧基基团,改变了蛋白质的电荷分布,提高其溶解度。化学脱酰胺的方法有碱法、酸法,根据使用的酸不同,酸法分为无机酸法和有机酸法。考虑到安全性,目前多利用可食性有机弱酸,如醋酸、琥珀酸、柠檬酸等^[17]。

磷酸化是用三聚磷酸钠在谷朊蛋白的侧链上引入磷酸根,增加蛋白质的负电荷,提高蛋白质的溶解度。唐文婷^[18]利用三聚磷酸钠对小麦谷朊蛋白进行磷酸化改性,结果显示,蛋白质侧链氨基上引入的磷酸根数量与蛋白质溶解度、乳化性、乳化稳定性、起泡性和起泡稳定性正相关。

近年来,有添加其他化学物质对小麦谷朊蛋白理化性质影响的研究。穆婉菊等^[19]研究了菊粉对小麦谷朊蛋白的理化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菊粉对小麦蛋白乳化性能有显著影响,10%的菊粉可以使其乳化活性提高14.4%;7.5%的菊粉可以使蛋白质乳化稳定性提高18.7%。谢新华等^[4]考察了 γ -聚谷氨酸对面筋蛋白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谷朊蛋白的持水率随 γ -聚谷氨酸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加,

其结合水含量由9.52%增加至12.71%,弹性逐渐减弱,黏性逐渐增强。微观结构表明,随着 γ -聚谷氨酸添加量的增加,蛋白的网络结构更加均匀,孔径更加细小。

化学改性反应历程短、成本低、改性效果明显,故目前是蛋白质改性的主流方向。但化学改性改变了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在产生预期效果的同时,可能在营养和毒理方面造成有害效应^[20]。

2.3 酶法改性

酶法改性是在蛋白酶的作用下,对谷朊蛋白进行限制性酶解,降低蛋白质的分子质量,增加离子化基团,使包埋在分子内部的疏水性基团暴露出来,提高蛋白质的溶解性、起泡性、乳化性及乳化稳定性等^[5]。通常适用的商业化酶包括碱性蛋白酶、胃蛋白酶、木瓜蛋白酶、菠萝蛋白酶和胰蛋白酶等。

费国源等^[21]的研究表明,碱性蛋白酶比中性蛋白酶的水解速率高,谷朊蛋白的溶解度随着水解度的增大而增大,起泡性和起泡稳定性随着水解度的增加而降低。谷中华等^[22]考察了胃蛋白酶、胰蛋白酶、碱性蛋白酶和中性蛋白酶对谷朊蛋白的水解,在水解度相同时,胃蛋白酶处理组中总多肽含量最高,然后依次是碱性蛋白酶、胰蛋白酶和中性蛋白酶处理组。何林玲等^[23]用碱性蛋白酶和Protamex复合蛋白酶双酶分步水解的方法水解小麦谷朊蛋白,水解后的蛋白液中小于1 000 Da分子质量的肽段占40.34%,氨基酸组成丰富,谷朊蛋白的表面结构有明显变化。李莹等^[24]利用菠萝蛋白酶对小麦蛋白进行水解,显著降低了麦醇溶蛋白含量,达到降低小麦致敏的效果。

酶法改性具有安全可靠、特异性强、反应过程温和、改性效果显著等特点,对小麦谷朊蛋白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前景。但由于蛋白质结构复杂,酶法改性水解过程缓慢、产物复杂、目标产物产量低,限制了其在食品工业上的应用。

2.4 复合法改性

复合改性法就是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方法复合对小麦谷朊蛋白进行改性,如物理法预处理与酶法改性相结合、化学预处理与酶法相结合等复合改性法。张雪纷^[25]研究了超声-离子液体处理对麦谷蛋白水解度的影响,麦谷蛋白水解度比未处理组提高了49.65%。张淑芬^[26]采用0.8 mg/g的亚硫酸钠溶液在70℃的温度下对小麦谷朊蛋白溶液预处理20 min,小麦谷朊蛋白的溶解度、乳化性及起泡性也显著提高,其功能性综合评分达到最大值。亚硫酸钠碱性蛋白酶复合改性后的产物具有较强的抗

氧化性,抗氧化性随着样品浓度的增加而增强,且相对分子量越小抗氧化性越大。

小麦谷朊蛋白经改性后,其溶解性、乳化性、起泡性、黏弹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在食品工业中,针对不同的应用,采用相应的改性技术。

3 小麦谷朊蛋白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小麦谷朊蛋白作为淀粉生产的副产物,早期与膳食纤维等一起作为饲料使用,但随着谷朊蛋白改性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其应用价值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在食品工业的应用面也逐渐拓宽。

3.1 在面制品中的应用研究

我国面粉存在着“高筋不强,低筋不弱”的问题,已有将改性谷朊蛋白加入面粉中,改善面粉适用性的研究。裴旭东^[27]用多糖胶体对小麦谷朊蛋白进行改性,并将改性谷朊粉加入面条中,可有效改善面条的品质。王晶晶^[28]研究了乙酰化谷朊蛋白加入面条后,生面条硬度随着添加量的增加逐渐减小,弹性先增后平稳,拉断力逐渐减小而拉伸距离明显增大;熟面条硬度逐渐减小,弹性增大但趋势不明显,咀嚼性先增大后减小,但所有性能都高于原面粉。杨天一研究了添加0.01% TG酶和谷蛋白的面包与空白相比硬度减小13.9%,咀嚼度降低15.6%^[29]。王香玉^[30]研究了氧化还原剂在馒头加工过程中对馒头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馒头面团加工过程中,氧化还原剂对麦谷蛋白可萃取率的影响较大,麦谷蛋白的交联聚合行为的改变决定了面团加工过程中面筋蛋白的变化;而在蒸制过程中,氧化还原剂对麦醇溶蛋白可萃取率的影响较大,麦醇溶蛋白的交联聚合程度决定了蒸制过程中面筋蛋白聚合程度的变化。

3.2 在肉类加工制品中的应用

在肉制品中,小麦面筋蛋白作为黏合剂、填充剂或增量剂等,可以增加黏弹性、色泽稳定性、硬度、出汁率和保水性等。戈志成^[31]在肉丸中添加3%左右的湿热-琥珀酸酐酰化小麦面筋蛋白,结果显示优于小麦面筋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能够显著提高肉丸的质构特性,降低了肉丸的蒸煮损失率,提高了产品得率。王凯强^[5]研究了碱性蛋白酶和TG复合改性的小麦谷朊蛋白对猪肉丸蒸煮特性的影响,结果显示改性小麦面筋蛋白对肉丸品质有改善明显,使肉丸蒸煮损失率降低了49.16%,得率提高了15.48%,保水性提高了18.27%,肉丸的硬度、弹性和咀嚼性分别提高了97.05%,6.68%和121.96%。

3.3 在其他食品中的应用

改性谷朊蛋白还可用于婴幼儿食品及其他的特

殊人群的保健品、发酵制品等中。王延州^[32]用酶解法水解小麦谷朊蛋白得到谷氨酰胺肽,并通过动物试验观察到谷氨酰胺肽可以有效延缓小肠黏膜炎的发生,减轻肠黏膜损伤的程度,促进黏膜炎恢复。奚宽鹏^[33]采用中性蛋白酶对小麦谷朊蛋白进行水解,并将水解物用于啤酒发酵的氮源,酶解物提高了发酵过程中糖消耗和酒精生成速率,促进了啤酒酵母发酵。研究表明,水解度越大促进作用越明显;酶解物可提高啤酒中乙酸乙酯、高级醇的含量,改善啤酒风味,但同时也促进有机酸的生成,不利于啤酒风味,且酶解物水解度越大,影响越大;酶解物可一定程度改善啤酒的泡沫性能。何文猛^[34]采用柠檬酸湿热改性谷朊蛋白,并用20%替代率替代脱脂乳粉制备的冰淇淋具有较低的融化率,粒径分布相对均匀,粒径大小合理。丛旭等^[35]研究了将一定量的甘油和乙醇加入小麦谷朊蛋白,并用NaOH调分散液为碱性,制备用于方便面调料包的可食性薄膜。结果表明,pH 11.40、蛋白添加量为10.70%、乙醇体积分数为57%时,小麦面筋蛋白膜的综合性能最优,氧气透过率为20.74 meq/kg,抗拉强度为12.98 MPa。

4 展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小麦消费国。近年来,我国淀粉的产量逐年增加,小麦谷朊蛋白的产量也逐年增加,充分利用小麦谷朊蛋白必须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我国目前对小麦谷朊蛋白的一些改性机理研究还不够深入,对改性后的应用研究更少。因此,探索小麦谷朊蛋白科学合理的改性方法,特别是改性后产品的应用并使之产业化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此外,需加强以改性小麦谷朊蛋白为基质的可降解高分子材料等非食品领域的研究,为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减低生产成本、实现绿色化学提供新途径。

参考文献:

- [1]郭兴凤,张莹莹,任聪,等.小麦蛋白质的组成与面筋网络结构、面制品品质关系的研究进展[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6):119-124.
- [2]林敏刚.小麦面筋蛋白酶法改性及在鲜湿面条中的应用[D].郑州:河南工业大学,2010.
- [3]刘天红.小麦HMW-GS对谷蛋白大聚体形成和面筋二级结构及显微结构的影响[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6.
- [4]谢新华,毋修远,张蓓,等. γ -聚谷氨酸对面筋蛋白功能特性的影响[J].麦类作物学报,2018(8):1004-1009.
- [5]王凯强.小麦面筋蛋白的酶法改性、应用及凝胶化机理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16.

- [6]张玲玲,李永祥.小麦面筋蛋白去酰胺与磷酸化改性的研究[J].农产品加工,2018(6):1-5.
- [7]黄薇.超高压对小麦面筋改性及应用的研究[D].天津:天津科技大学,2016.
- [8]钟昔阳.小麦谷朊粉超高压改性加工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09.
- [9]阎乃珺.动态高压微射流对小麦面筋蛋白性质和结构的影响[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 [10]臧艳妮.物理预处理对小麦蛋白糖基化改性的影响[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17.
- [11]钟昔阳,姜绍通,潘丽军,等.超高压对麦醇溶蛋白/麦谷蛋白功能性质的影响[J].中国粮油学报,2009(8):8-11.
- [12]许世闯,徐宝才,奚秀秀,等.超高压技术及其在食品中的应用进展[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5):111-117.
- [13]杨雪飞,臧艳妮,赵妍嫣,等.微波预处理对小麦面筋蛋白糖基化改性的影响[J].中国粮油学报,2019(1):10-17.
- [14]张红印,王兰,席芳,等.小麦面筋蛋白质的乙酰化改性[J].无锡轻工大学学报,2002(3):239-243.
- [15]张洪印,傅承新,郑晓冬,等.小麦面筋蛋白乙酰化及琥珀酰化改性对功能性改善效果的比较及反应机理初探[J].中国粮油学报,2003(4):222-225.
- [16]李玉莹,马晓军.乙酰化麦醇溶蛋白溶液及与麦谷蛋白共混液流变性能的研究[J].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2019(1):63-67.
- [17]李小艳,李高阳,任国谱.小麦面筋蛋白脱酰胺改性研究进展[J].食品工业科技,2014(8):390-393.
- [18]唐文婷.小麦面筋蛋白的琥珀酰化与磷酸化改性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06.
- [19]穆婉莉,冯佳,李秀秀,等.菊粉对小麦面筋蛋白理化性质的影响[J].食品化学,2019(16):64-68.
- [20]唐文婷.小麦面筋蛋白的琥珀酰化与磷酸化改性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06.
- [21]费国源,孙培龙.蛋白酶改性处理对小麦面筋蛋白溶解度和起泡性的影响[J].农产品加工(学刊),2009(1):32-34.
- [22]谷中华,朱旭,杨凌霄,等.小麦面筋蛋白酶解制备合适分子量小肽的研究[J].食品工业科技,2013(24):105-109.
- [23]何林玲,王学东.双酶切制备富含谷氨酰胺的小麦水解蛋白及相关研究[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4(5):59-62.
- [24]李莹,周剑忠,王维权,等.菠萝蛋白酶酶解小麦降低过敏性[J].中国粮油学报,2016(5):56-60.
- [25]张雪纷.超声-离子液体处理对麦谷蛋白特性和酶解产物活性的影响[D].镇江:江苏科技大学,2018.
- [26]张淑芬.亚硫酸钠碱性蛋白酶复合改性小麦面筋蛋白加工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13.
- [27]裴旭东.小麦面筋蛋白的改性及其应用[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 [28]王晶晶.小麦面筋蛋白对面条品质影响的研究[D].郑州:河南工业大学,2014.
- [29]杨天一.小麦谷蛋白对面包品质影响的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17.
- [30]王香玉.馒头制作过程中蛋白交联行为及其对品质的影响[D].无锡:江南大学,2016.
- [31]戈志成.湿热-琥珀酸酐酰化小麦面筋蛋白的制备及应用[D].无锡:江南大学,2006.
- [32]王延州.小麦蛋白谷氨酰胺肽制备及对肠黏膜损伤修复效果的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14.
- [33]奚宽鹏.小麦面筋蛋白酶解物作为啤酒酵母氮源的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15.
- [34]何文猛.谷朊粉改性及其在冰激凌中的应用[D].无锡:江南大学,2014.
- [35]丛旭,刘锐,刘砚,等.小麦面筋蛋白可食膜的制备及其在调料包中的应用[J].天津科技大学学报,2018(3):9-17.

(责任编辑 姚虹)

Modification of Wheat Glute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ood Industry

WANG Jianzhong¹, YAO Hong²

(1. Henan Food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Zhengzhou, Henan 450053, China; 2. College of Chemical and Food,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Wheat glute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quantity, low price, high protein content, good flavor and complete amino acid composit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ood industry. However, due to the poor solubility, emulsifying property and emulsifying stability of wheat gluten, the application of wheat gluten in food processing is limited. In order to improve its processing performance, modification is often carried out. The modification method of wheat glute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ood industry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food industry; wheat gluten; modification; application

盐胁迫下不同地锦属植物的生理响应及耐盐性研究

孙浩冉¹, 孙 森²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图书馆, 河南 南阳 473000)

摘要:以不同地锦属植物种子为材料,研究170 mmol/L NaCl胁迫下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和其他生理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与对照相比,盐胁迫下各品种种子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等指标均出现下降,地下部分干重较地上部分干重下降较为显著。各幼苗叶片相对电导率、丙二醛、脯氨酸、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均较对照显著升高,而异叶地锦、花叶地锦、绿叶地锦、五叶地锦的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较对照明显降低。三叶地锦在盐胁迫下其种子发芽能力、叶片渗透调节能力均较强,表现出较好的耐受性;异叶地锦受盐胁迫影响较大,对盐胁迫较为敏感;花叶地锦、绿叶地锦、五叶地锦、栓翅地锦介于二者中间,为中等耐盐型。

关键词:地锦属;生理响应;耐盐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22

中图分类号:Q94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114-05

盐渍化土壤抑制作物生长,影响粮食产量,降低土地利用价值,是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破坏因素之一,也是世界性生态难题^[1]。目前全球超过20%的农田和旱地遭受盐渍化的威胁^[2]。我国作为世界上土壤盐渍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盐渍化的治理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盐渍化土壤易滞水,不易疏干,地温低,降低了酶的活性,抑制微生物代谢和有机质转化,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另一方面,盐离子含量偏高升高了土壤中溶液的渗透压,导致植物出现生理性缺水,生长发育被抑制。目前,盐渍化土壤的治理可通过两种手段来实现:一是利用生化或物理的手段降低盐含量,增加土壤肥力,满足植物生长发育的需要;二是种植耐盐植物来逐渐改善和提高土质。其中,后者是盐渍化治理的一种更为经济有效的手段,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地锦为多年生藤本植物,具有喜攀爬、观赏性强等特点,其根茎可入药,具有活血、消肿的功效。作为立体绿化的首选植物,地锦对SO₂等污染物具有较强的吸收力,同时在防沙护坡、保持水土等方面显

示了独特的生物学特性。目前对地锦的研究多集中在医学和药用价值、城市园林绿化、生态、食品等方面,对其耐盐性研究较少。通过研究170 mmol/L NaCl对6个不同地锦品种种子发芽、幼苗生长及生理生化指标变化的影响,根据耐盐程度进行分类,为选育合适的品种及盐碱地改良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 法

1.1 试验材料与设计

试验地锦共6种:异叶地锦、花叶地锦、三叶地锦、绿叶地锦、五叶地锦和栓翅地锦,分别用符号T1, T2, T3, T4, T5 和 T6 表示。试验前用95%乙醇将种子消毒,蒸馏水冲洗,温水浸泡48 h后置于培养皿中(每皿25粒),设置2个处理:0(CK), 170 mmol/L,每个处理重复3次。每天定时观察记录,15 d后测量苗长、胚根长、茎叶干鲜重,计算发芽率、发芽指数、活力指数。

分别将各品种种子播种于128孔育苗盘中,于一叶一心时选取长势健壮的幼苗移植于40cm×30cm的塑料盆中,每盆1株,待长至三叶一心时进行盐胁

收稿日期:2019-07-26

作者简介:孙浩冉(1979—),男,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

迫处理,每个处理重复3次。有关计算式如下:

$$\text{发芽率}\% = \frac{t \text{日发芽总数}}{\text{播种数}} \times 100\%, \quad (1)$$

$$\text{胚根相对长度}\% = \frac{\text{盐胁迫下胚根长度}}{\text{对照下胚根长度}} \times 100\%, \quad (2)$$

$$\text{发芽指数} = \frac{t \text{日发芽总数}}{\text{相应发芽天数}}, \quad (3)$$

耐盐指数 =

$$\frac{(\text{胚根平均长度} + \text{平均相对发芽率} + \text{相对发芽势})}{3}, \quad (4)$$

$$\text{幼苗存活率}\% = \frac{\text{存活株数}}{\text{总株数}} \times 100\%, \quad (5)$$

$$\text{组织含水量}\% = \frac{\text{鲜重} - \text{干重}}{\text{鲜重}} \times 100\%, \quad (6)$$

$$\text{盐害指数}\% = \sum \frac{\text{受害等级} \times \text{株数}}{\text{最高级数} \times \text{总株数}} \times 100\%。 \quad (7)$$

受害等级划分如下:0级为正常生长;1级为少量叶片枯黄;2级为50%叶片枯黄;3级为80%叶片

枯黄,50%茎干枯;4级为完全死亡。

1.2 生理指标测定和数据处理

于盐胁迫处理15d后,剪取新鲜叶片分别测定叶片的相对电导率(RC)^[3]、丙二醛(MDA)^[4]、超氧化物歧化酶(SOD)^[4]、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脯氨酸(Pro)、可溶性糖(SS)^[4]和可溶性蛋白(SP)含量。使用SPSS 18.0和Excel 2010软件对取得的数据进行差异性分析和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盐胁迫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表1中,在对照浓度下,各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无显著性差异。在受到盐胁迫时,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显著降低,其中T1,T2发芽率极显著低于CK,T4,T5显著低于CK;T3,T6显著高于T5,极显著高于T1,T2和T4。T3,T6发芽势较对照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高于T4和T5,极显著高于T1和T2。上述结果表明:盐胁迫抑制了种子萌发和胚根生长。其中,T3胚根长度显著高于其他基因型,其耐盐指数也最高,表明其耐盐性较强,其余种子的耐盐能力从高到低依次为T6,T5,T4,T2,T1。

表1 不同基因地锦种子萌发情况

材料	发芽率/%		发芽势/%		胚根长/cm		发芽指数		耐盐指数/%
	CK	ST	CK	ST	CK	ST	CK	ST	
T1	91 Aa	41 Cc	89 Aa	40 Cc	2.08 Aa	0.47 Cc	4.51 Aa	1.65 Cc	0.37 C
T2	92 Aa	45 Cc	90 Aa	43 Cc	2.08 Aa	0.87 Bb	4.50 Aa	1.91 Bb	0.45 B
T3	89 Aa	67 Aa	87 Aa	65 Aa	2.13 Aa	1.02 Aa	4.56 Aa	2.55 Aa	0.65 A
T4	91 Aa	52 Cb	88 Aa	51 Bb	2.11 Aa	0.51 Cc	4.52 Aa	1.88 Bb	0.46 B
T5	90 Aa	55 Bb	87 Aa	52 Bb	2.12 Aa	0.56 Cc	4.50 Aa	1.72 Cc	0.48 B
T6	90 Aa	62 Aa	88 Aa	63 Aa	2.12 Aa	0.98 Ab	4.55 Aa	2.13 Aa	0.61 A

注:同列相邻和相间不同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同一品种较对照CK差异显著($P < 0.05$)和极显著($P < 0.01$);同列相邻和相间不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不同品种差异显著($P < 0.05$)和极显著($P < 0.01$);下同。

2.2 盐胁迫对幼苗生长的影响

2.2.1 干物重和组织含水量

干物重和组织含水量分别反映植物体内有机物多寡和水分含量,两者对植物生长发育、叶表气孔开合、光合作用,乃至果实品质产生重要影响。由表2可知,各样品干物重和组织含水量较对照无显著差异。在盐胁迫下,不同品种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干重均较对照明显下降,但降幅不同。地上部分干重,T2,T4较对照分别降低21%和24%,达显著差异水平($P < 0.05$);T1,T5分别降低28%和25%,达极显著差异水平($P < 0.01$)。地下部分干重,T1,T5较对照均显著降低($P < 0.05$),其他均较对照无显著差异。同时,不同幼苗的组织含水量也明显下降,其中T2,T3,T6较对照分别降低1.26%,2.09%和

1.78%,差异不显著,而T1,T4,T5较对照分别下降5.03%,4.44%和4.54%,处于显著差异水平。这说明T1,T4,T5干物重和组织含水量受盐胁迫影响最大,其余受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T2,T6,T3。

2.2.2 幼苗存活率和盐害指数

在盐胁迫下,不同品种幼苗存活率均不同程度下降。其中,T2,T3的幼苗存活率分别为46.23%和51.74%,显著高于T6($P < 0.05$),极显著高于T1,T4和T5($P < 0.01$),而T1,T4,T5幼苗存活率分别仅为29.45%,26.67%和25.78%。结果显示幼苗存活率与盐害指数呈反比,幼苗存活率越低其盐害指数越高,盐害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T1,T5,T4,T6,T2,T3。

表2 不同基因地锦幼苗生长情况

材料	地上干物重		地下干物重		地上组织含水量		幼苗存活率/%	盐害指数/%
	CK	ST	CK	ST	CK	ST		
T1	0.54 Aa	0.39 Cc	0.05 Aa	0.01 Ab	95.5 Aa	90.7 Ab	25.78 A	82.37 C
T2	0.53 Aa	0.42 Bb	0.05 Aa	0.01 Aab	94.9 Aa	93.7 Aa	46.23 D	65.54 AB
T3	0.57 Aa	0.49 Aa	0.06 Aa	0.02 Aa	95.6 Aa	93.6 Aa	51.74 D	63.77 A
T4	0.55 Aa	0.42 Bb	0.06 Aa	0.02 Aa	94.7 Aa	90.5 Ab	29.45 B	70.22 B
T5	0.53 Aa	0.40 BCc	0.05 Aa	0.01 Ab	94.7 Aa	90.4 Ab	26.67 A	79.82 C
T6	0.55 Aa	0.47 Aa	0.05 Aa	0.01 Aa	95.4 Aa	93.7 Aa	36.35 C	68.34 B

2.3 盐胁迫对幼苗相对电导率(RC)和丙二醛(MDA)的影响

由图1a可知,在盐胁迫下与各样品的RC与对照相比分别增加813.95%,623.99%,502.99%,809.94%,744.95%和565.91%,均达到极显著差异水平($P < 0.01$)。同时,6种样品叶片的RC也存在明显差异,T3极显著低于T1,T2,T4和T5($P < 0.01$),显著低于T6($P < 0.05$),说明NaCl胁迫会改变植物细胞膜结构,引起相对电导率升高,膜透性增大,从而降低了自身的稳定性,但这种变化也因品种而有差异,各品种RC数值由高到低依次为T1,T4,T5,T2,T6,T3。

细胞膜脂过氧化生成MDA,继而与蛋白质、氨

基酸生成不溶物,干扰细胞的正常生理活动,因此,MDA含量也可反映细胞膜透性变化情况。由图1b可知,在NaCl胁迫下,各样品的MDA较对照显著增大,T1~T6分别增加128.99%,100%,61.98%,118.95%,121.96%和85.96%,均达到极显著差异水平($P < 0.01$)。同时,6个品种叶片的MDA含量彼此也存在显著差异,T3的MDA含量显著低于T2($P < 0.05$),极显著低于T1,T4和T5($P < 0.01$),说明盐胁迫会极显著地提高植物叶片中MDA含量,导致细胞膜透性增大。在相同浓度盐胁迫下不同品种的MDA含量有明显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T1,T5,T4,T2,T6,T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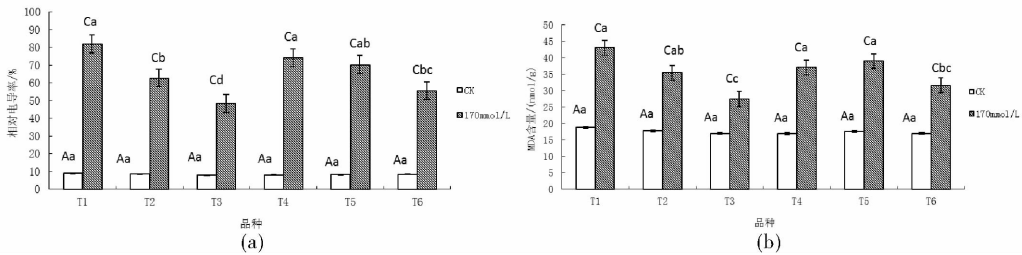


图1 盐胁迫对RC/MDA的影响

2.4 盐胁迫对叶片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作为一种重要的抗氧化酶,SOD肩负着清除生物体新陈代谢生成的自由基,保护自身免受伤害的重任,其水平高低间接反映机体所受伤害程度。由图2a可见,在同浓度盐胁迫下,不同品种的SOD活性变化趋势不同,其中T1,T2,T4,T5均较对照明显降低,而T3,T6则显著高于对照($P < 0.05$)。同浓度盐胁迫下,T3和T6的SOD含量高于T1,T2,T4,T5,表明在盐胁迫下,爬山虎能通过调整自身的SOD活性水平,从而减轻盐胁迫的伤害。T3,T6的SOD活性水平最高,代表其对盐分的适应性更强,T1最低,代表其对盐分的耐受性最差。

POD和CAT则是生物体内清除自由基的另两种保护酶,其活性高低可以判断机体受活性氧自由基伤害的程度。由图2b和2c可见,较对照T1,T2,T4,T5均下降,T6升高,T3显著升高。同样胁迫下,POD和

CAT活性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T3,T6,T5,T2,T4,T1。

上述结果说明,在盐胁迫下,不同品种叶片保护酶活性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在保护酶活性方面由强到弱依次为T3,T6,T5,T2,T4,T1。

2.5 盐胁迫对叶片渗透调节物质的影响

脯氨酸可以调节细胞质渗透平衡,在有机体抗击渗透胁迫中起到保护作用。图3a中T1~T6脯氨酸含量较对照极显著升高($P < 0.01$)。在相同浓度盐胁迫下T3叶片的脯氨酸含量显著高于T2($P < 0.05$),极显著高于T1和T4($P < 0.01$)。可溶性糖含量增加是植物抵抗盐胁迫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图3c中T1~T6叶片的可溶性糖含量存在明显差异,较对照分别增加25.57%,54.93%,73.64%,26.15%,171.57%和70.44%,其中T2,T3,T5,T6达到显著差异水平($P < 0.05$)。在盐胁迫下,T3显著高于T2,T6($P < 0.05$),极显著高于T1,T4,T5

($P < 0.01$)。图 3c 中 6 种样品 SP 含量均较对照显著升高,盐胁迫下 T3 显著高于 T2, T4, T5, 极显著高于 T1。这说明,盐胁迫会显著提高叶片的 SP 含量,不同爬山虎叶片的渗透调节物质含量存在显著差异,其中, T3 爬山虎含量最高,其次为 T6, 而 T4 含量最低。

了光合作用,致使生物量下降有关。研究还发现,盐胁迫下,地锦幼苗组织含水量降幅越小,幼苗存活率越高,耐盐性越好,与樊秀彩^[7]等人研究结果一致,即耐盐性与幼苗组织含水量降幅呈负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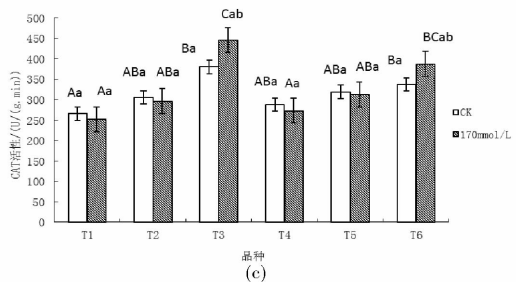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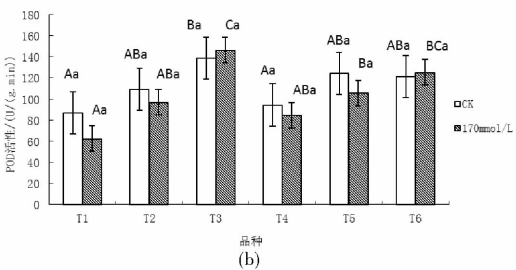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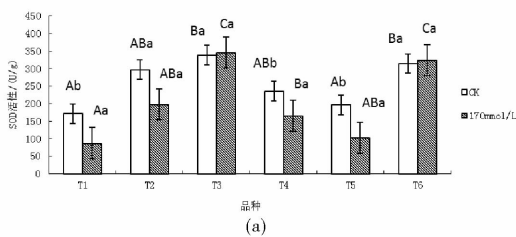


图 2 盐胁迫对叶片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3 讨论

3.1 对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

一般认为,盐分对植物的胁迫最初表现为种子萌发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会产生 3 种效应:完全抑制效应、增效效应和负效效应^[5]。盐分通过渗透胁迫和离子毒害两种手段达到这种抑制,但不同植物作用机制不同,低浓度下以离子毒害为主,高浓度下以渗透胁迫为主。实验发现,NaCl 胁迫下,各种子的萌发率显著下降,发芽时间明显延后。

生物量下降和个体矮小则是盐胁迫对植物生长发育影响的另外两种表现,其机理一是盐胁迫制造出低水势环境从而引发叶片水势降低,导致气孔导度下降;二是盐胁迫环境降低了光合作用的生产效率,减少物质和能量的产出;三是抑制特定酶和代谢进程。在盐胁迫下,植物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生物量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这与 STROGONOV^[6]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幼苗叶绿素受到破坏,削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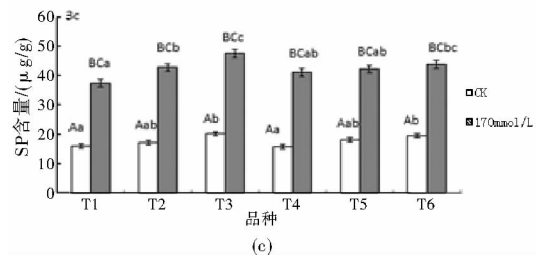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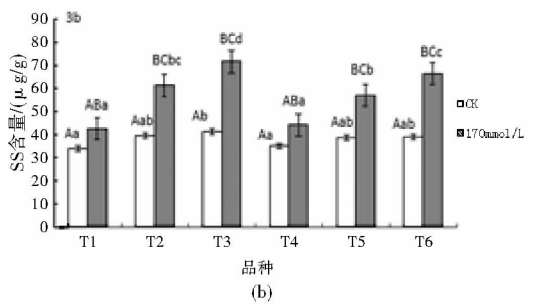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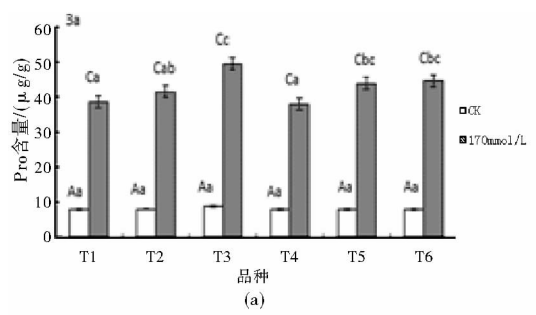


图 3 盐胁迫对叶片渗透调节物质的影响

3.2 对幼苗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渗透调节是植物抵抗盐胁迫的基本手段之一。盐胁迫下,植物体内的活性氧含量大幅提高,引起 MDA 随之升高,细胞膜脂出现过氧化和脱脂化,细胞结构被破坏。本研究发现,盐胁迫下叶片细胞膜透性和 MDA 含量较对照显著增加,表明细胞膜受损害程度加重,这可能是盐胁迫破坏了植物体内活性氧生成与清除的动态平衡所致。不同品种损害程度不同,其中, T1 最重,依次为 T4, T5, T2, T6 和 T3。

SOD, POD, CAT 是生物体内重要的抗氧化酶,三者协同作用共同抵御自由基的侵害。植物在逆境环境中,会诱发 3 种保护酶活性升高,从而增强自身机体对胁迫的抵抗能力^[8],这与本实验结果有一定出入,可能是盐胁迫浓度已超过 T1, T2, T4 和 T5 最大胁迫浓度,保护酶活性已开始逐渐降低,而 T3 和 T6 还未达到其最大值。试验样品中保护酶活性高低也与品种有关, T3 显著高于其他品种,依次是 T6, T5, T2, T4 和 T1。植物通过有机和无机渗透调

节自身水势从而维持正常生理代谢,通过合成脯氨酸等小分子有机物有助降低细胞水势,进而达到提高自身吸水能力的目的。文献发现抗渗透胁迫能力与体内脯氨酸含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耐盐能力越强,对应的脯氨酸含量越高,本实验发现在盐胁迫下各样品脯氨酸均显著升高,但不同品种间也有显著差异,T3 最高,依次为 T6,T2,T4,T5 和 T1。

植物耐盐性机理十分复杂,通常认为耐盐性的大小由其遗传性决定。因此,对植物进行耐盐性评价时,应选择同一植物的不同品种从多种指标多角度进行综合分析。本实验从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发育、叶片相对电导率、叶片保护酶活性、渗透调节物质等指标研究出发,发现盐胁迫不同品种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三叶地锦等在盐胁迫下种子发芽、幼苗渗透调节和抗氧化酶生成能力较强,耐盐能力强。异叶地锦受盐胁迫影响较大,为盐敏感型,绿叶地锦等表现介于两者之间,为中等耐盐性型,实验结果对耐盐性品种的筛选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丽娟,李小玉.干旱区土壤盐分积累过程研究进展

[J].生态学杂志,2019,38(3):891-898.

[2]WANG W, VINO CUR B, ALTMAN A. Plant responses to drought, salinity 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towards genetic engineering for stress tolerance[J]. Planta,2003(218):1-14.

[3]宋丹.几个引进树种幼苗耐盐特性及耐盐性评价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2006.

[4]张志良,翟伟菁.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刘永惠,沈一,陈志德,等.不同花生品种(系)萌发期耐盐性的鉴定与评价[J].中国油料作物学报,2012,34(2):168-180.

[6]STROGONOV B P.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lant cell in saline habitats[M]. New York:Halsted Press,1973:78-83.

[7]樊秀彩,张亚冰,刘崇怀,等. NaCl 胁迫对葡萄幼苗叶片有机渗透调节物质和膜脂过氧化的影响[J].果树学报,2007,24(6):765-769.

[8]杨艳兵,姜艳丽,尹晓斐,等. NaCl 胁迫对棉花幼苗生理特性的影响[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3,33(4):290-294.

(责任编辑 姚虹)

Study on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and Salt Tolerance of Different Parthenocissus Plants

SUN Haoran¹, SUN Miao²

(1. College of Chemical and food,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Library, Nany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Nanyang, Henan 473000, China)

Abstract: Six parthenocissus plants *parthenocissus semicordata* planch, *parthenocissus henryana* (Hemsl.) Diels & Gilg, *parthenocissus dalzielii* Gagnep, *parthenocissus suberosa* Hand - Mazz, *parthenocissus quinquefolia* (L.) planch and *parthenocissus laetevirens* Rehd were employ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170 mmol/l NaCl on seed germination, seedling growth and som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er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seed germination percentage, germination potential, germination index and vigor index decreased. Both the shoot dry weight and the root dry weight of different genotypes decreased to some extent. The RC, MDA content, Pro, SS and SP of each seedlin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while the activities of SOD, POD and CA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arthenocissus semicordata* planch exhibited strong salt tolerant ability due to its stronger ability of seed germination, osmotic regulation and scavenging reactive oxygen. *parthenocissus dalzielii* Gagnep was prone to be oxidated so it was regarded as salt - sensitive varieties; *parthenocissus suberosa* Hand - Mazz, *parthenocissus quinquefolia* (L.) planch, *parthenocissus henryana* (Hemsl.) Diels & Gilg and *parthenocissus laetevirens* Rehd were middle - level salt tolerant plants in this study.

Key words: parthenocissus; physiological response; salt tolerance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连续测定谷物中铅、铬、镉及不确定度评定

张强^{1,2}, 徐惠^{1,2}, 曹雅莉^{3,4}, 王萍^{1,2*}, 张小琴^{1,2}

(1.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 四川 遂宁 629000; 2. 四川省遂宁市农产品检验监测中心, 四川 遂宁 629000; 3. 四川轻工业研究设计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4. 国家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成都站,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样品经湿法消解, 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连续测定谷物中铅、铬、镉含量。铅、铬、镉检出限分别为 0.020, 0.013, 0.0013 mg/kg; 铅、铬、镉浓度分别在 0~30, 0~20, 0~3.5 ng/mL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高、中、低浓度加标, 铅、铬、镉样品回收率分别为 98.97%~104.34%, 97.13%~104.20%, 98.93%~104.23%; 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1.72%~6.47%, 3.34%~5.31%, 4.03%~6.44%。该方法各项技术指标能满足测定要求, 可用于谷物中铅、铬、镉的连续测定, 在此基础上以铬为例对不确定度进行评定。

关键词: 谷物; 石墨炉原子吸收; 铅; 铬; 镉; 不确定度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23

中图分类号: O65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19)05-0119-06

植物生长过程中, 可通过根系作用将重金属富集到谷物中。如果长期摄入重金属含量高的谷物, 可诱发人体产生各种疾病, 严重危害健康。因此,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1] 严格规定了谷物中铅、铬、镉的限量。谷物中铅、铬、镉 3 种重金属检测是农产品检测的重要指标, 目前主要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测定^[2-4], 但各方法只适合单一元素的测定, 对同一样品进行不同项目检测时需要多次前处理, 导致试剂耗量大、工作效率低、环境污染大。因此, 研究适合谷物中多种重金属连续测定的方法, 在处理不同检测项目样品时, 就能避免单一方法导致的不足。拟采用湿法消解-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连续测定谷物中铅、铬、镉, 以建立适用于谷物中三种重金属连续测定的快速、稳定、准确的检测方法, 并对测试结果进行误差来源的分析, 给出扩展不确定度, 为实验室质量控制和边缘值判定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仪器

AA-900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新加坡 Perkin-Elmer 公司; 20A plus 电热板; 电子天平: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d=0.0001\text{g}$ 。

1.2 试剂与材料

硝酸: UP 级; 高氯酸: UP 级; 铅标准溶液 (1 000 mg/L)、铬标准溶液 (1 000 mg/L)、镉标准溶液 (1 000 mg/L): 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中心; 质控样品 GSB-22 小麦、GSB-2 小麦: 国家质检中心; 机体改进剂 (10% NaH_2PO_4 溶液, 临用时配成 1%): 新加坡 Perkin-Elmer 公司; 实验室用水均为超纯水 (自制, 优普超纯水制造系统); 样品由市场和网络渠道自行采购。

1.3 标准溶液的配制

用 0.1% 硝酸溶液分别将铅、铬、镉标准溶液稀释, 配制成铅标准储备液 (10 $\mu\text{g}/\text{mL}$)、铬标准储备

收稿日期: 2019-05-10

作者简介: 张强 (1989—), 男, 四川遂宁人, 硕士, 四川省遂宁市农业农村局、遂宁市农产品检验监测中心职员, 从事化学分析及相关研究工作。

液(10 μg/mL)、镉标准储备液(10 μg/mL),于0~4℃保存。

铅标准储备液(10 μg/mL)逐级稀释,配制成20 ng/mL铅使用液,用石墨炉自动进样器自动配制成0.5, 10, 20, 30 ng/mL铅标准系列。

铬标准储备液(10 μg/mL)逐级稀释,配制成20 ng/mL铬使用液,用石墨炉自动进样器自动配制成0.4, 6, 8, 12, 16, 20 ng/mL铬标准系列。

镉标准储备液(10 μg/mL)逐级稀释,配制成5.0 ng/mL镉使用液,用石墨炉自动进样器自动配制成0, 0.5, 1.0, 2.0, 3.5 ng/mL镉标准系列。

1.4 样品处理

称取谷物类样品0.50 g(准确到±0.01 g)于150 mL广口三角瓶中,加入10 mL硝酸(HNO₃),再加入1 mL高氯酸(HClO₄),盖上歪颈漏斗,浸泡过夜。在可调式电热炉上消解(参考条件:120℃ 1 h,升至180℃ 4 h,升至200℃)。若消化液呈棕褐色,再加少量硝酸,消解至冒白烟,消化液呈无色透明或略带黄色,取下三角瓶,冷却后用1%硝酸转移、定容至10 mL,混匀备用^[5-7]。试剂空白按上述方法操作进行湿法消解。

1.5 测定

吸取待测样品20 μL(标准曲线按自动计算结果,自动吸取样品),稀释液10 μL,机体改进剂5 mL

(1% NaH₂PO₄溶液,测铬不加机体改进剂),于石墨管中按预设升温程序升温,然后测定待测样品吸光度,待测样品含量计算式为

$$X = \frac{(C_1 - C_0) \times V_1}{m \times 1000}, \quad (1)$$

式中: X —被测物含量,mg/L; C_1 —消解液中被物含量,mg/L; C_0 —空白中被测物含量,mg/L; m —称样量,g。

2 结果与讨论

2.1 仪器条件筛选

优化仪器条件,有利于提高仪器灵敏度,提高样品检出率。本实验使用10 ng/mL铅、10 ng/mL铬和2 ng/mL镉,在不同仪器条件下分别优化干化温度、灰化温度和原子化温度。

2.1.1 干化温度优化

干化温度对铅、铬、镉测定结果的影响见图1。由图1可知,铅在120℃吸光度最大,之后响应值降低;铬在100~130℃吸光度基本不变,而后降低;镉吸光度在实验条件范围内基本不变。这是因为温度过低或温度过高,干化不完全,在进一步升温过后导致液体爆沸,喷溅不利于测定,导致测定结果吸光度降低。因此,铅、铬、镉的干化温度分别选择120, 130,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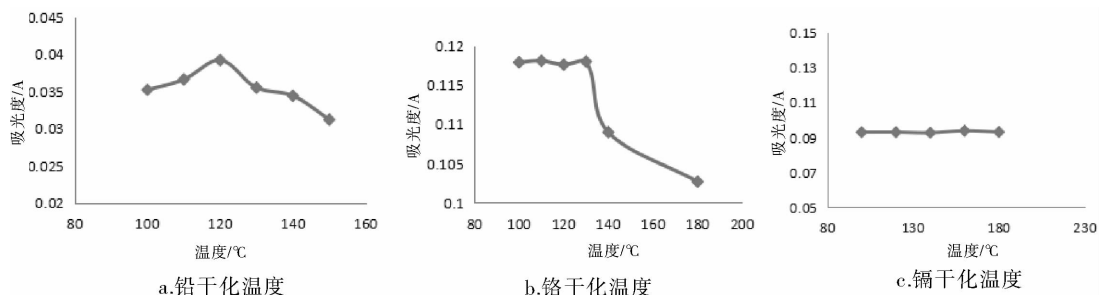


图1 铅、铬、镉干化温度对吸光度的影响

2.1.2 灰化温度优化

灰化温度对铅、铬、镉测定结果的影响见图2。由图2可知,铅在500~1000℃吸光度基本一致;铬在800~1400℃吸光度基本无变化,之后降低;镉在700℃吸光度最大。这是因为温度过低,灰化不

完全,在进入原子化之前,相应的重金属元素没有形成有利于原子化的形态;温度过高,灰化后的目标元素部分原子化,从而导致测定结果降低。因此,铅、铬、镉的灰化温度分别选择1000, 1400, 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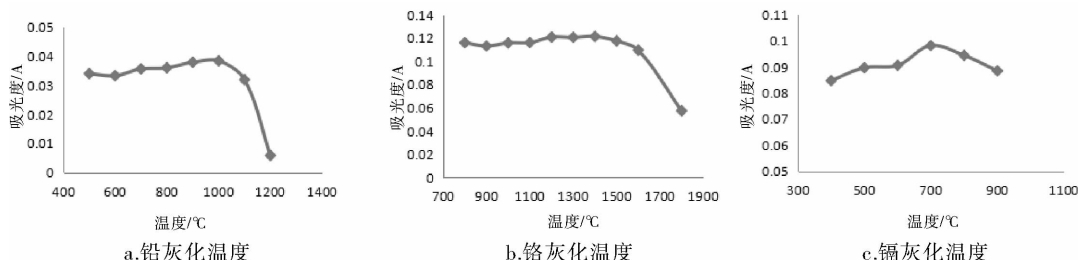


图2 铅、铬、镉灰化温度对吸光度的影响

2.1.3 原子化温度优化

原子化温度是样品测定的关键温度,恰当的原子化温度能保证样品检测的准确性,铅、铬、镉原子化温度对测定结果的影响见图3。由图3可知,铅在1400℃吸光度最大;铬在2100~2300℃吸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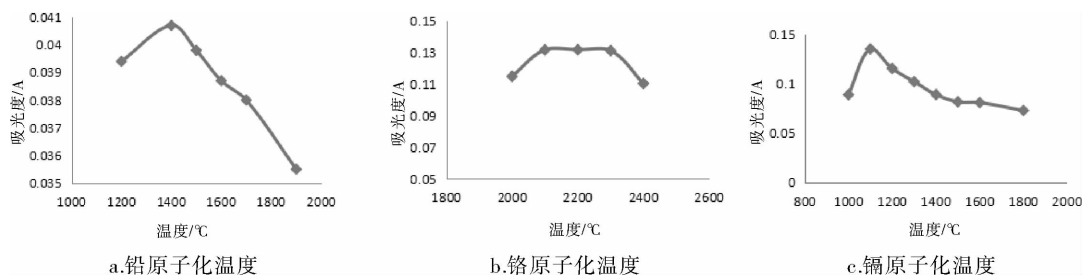


图3 铅、铬、镉原子化温度对吸光度的影响

2.1.4 石墨炉升温程序

根据实验优化结果筛选出适合铅、铬、镉3种重金属测定的石墨炉升温程序条件,见表1。

表1 石墨炉升温条件

检测项目	干燥温度/℃	灰化温度/℃	原子化温度/℃	除杂温度/℃	测量方式
铅	120	1 000	1 400	2 450	背景,扣除
铬	130	1 400	2 300	2 450	背景,扣除
镉	130	700	1 100	2 450	背景,扣除

2.2 方法评价

2.2.1 标准曲线及线性范围

石墨炉自动稀释配制铅、铬、镉3种重金属元素标准曲线见表2。由表2可知,铅、铬、镉3种重金属元素分别在0~30 ng/mL, 0~20 ng/mL, 0~3.5 ng/m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表2 铅、铬、镉3种元素标准曲线及相关系数

元素	标准曲线方程	线性相关系数(R)
铬	$Y=0.01530X-0.00223$	0.9998
镉	$Y=0.06909X-0.00339$	0.9993
铅	$Y=0.00243X-0.00056$	0.9997

2.2.1 方法精密性与准确度

采用空白样品加标进行铅、镉和铬3种元素的加标回收率实验及精密性实验,验证方法的可靠性。每种元素做高、中、低三平行加标,计算加标回收率及相对标准偏差(RSD),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高、中、低浓度加标,样品中铅、铬、镉回收率分别为98.97%~104.34%,97.13%~104.20%,98.93%~104.23%,精密度高;相对标准偏差(RSD)在1.72%~6.47%,3.34%~5.31%,4.03%~6.44%,能满足测定要求。

表3 铅、镉、铬三种元素高、中、低加标回收结果

元素	加标量/(ng/mL)	测定值/(ng/mL)	平均值/(ng/mL)	回收率/%	SD/(ng/mL)	RSD/%
铅	5.00	4.62,4.53,5.01,5.22,5.21,4.76,5.39	4.95	98.97	0.32	6.47
	15.00	15.81,15.52,15.71,15.54,15.61,15.81,14.91	15.56	103.72	0.31	1.72
	25.00	25.31,27.81,24.44,25.21,26.51,27.31,26.01	25.80	104.34	1.21	4.63
	4.00	3.77,3.82,4.21,4.21,3.86,4.15,4.27	4.04	101.04	0.21	5.31
铬	8.00	7.35,7.83,7.42,8.38,7.27,8.25,7.89	7.77	97.13	0.44	5.68
	16.00	15.55,16.78,16.82,16.54,17.15,17.28,16.59	16.67	104.20	0.56	3.34
	0.500	0.475,0.486,0.521,0.497,0.510,0.531,0.522	0.506	101.22	0.020	4.03
镉	1.500	1.428,1.551,1.491,1.580,1.433,1.476,1.429	1.484	98.93	0.061	4.13
	3.000	3.123,3.238,3.585,2.801,3.302,3.647,2.893	3.127	104.23	0.20	6.44

2.2.2 方法检出限

按照试验方法重复分析7个空白低限加标样品,计算方法检出限。试验方法检出限计算参照美国EPASW-846中规定,计算式为

$$MDL = St_{(n-1, 1-\alpha=0.99)} \quad (2)$$

式中:MDL—方法检出限,mg/Kg;S—低浓度加标样品重复试验的标准偏差;n—重复试验次数;t(n-1, 1-a=0.99)—自由度为n-1、置信水平为99%时

的t值。

称取样品0.5g,定容至10mL,根据检测结果,铅、镉、铬方法检出限分别为0.020,0.013,0.0013mg/kg,满足检测需要。

2.3 样品测定

优化条件下对谷物测定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谷物中铬含量在0.3085~0.9549mg/Kg,虽然处于国标规定的限量范围(≤1mg/Kg)之内,

但显著高于其他被测指标,这与植物对铬选择性富集的程度有关。将镉测定结果与国际食品准则委员会(CAC)《食品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CODEX STAN 193 - 2010)^[8]和欧盟食品污染限量标准(EC629 - 2008)^[9]比较,我国标准高于欧盟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铅测定值均小于我国标准值,也小于国际标准值 0.2 mg/Kg,表明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并高于部分地区标准。

表 4 谷物样品测量结果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铅(Pb)含量 mg/kg	铬(Cr)含量 mg/kg	镉(Cd)含量 mg/kg	判定结果
GW-1	稻谷	0.15	0.881	0.017 1	合格
GW-2	玉米	0.16	0.902	0.077 2	合格
GW-3	稻谷	0.11	0.393	0.041 1	合格
GW-4	稻谷	0.12	0.462	0.044 2	合格
GW-5	小麦	0.06	0.957	0.052 3	合格
GW-6	小麦	0.18	0.344	0.046 8	合格
GW-7	稻谷	0.17	0.308	0.048 8	合格
GW-8	玉米	0.10	0.929	0.079 0	合格
GW-9	玉米	0.17	0.534	0.044 1	合格
GW-10	玉米	0.12	0.763	0.050 5	合格
GW-11	玉米	0.17	0.840	0.044 8	合格

3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以铬为例。本实验条件下,对铬测定时测量不确定的度评定方法按照国家标准《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与表示》^[10]执行。

3.1 数学模型

本实验样品中铬的计算见式(1)。

3.2 测量不确定度来源

(1)样品称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frac{u(m)}{m}$ 。该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于样品称量过程中仪器的不确定度。

(2)样品消解、定容引入的不确定度 $\frac{u(v)}{v}$ 。该不确定度来源主要有:①容量瓶允差;②温度变化度;③容量瓶定容时估读误差。

(3)样品测定引入的不确定度 $\frac{u(C)}{C}$ 。该不确定度来源主要有:①标准溶液配制;②测量重复性;③标准曲线求得样品浓度 C_1 ;④储备液不确定度。

3.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评定

3.3.1 称量样品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frac{u(m)}{m}$

本实验称量样品所用天平为梅特勒电子天平,最小分值为 0.000 1 g,准确称取 0.500 0g 样品,按均匀分布($k = 3$),则 $\frac{u(m)}{m} = \frac{0.000 1}{\sqrt{3} \times 0.5} = 0.000 15$ 。

3.3.2 样品消解、定容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frac{u(v)}{v}$$

(1)容量瓶引入的不确定度 $\mu_{v,1}$

根据 JJG 196 - 2006《常用玻璃量器》的规定^[11],本实验所用 10 mL, A 级单标线容量瓶,20℃时允为 ± 0.020 mL,按三角分布($k = 6$),则 $u_{v,1} = \frac{0.020}{\sqrt{6}} = 0.008 16$ mL。

(2)容量瓶因温度引起的不确定度 $\mu_{v,2}$

本实验室常年温控为 (20 ± 5) ℃,而 A 级单标线容量瓶出厂校为 20℃,水体膨胀系数为 $2.1 \times 10^{-4}/\text{℃}$,按均匀分布($k = 3$)则 $u_{v,2} = \frac{10.0 \times 5 \times 2.1 \times 10^{-4}}{\sqrt{3}} = 0.006 06$ mL。

(3)定容时估读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mu_{v,3}$

量瓶定容时估读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mu_{v,3}$,单标线 10 mL A 级容量瓶定容时的估读误差约为 ± 0.005 mL,按三角分布($k = 6$)则 $u_{v,3} = \frac{0.005}{\sqrt{6}} = 0.002 04$ mL。

合成上述不确定度,则样品定容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u_v = \sqrt{u_{v,1}^2 + u_{v,2}^2 + u_{v,3}^2} = \sqrt{0.008 16^2 + 0.006 06^2 + 0.002 04^2} = 0.010 37 \text{ mL}。$$

综上,样品消解、定容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frac{u_v}{v} = \frac{0.010 37}{10} = 0.001 037$ 。

3.3.3 样品测定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left(\frac{u(c)}{C}\right)$

(1)标准溶液配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mu_{c,1}$

①标准储备液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mu_{c,1,1}$:标准储备液 Cr = 1 000 ug/mL,证书给出不确定度为 $\pm 0.7\%$,按均匀分布($k = 3$),标准不确定度 $u_{c,1,1} = \frac{0.007 \times 1 000}{\sqrt{3} \times 1 000} = 0.004 02$ 。

②标准溶液配制过程中玻璃仪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mu_{c,1,2}$:铬标准溶液配标过程,见 1.3.1。两次使用 1 ml 移液管和 100 ml 容量瓶,1 次使用 10 ml 移液管,一次使用 50 ml 容量瓶。现以 $C = 20$ ng/mL 进行评定,按三角分布($k = 6$),不确定度见表 5。第 1 次和第 2 次稀释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frac{u_{g,1}}{g_1} = \frac{u_{g,2}}{g_2} = \sqrt{\left[\frac{u_{v,1}}{v}\right]^2 + \left[\frac{u_v, 100}{v}\right]^2} = 0.002 9。$$

次稀释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frac{u_{g,3}}{g_3} =$

$$\sqrt{\left[\frac{u_{v,10}}{v}\right]^2 + \left[\frac{u_{v,50}}{v}\right]^2} = 0.00084。$$

③标准溶液配制过程中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mu_{c,1}$:合成标准溶液配制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frac{u_{c,1}}{C} =$

$$\sqrt{\left[u_{c,11}\right]^2 + \left[\frac{u_{g,1}}{g_1}\right]^2 + \left[\frac{u_{g,2}}{g_2}\right]^2 + \left[\frac{u_{g,3}}{g_4}\right]^2} = 0.00582,$$

则 $u_{c,1} = 0.00582 \times 20 \text{ ng/mL} = 0.1164 \text{ (}\mu\text{g/L)}。$

表5 玻璃器具校准的不确定度

玻璃仪器(A级)	允许误差/mL	标准不确定度/mL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1 ml 单标移液管	±0.007	0.00286	$\frac{u_{v,1}}{v} = 0.00286$
10 ml 单标移液管	±0.020	0.00816	$\frac{u_{v,10}}{v} = 0.000816$
50ml 单标容量瓶	±0.050	0.0204	$\frac{u_{v,50}}{v} = 0.000204$
100 ml 单标容量瓶	±0.100	0.0408	$\frac{u_{v,100}}{v} = 0.000408$

(2) 样品重复测定引入的不确定度 $\mu_{c,2}$

重复性测样品7次(10.52, 10.14, 10.44, 10.33, 10.38, 10.53, 10.40 $\mu\text{g/L}$; 平均值 10.39 $\mu\text{g/L}$)引入的

表6 校准曲线引入不确定度及相关数据

元素	不确定度及相关数据									
	S_y	C_1	C	p	S_{cc}	n	b	x	$u_{c,3}$	$\frac{u_{c,3}}{C_1}$
铬(Cr)	0.0017	10.39	9.43	7	293.7276	7	0.01530	10.42	0.062	0.00597

(4) 合成样品测定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u_c = \sqrt{u_{c,1}^2 + u_{c,2}^2 + u_{c,3}^2} =$$

$$\sqrt{0.1164^2 + 0.1629^2 + 0.062^2} = 0.2096 \text{ ug/L};$$

$$\frac{u_c}{C} = \frac{2.3394}{10.39} = 0.02017。$$

3.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连续测定谷物中铬不确定度来源及标准不确定度值见表7。由表7数据计算

表7 谷物中铬测定的各个不确定度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名称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值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值
样品称量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frac{u(m)}{m}$	0.00015	样品称量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样品消解、定容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frac{u_v}{v}$	0.001037	容量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mu_{v,1}$)	$u_{v,1} = 0.000816 \text{ mL}$
		容量瓶因温度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mu_{v,2}$)	$u_{v,2} = 0.00606 \text{ mL}$
		定容估读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mu_{v,3}$)	$u_{v,3} = 0.00204 \text{ mL}$
样品测量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frac{u(c)}{C}$	0.02017	标准储备液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mu_{c,1,1}$)	$\mu_{c,1,1} = 0.00404 \text{ mg/L}$
		标准溶液配制过程中玻璃仪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mu_{c,1,2}$)	$\mu_{c,1,2} = 0.11640 \mu\text{g/L}$
		样品重复测定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mu_{c,2}$)	$\mu_{c,2,3} = 0.06290 \mu\text{g/L}$
		标准曲线拟合求得样品浓度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mu_{c,3}$)	$\mu_{c,3} = 0.0620 \mu\text{g/L}$

标准不确定度属于A类不确定度,则 $\mu_{c,2} = S =$

$$\sqrt{\frac{\sum_{i=1}^n (C_1 - \bar{C})^2}{n-1}} = \sqrt{\frac{0.1325}{5}} = 0.1629 \text{ (}\mu\text{g/L)}。$$

(3) 标准曲线拟合求得样品浓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mu_{c,3}$

最小二乘法拟合校准曲线标准得出 C_1 时会产生不确定度,则 C_1 的标准不确定度^[10,12-13] $u_{c,3} = \frac{S_y}{b}$

$$\sqrt{\frac{1}{p} + \frac{1}{n} + \frac{(C_1 - C)^2}{S_{cc}}}, S_y = \sqrt{\frac{\sum_{i=1}^n [A_i - (a + bc_i)]^2}{n-2}}。$$

其中: C_1 —校准曲线求得样品浓度,ng/mL; S_y —求得标准溶液吸光度的残余的标准差; S_{cc} —标准溶液浓度的残余的平方和; n —为标准溶液测定次数; p — C_1 测定次数; C —校准曲线的标准溶液的平均浓度,ng/mL; $\mu_{c,3}$ — C_1 的标准不确定度,ng/mL; b —斜率,计算结果及数据见表6。由表6可知,铬校准曲线引入 $u_{c,3}$ 不确定度分别为 0.062 ng/ml; 相对不确

定度 $\frac{u_{c,3}}{C_1} = \frac{0.062}{10.39} = 0.00597。$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frac{u_x}{x} = \sqrt{\left[\frac{u_m}{m}\right]^2 + \left[\frac{u_v}{v}\right]^2 + \left[\frac{u_c}{C}\right]^2} =$$

$$\sqrt{0.00015^2 + 0.001037^2 + 0.02017^2} = 0.0202;$$

$$X = \frac{(C_1 - C_2) \times V_1}{m \times 1000} = \frac{10.39 \times 10}{0.5 \times 1000} =$$

$$0.2078 \text{ mg/kg};$$

$$u_x = 0.0202 \times 0.2078 = 0.0042 \text{ mg/kg}。$$

3.5 扩展不确定度

扩展不确定度(置信度 95%, $k = 2$): $u_k = k \times u(x) = 2 \times 0.0042 = 0.0084 \text{ mg/kg}$ 。

结果表明,样品中铬的含量为 $(0.2078 \pm 0.0084) \text{ mg/kg}$ 。

4 结果与分析

谷物是我国重要的粮食,提高谷物检测技术是保障农产品安全和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本文建立的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连续测定谷物中铅、铬、镉的方法,能够满足谷物中重金属测定要求。该方法不仅有效解决了单个样品多检测指标不能连续、高效测定的问题,而且具有灵敏度、准确性和精密度高,简便稳定,节省试剂等优点。不确定评定表明该方法不确定度分量小,实验结果受实验过程的影响小。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7.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GB 5009.12-2017[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7.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铬的测定:GB 5009.123-2014.[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5.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GB 5009.15-2014[S]. 北京:中

国标准出版社,2015.

- [5] 郭艳华,吴旺喜,张玉敏,等. 食品中有害无机元素镉的含量测定方法比较[J]. 江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44(6):514-519.
- [6] 鞠兴荣,袁建. 食品中限量元素分析样品的预处理技术进展[J]. 食品科学,2004,25(2):199-203.
- [7] 许兰淑,周金池.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环境及食品样品中痕量元素的样品前处理方法的研究进展[J]. 理化检验(化学分册),2016,52(2):244-248.
- [8] CAC. Codex General Standard for Contaminants and Toxins in Food and Feed: Codex Standard 193-1995 (Amended 2010) [S/OL]. [2019-02-10]. <https://wenku.baidu.com/view/dcd3ddb7680203d8ce2f2477.html>.
- [9] EC 629-2008 欧盟关于食品污染物最高限量 [EB/OL]. [2019-02-10]. <http://www.docin.com/p-487058593.html>.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与表示:JJG 1059.1-2012 [Z]. 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2013.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常用玻璃量器:JJG 196-2006[Z]. 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2007.
- [12] 杨凤华. 微波消解法测定食品中铅、镉、铁、锰、铜和锌及其不确定度评估[J].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07,27(7):1440-1443.
- [13] 刘红艳,周燕,王铁夫,等. ICP-MS 法测土壤样品中铜、铅的不确定度评定[J].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11,31(4):1115-1118.

(责任编辑 姚虹)

Determination of Lead, Chromium, Cadmium in Grain by Furnac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and Evaluation of its uncertainty

ZHANG Qiang^{1,2}, XU Hui^{1,2}, CAO Yali^{3,4}, WANG Ping^{1,2}, ZHANG Xiaoqin^{1,2}

(1. Suining Agricultural Bureau, Suining, Sichuan 629000, China; 2. Suining Agricultural Product Inspection and Monitoring Center, Suining, Si chuan 629000, China; 3. Light Industry Research and Design Institute of Si chuan,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hina; 4. National Light Industry Food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Testing Station,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hina)

Abstract: A wet digestion graphite was established for continuous determination of lead, chromium and cadmium in cereals. The detection limits of lead, chromium and cadmium are 0.020, 0.013 and 0.0013 mg/kg, respectively; It ha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in the range of 0~30, 0~3.5 and 0~20 ng/mL; The high, medium and low concentrations are 98.97%~104.34%, 97.13%~104.20%, 98.93%~104.23%, respectively, and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is 1.72%~6.47%, 3.34%~5.31%, 4.03%~6.44%. The technical indicators of this method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easurement and can be used for continuous determination of lead, chromium and cadmium in cereals.

Key words: grain; furnac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lead; chromium; cadmium; uncertainty

共享平台建设背景下云计算 在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开发中的应用前景

孔 健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系,安徽 合肥 231000)

摘要:我国逐步进入老年化社会,老人智能看护系统的开发前景广阔。基于共享平台建设背景,运用云计算实现老人智能看护系统的设计,构建了一个云计算下的共享平台,分析了云计算平台系统体系及总体架构,实现对云数据的处理,提高系统的整体应用扩展功能。

关键词:云计算;共享平台;看护系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5.024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5-0125-04

随着我国国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质量的提高、社会结构的发展等,人们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同时,新生儿的出生率在下降,我国已经逐步迈入了人口老龄化的门槛。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活护理能力逐渐降低,对老人的看护问题使得多数家庭压力倍增,老人智能看护系统随之出现,它能实现对老人的智能化看护^[1]。

云计算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超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技术,通过专用的软件自动处理收集到的资源,能动态申请资源保证应用程序的运行^[2-4]。云计算构建了看护人员和老人之间的联系,提高了看护人员的服务质量;云存储的数据中心管理模式较为简单,通用性成本逐步降低,资源利用率也逐步提高。监护人能实时监控看护人的行为,实现远程数据控制管理,同时也能对监护人进行信息查询以及管理平台,构建新型高效的管理模式,提高了看护工作的精确性和数据共享性。

1 基于云计算的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开发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可利用计算手段实现对老人的智能看护和行为监控。从基本的老人行为检测预警到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基本包含老人基本信息的采集、记录、存储、分析等内容,例如老人是否跌倒、行走路线等,这就包含了传感器的应用、

数据的硬件采集、行为检测设计以及计算。当老人危险行为发生时,系统会直接触动异常报警机制,实现看护人对老人的实时看护以及监督,并反馈给医生进行远程访问。设计基于云计算的老人智能看护系统,能够满足大量的老人看护系统的应用需求,实现多功能看护及高扩展性等,大大降低了老人看护成本^[5]。

1.1 系统整体设计

老人行为在白天和晚上是有区别的,本文分别设计白天和夜晚两种老人行为检测模式,并通过压力传感器来进行数据的获取。一旦老人发生了危险状况,系统能直接实现报警信息的推送;正常作息时间的记录以及分析能够快速检测到老人的异常行为。

老人智能看护系统中的硬件设备主要有单片机和压力垫,并使用 Zigbee 进行组网,将老人的信息收集到中心节点中。中心节点将信息发送给移动端并转发到后台服务器中,看护人员可直接通过移动端实时查看老人的作息生活情况,从而加强对老人的看护。

老人智能看护系统架构如图 1 所示。数据采集和处理主要包含了各种传感器和单片机等硬件对原始数据的采集,并通过 Zigbee 发送端将采集到的数

收稿日期:2019-04-10

作者简介:孔健(1980—),男,安徽合肥人,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讲师,研究方向:电子科学。

据转发到 Zigbee 数据中心节点中;数据转发则是将网络中的数据通过网络进行传输,以此来实现对数据的转发。这两个步骤通过特定协议完成原始数据的采集和转发,并通过 Zigbee 中心节点由网络传输到云平台上。云平台首先会接收 Zigbee 传输来的数据,并将其保存在数据服务器中,接下来通过数据处理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最后将处理后的数据保存到网站服务器中,以供前台进行调用。用户访问终端则能够实现对云平台的交互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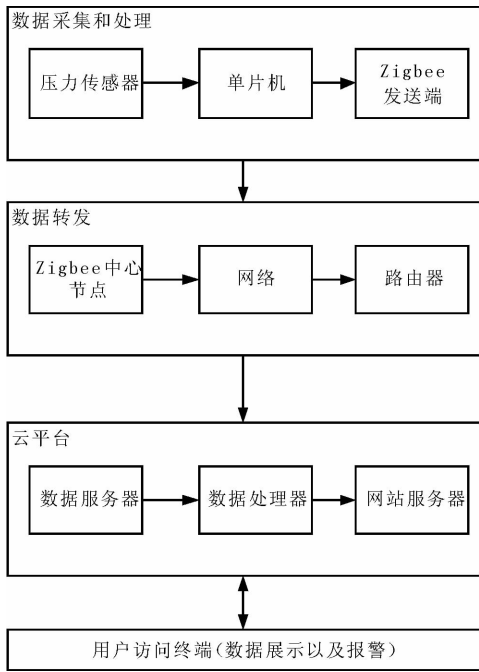


图1 老人智能看护系统架构图

1.2 基础数据模块

基础数据模块包含数据采集处理层以及数据转发层^[6-7]。通过压力传感器中的信号变换将其转换为 Zigbee 发送端能够处理的二进制数据;Zigbee 中心节点在接收到发送端传输过来的数据后,应用网络路由器等对数据进行转发,实现对后台服务器中的 socket 连接,并将其转换为设计的格式对数据进行转发,具体流程如图2所示。

1.3 云平台模块

云平台模块是为了能够实现智能的老人看护,在各个层面中提供了移动端的网络用户接口支持,例如老人管理、设备管理、报警管理、权限管理等基本数据服务器。同时,当运行了老人看护系统时,通过 socket 来接收设备发送的消息并进行数据类型的判断,以此获取得到最新的老人行为预判,可以直接根据行为判断对比分析,得出异常的老人行为,最后综合分析老人平常的作息时间以及动作规则来实现报警,将报警信息发送给老人的联系人或常用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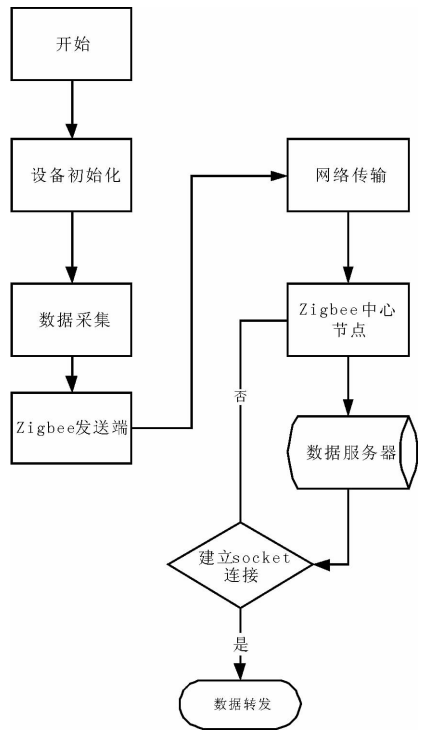


图2 基础数据处理流程图

联系人,实现对老人的智能看护^[8]。云平台功能模块图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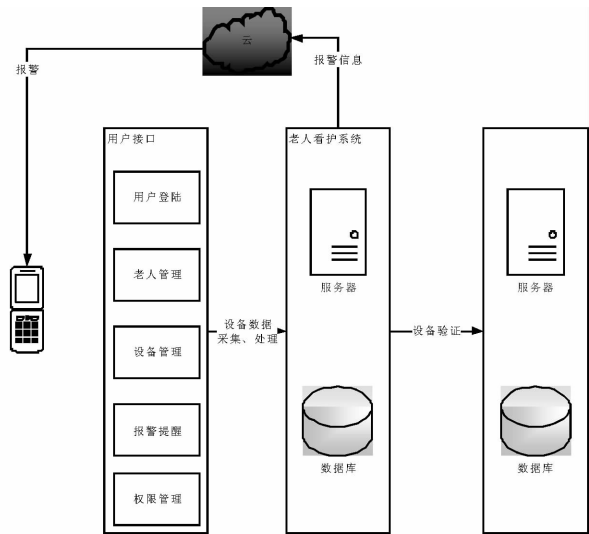


图3 云平台功能模块图

该功能模块应用移动端进行账号的注册、登陆,并对老人的设备进行添加,同时对基层的硬件设备进行的管理,以此来实现数据的传输、转换管理。对权限管理分配不同的管理人员,这就保证了数据的管理安全。不同的网络都能接入到系统中进行登陆及注册,同一个用户可以绑定固定的设备和多个老人信息,满足用户实时监控老人行为的需求。在移动客户端中可以对老人信息进行管理,并对老人行为正常值以及异常值进行设置,实现对老人基本行为进行重点看护。

基于云计算下的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应用的是传感器硬件来实现的数据采集,避免了传统方式的不便,例如在设备没电时有些老人容易忘记及时充电,造成采集数据缺失。

2 共享平台建设背景下老人智能看护系统的应用前景

老人智能看护系统中有大量的数据需要处理,且使用的是传统的 B/S 模式,随着需要看护的老人逐渐增多,可以对一些老人信息进行整合共享或改进,这就需要对老人看护系统进行应用规划。

在智能老人看护系统中有众多的服务器,一些硬件资源没有得到较好的重复利用,造成资源浪费。社区公共资源可以实现共享,例如老人的个人信息资料等,这就需要进一步整合存储资料,构建一套公共资源信息库,以此提高对资源的访问以及获取,同时也能够降低对服务器等的后期维护管理,将更多精力专注在老人智能看护管理上。

2.1 结构体系

在共享平台建设背景下,应用云计算对老人智能看护系统进行结构设计并搭建共享平台,结构体系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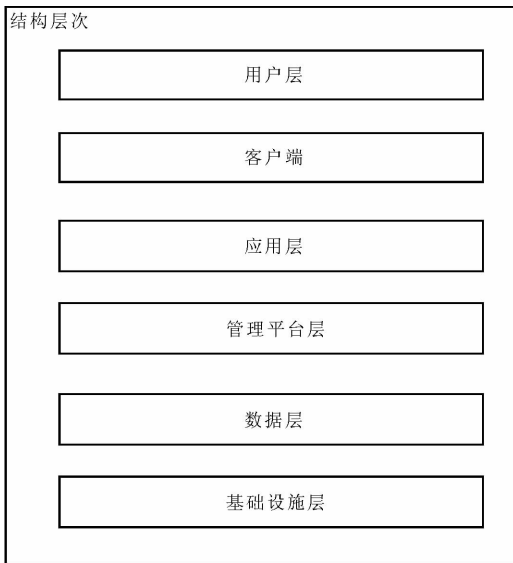


图 4 结构体系图

用户层包含了老人、看护人等常规用户,有的可添加家庭医生。共享老人智能看护系统的用户能够在线对老人信息中的基本行为以及作息时间表进行下载,同时还能在小区范围内设置老人小组,实现老人之间的交流以及情况对比,这也能促进老人精神上的满足。

客户端则是移动设备端,是直接实现系统后台和用户之间数据联系的媒介,将后台数据内容直接呈现给用户,实现云端到移动设备之间的直接访问。

应用层是整个智能老人看护系统中的核心支架部分,它不直接承载任何的数据,却连接了客户端和后台数据,支撑了老人看护系统中的应用软件。

管理平台层主要负责部署系统环境,还包含了相关的任务分配以及资源调度等相关工作,对提高整个体系的运行效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数据层可以实现平台中所有存储数据的共享,该层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一套基本的老人行为信息资源库,在云端能够实现对老人行为信息的存储。由于采集到的是不同行为的数据,数据类型结构也不一致,同时还会有各种不同的视频、图片等非结构化信息,需要进行数据的对照,实现管理、存储、读取结合统一。

基础设施层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对底层的硬件设备进行管理,包含服务器、存储空间、传感器设备等,采用云计算整合分布的存储资源,并虚拟为一个数据“存储池”,集群统一调度管理虚拟的云计算服务平台。云计算的高计算能力能够为共享平台提供海量的存储空间以及处理能力。

2.2 共享平台构建

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共享平台建设中云计算的应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共享平台构建图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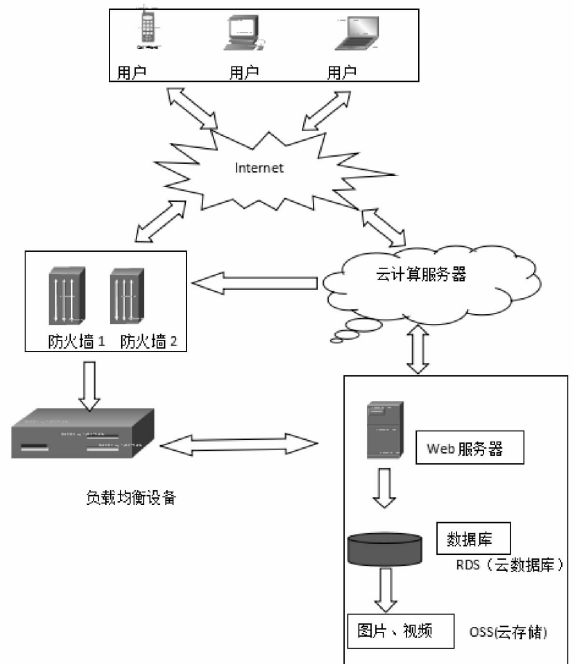


图 5 共享平台构建图

云计算服务器是看护系统的关键部分,具备优良的扩展性,能使看护系统性能稳定、高效运行。当访问服务器的在线用户较多时,负载均衡设备能够动态地合理调度硬件资源,提高网络的服务功能,进一步提高用户的个人体验感。云数据库能将老人的

基本行为信息等结构化类型数据存储在云数据库中,云存储能够更好地实现服务器资源的进一步改进,这就需要开放存储服务,并将一些非结构化类型数据,例如图片、视频、音频等都存储在该部分。Web 服务使得用户能够更好地访问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及时查看被看护老人的基本信息、个人行为、异常行为等,能够提供更好的计算能力。云服务可以对一些不对外公布的基础个人隐私数据进行存储,确保个人隐私数据的安全,防止出现老人个人行为以及基本病情信息等的泄露,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2.3 共享平台背景下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应用前景

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家庭养老压力的剧增以及社会负担的增长,促进了老人智能看护系统的推广和发展。共享平台建设背景下云计算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借助云计算的高速处理能力,能够整合家庭、社会公共组织等养老基础数据资源,并将其提供的各类服务分门别类地收集在云系统中,从而加强老人和专业看护人员或家庭看护人员之间的联系,提高对服务内容的传递。云计算中的远程管理以及数据传输功能,不仅能够加强对老人日常行为的检测以及异常行为的监督,而且可以高效完成数据的加工处理和统计,能够实时监测老人的行为,建立一种高效的管理模式,提高看护工作的精确性和数据的共享性。

3 结语

基于云计算的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共享平台,能够直接采集到老人的基本行为和个人信息,同时分

析老人的正常作息行为,能对老人异常行为进行分析和进行报警处理。系统需要较多的智能传感器设备,需要进一步提高计算能力。应用云计算的高性能计算能力处理老人行为信息资源库,可以增强用户的个人体验,提高对老人的看护能力。

参考文献:

- [1] 田进婷,王亮.一种基于云计算的老年人一站式智能综合知识服务系统:CN103914794A[P].2014-07-09.
- [2] 杨君仪,徐晓龙,莫华清,等.一种基于云计算的老年人健康监测系统设计[J].微处理机,2016,37(4):71-74.
- [3] 卢剑炜.基于云计算的老人关爱系统的设计与开发[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6,12(13):82-83.
- [4] 孟宪明,孟大海,薛定华,等.一种基于云技术的老年服务中心智慧集成管理平台:CN106056513A[P].2016-10-26.
- [5] 许继勇,舒明雷,周书旺,等.基于云平台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系统设计与实现[J].山东科学,2017,30(5):117-122.
- [6] 黄凌霄.互联网+智能居家养老看护系统的研究与设计[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8,37(3):40-43.
- [7] 吴非,崔岩,张建伟.基于健康、养老大数据云计算服务平台的研究与应用[J].中国发展,2017,17(6):68-71.
- [8] 陈莉琳.福建省东南健康医疗大数据汇聚平台架构设计与应用前景分析[J].福建电脑,2017,33(10):89-90.

(责任编辑 姚虹)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Cloud Compu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Intelligent Care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har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KONG Jian

(Depart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Hefei Kindergarten Teachers College, Hefei, Anhui 2310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entering the aging society, which improve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intelligent care system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haring platform, this paper uses cloud computing to realize the elderly intelligent care, constructs a sharing platform under cloud computing, and analyzes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which can improve the overall appl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elderly caring.

Key words: cloud computing; sharing platform; nursing system